

三联

生活

2016.11.7  
2016年第45期  
www.lifeweek.com.cn

周刊

# 巴黎高师： 法国精英制造

## 共和国传统与知识分子摇篮



911



4.5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国内统一刊号：ISSN11-3603

CN11-3221/C

生活周刊

邮发代号：82-20 定价：¥15元



《旁观者》(英国) 2016.10.29

## 另一种胜利

距离法国总统大选还有6个月，最新民调显示，引人注目的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主席玛丽娜·勒庞这次估计胜算不大，但她会放眼于2022年。面对法国目前亟待解决的社会治安、恐怖主义、移民和经济问题，法国共和党党魁萨科齐强硬激烈，另一位共和党参选人朱佩着力平稳，而勒庞的势头则折射出法国社会更深层的困境。



1 《经济学家》(美国) 2016.10.29

### 加拿大榜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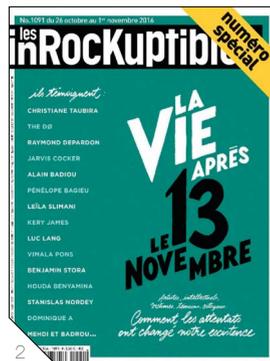
美国两位总统候选人都反对贸易自由主义政策，英国公投脱欧，德国总理默克尔因为向叙利亚难民敞开大门而连续遭遇政治挫折，西方世界的全球化之路举步维艰。与此同时，加拿大在总理特鲁多的领导下，去年接收了3.3万名叙利亚难民，积极推进自由贸易，加大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为中产阶级减税，颇有成效，成为西方国家中包容与开放新的榜样。



3 《纽约客》(美国) 2016.10.31

### 把大选写成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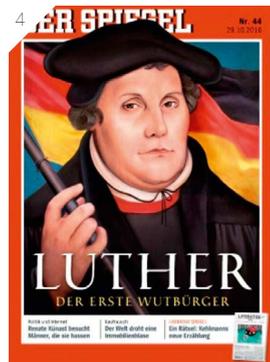
若干年后，充满戏剧性的2016年美国大选或许会留影在一部历史小说中。希拉里是一个较为丰满且具一定代表性的人物，对能随时进入战备状态的她而言，似乎有关梦想的自我实现都已迟到。特朗普更像是小说中的扁平人物。各色人士的命运基调都在这场现实的碰撞中潜行，当下足够精彩，一种后见之明的趣味也许可在小说中探寻。



2 《摇滚杂志》(法国) 2016.10.26

### 恐袭之后的日常生活

距离去年11月13日巴黎恐怖袭击已经过去将近一年了，巴黎人的生活还在继续着。袭击后因抗议恐怖分子公民权被剥夺而辞职的司法部长克里斯蒂亚娜·托比拉、曾历经无数灾难现场的摄影师雷蒙·德帕东、近几十年一直在讨论欧洲民族融合的哲学家阿兰·巴迪欧等众多法国大家和平常百姓一起，都在努力为自己被改变的生活做一个总结。



4 《明镜》(德国) 2016.10.29

### 近代信仰的第一个“反叛”

1517年10月31日被看作基督教自上而下的宗教改革运动的开始，从而奠定了德国新教的基础。明年将是宗教改革的500周年，《明镜》杂志将在2016至2017年推出五期系列特刊，解读这项改变欧洲发展的历史事件。本期着眼于马丁·路德和德国新教的文化历史，他因提出著名的《九十五条提纲》，成为宗教改革当之无愧的领袖。



## P30 封面故事

共和国传统与知识分子摇篮

# 巴黎高师：法国精英制造

三联生活周刊

- 34 巴黎高师：法兰西精英之路
- 48 这不是一个哲学的时代？
- 56 哲学剧场及其漫游者
- 60 我的巴黎“游学”经历
- 64 浪漫国度的数学传统
- 72 塞德里克·维拉尼：一位数学家的肖像
- 82 巴黎闹市中的理工教育
- 88 巴黎街头的博雅教育



P100 国家公园：我们到底在建什么？

## 社会

- 生态：国家公园：我们到底在建什么？ 100  
 数据：小众崛起的中国版本，并没有那么简单 118

## 经济

- 市场分析：人民币恐慌性贬值 98  
 商业：吉利为何再造新品牌？ 126

## 文化

- 话题：《行尸走肉》：末日生存和社会寓言 130  
 话题：从《欲望都市》到《离婚》：年龄和经历 136  
 戏剧：扬·克拉塔：在剧场讨论政治 140  
 电影：陈思诚：“成才”的远大前程 144  
 时尚：电商的野心 150  
 思想：快乐是一件严肃的事 156  
 书评：花衣小丑埃科 158  
 书与人：彼得·汉德克究竟需要撕掉多少标签？ 162

## 专栏

- 邢海洋：加税：高收入还是高净值 16  
 袁越：人各有命 149  
 张斌：开机看球！你到底开的是什么机？ 154  
 宋晓军：国产航母的“内在气质”是什么？ 155  
 朱德庸：大家都有病 167

(本期封面摄影：于楚众)

环球要刊速览	2	声音	21
读者来信	8	生活圆桌	22
天下	10	好东西	26
理财与消费	18	个人问题	168
好消息·坏消息	20		

2016年第45期，总第911期，2016年11月7日出版  
 版权所有，未经允许，不得转载本刊文字及图片。  
 本刊保留一切法律追究权利。



www.lifeweek.com.cn

## 主管 / 主办 Published by

主管：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主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有限公司 出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有限公司

## 总编辑 Publisher

路英勇 Lu Yingyong

## 副总编辑 Deputy Publisher

常绍民 Chang Shaomin

## 名誉主编 Honorary Editor-in-chief

朱伟 Zhu Wei

## 主编 Editor-in-chief

李鸿谷 Li Honggu

## 副主编 Deputy Editor-in-chief

李菁 Li Jing 李伟 Li Wei

## 主编助理 Associate Editor-in-chief

吴琪 Wu Qi 曾焱 Zeng Yan

## 采编中心 Editorial Center

## 资深主笔 Senior Editor

邢海洋 Xing Haiyang 王小峰 Wang Xiaofeng 谢九 Xie Jiu

袁越 Yuan Yue 陈晓 Chen Xiao 王星 Wang Xing

## 主笔 Editor

李三 Li San 鲁伊 Lu Yi 钟和晏 Zhong Heyan

薛巍 Xue Wei 陈赛 Chen Sai 葛维樱 Ge Weiyang

贾冬婷 Jia Dongting 蒲实 Pu Shi 徐菁菁 Xu Jingjing

杨璐 Yang Lu

## 主任记者 Senior Reporter

李翊 Li Yi 关海彤 Guan Haitong 李晶晶 Li Jingjing

蔡小川 Cai Xiaochuan 曹玲 Cao Ling 何潇 He Xiao

黑麦 Hei Mai 程磊 Cheng Lei 石鸣 Shi Ming 丘濂 Qiu Lian

吴丽玮 Wu Liwei 俞力莎 Yu Lisha 王丹阳 Wang Danyang

## 记者 Reporter

邱杨 Qiu Yang 付晓英 Fu Xiaoying 孙若茜 Sun Ruoxi

杨聃 Yang Dan 张若凡 Zhang Ruofan 刘敏 Liu Min

张月寒 Zhang Yuehan 张星云 Zhang Xingyun 艾江涛 Ai Jiangtao

宋诗婷 Song Shiting

## 特邀撰稿人 Overseas Feature Writer

赵潇 Zhao Xiao 苗千 Miao Qian

## 摄影记者 Photographer

于楚众 Yu Chuzhong 黄宇 Huang Yu 张雷 Zhang Lei

## 视觉设计中心 Vision Design Center

## 视觉总监 Visual Director

邹俊武 Zou Junwu

## 执行图片总监 Executive Photo Director

陈晓玲 Chen Xiaoling

## 设计总监 Design Director

王小非 Wang Xiaofei

## 美术编辑 Art Editor

黄罡 Huang Gang 刘畅 Liu Chang

## 插图 Illustration Editor

张曦 Zhang Xi

## 图片编辑 Photo Editor

覃柳 Qin Liu 陈喆 Chen Zhe 韩雅丽 Han Yali

## 编务总监 Coordination Director

程昆 Cheng Kun

## 发行中心 Circulation Center

## 执行总监 Executive Director

雍江 Yong Jiang

## 副总监 Deputy Director

周旭 Zhou Xu

## 区域经理 Regional Manager

杨雪梅 Yang Xuemei 潘海艳 Pan Haiyan

## 发行助理 Circulation Assistant

李卫红 Li Weihong 刘琳瑶 Liu Linyao

## 发行财务 Financial Executive

王霄 Wang Xiao

## 发行物流 Issue Logistics

王荻 Wang Di

## 发行库管 Release Library

姚贺梅 Yao Hemei

## 读者服务经理 Reader Service Manager

朱静 Zhu Jing

## 读者服务助理 Reader Service Assistant

金宇迪 Jin Yudi

## 市场发展中心 Marketing Development Center

## 副总监 Deputy Director

钦征 Qin Zheng 傅东方 Fu Dongfang

## 新媒体事业部 New Media Development

## 总监 Director

钦征 Qin Zheng

## 内容编辑 Editor

薛苒 Xue Peng 刘彭媛 Liu Pengyuan 徐睿洽 Xu Ruihan 刘凌 Liu Ling

## 美术设计 Artistic Design

张莉 Zhang Li

## 技术支持 Technology Department

刘国强 Liu Guoqiang

## 手机产品 MB Product

辛军 Xin Jun

## 平板产品 Tablet Product

连子君 Lian Zijun

## 活动事业部 Event Department

## 总监 Director

傅东方 Fu Dongfang

## 副总监 Deputy Director

庄山 Zhuang Shan

## 运营 Operational Manager

罗启宏 Luo Qihong 邢宇 Xing Yu

## 产品经理 Product Manager

殷佳婷 Yin Jiating

## 文案 Official Documents and Letters

孙名梓 Sun Mingzi

## 活动专员 Event Executive

周宇飞 Zhou Yufei

## 视频事业部 Video Department

李倩 Li Qian 吴冰川 Wu Bingchuan 孙明楷 Sun Mingkai

## 节气刊事业部 Solar Term Department

## 执行总监 Executive Director

王晶 Wang Jing

## 设计 Design

袁媛 Yuan Yuan

## 创新产品中心 Innovative Products Center

## 松果事业部 Songguo Department

## 总监 Director

魏一平 Wei Yiping

## 运营部 Operational Manager

宋洋 Song Yang 李晓楠 Li Xiaonan 赵夫宏 Zhao Fuhong 孙正之 Sun Zhengzhi

张倩娜 Zhang Qianna 周扬 Zhou Yang 陆汉夫 Lu HanFu 牛家欢 Niu Jiahuan 陈璐 Chen Lu

## 市场部 Marketing Department

夏青 Xia Qing 李璐 Li Lu 尤帆 You Fan 奚牧凉 Xi Muliang 李加贝 Li Jiabei

陈陌陌 Chen Moyang 韩蕾 Han Lei

## 行政 Administration

叶秋菊 Ye Qiujie

## 行政管理中心 Administration Center

行政主任 Office Manager

高媛 Gao Yuan

行政助理 Assistant

刘蓓 Liu Bei 吴泓林 Wu Honglin

财务总监 Financial Director

郝大超 Hao Dachao

财务主任 Financial Controller

陈晓华 Chen Xiaohua

出纳 Accountant

张宇 Zhang Yu 李明洋 Li Mingyang

法律顾问 Legal Counsel

金桥律师事务所 马眉 Ma Mei

社址：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9号B座 邮编：100125

采编中心热线电话：

(010)84681030 84681029 (传真)

E-mail: letter@lifeweek.com.cn

读者服务热线电话：

(010)84050425/51

E-mail: dzfw@lifeweek.com.cn

印刷：北京利丰雅高长城印刷有限公司

电话：(010) 59011318

物流总代理：北京双不物流有限公司

电话：(010) 61256299

广告许可证号：京东工商广字第 0063 号

期刊登记证号：ISSN 1005-3603 CN11-3221/C

邮发代号：82-20

定价 Price：¥15.00 \$8.00 港币 20.00

本刊为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南方航空公司、

法国航空公司、美国联合航空公司机上阅读刊物

## 如何购买 《三联生活周刊》

读者朋友，购买本刊请登录官网商城  
shop.lifeweek.com.cn

或到当地邮局办理，本刊代号：82-20

也可直接向本刊读者服务部咨询

电话：010-84050425 84050451

另外，本刊在下列城市经销商的联系电话：

上海：上海汇敦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021) 63769858

成都：四川尚和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028) 86667805

重庆：重庆弘景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23) 86359776

南京：南京星与火文化有限公司 (025) 83327129

杭州：杭州华鸿图书有限公司 (0571) 88256120

广州：南方都市报广州发行部 (020) 87376490

武汉：武汉春秋书店 (027) 85493562

西安：陕西五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29) 82100585

昆明：昆明尚云图书报刊有限公司 (0871) 64122816

沈阳：大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24) 23934765

哈尔滨：志诚远大书刊公司 (0451) 88341879

青岛：盛世飞龙图书有限公司 (0532) 83840608

济南：山东前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531) 82903395

长春：吉林九歌图书有限公司 (0431) 82752206

大连：大连渤海书店 (0411) 84609410

南昌：江西省邮政报刊零售公司 (0791) 88820509

太原：山西森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351) 7065397

贵阳：贵阳尚和图书报刊有限公司 (0851) 5661974

兰州：兰州大漠天马图书有限公司 (0931) 8521090

郑州：河南大河书局有限公司 (0371) 67647337

天津：天津天智书店 (022) 23683854

河北：石家庄远大书店 (0311) 83993043

安徽：合肥皖新书店 (0551) 64252409

新疆：乌鲁木齐市纵横文书刊有限公司 (0991) 5582981

内蒙古：呼和浩特融联书店 (0471) 6263358

深圳：深圳市新宏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755) 22203426

长沙：湖南国闻书局书报刊配送有限公司 (0731) 82253036

## 本期广告目录

封二~扉1 · 波音

3 · 力度形象

17 · 周刊征订

87 · 一汽大众

97 · 周刊20年

125 · WWF

128~129 · 红牛软文

143 · 麦语云栖软文

161 · 书店广告

封三 · 野生救援

封底 · 歌诗达邮轮



拍摄二维码直接  
下载客户端



新浪微博 @ 三联生活  
周刊或扫描二维码



微信搜索 Lifeweek  
或扫描二维码



扫描二维码下载  
松鼠 APP

手机报订阅：移动用户发送短信 SLZK 到 10658000，电信用户发送短信 SLZK 到 10659000。包月 8 元，周一至周六每日一期。

网络支持



新浪网官方微博：http://weibo.com/lifeweek

腾讯网官方 QQ:800033183

## 力度国际文化传媒集团

《三联生活周刊》  
全媒体广告独家代理商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外大街9号

齐家园外交公寓7-5-13

邮编：100600

电话：+86 10 85325466

传真：+86 10 85324800

电邮：vtpower@vtpower.com.cn

网址：www.vtpower.com.cn

Vtpower  
VITALPOWER MEDIA  
力度国际文化传媒集团



## 不安的中东

两次伊战得与失，东西方各有评价，体现相异的意识形态对抗。就我而言，最不堪面对的是血腥屠杀。刚刚看到消息，在伊拉克第二大城市摩苏尔，有190名人质和40名不愿配合的村民被“伊斯兰国”恐怖分子杀害。正痛心中，就收到这期杂志，封面上伊拉克老人背影中透出的苍凉和无力更激起我的愤怒。伊政府军总攻摩苏尔，但未来能有永久和平吗？叙利亚的“伊斯兰国”大本营尚在，国际间各种势力在叙的较量最终会使其获得生存空间，谁敢乐观？从伊拉克到中东，未来的世界会更好吗？巴勒斯坦人投千作词的《我的家乡》被伊政府用作国歌——“青年们满怀豪情为您的独立奋斗，我们宁愿牺牲也不做敌人的奴隶，/我们要摆脱常年耻辱和悲惨生活，/我们将重现我们的荣耀，/我的家乡，我的家乡！”这歌词中的誓言能成为伊拉克以及中东未来的希望吗？

济南 董家耀

## 尴尬的童书店

我所在的学校位于县城郊区，这几年生源暴增，小小的一所小学三四年间学生人数翻了一番，已经超过1000人。而小学附近二三百米内就有三家幼儿园，大概有七八百幼儿入园。我们学校辐射范围较大，有些学生的家距离学校七八里，学校附近2公里内居民也超过5000人。不过因为离县城太近，学校门前的大街还不如乡村集镇热闹，近2里长的街道大部分路段只有一侧有门面房，而且看起来半数都没什么生意。生意也单调，除了两三家卖农具的，剩下的主要就是只有七八十平方米却挂着“超市”牌子的日用杂货店，还有两家难得有顾客的饭馆。整条街道大部分时间都冷冷清清，过往车辆也不太多。

也就只有学校门口热闹些，上学和放学时间数百辆电动助力车和三轮车简直要把学校门前的一段路封了。就在这三四年里，原来只有一家生意没起色的早餐店在学校对面，现在30米内就有5家在竞争，还有三四个卖豆浆、鸡蛋灌饼之类的小推车每天早上也支在路边凑热闹，这使得附近门面房的租金一下子就从每间每年七八百元涨到了四五千元，连附近的住房租金也水涨船高了。

这让我也看到了一个机会——在这里开个小小的少儿书店，应该不错吧。这里跟城区隔条河，离最近的书店也有五六里，书摊也极少有人来摆。哪怕每个学生和幼儿园小朋友一年购买5本书，生意就可以了。而且，因为我经常上网给孩子购书，有时也帮助学生购书，发现几家比较值得信任的网站在正版书搞活动时二三折就可以拿到，比县城超市卖的盗版书还便宜。于是，今年秋季开学前，我帮亲戚在学校对面租了一个只有十几平方米的门面房，开了一个童书店，凭借我对小学生阅读兴趣的了解，购进几百种国内外经典名著和经

典童话、优秀儿童绘本、儿童科普图书等等，有一部分还是比较适合小学生阅读的注音图书。即使从培养孩子的读书兴趣、提高学习成绩的角度说，这个小书店也应该受到学生和家长的欢迎啊。

然而，我过于乐观了。亲戚抱怨，从开店到现在的一个多月里，大部分日子都没有一个顾客进门，图书基本都是以半价出售，也只卖了十几本，赚的钱连房租都不够。好多人建议主营教辅之类，的确，不说别的，就只卖“作文选”的话，开学一个月就能赚几百元，只是我对教辅类一直不“感冒”，忽略了这方面的信息，让亲戚错失了赚钱的机会。还有让亲戚很尴尬的事，不时会有人进店要买作业本和文具。

据亲戚讲，偶尔进店的顾客也大多“不识货”，即使半价售书，仍然嫌书贵，他们总是说，县城一家超市里的书更便宜。他们并不在乎什么正版盗版，还有人质疑：“正版盗版不都一样读吗？”尤其是幼儿绘本，“哄哄小孩子而已，有个画能看不就行了？”有些孩子想要书，家长却不舍得买；更多孩子走过书店门口，眼神里一点兴奋都没有，显然想都没想过进去看看。现在，亲戚已经不再进货，到路边摆起地摊，想赶快把货处理掉。也许，年底这个小小的童书店就要关门了。

河南唐河 温凉河

## 在北京买燃气

近日，家里燃气表显示数字不多了，因买燃气只能到建行，而住家附近又没有建行，就想利用上班中午休息时间到单位附近的建行买。

本以为最多几分钟搞定的事情，但到银行却被告知，燃气公司在更新系统，关闭了自助机购买功能，买燃气只能取号等着去柜台办理。中午窗口少，人又莫名的多，等了将近一个小时才把燃气买上，总算舒了口气，但又郁闷简单的缴费为什么搞得这么

费劲。想起前段时间朋友偶然聊起买燃气的事，他也有同感。朋友某天放假在家做午饭，开着火炒菜正在兴头上时，灶火突然灭了，试了半天也不行，自己查了半天也不知道原因。打电话叫物业维修，一语惊醒，燃气没字了。最近的建行离朋友家也要半个小时，加上排队时间，朋友饿着肚子等买好燃气已经过了一个小时，全家人已经等不及，只好先到附近的餐馆吃午饭了，留着炒到一半未熟的菜晾在锅里。

经过实践受教育之后，自己也想了解更多知识。为此，通过网络、96777电话咨询了解了北京燃气公司有关缴纳燃气费的规定。北京居民现在有两种燃气表：一种是老式的没有插卡功能的，这种表需要人工查字，一般工作人员也不一定每月都到你家来，可能某天在你家门口贴张条，请你把家里燃气表上的字短信发给他，再过一段时间一张燃气缴费单就贴到家门口了。即使你不报字，燃气公司那边也有记录，燃气缴费单也会按时贴到你家门口。96777电话告知，这种表可以通过银行柜台、网上银行、电话银行、自助设备、机顶盒和手机支付。第二种表是插卡的表，燃气公司称之为智能卡表，这种表使用的是智能卡，目前一个小区的燃气表所用的智能卡只能在某一家银行购买燃气，因为燃气公司在这个小区只跟一家银行合作，用户只能到这家固定的合作银行，通过柜台或者自助机充值购

气。我家使用的正是这第二种燃气表，说是智能卡，一点也看不出其优势在哪里。据我所知，有的小区只能在北京银行购气，智能卡是无法在建行和北京银行之间互认购气的。所以，如果遇到燃气公司系统升级而关闭自助机功能时，就只能到柜台购买了。

其实，了解完情况后，自己的疑问却更多了，为什么燃气公司不可以跟更多的银行合作，为什么智能燃气表不可以跟智能电表一样直接通过网络渠道或者多家银行购买，为什么所谓的智能卡表比人工查表缴费更为复杂？我自然也不明白，为什么系统升级不在没有购气需求的夜间进行？即便智能卡是银行各自发放的，银联早都让各家银行业务大联合了，购气问题真那么难兼容吗？

这些问题不知燃气公司的员工在日常生活中有没有遇到过，或者想到过？公共事业尤其是水、电、燃气等是居民每天都要用到的基础能源，是关系到每一个普通百姓能否正常生活的民生大事，是否应该想着如何利用信息技术和网络互联更好地提升服务、方便百姓，而不是以不变应万变的老旧服务方式维持公司收费即可？

北京 田滨

### “医保”全国“通保”，难吗？

笔者曾经是省、市、区三级政协委员，在任时对医保问题有过多项调查研究，当时感到很多离退休人员以

及常年有出差、旅游、打工等情况的人对“医保”全国“通保”非常在意，出于责任感，曾在不同层级的政协（包括委托全国政协委员）无数次提出过关于尽快实施“‘医保’全国‘通保’”的提案、建议。但一直处于“软打整”而没有任何“硬举措”的状态。

医保报销之难，特别是在本人2008年从工作40多年的贵州退休回到生我养我的重庆与家人团聚后，才有了更加切身的体验：手里虽然握有在贵州参保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障卡》（俗称“医保卡”，仍有“银联卡”标识），倘若在重庆有头痛脑热三病两痛的，“医保卡”根本派不上用场；只好每年把“医保卡”寄回原参加医保的工作地请人购买大量常用药品寄来以防万一。后来有了可在异地指定医院“有条件”地住院就医、回参保地报销医药费之“新规”，但要按照以下程序操作：①本人工作地医保部门领表、填表；②现居住地指定两家三甲、一家二甲医院盖章认可；③需要这些医院所在地医保部门盖章确认；④把盖完所有章的表拿回原单位，交医保部门审批，即视为办理了“异地定点医保”手续；⑤倘若在异地生病住院（门诊不行），且要提前（至少同时）通知参保地医保部门，方可入院；⑥个人垫钱在先，出院再把发票、用药清单一并交参保地医保部门审核、报

销……一番折腾，仅报销医药费，没有仨月半年的，办不妥。且因为地域不同造成的用药差异，还经常遇到当地医保可报销而参保地不予报销的药物。

10月9日，人社部发出《关于深入学习贯彻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精神的通知》，其中提出“2017年底，基本实现符合转诊规定的异地就医住院费用直接结算”。有媒体欢呼，我说“且慢”！一是新政要到2017年底才基本实现，二是，接着又有两个前置条件：一是“符合转诊规定”，什么叫不符合“转诊规定”，岂不是预留出极大的“折腾”空间？二是重音符号打在“住院费用”，言下之意，即便生病不住院也不行！那不是变相“鼓励”一病就住院或者“挂床住院”，岂不徒费医疗资源？我就不明白，既然各地城乡医保一体化，参保人员手中的“医保卡”为什么不能如同“一地办卡存款，各地均可取、存”的“银联卡”那样——在一个地方参加医保，东西南北中都可以刷卡看门诊、购药（处方或非处方药），何必非要等到“生病住院”！其实，恰恰后者更加惠及全国人民：无论你是异地养老的、出差的、探亲的、旅游的、打工的……“‘医保卡’在手，看病吃药样样有”！想想也是，既然“银联卡”都能办到，“医保卡”全国联网还存在任何技术条件的障碍吗？！

重庆 徐宗俦



## 马拉维 | 大象“搬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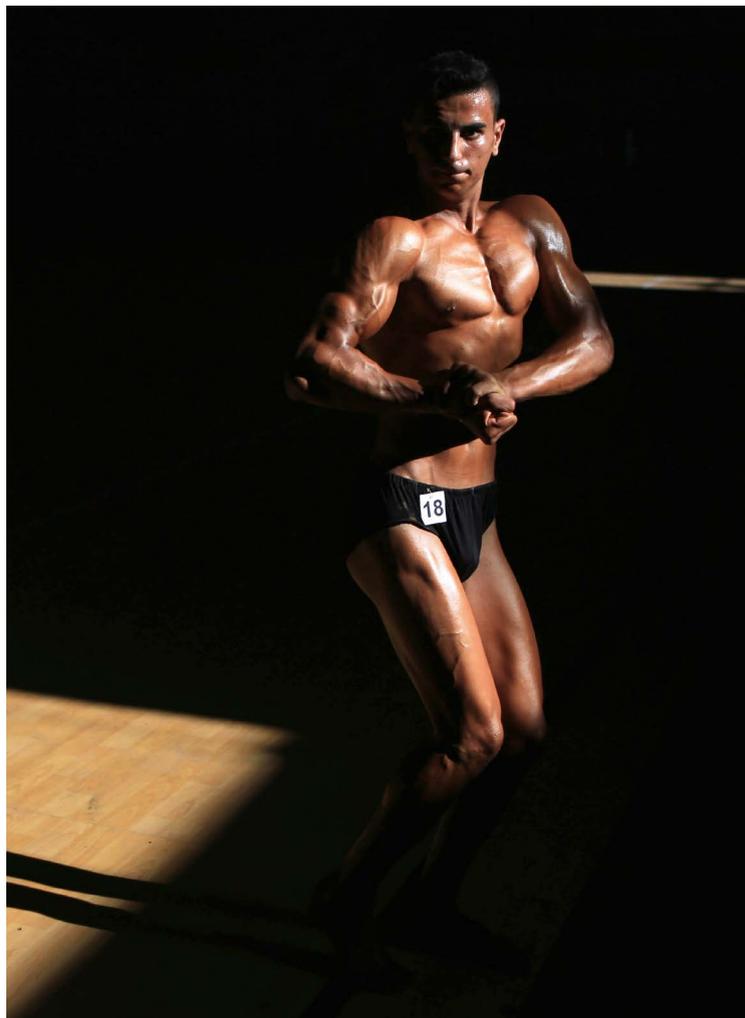
10月28日，英国哈里王子在马拉维参与保护野生动物活动，活动内容包括将500只大象从利翁代国家公园和玛杰特野生动物保护区转移至恩科塔科塔野生动物保护区(Nkhotakota Wildlife Reserve)。恩科塔科塔位于马拉维中部地区的东边，靠近马拉维湖，是该地区两大游猎区之一。





## 巴勒斯坦 | 健美大赛

(右图) 10月28日, 巴勒斯坦男子在加沙参加健美大赛。



## 澳大利亚 | 万圣节

(左页上图) 10月30日, 一名男子打扮成巫师的模样在停泊于澳大利亚悉尼港的“嘉年华精神号”邮轮旁表演滑水。当天, 表演者们扮成巫师, 为邮轮上 2600 名乘客表演各种精彩的水上运动, 以庆祝万圣节的到来。

## 加拿大 | 峡谷美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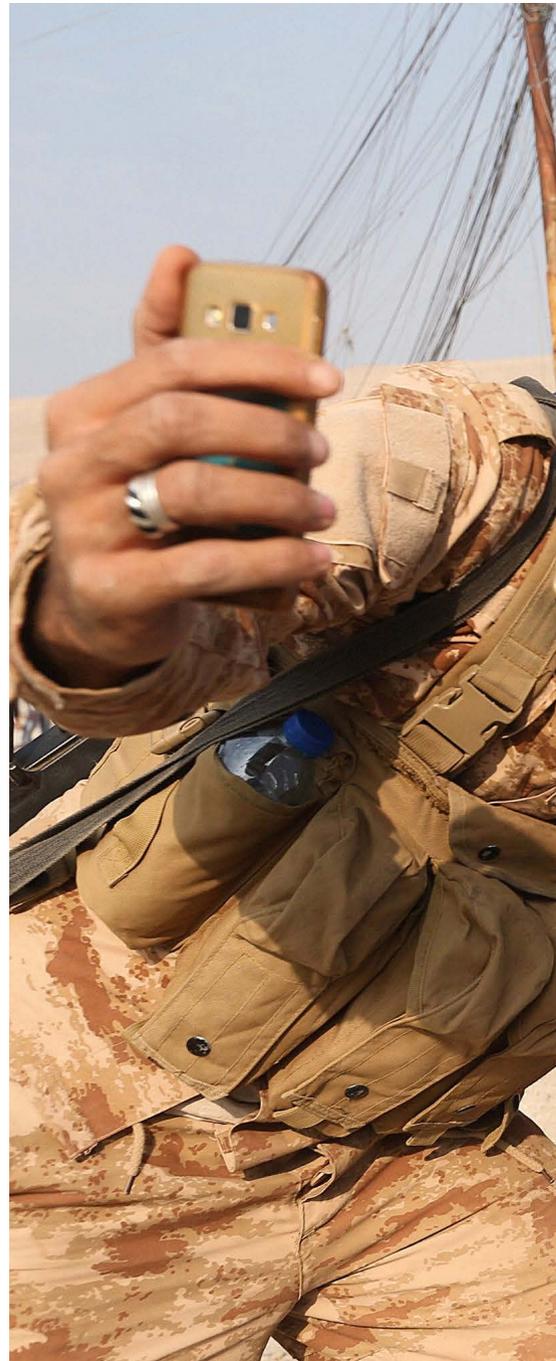
(左页下图) 加拿大育空地区卡克罗斯(Carcross)南部奇尔库特小径(Chilkoot Trail)附近一处峡谷的景色。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的祖父当年就是靠加拿大育空河流域的淘金潮发迹的。

### 伊拉克 | 胜利

(右图) 10月27日, 伊拉克政府军及库尔德武装“自由战士”成功击退“伊斯兰国”极端组织, 夺回被“伊斯兰国”控制许久的摩苏尔法迪利亚村 (Fadiliya)。图为一名库尔德战士与村里的孩子们合影。

### 希腊 | 涂鸦

(下图) 10月26日, 雅典的一栋建筑上被街头艺术家WD留下涂鸦。画面上一个女人手握着一只鸟。





# 加税：高收入还是高净值

文 / 邢海洋

“减轻中等以下收入者的税负，加大对高收入者的税收调节”的国务院意见稿在中产和准中产群体中搅动起波澜。12万元，10年前的“高收入门槛”对号入座。其实，该探讨的不是年入多少算高收入，而是靠收入养家糊口，在这个“食利”社会里越来越沦为弱势群体了。

广州杨箕村的一场千桌盛宴拉开城中村的炫富大幕，高潮是深圳水贝村每家拆迁得2亿元造谣者被刑拘。按理说，揣度他人的身价，即使是公开猜测，也顶多是国人“嚼舌根”爱好的一种表现，罪不至于进看守所，可谁让这几位小报记者触动了国人敏感的妒忌神经。深圳北站对面一片荒芜的田地上矗立着一幢“钉子楼”，建筑面积950平方米，2011年房主曾拒绝的拆迁款是2000万元。广深高铁开通，这里从城郊结合部变为寸土寸金的繁华地，加之深圳房价暴涨，如果说土地增值十倍或陷入“造谣”陷阱，上涨五六倍应该是合理的推断。城中村改造，尤其南方“握手楼”林立的城中村重建，获得十余套甚至几十套房屋补偿的村民大有人在，暴富者众，在为城市落脚而苦苦挣扎的工薪甚至高薪者眼里，当然就显得反差强烈。

2006年国税局发文要求“12万高收入”者申报至今，中国社会的总体财富急剧增长，普通人的收入提升很快，可富人财产以更快的速度膨胀。2006年《福布斯》富豪榜上的中国首富是黄光裕，其财富为181亿元，2016年这笔钱都排不到富豪榜的前80位。

2016年首富王健林的净值为330亿美元，约合2220亿元人民币。10年间，首富财富增长11倍，如果说选取两个特定的年份首富不具备普遍意义，更大范围的统计或更有代表性。新财富500中国富人榜2006年财富总和是7465亿元，2016年就是8.0191万亿元，顶级富豪群体财富增长幅度大致与首富相当。而同期，大家不妨自忖一下，当年刚过12万元申报门槛的人，谁的年收入今年过了144万元，恐怕是极少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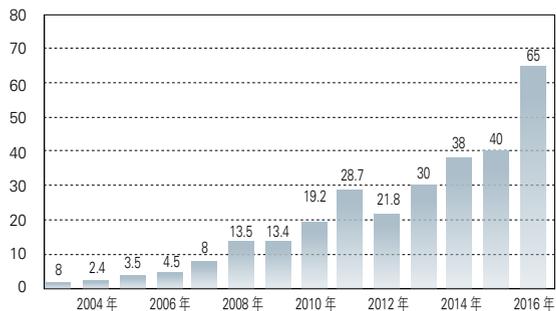
富人何以如此聚财？去年，中国GDP增速滑落到了6.9%，创下25年新低，股市暴涨暴跌，多少中产阶层的财富灰飞烟灭，可中国最富有的500个人的上榜门槛，从40亿元提高到了65亿元，增长62.5%。500个富人人均财富达到160亿元，较去年的113亿元增长41.8%，远高于上一年25.7%的增速。富人们呼风唤雨的秘密是资产证券化，是A股市场特色的高门槛以及与之相伴的高估值。一次成功的IPO，一个乃至数个百亿富豪就此诞生。而A股上市门槛高悬，还为已上市富豪提供了廉价并购未上市公司的机会，增发并购，实现体外资产的证券化也助富豪财富膨胀。另外，不设门槛的新三板，一年中上市了3000余家，更为这场财富盛宴锦上添花。

岂止是国内，技术革命带来的财富重新分配也深刻影响着全球工薪阶层与富裕人群的财产格局。新的技术带来的效率提升通常只发生在具有革命性的产业部门，这些先进的生产力虽沐春风，可受到新技术冲击的传统产业却一片哀鸿。乐施会一份报告显示，全球最富有的62个人所拥有的财富，相当于全球最贫穷的50%人口财富的总和；而在2010年，与全球最贫穷50%人群的财富相等，还需要388位最有钱的富翁。这份报告称，我们所创造的经济是为了那1%而存在的，而不是为了所有人的繁荣，为了后代和地球。

遗憾的是，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实行了遗产税，至少在财富的世代转移间设置了一道公平的闸门，我们却没有。资本市场绝大多数都在征收资本收益税，我们也没有。当薪资人群与资本所有者差距越拉越大时，国税局还在探讨向所谓的高收入加税，真可谓缘木求鱼。☑

(单位：亿元)

新财富500强的上榜门槛





绘画·阿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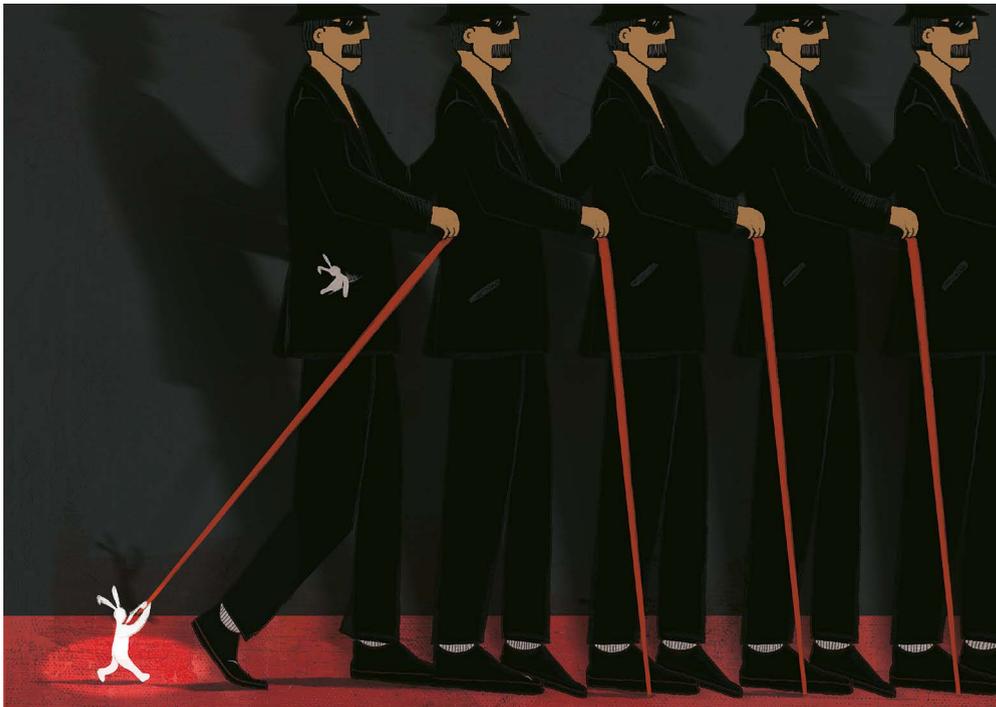
喧嚣时代 给灵魂一个栖息之地

# 阅读之美

生活周刊

每周一出版 全年52期 多样便捷的订阅方式  
邮发代号:82-20 拨打11185上门收订

零售单价:15元 零售年价:780元 订阅单价:10元 订阅年价:520元,全年净省260元  
读者服务电话:010-84050425/84050451 读者服务邮箱:dzfw@lifeweek.com.cn



栏目插图 | 范薇

## 黑色系

上半年是钢材，下半年是煤炭，资金紧跟着黑色系。10月25日收盘，焦煤上涨5.05%，动力煤上涨4.65%，而焦炭则以6.97%的涨幅创下了“15连阳”的纪录。煤价的这轮上涨，除了资金的推动，还因现货价格不断上调。截至9月底，钢铁、煤炭两个行业退出产能均已完成全年目标的80%以上，而房地产启动拉动钢材需求，进而导致炼钢用炭紧俏，最终完成了黑色系轮动。

## 养老金入市

人社部表示，年内将优选出第一批养老基金管理机构，正式启动投资运营，全国4万亿元养老金终于入市。此前政策规定的银行存款、购买国债已经不能适应基金保值增值的需要，去年8月，《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管理办法》出台，养老金获股市通行证。据预测，首批入市养老金规模约4000亿元，占流通市值比重为1.1%。养老基金作为长期入市资金，可起到稳定市场的作用。

## 抛美债，“抢”日元

作为最大海外持有国，中国在大规模减持美债，仅8月就抛售337亿美元美债。美国财政部认为，中国这么做是为了支持汇率，防止人民币快速贬值。同时，中国还在忙着加速买入收益率为负值的日本国债，今年前8个月的净买入额接近9万亿日元（约合866亿美元）。当美联储加息时，投资者往往就会减持美债，中国正在未雨绸缪。可加息预期反而加剧了美元汇率的坚挺，这或许是管理当局未料到的。



### 高房价挤出效应

江苏、浙江、广东前三季度经济增速分别为 8.1%、7.5%、7.3%，分别比上半年增速降低了 0.1、0.2、0.1 个百分点，北京和上海也有放慢迹象，而减速的主要部门是服务业。发达地区服务业放慢，既是经济脱虚向实的表现，也因国家陆续推出了房地产调控措施，房地产对经济的贡献降低。房地产贷款放慢，也影响了金融业的发展。而高房价对高端制造业、科技业和服务业的挤出效应，或在日后显现。



### 进口替代

1990 年以来，中国的进口每年都在增加，但 2015 年下跌 13%。从铝土矿到晶片，中国进口了大量的原材料和零部件，再将其加工制造成各式各样的商品，并销往全世界。现在，很多原材料和零件，特别是在半导体和机械等利润丰厚的领域实现了进口替代。中国在世界供应链中占据了更大的份额，并因此引发了全球贸易模式的变化。据万得资讯，去年，中国进口的用于生产其他产品的零部件及原材料的总值，比上一年下降 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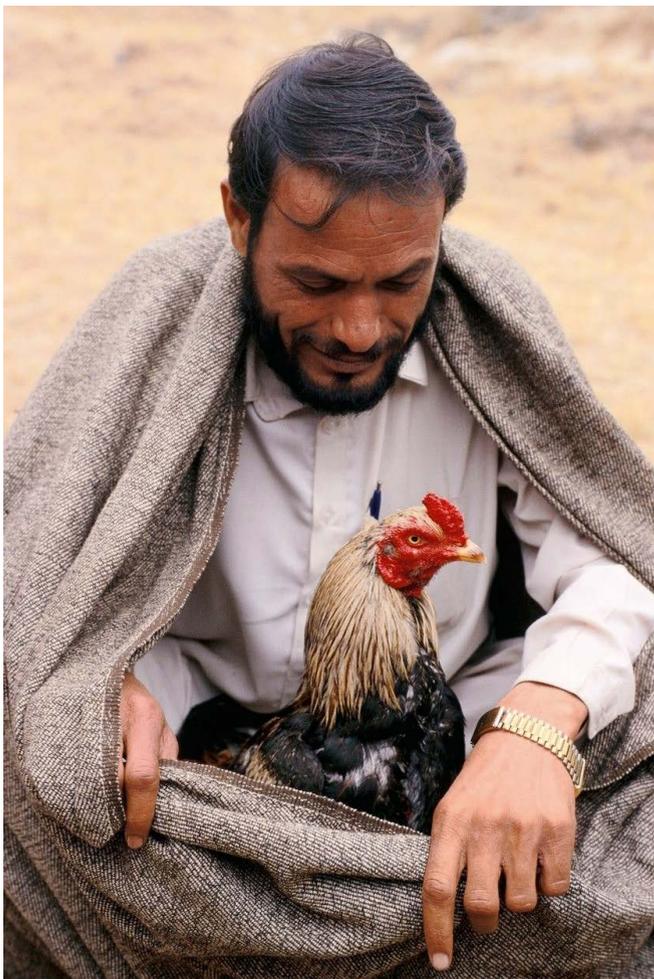
### 跨境开户

虽开通了沪港通，愈来愈多的内地客还是愿意到香港开户炒股。以前一线城市居民为主，现在二、三线城市的投资者也想配置港股。似乎是回应内地投资者的需求，香港证监会发出通函，称放宽客户初次开户时，若非面对面进行，可以利用电子证书签署，视作书面签署的同等，内地投资者港股开户将更为方便。相比沪港通，直接开户可投资品种更多，手续费也更优惠，还能获得更高杠杆率。

### 小包装大利润

可口可乐三季度销售额虽同比下滑 6.9% 至 106 亿美元，但调整后每股盈利为 49 美分，高于预期的 48 美分，连续七个季度超过预期。可口可乐三季报成功击败市场预期，居然得益于更高的定价、更小的包装和使用玻璃及铝材料的优质包装。北美地区碳酸饮料的需求减少，可口可乐的重心从提振销售转移到增加利润，其中就包括让消费者购买更多更小包装的饮料。





## 拯救公鸡

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古老问题，在现代蛋鸡场中有一种十分现实的打开方式：如果种蛋孵出来的都是公鸡，肯定不会再有新的鸡蛋。事实上，由于产蛋鸡和肉食鸡品种上有很大差异，雄性蛋鸡通常被认为毫无经济价值，一孵化出来便被杀掉，在美国，每年约有3亿只公鸡因此死于非命。不过，一项由美国和以色列的联合研究小组最新开发出的新技术或许可改变这一血腥现实。通过对孵化中的种鸡蛋气孔释放出的气体进行化学成分分析，研究者已经可以准确判断出鸡胚的性别，从而将那些内有雄性鸡胚的蛋分拣出来。由于它们尚处于孵化早期，因此仍可作为鸡蛋被食用。

## 好消息

### 拥抱新生

人们曾经对“煤用完了怎么办”的问题担心不已，但根据国际能源组织日前公布的报告，新的可再生能源技术的突飞猛进和大面积推广已经令煤变得不那么必不可少。目前，全球可再生能源发电能力已经超过了燃煤发电量，发电量增长的半数以上来自太阳能、风能等新能源。



### 蜂巢城市

现代都市的交通拥堵是一个世界性难题，然而，两个哥伦比亚国立大学的研究者在 ArXiv 网站上发表论文指出，假如在建造新城的时候突破传统上务求方正的街道设计理念，而采用六角形的蜂巢结构，令所有的交叉路口呈丁字而非十字，高峰期的车流便会通畅得多。

## 坏消息

### 天使有风险

能够遇上一个慷慨大方又不对实际业务指手画脚的天使投资人，是许多科技初创公司的梦想。但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的研究小组调查了350家新公司的外部投资状况后发现，获得天使投资的公司上市时间要比获风险投资的公司慢得多，其创新技术的总体影响力也远逊后者。

### 未补先中毒

宣称可以改善人体机能、提高运动成绩、增加肌肉量和帮助降低体重的植物营养素和膳食补



剂近年十分流行，但发表于最新一期《肝脏病学》杂志上的论文指出，每年美国至少有20%以上的肝脏中毒事件是由服用此类产品所导致的，其中又以包含多种成分的复合补剂最为危险。

澳大利亚的大堡礁在久病后于2016年去世。享年2500万岁。在其一生的绝大多数时间里，大堡礁都是世界上最大的生命结构，而且是从太空中唯一可见的生命结构。

——《户外》杂志10月刊发了环保主义作家罗恩·雅各布森为大堡礁撰写的讣告

心胸狭窄者向往超凡，心胸宽广者意念平凡。

——法国哲学家帕斯卡

索尔·贝娄曾经说：“小说是更高级的自传。”换言之，小说是那些伤害过你的人所做的补偿。当人们读我写的《我的体操老师是一个打人的暴徒》和《她把它们称作球芽甘蓝：一个幸存者的故事》时，我告诉他们其中包含自传成分时，他们经常都感到惊讶。我告诉他们，这就是艺术。

——美国小说家科尔森·怀特海，《如何写作》

麦当娜和碧昂斯的舞蹈是女性意志的表现，具体阐明女性意志的限度和可能性。其中的教训很清楚。我的身体服从我。给我伴舞的人服从我。现在你也要服从我。激起类似的忠诚的女作家有穆丽尔·斯帕克、琼·狄迪恩和简·奥斯丁。她们有着同样的特点：全面的控制（她们的形式）以及没有自由（对读者来说）。

——英国作家扎迪·史密斯谈作家能从舞蹈学到什么

+/-

数字

10

万

中国文字博物馆实施甲骨文释读成果专项奖励计划，对破译未释读甲骨文并经专家委员会鉴定通过的研究成果，单字奖励10万元。该计划鼓励甲骨文研究者运用云计算、大数据等现代技术手段与传统研究手段相结合，形成原创性研究成果。

2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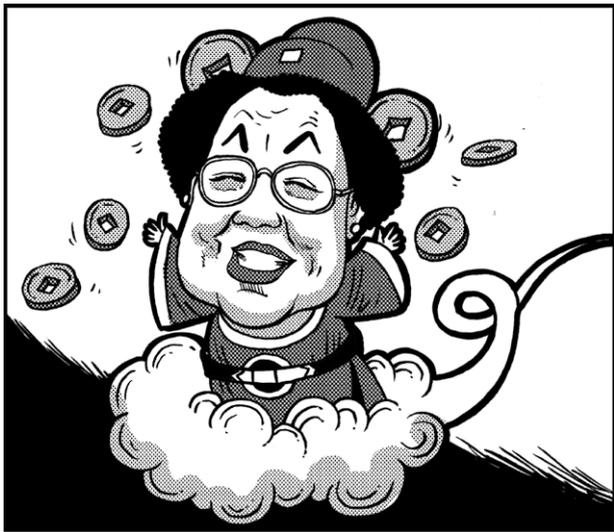
公里

欧洲火星试验登陆器“斯基亚帕雷利”10月19日摔在火星表面，并砸出了一个浅坑，估计撞击时的速度为每小时289公里。“斯基亚帕雷利”是欧洲和俄罗斯合作的“火星太空生物”项目的一部分，以寻找火星上是否存在生命的证据。

17

部

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近日公布消息称，莎士比亚的44部剧作中有17部为合著。来自5个国家的18名专家使用大数据对莎士比亚和诸多同时代作家的作品进行了精确比较，认为从18世纪以来就被视为莎士比亚竞争对手的克里斯托夫·马洛其实是《亨利六世》三部曲的联合作者。



(插图 山羊胡)



我不停地写作，只因我是个理想主义者，我相信生活，而且试图用我最迫切的涂鸦来给生活一个说法。

——杰克·凯鲁亚克，《荒凉天使》



## 几十度灰

文 / 赵阳

图 / 谢驭飞



从安妮家吃完晚饭回来，夜色才刚刚上来。我们于登山的小路缓缓攀行中，一辆车开过去，急刹车声划破了宁静的小镇，车子倒开回来。是让，他的脸色有点微醺的红，说刚刚和一个去过中国的女教师吃完饭回来。我说，找一天一起吃饭，让很高兴地答应了。

让开车很快，很快，安妮说。我们又一次等待让的到来。让的脚好了，捧着一大块奶酪走了进来。寒暄过后，聊到了最近看过的电影，我说我看了《我的路特》，一个黑色幽默的法文片，讲述法国北部食人族的故事。让说，他也喜欢那个导演。让最近看了《刺客聂隐娘》，让说他太喜欢了，那种慢，那种中国。安妮说她看了《在山那边》，说片子的前面都挺好，就是最后有点虚构过度。

尽管大家回避着，话题还是转到了他得了厌食症的女儿安娜身上。让说，安娜休学住院了，在里尔，现在每天都得打点滴维持营养，每周末他得开车几百公里过去看她。安娜是个很漂亮的女孩，很像她的母亲多米尼克。我说：“她喜欢吃什么，就让她多吃点。”让说：“关键是她什么也不想吃。”我鼓励让说：“一生很长，这只是安娜的一次经历。”让说：“确实，人生很漫长。”

话题有点沉重，饭局结束得也早，第二天是周六，让还得去里尔。看着让的背影，突然我想起让说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时，就翻开《易经》一指，遵从书的指示。

两周后的一个黄昏，又是一阵急刹车，我说，

那是让。果然，让倒车回来，不过这次副驾驶的位置上坐着一个陌生的女孩。那一定是他的女儿安娜，消瘦而没有力气地和我们打着招呼。让说，安娜可以偶尔回来了，我带她去市里转转。

友人来造访莫奈小镇，我把诺曼底天气和印象派的关系解释给他们听，他们都乐了。印象派起源于一个想写实美丽日出的画家，在海边等了很久很多天也不见晴天，最终在迷雾中放弃而改变了自己的画风。

诺曼底的天气就是这样，春天是明亮的灰，秋天是通透的灰，冬天是凝重的灰，夏天大家都去度假了，没有人在意是什么样的灰。就算是在一天里也有着不同的灰色，友人说，但愿那灰色不是50度的。当然，如果傍晚会下起一阵急雨，有的时候也会看见美丽的彩虹。

忍受不了灰色的画家们在作品里使用色彩，虽朦胧，却鲜艳。陪友人看了莫奈的房子和花园，在他的工作室里，终于看到了那幅时间之作——莫奈夫人和孩子在画中的花园里出现了两次，远处台阶上是母子两个人，面容依稀看不清楚，近处是孩子长大了一些，独自一个人走下了台阶，让人感受到时间的存在。就好像我们在路上遇见了两次让。

临行前去和让告别，他不在家，让请人新刷了墙，白得耀眼。花园里也还是老样子摆着躺椅，不过这回躺椅上多了一把大太阳伞，两个躺椅之间的圆桌上放着一个空玻璃杯，里面有一个红色吸管。也许，那是安娜喝过的。☑

## 关于外公

文 / 糊糊大人

图 / 谢驭飞



我曾经对人说，我喜欢老人。这是真的。人有了年纪，就有了智慧，能看透一般人无法了解的状态。老了会变得谦逊，得失也能看到另一个角度了。他们不是退化跟不上时代了，其实是进化了。我们常自作聪明。

自我记事起，外公的精神就有点问题。

对于外公的第一个印象就是，他坐在椅子上，一个人莫名其妙地就笑了起来。外婆和外公关系不好，很早就分房睡，基本无交流，除非是要他干什么活，不然就是争吵。其实，也谈不上是什么争吵，无非是外婆生气，外公却压根儿不作理会。而后，我常常思考，外婆或许觉得最悲哀的事情，正是外公的冷漠。那种可以对每天睡在枕边的人视而不见的冷漠，才是最可怕的东西。

其实关于外公精神的问题来源，我一直不太清楚，也不敢太过问，特别是在外婆面前。只记得多年前小姨生小孩，我们去探望，那天晚上很多人挤在一张床上，睡梦中，听到外婆和妈妈聊起。似乎是外公年轻的时候，在一家窑上做工，在那里爱上了一个送他西瓜吃的女孩，而后他对这个女孩魂牵梦萦，从此落下病根。那晚其实我一直醒着，妈妈必定是以为我睡着了。

后来我一直在猜想，那是怎样的女孩，可以让一个男人从此神魂颠倒，丢了自己。

关于外公的第二个印象，就是象棋。那时候每逢去外公家，就会见到他和舅舅下棋。舅舅比我只大5岁，和他同年纪的孩子那时候村里很多，每

次家里都是络绎不绝冲象棋来的人。他们下象棋不太较真，纯属娱乐，可以悔棋，甚至会给对方出招。我外公还会吹口琴，据说还会拉二胡。在常人不太能理解的世界里，他把自己的日子过得津津有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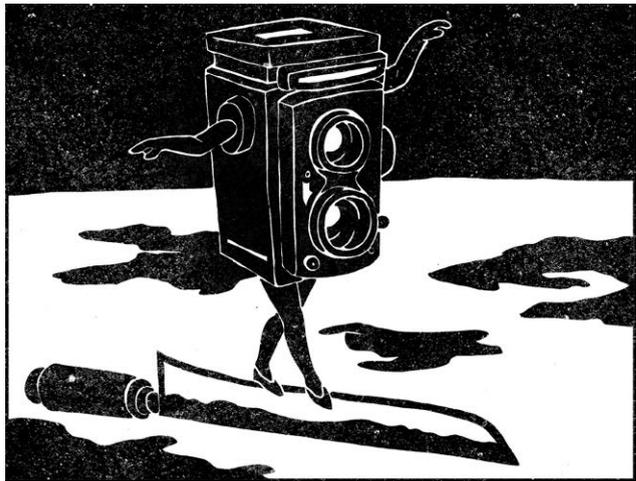
我那疯外公虽说人糊涂点，但也落得清闲。他倒是花草树木有格外的感情，外婆家屋后的柿子树，便是他当年的功劳。记得那时我和老弟淘气，把树上刚长出的柿子摘了不少回来，还很兴奋地全搬回家，理所当然挨了外公一顿脾气。如今，他已去世多年，但那棵柿子树依然每年开着花、结着果。有一阵他还迷上了养蜜蜂，把蜜蜂的蜂箱放在他房间的窗户边方便它们进出。蜜蜂的确是很聪明的动物，早出晚归，但“为谁辛苦为谁忙”，它们大概也是不计较的。我记得老弟曾被外公家的蜜蜂蜇过，但大部分时间它们很乖，人不犯它们，它们倒是不会主动攻击人。

外公是个疯狂的人。我们常人的确没办法理解他的作为，就像没法理解他整天莫名其妙的笑。他去世前的一段时间，突发奇想跑到山上的树林里自己做了个床，晚上就在那里睡。那时候天气还很冷，不多久他就病重，我妈带着我赶去的时候他已经躺在床上，奄奄一息，这就是最后一面。后来，他们一致认为是在山上睡的日子里着了凉，要了他的命。

外公从不关心人，从不理会自己之外的世界。他活在那个女孩美丽的笑容里，于是整个世界也笑了。☑

## 爱情地标

文 / 肖遥  
图 / 谢驭飞



R在想，一个人在一个城市里生活了几十年的，会有多少爱情在生发？又会有多少爱情在幻灭？这一茬又一茬的爱情，生发时如夏花般绚烂，死去时如孤魂野鬼，飘荡在城市里。最怕，你有朝一日和你曾经的爱情忽然邂逅，无可回避。

20岁的R还在美院读研。有时候骑自行车转悠出学校，R会专门绕一下路尽量不从学校隔壁医学院门口经过，因为此前曾经和一个医学院的医生谈过一场无疾而终的恋爱，那时还不知道路过一个地方就像重听一首老歌，会令人睹物思人，而那人已经芳踪难觅却音容宛在。一不留神走在他送她回程的路上，想着最后一次见他的点滴，R总是难过得心疼，那时候的R很担心自己心里那块伤疤会不会永远都不消失。就像人鱼为了爱情把鱼尾变成了双腿，永远都像走在刀尖上，而走在刀尖上，还要装作像跳舞一般优雅，别人会不会看出来？

还有一个地方叫“西后地”，那里曾经有另一个旧人，已经弄不清当年是他对她用了心，还是她对他用了心，这些心思，就不知不觉间镶嵌在那些一起走过的路、一起吃过的苍蝇馆子里了。两人刚刚分手不久，在这条街上，R曾经有几次骑着车子走错了路，或许是心里默许自己走错的，总是走着走着，一抬头竟然是他家楼下。或许是在潜意识里，还想在这里碰到他？可是，碰到又能怎样呢？他看到她青春如许花容月貌又回心转意吗？青春毕竟是青春，R知道青春的好，可是她总是拿着自己的青春不知所措，就像一个人拿了大把的钱不知该

怎么花，而这钱又分分钟在贬值。转眼10年过去，R偶尔开车路过西后地，那里已经拆成一片废墟，废墟上的抗议横幅提醒着她：生活，除了风花雪月，还有人问疾苦。

不错，人年轻的时候，以为就爱情是唯一的苦，比黄连、苦胆都难以下咽的苦。可是往后走会发现，连苦都是不一样的味道。后来路过一个叫“文艺路”的地方，这是R和前夫住了10年的地方，R会尽量避开眼神，不愿多看一眼。那场苦，已经和爱情没有一毛钱关系了，结束时的那场撕斗，伤筋动骨，伤到元气了。也许以后不免还要碰见他，因为他是他们孩子的爹。R会努力地想：除了孩子，不会没有留下一点别的吧？比如某个一起去过的城市，某个葱茸茂盛的季节，还有某个灼热的蝉鸣午后，两个人你一口我一口吃过的一个冰淇淋……

正如桑塔格在对摄影的研究中所说：“现实似乎已变得越来越像照相机所呈现给我们的样子。”换句话说，没有相机给人提供的证据，人们几乎找不到自己的存在感。R想，这些爱情的遗迹呈现给自己的是什么呢？也许令自己隐隐作痛的不是某个人，而是这些记忆本身而已。好在现在的城市就好像现在的爱情一样，不断地拆了建、建了拆，街道依稀，那些爱情带来的伤痛或欢娱也会模糊。

R终于明白，不论自己是在跳舞，还是走在刀尖上却装作像跳舞般优雅，其实没有几个人会在意。☑

## 过客 Y 的突围

文 / 车恩  
图 / 谢驭飞



按理说，介绍一个人物，应该从他的出场开始，过渡到不可调和之矛盾，引入全文的高潮，最后，舞台上的光一点点变暗，直至爆发出哑然之后了然的掌声。只是，你我都明白，Y 不过是一个在中场替补上位的角色，已经渐渐变为一个面容模糊的过客。

一个平庸无常的夏日午后，是 Y 首次登台的背景。他穿过了南山路法国梧桐制造的阴凉，冒着知道了掉到头上的风险，挤进了正在看分班结果的 A、B、C 们。寻找的过程是漫长无趣，结果是清晰明了。头顶的风扇很别致，白色的不锈钢保护罩基本杜绝了 Y 对风扇的一切可怕联想。班主任自豪地迎接在分班考试中名列前茅的 Y 与 C、D、E 们，感慨地讲述着这座学校上百年的历史。当然，多年之后，在阿尔茨海默症的侵袭之下，这些记忆都将变得遥远而不可捉摸。唯一无法忘却的，可能只剩下那年夏天军训时，趴在地上爬草地时那种被闷在火炉里苦苦挣扎的感觉。不过，这些都是后话了。

里尔克曾在给青年诗人的信中说道：“他们（青年）必须用他们整个生命，用一切的力量，聚集他们寂寞、痛苦和向上激动的心去学习爱。”在 Y 看来，这句话去掉最后一个字显然更加通顺。二线城市，普通高中，这些都是 Y 心头不可诉说之烙印。如果 Y 是一只鱼，他会毫不犹豫地游向马六甲海峡，谁会考虑那一潭栽满了荷花的湖水？所以，这注定是一场长达 3 年的突围。

语文老师在职台上说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字，

引得台下一阵哄笑；数学老师和物理老师的高跟鞋，轮番轰炸着整个楼层的地板，当然，同时碾压着 Y 与 C、D、E 们的脆弱的心；在那些夹杂着方言与平翘舌音难辨、前后鼻音不分的普通话中，Y 与 C、D、E 们似懂非懂地记着笔记，参加各种考试。当然，看似波澜不惊的生活实则波涛暗涌，Y 与 C、D、E 们处于最直白的年纪之一，摩擦与分歧难以避免。而那年高三比想象中来得快许多，在学习的时间长达 18 个小时与滚动的排名压力之下，“虐狗”现象、心理失衡现象层出不穷，至于 Y 是否卷入其中，谁也记不清了。唯一能够确定的是，那阵卷来柳絮的风过后，Y 的生活中便再也没有出现过仙境。仙境在远方。

此刻，我看到 Y 了。两个月的分别使他的面容变得难以辨认，他那样子，仿佛在爬山，仿佛在旅行，仿佛在学习……至于，他有没有突围成功，由于在那场考试之后，很少有人关心排名，所以，我不知道。只是，在某一刹那，Y 转向了我，可惜的是，在看清他的面目之前，他就已经膨胀成了一朵圆滚滚的烟花，在夜空中绚烂了 3 秒钟，终于遥不可及了。与此同时，我仿佛被灌了一大口海水，好似在夏天的马路上站了几十年，然后，我忽然意识到，在这场漫长的突围记中，留在 Y 与 C、D、E 们心中的，将永远是因风起的柳絮，与那棵在学校操场中间立了 100 年、和膨胀的烟花一样庞大的悬铃木。☑

本栏目投稿邮箱：mensula@sina.com

### 大万年历腕表

名士克里顿系列万年历腕表能依照公历有 31 天、30 天或 28 天的月份和每四年一次的 2 月 29 日自动调整。同时能显示日期、星期、月份及月相盈亏，在 2100 年 3 月 1 日之前完全不需人手调校。



### 流动感平衡椅

巴西品牌 LUHOME 与艺术家安德烈·波利 (André Poli) 合作设计了家具系列“平衡”(Equilibrium)。充满不确定性的流动感，可以任由两侧随意倾斜，只有准确寻找到那唯一的平衡点时，才能稳定下来。该系列以牛皮和原木打造，手工切割的如棕榈树叶般的纹路具有丰富的视觉层次感。



### 动漫耳机

HIFIMAN 推出的 Edition S 山新限定版耳机针对动漫、ACG 爱好者的需求，进行特殊调音，使之更契合动漫、ACG 爱好者的口味。耳机仅重 248 克，可便捷地从封闭式变成开放式，分别适合在室内和户外使用。



### 迷你工具箱

Talon 出品的一款可挂在腰间的迷你型工具箱，集成了 17 种生活中常用的大小工具，一体化的设计看起来十分规整。其采用的航空级复合材料，在保证金属硬度的同时，还避免放在包中对其他物品产生划痕，重量较钛合金也减轻了 40%。

### 叶片口袋刀

设计师阿勒斯·卡彻里克 (Aleš Kachlík) 的这款折叠刀，采用了 Virobloc 锁定系统，它重塑了法国和西班牙的传统口袋刀设计，用最常见的叶片形状结合了简单的径向手柄。刀背上的手指着力点使它在使用过程中更为顺手。



### 登高脖套

这款专供 2 ~ 5 岁儿童坐骑的登高脖套，依靠符合人体工程学的设计结构来保证儿童的舒适度和安全性，让喜欢骑在爸爸肩膀上的孩子可以在父母肩头玩耍，脖套自重 2.7 斤。

### 追踪钥匙扣

Tile Mate 是一款自带追踪功能的钥匙扣。两块瓷片通过磁性吸附在一起，兼具防水功能。内置的蓝牙装置方便与智能手机相连接以追查物品，同时能遥控发声，跟声寻找。





#### 黄铜吊灯

Sollos 品牌的 Mush 吊灯具有明显的现代主义风格，镀成金色的黄铜灯杆伸入圆球形玻璃灯罩中，细腻的黄铜支架结构丰富了它的视觉表现。

#### 藤编扶手椅

出自巴西设计师贾德·阿尔梅达设计的 Mad 扶手椅，坚固的实木框架搭配蓝色泡沫椅垫，细腻的手工艺水准从藤编椅背中体现出来。



#### 四轮玩具车

皮埃罗·里索尼为 Kartell 设计的 Discovolante 玩具车系列，车身以金属为结构，彩色塑料片制成座椅和框架，多种色彩组合出不同的车型。





### 水晶戒指

玛丽·德·泰莱克为 Baccarat 设计的水晶戒指，八角形的水晶如宝石般镶嵌在玫瑰金底座上，红色、绿色、牡丹花色、绿松石色等色彩可以与各种肤色相搭配。



### 配对游戏

网络概念店 Yoox 与芬兰图形艺术家安蒂·卡莱维共同设计的“配对游戏”纸牌，卡莱维以多彩人物、水果、动物等手绘画，传递出轻松愉悦的效果。



### 圆点双肩包

Vivienne Westwood 品牌的 Dotmania 双肩背包，回收的黑色 PVC 面料包袋上印制黄色圆点以及结合英国王冠顶端 Orb 的土星标志，手柄点缀了红色“笑脸”挂件。

### 鹦鹉腕表

宝格丽 Divas' Dream 陀飞轮镂空腕表，玫瑰金表盘上呈现枝叶繁茂的异域花园，一只色彩斑斓的鹦鹉居于中心位置，所有机芯构件都是用透雕细工的技法手工完成的。





巴黎余乐姆街上匆匆赶去上课的高师学生



# 巴黎高师： 法国精英制造

共和国传统与知识分子摇篮

文 / 蒲实

巴黎市区深处的巴黎高师就像一所隐修院。在一条叫“余乐姆”的小街上寻到它时，跃入我们脑海的第一个词语是“小”，小到让它字面上看起来很阔绰的身份——“大学校”(grand école)有种滑稽的名不副实感。它如此小，也省去了我们耗费笔墨去铺陈它校园景色的麻烦。实际上，它根本不能算有校园：从侧门进入门岗室，接受安全检查后，就可以直接迈入它的大门；大厅里四面围着玻璃、被称为“水族馆”的收发室一直未变；穿过大厅，中庭花园正中有一个叫恩斯特的水池，学生们在为数不多的池塘边的桌子上学习；穿过花园，进入下一个中庭，就是它的图书馆和另一些围合的小楼。没有绿茵草坪或精心修剪的花园，也没有巨柱长廊或教堂钟楼，更不用提博物馆或体育场了。它的简朴，部分来源于它对精神纯粹的崇尚，部分也受限于主要由法国政府提供的有限预算。由于它的小与它建立以来两个多世纪中出产的群星璀璨的思想家、文学家、数学家和科学家，以及它对法国乃至世界的影响如此不成比例，我们很容易便觅到了第二个词语来形容它：“小而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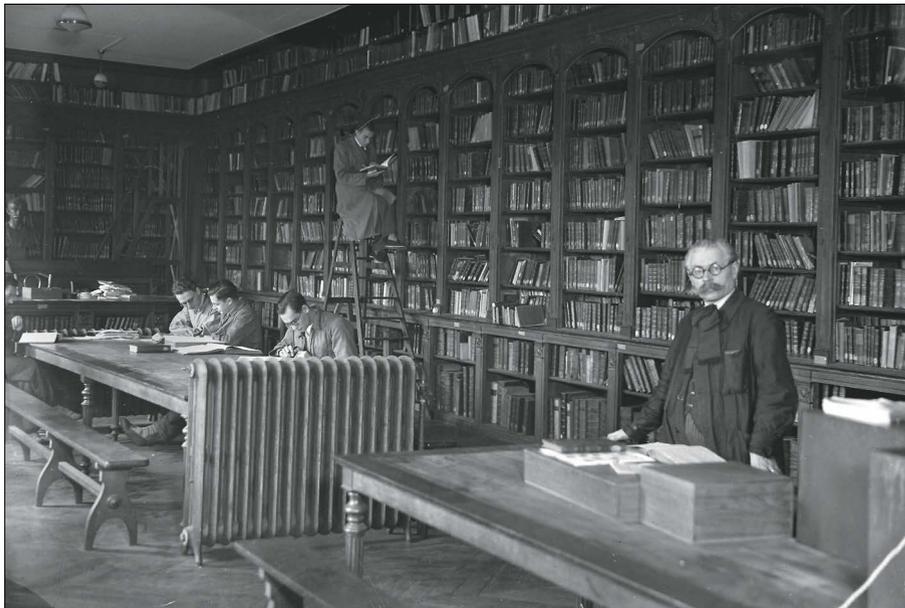
这与我们过去考察过的所有大学都有所不同：无论是剑桥、牛津，还是哈佛、耶鲁、斯坦福，这些大学都在相对远离城市的开阔之地发展出风景秀丽和不乏历史性建筑的大学校园来。但巴黎高师是属于城市的。200多年来，它已经把居于拉丁区心脏地带视为自己性格乃至命运最重要的一部分，任何的扩张冲动都得到了抑制。与那些隐居在宁静小镇或世外桃源思考学问的学派不同，高师人的精神不是仰望星空的，而是俯瞰芸芸众生的。在它的斜坡屋顶上，曾经站立过很多攀爬上来的高师人，他们登高望远，迎风吟诗，内心被唤起无限抱负和激情。高师的规模与它所占据的空间200多年来都保持着相称的比例，它的学生至今不过800人，每年招收的人数不过200人。它是一所非常具有“法国特殊性”的精英学校：虽然法国自12世纪就有了与欧洲一脉相承的大学体系，但法国大革命之后，拿破仑在“大学”(universités)之上，又建立了一层以培养共和国最优秀的专门人才为目的的精英学校结构，这就是“大学校”体系。这两套体系，并行不悖。

决定做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时，我们尚未完全清晰地意识这种“法国特殊性”。那时，我们内心被另一种感觉占据着：每年一期、已经做了7年的大学专题



报道，遇到了瓶颈，陷入了某种迷惘。那些英美大学虽然世界一流，但对我们来说，随着对它们从教育思想、制度到学科体系相似性，以及它们所生产的“精英”的相似性发现愈来愈多，一切都在慢慢往“套路”这个可怕的方向上滑去。再多写一所普林斯顿、加州伯克利或伦敦帝国理工，又能拓展什么新知呢？无非是在住宿制度、俱乐部名称、更擅长的体育运动、校友事迹或性格气质上做做文章。在一个全球资源都不断向几所大学集中、学术和知识越来越集约化规模生产的时代，大学正变得越来越雷同。我们暗自思忖，是否到了该撤退的时候了？

直到我们探索着进入巴黎高师所在的法国特定语境中，一成不变的老路似乎出现了一点转机。至少，我们开始问一系列与过去不同的问题。这些问题首先是制度层面的。比如：代表法国精英教育的“大学校”和代表法国全民高等教育的“大学”之间有什么不同？法国人如何鉴别和选拔精英？他们理想中的精英具有什么样的特质？“大学校”用何种方式培养精英，又以何种方式为其培养的精英提供身份的合法性？在法国，为什么专门性的学校生产精英，而不是综合性大学生产我们已熟知的“博雅”精英？小型教育机构会在学术研究上呈现出什么不同于综合性大学的特点？以国立大学为主导的法国高等教育，在教育宗旨和使命上，和以私立大学为主导的英美大学相比，有何不



左图：1910年时的巴黎高师

右图：1935年的巴黎高师图书馆

同？这两种制度运作下的大学，各有什么优势与不足？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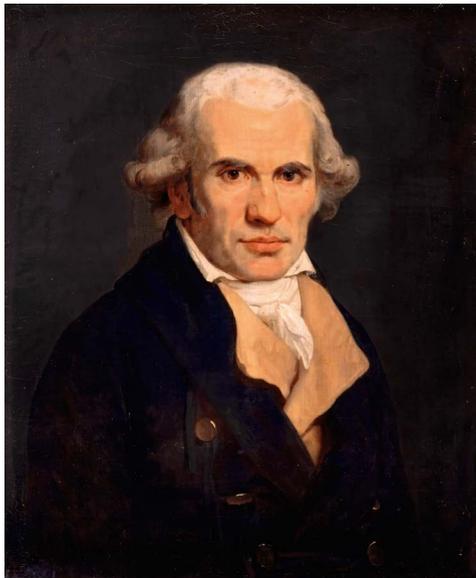
巴黎高师和它所浸淫其中的独特法国精英教育体制，投射出许多法国人的独特品质。法国人一向认为自己是一群善于思考的人，对思想理念有强烈的追求，更显著地具有道德和知性上的力量；他们钟爱抽象理论，迷恋普遍性，追求纯粹，在论证时习惯清晰和一分为二，但又时常自相矛盾或走向极端；他们的思想家常有救世主情结，替全人类思考，为人类贡献了自由、平等、博爱、共和、公共利益等优雅而复杂的抽象政治概念；他们在启蒙运动的洗礼下崇尚理性，但又喜爱神秘主义，热衷激情和冒险。毫无疑问，“知识分子”是法国贡献给世界的文化创造物，而巴黎高师则是精英知识分子成长最肥沃的土壤。

最初的师范学校是一所理科学校，教授数学、物理和天文学。数字的讲坛先于词语的讲坛，因为它最初要培养的并非美的思想，而是博学之士。然后，它发展出了对词语和文学的热爱，最后是哲学和思想。高师培养出来的最优秀的人，除了那些影响了人类文明和思想史的科学家和思想家，还有很多默默无闻为法国整个教育做出贡献的人。而很多法国的知名知识分子，都曾以授衔教师的身份，在中学、高中或大学任过教。“共和国的教师”担负着培养共和国公民的使命，他们从巴黎高师走出来，按照国家的需求，到巴

黎或外省的小学、中学与大学里任教，以教育之专业方法，将共和国先贤的知识传遍法兰西的各个角落。

200多年来，法国人面对着一个对他们来讲永恒矛盾的命题：如何教育一代精英，而又不至于制造一个等级？法国的高等教育，一方面具有最大限度的平等，全民免费接受大学教育，另一方面，又有比很多欧洲国家更强的等级制，精英学校出来的学生会被自动打上身份的烙印，这个身份并不一定直接意味着物质利益或权力，但绝对象征着地位。精英如何被选拔和认定，并赋予其合法性？他们会进行自我再生产吗？法国独特的预科班制度可能为这个矛盾提供了一些答案。

而这个建立在共和国理念上的教育体系，在全球化时代，还面临着悖论：公民的身份限制着它从全球吸纳人才和资源。它的“小而美”，既建立在法国国内的特定环境上，又是以传统的知识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它最有学科地位的数学和哲学，既是非常抽象的学科，也是不依赖于任何大规模资本投入，而完全依赖于人的思维而存在的学科，推动它们发展的，是人类凤毛麟角般最精英的天才或大师。但新的知识生产方式——人才和资本密集、大规模、跨领域、跨国界的全球化知识生产，让“小而美”再难独善其身。法国的高等教育体制正在进行着改革，而高师是这个正在进行中的历史进程的积极推动者。☑



法国数学家加斯帕尔·蒙日

## 巴黎高师 法兰西精英之路

文 / 蒲实

法国大革命后的共和国雾月九日，巴黎高师的建校法令这样阐述其目的：为了使知识浸透共和国的每一个角落，完善传授人类知识的艺术，使纯净、充裕、光明的知识源头，从共和国的先人那里一步步传遍整个法兰西，并在此过程中不失其纯正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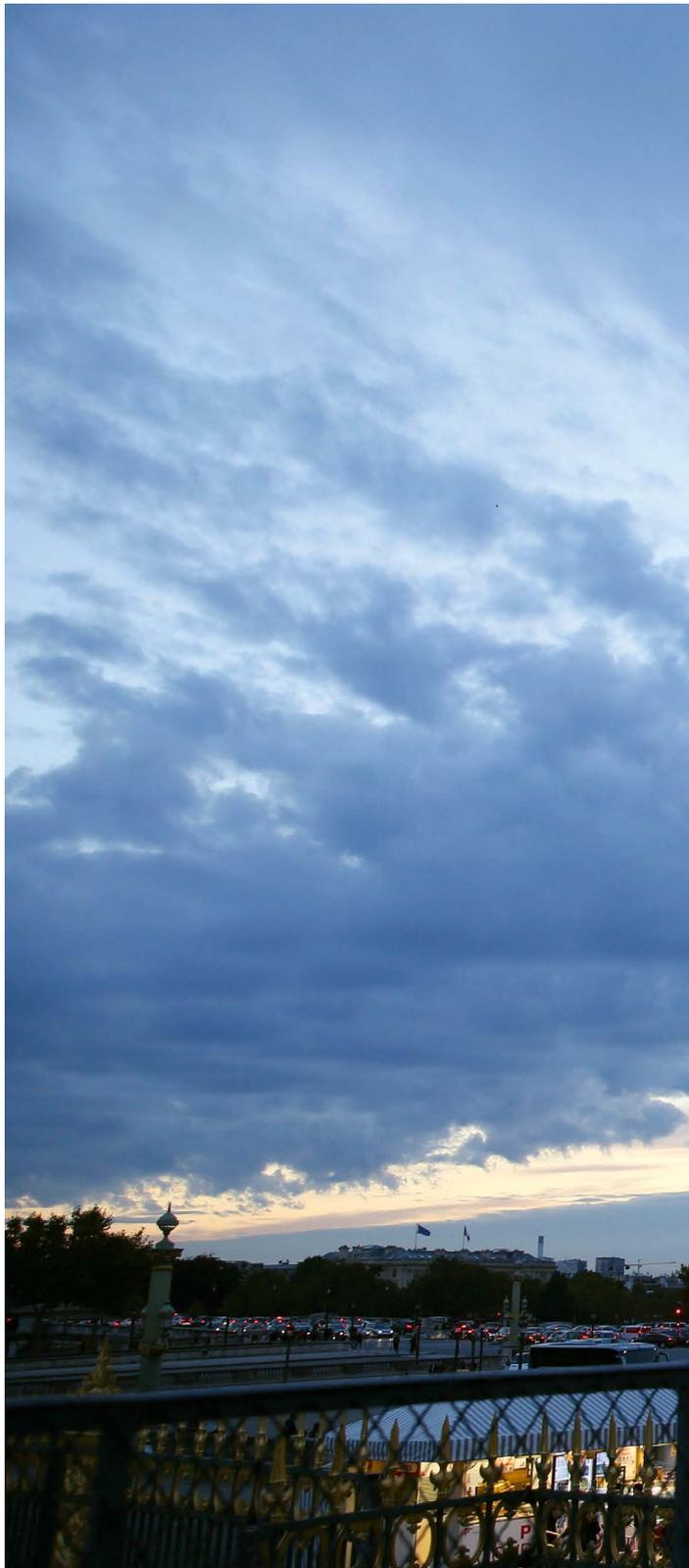
在 200 多年的历史中，作为法兰西知识分子精英的摇篮，巴黎高师毋庸置疑地影响着法国的精神面貌。而今天，它正处于从共和国学校走向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

### 巴黎的高师，高师的法国

这是我第四次来巴黎。这一次，当我怀揣“巴黎高师”这个到访的初衷再次在拉丁区的塞纳河畔漫步时，这座城市向我呈现出过去从未被注意到的新貌。

每天，我经过博堡（Beaubourg）大街的蓬皮杜国家艺术和文化中心，看到它钢架林立、彩色管道纵横的现代风格建筑突兀地嵌在颜色朴素的巴黎市区。

（于静拍摄）



巴黎协和广场上的雕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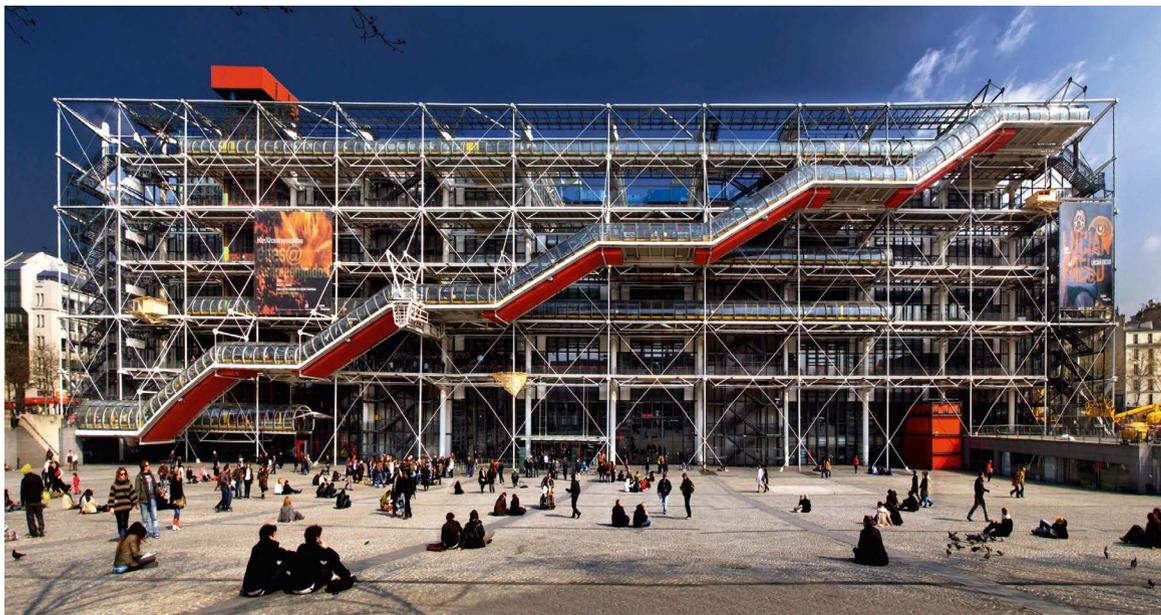


任何时候，门口售票处排队的人都和广场一侧聚集的鸽子群数量平分秋色。那位决定兴建这座现代艺术博物馆、名字念起来与“古斯古斯”（博堡大街周围随处可见的北非风味餐厅，couscous）一般接近象声词的法国前总统，蓬皮杜，第一次在他好大喜功的浮夸工程之外，以其特殊身份吸引了我对他本人浓厚的兴趣：他是“高师人”。从巴黎高师毕业的人，谦逊地用一个带后缀的专门词“Normalien”，即“师范人”来形容自己（而不是“Supérieures”）。

作为外省小学教员家庭的儿子，蓬皮杜是巴黎高师第一位登上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宝座的毕业生。法国总统之外，他还有一个身份，“授衔教师”。他在高师研究的是波德莱尔的诗歌，毕业后，他以文学教师资格会考第一名的成绩得到教师职衔。“授衔教师”在法国是公务员地位，常常得服从在全国范围内的分配

和调动。蓬皮杜先去了马赛的圣夏尔高中教法文，然后转到巴黎名校路易十四高中，后来又到同样是巴黎名校的亨利四世高中教法文和拉丁文。朴实如他，也爱像高师人那样用围脖来打扮自己，因而具有高师式的文化外表，也包括喜欢在新闻发布会上引用艾吕雅的诗句和展示演绎辩证法。

同为“高师人”的两位法国名记，弗朗索瓦·杜费和皮埃尔-贝特朗·杜福尔，在他们给校友勾勒的众多肖像画里，专门提到蓬皮杜通过“一系列高师式的手法”步入政界和金融界。这些“高师式的手法”包括：给自己在高师的老朋友、戴高乐将军的办公室主任、后来成为临时政府负责人的何内·布鲁耶（René Brouillet）写信，恳请他考虑自己的政府职务；虽然作为文学授衔教师，对金融运作几乎一无所知，但深知如何笼络银行大老板居伊·德·罗斯柴尔德的心，



左图：花神咖啡馆有一个传奇的名字叫“萨特的办公室”，哲学家萨特和波伏娃经常相聚在此，一起伏案写作，或一起与朋友畅谈

右图：蓬皮杜国家文化与艺术中心

获得他的信任。他还有一个在“高师人”眼里显得不同寻常的作风：务实，“具有一种冷峻的现实主义气质”，“不顾理论、空想或精神建构，直接走向事实”。可见，正常的高师人理应多么不接地气地悬于空中。主政法国后，他定期邀请老同学去爱丽舍宫共进午餐，释放过因私通苏联被判间谍罪、同为“高师人”的路透社部门主管。1963年，他为当时信息部部长佩尔菲特编纂的文集《余乐姆街》（巴黎高师骄傲的地址）写了一段深情的序言，描绘了与他自己并无相似之处的高师人“命定的杰出品质”：“在日常生活中，他是一个怪人；在当代社会中，他缺乏经验的愚钝令他很矛盾。他对理念现实性的信仰超越一切。”

过了蓬皮杜中心，踱步10分钟，就是塞纳河，过桥便是拉丁区的左岸。有时，我会路过花神咖啡馆。这个让·保罗·萨特和西蒙娜·德·波伏娃经常见面，讨论哲学和工作的地方，如今游客云集，座无虚席。隐藏在角落里的纪念性标志上，还刻着另两个曾造访这里的人物的名字，托洛茨基和周恩来。这4位在不同时间里曾在这个咖啡馆落座的人，转身回到各自国家的历史里，竟将相互发生直接或间接的联系。谁能想到，1955年，周恩来将在北京饭店的宴会厅招待萨特和波伏娃呢？这座咖啡馆在精神上（如果有的话）已经用“存在主义咖啡馆”为自己命了名。到此一游的文化朝圣者，在一杯咖啡里领悟萨特的“存在”之后，还可以移步

紧邻它新开张的路易·威登门店，体验“虚无”。

萨特也是一位高师人，1924年入学的。他充分体现出一个高师人的狂放不羁，尤以在高师喧闹的食堂里将雄性器官摆上桌面令人刮目相看。他也具有一名合格高师人应有的恶作剧天赋，比如躲在学校楼梯上，将水弹砸向身穿燕尾服、出席上流社会晚宴而迟归的学生，以及让高师小伙伴假冒飞跃大西洋的美国飞行员林德伯格，在受骗聚集到高师门口的群众面前向他颁发了假证书。与萨特同时入学的还有另一位法国重要思想家雷蒙·阿隆。这个出生在巴黎郊区凡尔赛镇资产阶级舒适家庭的高师人，在高师读书时是相信社会主义的左派。高师岁月里，阿隆与萨特常常在巴黎的街巷里漫长地散步，密切交流，虽然两人思想相距甚远。教师资格会考后，萨特在外省小城当了一名中学哲学教师。而阿隆去了德国，在纳粹势力高涨时引退，后来成了为数不多讨论自由的法国哲学家。

离花神咖啡馆不远的布歇利(Bucherie)街37号，就是乔治·惠特曼开的“莎士比亚书店”，出售英文书籍。由于它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迷惘一代”美国作家的密切联系，这个地方成了英语世界游客的朝圣地。并不算宽敞的店内，每个书架前都人头攒动；书店外，络绎不绝的人还在排队等待进入。在这里，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匹克迪新近写的《21世纪的资本》的英文版摆在架上，这本大部头学术著作出版后，立

即成为英语世界的畅销书，引发了热议和争论。考虑到托马斯·匹克迪是一位“高师人”，这种畅销尤为难能可贵，毕竟，高师是“一所按人数比例出版了最多的书，而只有最少畅销书的学校”。

这本从资产和投资回报率永远高于经济增速这个角度来论证资本主义导致财富不平等加剧、自由市场经济不能完全解决财富分配问题的书，与其说让人想到马克思《资本论》的遗产，不如说继承了巴黎高师向来的批判传统和关注平等的左派传统。纵观20世纪的高师历史，绝大多数时候左派思想都占据着主流地位。无论是来自巴黎的资产阶级家庭还是外省的农民、工人家庭，大部分高师人都天然站在资本主义的对立面。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到“冷战”时期，它不仅出产“社会主义高师人”，甚至一度成是一所“马克思主义大学”。深刻影响了高师一代人的精神导师阿尔都塞则是一位共产主义者，他开设的关于《资本论》的讨论课，请来了雅克·朗西埃、皮埃尔·马舍雷和埃提安·巴里巴尔轮流发言。根据这些发言集结出版的《阅读资本论》，是高师学院派的代表作。

匹克迪还以积极态度介入到政治中，做了一个典型的“高师人”爱做的事。他给左翼阵地的报纸撰文，也曾在2006年的大选中支持左翼社会党的候选人罗亚尔，并加入了她的竞选阵营。2015年，他拒绝接受法国荣誉军团勋章，以表达对当政的社会党政府的不满。他认为自己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属于从未受到共产党诱惑的年轻一代”。他对不平等的批判，显然比他提出的向富人征重税的建议更有力量——这也符合高师人一贯的传统。

漫步的目的地，总是余乐姆（ULM）街。绕过先贤祠，沿着一排以卢梭雕塑为前景、有着桑贝笔下的巴黎细腻的石雕饰和铁艺花纹的灰色石头公寓走到尽头，转过街角，就是余乐姆街了。与罗马万神庙有几分相似的希腊十字形圆顶建筑里，先贤祠安葬着为法兰西做出特殊贡献的72位贤人。这其中，至少有一位高师人——共和国的精神领袖和反战人士让·饶勒斯。这个农民的儿子从小被教育部的督察员选出来，经老师严格培养，踏入高师大门。对平民子弟来说，进入高师就像经历了授勋仪式，成为知识贵族。他的父亲曾透过他巴黎叔叔家的窗户瞥到了巴黎高师的大门，从而把考高师的梦种于饶勒斯心中，那扇能够看到高师大门的小窗，应该就在先贤祠附近这几栋为数不多的公寓里。公寓里的某一间还住过高师做了两年讲师的爱尔兰剧作家萨缪尔·贝克特。他疯得总是

想自杀，却总是在半夜用蹩脚的笛声让高师一半的教师想去自杀。成名后的贝克特隐居在高师好友贝罗松靠近先贤祠的公寓里，这是他唯一感到宾至如归的去处。半夜两点，经常还能听到他背诵拉辛的诗句。

沿着余乐姆街走，一路会经过隶属于居里研究院、在数学和物理领域享有盛名的庞加莱研究所，它的所长是一位高师人，菲尔兹奖得主塞德里克·维拉尼。然后是居里研究院，它所纪念的化学家居里夫人是索邦大学的毕业生，被供奉在先贤祠内。法兰西学院在这条街上有一栋现代化的大楼，巴黎国立美术与装饰学院也在这里。但这条街主要是以巴黎高师而闻名的，它的几栋楼都分布在这条空间紧凑的街上，居于学科最老和最高地位的数学系和哲学系位于历史性建筑45号，生物学、认知心理学等学科则分布在现代的建筑里。自法国大革命后成立以来，巴黎高师神秘地在200多年里抵抗住了所有扩张的诱惑，沉稳地做着巴黎这座大都会核心地带的一所小小的“大学校”（grand école）。直至20世纪70年代，它的在校学生都维持在200人左右，今天，这个总数也不超过800人。我知道，巴黎秋雨浸润的安静街道，只是迷惑外来者的模样。这里曾有过与恐怖相伴的浪漫，也有过文明与疯癫。

这条街所有的机构，现在都有了一个新的统一标识：蓝底白字的“PSL”（Paris Sciences et Lettres），这是“巴黎科学艺术人文大学”的缩写。巴黎高师置身于一段正在发生的历史中：这条街上的所有研究机构，加上其他地方如法兰西远东学院、巴黎高等矿业学院、巴黎第九大学、巴黎天文台等共26个机构，正在法国政府政治意愿的推动下（这非常法兰西共和国），开始融合为一所研究大学。巴黎高师是这个历史性进程的主要推动者，也是这个新组织的创始成员之一。

先贤祠广场旁，还有一所古典建筑，占据着皇家圣日内维耶修道院的遗址，这就是亨利四世中学。这个法国最好的预科学校，每年向巴黎高师输送相当比例的人才。还有一座与凯旋门相似的建筑，矗立于先贤祠广场上，这是巴黎综合理工曾经的所在地。这所同为法国顶尖“大学校”的理工大学已从老校址搬出了巴黎的中心，这成了法国高等教育和科研部的所在地。这个巴黎高师的竞争对手现在时常风头更劲。我曾造访它位于巴黎郊区帕莱索的广阔校园，恣意铺开的树林和绿地间，散发着马粪的味道——与巴黎高师的纯粹和谦卑不同，马术是这所“世袭”味道更重的精英学校里学生爱好的体育运动。与巴黎高师成为



(于魁众 摄)

巴黎高师校长马克·梅扎尔

PSL的一部分的历史逻辑一致，它也成为萨克雷大学集团的一位成员。

沿着同样从先贤祠广场发散出来、和余乐姆街相邻的穆浮达街（rue Mouffetard）走一走，一些18世纪的老建筑还保留着原先的风貌。一幢中世纪特色小楼的外墙上挂着黑奴伺候贵族用餐的油画（Au Nègre Joyeux），呈现出过去这座房子里的生活场景。1921至1925年海明威住的楼也在这里，那家他经常去一边写作，一边白葡萄酒就着生牡蛎下肚的餐厅就开在楼下。从这里，步行几分钟，经过圣日耳曼大道，便可到达索邦大学的历史校区——法国最古老大学的发源地。它与先贤祠一起构成了拉丁区的最中心。对游客来说，这里有中庭广场上教堂的雄伟穹顶，有法国思想先哲们的雕塑，有枢机主教和首相黎塞留的油画与半身像，有巴洛克风格、流光溢彩的演讲大厅。只有在这儿的教室里上课的学生，才能发现它层层叠叠嵌套结构的秘密。城市与学校发展的轨迹在这个市中心极为有限的空间里画出了一道迷宫，在里面转悠半个小时找不到教室并不意外。

与索邦相比，巴黎高师的建立晚了6个多世纪。第一帝国时期，拿破仑在“大学”（universités）之上，搭建了专门培养精英的“大学校”体系，才让法国形成了很有法兰西特色的“双轨”高等教育体制。自法国大革命以来，在巴黎拉丁区的核心、学府云集的文化中心，巴黎高师人开始在法兰西的历史上烙下他们的痕迹。

### 共和国的精英

初探高师，在高师读社会学的博士生向我讲述这所学校时，不自觉地在一个词下面画上了重点符号，这就是“身份”。过去几年里，我曾在探访几所英美名校时不断遭遇这个带有排他性（有时势利汹汹）的词。但巴黎高师的语境，却截然不同。

法国高等教育有一个“非常法兰西”的独特之处，即存在着“大学校”（grand écoles）与大学（universités）两个并行的系统。法国的大学系统和许多欧洲国家一样，起源于宗教神学院，随着启蒙运

(于魁宏 摄)



1

1. 巴黎国立装饰与艺术学院的学生，正在上版画课
2. 巴黎电影学院的学生在布景拍摄
3. 法国左派哲学家阿尔都塞
4.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帕克迪
5. 巴黎国立装饰与艺术学院院长马克·帕图切



3



4





（于越众摄）

2



（于越众摄）

5

动和社会民主运动的发展，成为世俗化的高等教育中心，逐渐形成多学科的综合性大学。但法国的“大学校”则是第一帝国时期在拿破仑的支持和倡导下建立的专门学校，目的在于培养具有专业知识的精英为国家服务。拿破仑远征埃及时，带着一支由167位科学、技术和文化专家组成的考察团，有博物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地图测绘人员、工程师、考古学家和艺术家，去调查研究埃及的自然资源和古代文物，并把劫掠的物资运回国。他的科学顾问和朋友加斯帕尔·蒙日大力协助了他的这次远征。1794年，数学家、分析几何学家加斯帕尔·蒙日在巴黎创立了第一所“大学校”，巴黎综合理工。之后，一系列师范、工程技术、军事、农学、商业、行政等专业大学校也相继成立。

李思宇告诉我，她所在的社会学专业，由于有些课程并不开设在巴黎高师，所以学生必须去别的大学（universités），比如巴黎一大、巴黎四大和索邦大学选课，实际上接受的是和大学学生一样的教育。在这种情况下，“大学校”和大学的区别，几乎就是一个身份差别。而且，像巴黎高师这样的“大学校”很特殊，“它并不提供本科、硕士或博士学位，所以还需要到别的大学‘挂靠’一个学位证书。现在只有个别系有自己的‘联合培养’项目，可以颁发联合证书”。不少从高师毕业的最好的老师则在大学教书，他们偶尔会抱怨一种法国大学体系里的“非闭环流动”情况：“最好的学生是巴黎高师的，但这些最好的学生毕业后成为老师，教授的对象却并不再是最好的学生。”不过，这种情况反过来则不同，也就是别的大学的人很难在高师上到小班课。高师数学系主任克劳德·维特尔伯告诉我：“即使有了PSL，今天，数学系的课程仍然基本只对高师学生开放，班级的规模较小，有些课程还有一对一的教学。”

即使所学的有些内容和“大学”的差别没想象中那么大，“高师人”仍是一种毋庸置疑的身份。PSL主席天曦·固隆（Thierry Coulhon）向我形容：“‘高师’就像打在你额头上的烙印，伴随你一生。法国企业和政府在看简历的时候，除了看你取得的各项成绩，最重要就是看毕业院校。‘高师’和PSL学院的身份意味着，你的起点高于普通大学的毕业生，而且会上升得更快。”一位从另一所顶尖精英大学——巴黎政治学院毕业，现在伦敦金融城工作的同学告诉我，法国大公司在招聘人才的时候，遵循一些“明规则”：“我10年前毕业时，同样的工作，顶级精英学校毕业的学生大概4.5万欧元一年，差一点的‘大学校’3.5万，一般大学可能2.8



(于慧众 摄)

左图：巴黎科学艺术人文大学正在召开讨论跨学科教育的研讨会

右图：巴黎高师音乐厅举办的周末音乐会。伴随着音乐，舞者跳起踢踏舞

万。其实他们做的事情都是一样的。有人的档案里有‘cadre’（干部）这个身份，这与一般员工的身份待遇也是不一样的。其实这也取决于你毕业的学校，如果你是一流精英学校毕业的，一毕业就可以有‘cadre’身份，如果是普通大学，可能要5年到10年才能转成这个身份。”

从政治制度上来讲，法国大学是平等主义和精英主义结合的产物：一方面，它左派力量强大，很社会主义，实行最大限度普及的全民免费高等教育，所有人高中毕业后都可以上大学，但另一方面，它又非常精英主义，在高等教育上是欧洲国家里等级分化较大的国家。这里面充满矛盾。一位巴黎高师数学系的学生就带着诡辩的狡黠告诉我，他之所以选择“高师”，“是看中了高师提供的‘身份’和快速的上升通道。但作为‘高师人’，我对它的精英化制度感到不满”。

巴黎的高等教育体系是国立大学占绝对主导地位的体制。与美国最好的大学几乎清一色是私立大学不同，法国的普通“大学”和顶尖的精英“大校”，全是公立学校。对巴黎高师来说，它成立的初衷，就是为共和国培养优秀的教师。法国教师的地位曾经非

常高，他们的职业总是与“共和国”的概念联系在一起，就产生了一个法国特色的词：“共和国的教师”。这支法兰西共和国“无可争议的统一、强大的社会力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地位逐渐下降，特别是中学和小学教师。但在一些农村地区，小学与村政府共用一座建筑物的传统都还保留着。很多杰出的高师巨擘，都有过去外省或回巴黎当中学或大学教师的经历。比如，获得过龚古尔奖的当代法国大作家于连·格拉克——《流沙海岸》的作者，就是路易·普瓦耶（Louis Poirier）中学的教师，他一直在那儿任教到退休。再比如，曾任过巴黎高师院长的让·伊波利特，就曾是米歇尔·福柯在亨利四世中学的哲学老师。进入高师的学生，相当于和法国政府订约，成为教育部和科学技术研究部的公务员，拿政府津贴，毕业后理应为共和国服务。而像巴黎综合理工这样隶属于国防部的精英学校，现任副校长是将军，在校时着军装；注重体育训练，按军队的方式组织班级；优秀学生在国庆节时则要组成方队，参加凯旋门的阅兵仪式。

“大校”学生兼有国家公职的这个身份，也让他们负有更多的“精英责任”。尽管两次世界大战中，



（于晓文摄）

欧洲各国最优秀的大学生有很多为国家奔赴战场、流血牺牲，但法国的情况还要特殊一点。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政府让它们的学者继续从事科学工作，再用他们的发明来提升军队的战斗力；而法国政府在战争开始的头两年内则认为，每个人都应该到前线去战斗；巴黎高师年轻的精英科学家更应到前线去尽他们的责任。这也造成了“一战”后法国科学界特别惨重的断层。不过，对共和国的“精英责任”现在已不再像过去那样精神化。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高师人毕业后从事教学的已不再像从前那么多，不少人涌向企业、金融界或律政界，转学或改行成了司空见惯的事，“高师—企业俱乐部”在豪华酒店举办年度聚会也早已不再是羞于启齿的事。

记得前年在牛津大学采访时，基督教堂学院的院长曾自豪地告诉我，学院的通识教育能让学文学的人毕业后胜任银行高管，学古典学的人也可以像鲍里

斯·约翰逊那样当伦敦市长。但在巴黎高师，讨论这种情况的语境则有些不同。20世纪80年代，一位才华横溢、获得文学教师授衔的高师毕业生，虽然在巴黎戴高乐广场附近开办了多所法律事务所，以文学底蕴获得了成功，但他一点也不自豪，反而有些腼腆：“在我的同行看来，我是知识分子；而在知识分子阶层看来，我却是个商人。总是有点阴差阳错的感觉。”正如两位高师毕业的记者所说的那样，将求知的过程与对权力的追求分离开来，可能是对“共和国一个世纪以来非功利、独立和免费的教育原则的背叛”。这不是什么值得引以为豪的事，相反，它是可耻的。只不过这种“背叛”来自于高师人，还是来自于共和国，无法定论。

今天，这种腼腆和羞耻感已逐渐烟消云散。当我问数学系主任维特尔伯，如何看待自己的学生毕业后去从事投行或金融工作，他云淡风轻地回答：“我们



图：高师(十一)



左图：高师毕业生、巴黎科学艺术人文大学副主席爱德华·禹嵩

右图：数学家、物理学家，巴黎科学艺术人文大学主席天曦·崮隆

鼓励学生毕业后进入任何行业。”按照共和国与高师人的约定，他们本应为国家服役10年。然而，“说实话，没有见到提前离开教育领域的人受到什么惩罚”。一位高师人告诉我。考虑到法国目前的经济状况和年轻人接近20%的失业率，共和国又怎能不把自己精英的就业前景提升到首要考虑的地位呢？更何况，校友的财富是可以回馈学校的。高师校长马克·梅扎尔告诉我，就在6个月前，他发起了高师历史上第一次校友筹款活动。鉴于高师70%的预算来自政府的财政预算，30%来自于捐赠、企业、欧洲和其他基金，这对将大部分与财政相关时间都花在和政府官员做预算的高师校长来说，是史无前例的。“虽然作为一所小型学院，我并不期待能像美国大学那样筹到那么多钱”。梅扎尔说。

法国人有很强的“大学校”情结，渗透了用人制度、市场规律和观念习俗。凡是名字里有*école*，*collège*（学院）和*institut*（研究所）的，基本上属于“大学校”系统，对法国人来说，就是身份的象征。纵观近一两百年来的法国历史，几乎所有的国家首脑、行政领导、企业高管和思想文化界的大师都出自这几所小而精的“大学校”：巴黎综合理工、国家行政学院、巴黎高等商校和巴黎高师。可以说，正是这几所学校，主宰着

法国的命运。不过，在这个“精英制造”体系里，有一个必须提及的关键制度，以其公信力生产了“精英”身份的合法性，这就是预科班制度。虽然预科班设立在高中，但它其实是大学体制的延伸。

一位高中时曾交换到法国南部城市波尔多读书的学生告诉我：“整个波尔多只有大概两所有高中有预科，是当地最好的高中，基本上只收波尔多每个学校成绩最好的前5名。这些孩子高三毕业后再读两年预科，然后参加‘大学校’的入学考试，基本每天晚上要学到两点过，相当于连着读三个国内的高三。因此，与高考不同，‘大学校’入学考试是尖子生班的再筛选，水平相当于国内‘大二’。不过，考进去，基本就轻松了。”而在巴黎，这样的预科班高中大约有10所。

在预科班，学习只有几个大方向，如数理班、理化班、生化班、理学商科班、经济商科班、文科班等。鉴于预科班教育与英美大学生从高中毕业至“大二”的大学教育处在平行的时间段里，我们可以把预科班教育理解为与耶鲁大学本科生所接受的通识教育相似，即大一、大二不分专业，“大三”才选择专业。预科虽然设在中学，但学的课程却完全是大学课程。如数学，完全是数理化、文史哲所有学生的基础课，



(于毅公 摄)

没有专业课；理科班的重点虽然是数理化，但也有很多文史哲的课程。科目学习的分量又重又深。第二年则学习科学文献分析阅读，指定学生阅读文献两小时后演讲，再由老师当场点评，期末考试的时间长达4小时。预科的教师基本都有博士学位，但取得教师资格需要通过全国考试，而且会不断受到评估考察。他们没有科研要求，只一心一意教书，不仅收入很高，而且在法国有很高的地位。

在这次采访中，高师的许多人都向我提到了“训练”（formation）这个词，他们把“训练”和“研究”做了区分。这个词在英美大学的教育体系中几乎没有出现，甚至是作为“教育”的对立面而略带贬义的。比如，菲尔兹奖获得者塞德里克·维拉尼就向我强调，他觉得自己最受益的是预科班和高师的数学“训练”体系；PSL的学位教学主管伊莎贝尔·卡托和学术研究主管亨利·贝雷斯蒂奇在设计“大学校”课程时，也将“训练”从“研究”中剥离出来。我想，预科班是理解“训练”的关键。虽然法国“大学校”并没有提出“博雅教育”这个概念，但他们实施的，其实是更加深厚的“博雅”教育，只是它带有更多方法论与强制性色彩。但不要以为学业上严格的“训练”，将磨灭高师人的反叛精神。

相反，“修道士般的戒律”成了“无政府主义者存在的支柱”。好像是为了弥补在艰苦难熬的预科班生活中失去的乐趣，高师人将把自由和无政府状态发挥到极致。有种说法是“高师是唯一一所仅随着年龄增长即可过渡到高一年级的学校”，这大概适用于文科生。

毕业于高师的PSL副主席爱德华·禹嵩（Edouard Husson）告诉我，预科班加“大学校”的选拔体系，最初其实借鉴了中国的科举制度。当路易十四的元帅沃潘想为军队招募时，他建立起一种“没有人能够通过推荐或是关系被录取，职位必须由能力和才能来决定”的考试选拔制度。预科班从制度设计上看，确实具有阶层流动性；它不看你的课外活动、其他成就或推荐信，学习成绩是唯一的标准。理论上，进“大学校”靠的是天分和勤奋，而不是社会关系。

在高师毕业的法国作家于勒·罗曼的一部小说里，主人公坐在高师的屋顶上，反思他平民子弟的命运：“一个乡村教师的儿子，农民的后代，一个民间最健康、强壮、单纯的家族。既没有市民疲惫的陋习，也没有平民的奢望。无产者的一生中并非只有苦涩、折磨与侮辱。面对不公正的社会，不需要复仇，要用冷静的目光面对一切……”于勒·罗曼本人就是这样一位农民子弟。在高师200多年的历史中，它的学生有不少出身于富裕的大资产阶级家庭，但总的来说，高师人的家庭出身比较普通，预科班上常常有“来自偏远省份，带着各自浓厚的乡音和土语，却有着令人感叹的求知热忱的学生”。20世纪70年代以前，从农村走向大学的过程，是有可能通过三代人来完成的：农民出身的父亲当上省城师范小学的教师，再鼓励儿子成为高师人。而今天，这种体系提供的流动性正在减少。家庭因素越来越成为进入精英学校的考量因素。毕竟，巴黎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家庭以及外省的优越家庭，比社会中下层家庭拥有更多的文化教育和信息资源。21世纪的统计数据表明，预科班学生家长50.8%属于上层社会。高师校长马克·梅扎尔告诉我：“为了缓解这种倾向，我们现在已开始从两个渠道录取学生：预科班，以及成绩优异的普通大学学生。”

但高师毕竟曾是一个能让人抽离其出身的地方，这也让“共和国的精英”们常常有一种平民阶级的基本立场。如果说“知识分子”是法国文化的创造物，那么高师就是孕育法国“知识分子”的摇篮。他们的精神追求与中国的士大夫阶层有几分相似，都不屈膝为社会权贵效力，政治倾向是偏左，而且以毫不留情的现实批判为己任。只是如托尼·朱特在《未竟的往昔》

法国知识分子，1944～1956》一书里所观察到的一样，法国的公共理论由无处不在的中央集权国家形态所决定。在强调公民教育的启蒙运动中，法国人倾向于认为：“个体的利益和需求往往不太可能同竞争和自我发展过程协调一致，而常常倾向于以一种权威的方式来定义和确保社会能够为了所有人共同的利益而运作。”在法国，“寻求国家支持和保护的习气，自波旁王朝以来就成了传统”，国家的能力也同个人的利益整合起来。对易被抽象所诱惑的法国人（高师人更是）来讲，“普遍的、无差别的民主替代了自由的理念，成了共和国主流语汇中的潜台词”。个人反抗普遍与共和的自由主义在法国现代政治话语中一直缺失，也许，这就是继萨特、福柯、德里达和阿尔都塞以后，法国知识分子缺乏创造力、话语权式微的一个原因吧。

高师人以擅长攀爬登高而闻名，房顶散步是高师神话的一部分。想象一下，当一位高师人在学院的尖斜屋顶上行走，迎风大声吟诵希腊语、拉丁语和诗歌，整个巴黎南部的风景尽收眼底，哪位年轻人的心中不涌起抱负、憧憬与理想呢？哪位年轻人又能抵挡住“由高度引发激情，从而联想到权力”的诱惑呢？对那些外省青年来说，高处的眩晕之后，巴黎像大海一样在脚下展开，就像有待征服的领土。我一直觉得，与海德堡大学相比，高师的哲学精神，并不是仰望星空的，而是俯瞰众生的。也许爬上屋顶俯瞰巴黎的冒险，赋予了他们介入政治的视角吧。

只是今天，高师人很少再攀爬屋顶了。一位高师人告诉我：“现在流行的是扔水池。被几个人架到恩斯特水池那里，扔进去，爬上来后，再伙同大家把方才扔自己的人扔下去。”我难以赋予这一场景浪漫的含义，却忍不住想象池中的鱼儿惊扰沸腾的景象。也可能，这更加体面，风险也更小的冒险，才更适合新时代的高师人吧！“在一个变得越来越官僚化，越来越强调专家治国的时代，知识分子已经无法再为政治提供理论和思想指导了。”一位高师文学系的教师如此告诉我。

## 全球化：悖论与选择

在余乐姆街逗留的这几天，有几件让我略微惊讶的事，向我暗示了法国正在发生的变化。第一件事，是几乎每个高师人都会用“法国是一个小国”来介绍自己。或许这是出于待客之道的谦卑，也或许，我心中仍然固持的“法国是一个大国”的观念已经过时。

第二件事，是我被每一个人告知，2003年法国在大学排名榜的全线沦陷，吹响了“唤醒法国人的号角”，从而开始了一场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高等教育改革。可能我一直以来对法国人的骄傲都是一种误会；骄傲的人怎会按别人的标准来重塑自己呢？第三件事，是离开巴黎的那一天，我匆匆听了一场正在PSL举行的法国高等教育改革研讨会，PSL联盟里的学院和机构领导悉数到场。这是一场用英语召开的会议，虽然它的与会者几乎全是法国知识分子。这打破了我对“法国人只爱说法语”的成见，法国人开始变得越来越像欧洲大陆的德国和北欧邻居了。

我难以理解的是，这些有着200多年历史、学术声望很高、各有特色的“大学校”，为什么200多年彼此相安无事，突然之间在2003年“觉醒”，开始推动大学的联合与融合？我同样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作为法国顶尖的精英学校之一、在国际教育市场中显然更有能力独立存在下去的巴黎高师，却遵照自己的独立意愿，决定成为PSL联合体的创始成员？

高师校长马克·梅扎尔给了我一个解释：“小而美”已经无法适应这个时代的知识生产和人才生产模式了。“在过去二三十年里，我们逐渐意识到，小规模开始大大限制高师吸引最好的全球才智——最好的学生和教师的能力。在过去30年发生的事情是，高等教育最优秀的人才和最好的资源都越来越向少数几个大学机构集中，从而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资本向它们聚集，知识的生产方式也越来越规模化。”梅扎尔谈到他作为高师的校长去访问世界上最好的大学。“我总是受到尊重和礼遇，因为每个人都知道巴黎高师。但当我提出，‘我们来做一个交换项目吧’，我谈论的通常是‘明年可以送两个学生过来’这样的数量。我还记得我的中国香港同行当时对这么小的规模非常震惊，我连忙解释‘但他们非常优秀！’但我慢慢发现，对世界上的大多数大学来说，让他们花时间去安排‘两个人的交换项目’，真的是一种浪费。”巴黎高师面临着两个选择：是继续做一个法国特殊的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小型“大学校”，不在意外面发生的事情，还是对全球化的国际竞争做出回应？“我们的选择是后者。为了对国际竞争做出回应，我们是选择扩大规模，还是选择联合？选择前者，我们有预算上的限制，也有空间上的限制——居于巴黎市中心，又不愿放弃市中心作为学校特质和身份的重要部分，所以我们选择了联合。”“当我们作为一个整体，去世界各地的大学旅行时，我们终于可以谈论一个‘20～30人’能落地的项目了。”

有意思的是，在 PSL 的创建过程中，不同学科的地位问题以一种“令人瞠目结舌的方式”呈现出来。高师毕业的 PSL 学术委员会主席弗洛伦斯·韦伯为我勾勒了一幅 PSL 内部学科权力的概貌：“在 PSL 的组建过程中，所有对这一组织做出巨大贡献的人几乎都是数学和理科学科出身。比如，巴黎高师的校长、物理学家马克·梅扎尔，高师副校长、数学家伊夫·拉斯洛，数学家天曦·崑隆，高师毕业的数学和哲学家亨利·贝雷斯蒂奇和‘为社会学服务的’数学家伊莎贝尔·卡托。这些信号都明确指出了这是‘科学’的时代，所有学科都居于数学学科的统治下。而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们无论在高师、在高等社会科学院，还是在国家科学研究中心，都退居二线。”而恰好是在这些科学领域，跨领域、跨国、全球性的合作研究，正变得必不可少，从气候变化到生物医学都是如此。更有趣的是，韦伯告诉我，除了传统和历史因素，数学和哲学目前的学科地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数学和哲学，至少在法国，是抽象科学中仅有的，在没有太多资助的前提下，可以做出最杰出成果的学科。而法国从很久以前就已经是一个穷国了！物理、化学、生物，这些学科的研究虽然都有很大的赚钱潜力，但前期都需要足够的资助，而这一资助已超出了法国小型高等教育机构可获得的范围。这一困境将来还会加剧。”看来，对全球化一贯持批判态度的法国来说，在这个时候选择回应全球化、共享资源，也是不得不做的选择。

但对于一个孕育“共和国精英”的国立高等教育机构来说，还存在一个悖论：对巴黎高师来说，政府的财政拨款、学费全免和给学生的津贴，都是基于公民身份的；而学生也理应以公民的身份回报共和国。但当它想要走向国际化的时候，国家、学校和学生之间，失去了公民身份的纽带，又应是何种关系呢？马克·梅扎尔告诉我，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高师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也发生着变化：“20 多年前，高师几乎没有什么独立性，重大决定主要听从从政府部门的安排；这种独立自主，直到 2010 年才完全实现。那个时候，巴黎高师几乎所有的财政预算都来自政府拨款，至今，大部分的法国大学仍有 85% 的财政来自政府。但今天，巴黎高师已经有了 30% 的资金来自非政府的个人捐赠、企业、欧盟和国际基金——这种情况在法国语境里显得有点特殊，但它是高师的发展趋势。”而在学校和学生之间，法国精英大学一般是与其他国家的大学建立合作框架，通过交换项目吸引至少“大三”以上的

本科生和博士生到法国学习，这部分解决了公民身份的逻辑悖论。

但也许还有一个矛盾，是高等教育资源全球化本身的矛盾。英美大学正是通过市场化运作教育资源，很好地完成了全球化战略；但很多教育机构的质量，却受到了市场化本身的侵蚀。一位在法国“大学校”就读的中国留学生告诉我：“法国的高等教育体制在质量上其实高于英美，因为它国立，政府拨款的，教育资源并未市场化，保持着近于苛刻的考核水准。而在英美，私立的教育资源已经被完全市场化和商业化。这意味着，除了牛津、剑桥这样的学校，在很多英国大学，教育成了交易：学生支付高昂学费，学校应提供相应的教育服务，包括提供保证学生走出校园能够获得良好成绩的文凭——只要你的成绩差不多，基本都不会为难你。”当法国的高等教育迈出全球化战略的步伐时，它还能维持现有的高水准吗？

而其实限制法国“大学校”规模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正是遴选严格的预科班制度。这种预科班制度选拔过于严格，一方面保证了法国精英教育的过硬质量，另一方面又几十年保持了仅占法国高中毕业生总数 5% 的“一小撮”录取数量，难以扩大规模。而且预科班设立在法国高中里，孤立于整个高等教育体系，在国际上很难产生较大影响。19 世纪，这种预科班制度曾经被欧洲视为楷模，很多国家，包括美国都纷纷仿效，但由于不能保证规模效应，很快就纷纷抛弃了它。只有在法国这个崇尚优雅和“小而美”的国家，它才延续了两个多世纪的生命力，直到它不得不向粗俗的规模化学术生产做出妥协。

而巴黎高师的社会学者、布尔迪厄的继承者们，也许对法国“大学校”的全球化抱负有着不同的感受。韦伯告诉我：“对法国的社会科学研究者来说，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他们就已经习惯了窘困的研究环境：他们是杰出的民族志学者，因为这种研究花费不高，只需支付学者的工资。……我们保持的批判传统并非继承于后现代主义：所有这些后现代理论正在崩塌之中，它们引导人们走向一个‘后真实’时代，这只能带来政治上的灾难。我们依旧吸引着卓越的国际学生，他们来自于中国或者拉丁美洲。我们的法国学生也仍然可以顺利地其他国家的研究所以找到合适的职位，如美国、荷兰、澳大利亚。我认为我们追求的是寻找以美国为中心的、偏安一隅的社会科学的替代方案，同时避免在回避美国中心主义时，产生对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再阐释和建立其上的极端立场。”



(于楚众摄)

上图：巴黎高师哲学系主任马克·克里朋 下图：巴黎高师于1847年迁至巴黎余乐姆街45号，这是高师最古老的建筑



(于楚众摄)

# 这不是一个哲学的时代？

文 / 陈赛

这不是一个哲学的时代。但作为哲学家，我们必须尝试更新人们对复杂性的愿望，这才是哲学的地盘。

## 语词的黑镜

在巴黎高师哲学系主任马克·克里朋（Mark Crepon）的办公室里，他花了不少时间向我解释什么是“屏幕词”（screen word）。

比如法国发生了恐怖袭击，当政治家谈到这些恐怖袭击时，他们必须给出很快的信息、意见，做出决定，他们会把这些袭击称为“战争”。

在这里，“战争”就是一个“屏幕词”。这种词在你的思想和你分析的真实事件或者现象之间制造出一个屏幕，它描述发生了什么，但并不帮助你思考它。一旦你不假思索地把“战争”放在事件之上，很多问题滑过，思考停止。

哲学所做的，就是打破这些“屏幕”：我们真的能把这些袭击定义为“战争”吗？如果我们用“战争”这个词，我们真的理解正在发生的这些事情吗？当我们使用“战争”这个词的时候，我们暗指了什么？武器是什么，策略是什么，敌人是谁？我们是在与宗教作战，与伊斯兰国家作战，还是说，这是一场法国内战，是法国大多数人对少数被恐怖主义吸引的年轻人？

“哲学需要的是一定的距离，与那些即时的反应、不假思索就使用的词语之间的距离。”克里朋告诉我。

“这也是时间的问题。”他说，“今天，世界运转的速度非常之快，人们渴望即时的答案与解决方案。但哲学是一种与时间的不同的关系。哲学需要时间——阅读的时间、分析的时间和思考的时间。”

“今天我们所称的‘哲学’，所谓幸福的秘方，不过是一些轻哲学、普通智慧（common wisdom）而已。”说到这里，克里朋的嘴角不自觉地往下一撇，闪过法兰西民族经典的对于糟糕品位的不屑表情。“作为哲学家，我们必须尝试更新人们对复杂性的愿望——这才是哲学的地盘。”

到了法国以后，我首先意识到的就是法国人对语

言的一种复杂感情：敏感、迷恋、骄傲、警惕。语词、文本，处于现实世界与人的头脑之间，像一道面纱将二者隔开。他们一方面追求语言的精确、明晰与优雅，无视语法规则甚至可以上升到“对理性准则的践踏”，但与此同时又时时警惕着语言对于思想的操纵和塑造潜力。

耳濡目染之下，我也多少学会了一点从“词语”中去把握世界的技巧。比如，我惊奇地发现，刚刚成立的巴黎科学艺术人文大学在英语中是 Paris Science & Letters，与人文相对应的是 letter，而不是 humanity。我还发现这里的文科教授们喜欢自称 man of letters，比如克里朋教授本人，年轻的时候也曾写诗、写小说，后来才被哲学所吸引。

萨特的自传取名《词语》。在这本童年传记里，他提到他的外祖父查礼·施韦泽，虽然从不自认为是一个作家，却对法国语言怀有莫大的兴趣，哪怕在 70 高龄的时候。

“他摆弄着法语，他喜欢词语，喜欢拼读词语，他严格的发音绝不会漏掉一个音符。在他空闲的时候，他还会用笔把词语排成一束鲜花的形状。他十分乐意以其即兴之作来为家里或学院里的事情增添光彩，诸如新年贺词、生日以及婚礼宴席上的祝词，为查理曼大帝而作的诗一般的讲话，还有小喜剧、字谜、限韵诗等种种可爱的小事情。”

作为他的外孙，萨特同样迷恋词语，迷恋层层概念所堆砌的意义的迷宫。他希望通过词语介入世界——“不是通过观察世界，而是通过观察组合词语得到它。通过组合词语，我将掌握真实的事物。你组合了它，然后就有了一个提供真理的词汇集合体。你通过想象来组合词语，创造词语集合体的想象。在这些词语集合体中，有些是真实的。这里的确有一些无法知晓的魔力，因为我原先没有想到它。它是由语言本身提供的。”

这位 20 世纪最著名的哲学家更愿意被称作文学家，而不是哲学家。因为哲学本身没有绝对价值，境况的变化会导致哲学的相应变化。哲学的正确与否不能在当下做出判断，它不是为同时代人写的。它谈论的是那些远远超越了我们今天个人观点的事情。文学正好相反。它记下的是当前的世界，是人们通过阅读、

谈话、情欲、旅行发现的世界。所以，他写小说，写戏剧，写评论，一生没有离开过他的笔，离开过写作，直至最后双目失明。

这几天，我零星地读着他的《词语》，阿尔都塞的《来日方长》，阿兰·巴迪欧的《爱的多重奏》，以及福柯的《疯癫与文明》，居然都读得津津有味，只觉得这些哲学家的文字灵动自如、活色生香，与黑格尔、海德格尔、哈贝马斯的晦涩艰深不可同日而语。

后来，我采访克劳德·安贝尔（Claude Imbert）教授，问到法国哲学的特点，她特别提到法国哲学家对语言的明晰性有一种特殊的追求：“不仅因为我们是普鲁斯特的后代，也是一种对读者的坦诚与礼貌——既然你做出了努力阅读我的书，我一定让你的阅读值回票价。”

“这就是法国的传统，伏尔泰、卢梭、狄德罗，你能说清楚，谁是哲学家，谁是文学家？比如我就认为列维-斯特劳斯是20世纪最伟大的作家。”

安贝尔教授今年80多岁，是法国当代哲学的大家，年轻时曾长期担任过列维-斯特劳斯的助手。

列维-斯特劳斯没在高师读过书，但他以哲学家身份进入人类学领域，希望能将自然科学的方法引入人文社科领域，也是存在主义最重要的批评者之一，曾经与萨特有过多次激烈的论辩。作为“结构主义”之父，他认为人类行为的底层隐匿着一些普遍的结构，比如语言，我们以语言为交流意义的工具，但这种交流无可控制地受到语言内在结构的限制与影响。

8年前，列维-斯特劳斯去世的时候，《纽约时报》曾经登出纪念长文，特别提到他的《忧郁的热带》，称赞该书的写作“渊博而诗意，充满了大胆的排比、精致的论辩、复杂的隐喻”。

那天晚上，我采访巴黎天文台的一位天文学家斯蒂芬尼·马泽维特（Stéphane Mazevet），他在巴黎科学艺术人文大学主持一个关于“人类起源”的大型科研项目。光头，穿着入时，风衣，围巾，是我在巴黎遇到的难得亲切的一个人。他希望让我理解这是一

也许就是因为在巴黎，法国哲学才呈现出如此浓郁的生活气息与艺术气息吧。他们的思考不仅关于概念，关于实质，也关乎气质，也关乎风格。

个多么野心勃勃的项目，不仅拿到了政府的巨资，而且集合了法国当前最优秀的一批物理学家、生物学家、天文学家、哲学家和人类学家……

什么什么，哲学家和人类学家？

是的，因为我们并不知道生命的定义是什么。

因为晚上要赶去高师听一场演奏会，天文学家主动提出帮我带路。天下着小雨，我们沿着巴黎街头走着走着，不知道怎么就谈到了福柯。

我说福柯现在在中国非常火，他的纪录片有上千人来看。他淡淡地说：是啊，福柯也是我的最爱。

“不不，与其说他的哲学，我更爱他写作的方式。”他说，“很美，很清晰，又很简洁，但逻辑的层层建构，严密而精致，跟我们科学家其实很像。”

我们在圣米歇尔大街的十字路口分手，他要赶去参加一个宴会，而我穿过先贤祠继续往巴黎高师走去。

先贤祠巨大的穹顶在夜色中投下浓重的暗影，我知道那里沉睡伏尔泰、雨果、大仲马、卢梭、左拉……

幽深蜿蜒的小街上几乎没有几个行人，空气里弥散着哥特式石头建筑的气息。我的路痴症发作，完全迷失了方向，因为之前碰过的钉子，我已经彻底放弃了问路的行为，只是漫无目的地往前走，走过一个个昏黄的街灯，一家家咖啡馆，雨水模糊了店内的人影。

巴黎被称为“光之城”，因为这是1889年世博会上第一个使用街灯的城市。此外，据说还因为这里是18世纪的启蒙之地。在启蒙时代，巴黎是欧洲教育、哲学与思想的中心。哲学精神在这里发展得比任何地方都更好。就像有一首老歌《巴黎天空下》（*Sous le ciel de Paris*）唱的那样：“巴黎天空下 / 坐着一位哲学家 / 两位乐师 / 和一群看热闹的乞丐和流浪汉 / 四方游客云集 / 他们海阔天空地神聊。”

也许就是因为在巴黎，法国哲学才呈现出如此浓郁的生活气息与艺术气息吧。他们的思考不仅关于概念，关于实质，也关乎气质，也关乎风格。

几年前在海德堡采访，遇到的哲学家仍然秉承着德国古典哲学的精神传统（他们一直认为，应该有一门学科，用一个统一的有关世界的图景把人类所有的知识结合起来），试图以“真理”“时间”“自由”三个概念为基础，构建一个宏大的综合理论体系。他们相信，这三个概念之间有一种深刻的内在关联，只有在一个综合的结构里，你才能真正理解真理是什么，自由是什么，时间之箭是怎么回事。

在法国，我见到的哲学家谈得更多的是人，是文学，是政治，是艺术，是宗教与暴力、宗教与爱之间

的悖反关系。他们创造各种关于世界的概念，思考这个世界是如何构成的，人的思维是如何构成的，但真正关心的，似乎却是生活的可能性——只要改变思想，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改变生活。

就像福柯说的：“在我们的社会，让我震惊的是，艺术变成了某种只与物品有关、而与人无关的事情。艺术变成了某种专业化的分工，只有作为艺术家的专家才能从事。为什么每个人的生命不可以是一件艺术品？为什么台灯、房子可以是艺术品，而生命不可以？”

同样，对于萨特，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这么一句话——当一个人到了50岁，都会有一张“值得”的脸。

从最浅显的角度来看，人要为自己的面孔负责，因为尽管这张脸是父母给的，但50年的人生里，七情六欲如何在你脸上刻下风霜印记，是你自己的事情。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要为这些七情六欲、岁月风霜负责呢？

萨特的“存在主义”，所谈的不仅是人的存在，人的自由，也是人的责任。他说，存在先于本质，人没有既设的目的，没有上帝提供一个关于人的基本概念，每个人都是自我命运的创造者。所以，谁都没有借口。人一旦做出选择，就必须承担这个选择所带来的一切责任。而且，不仅要对自己负责，还要对整个人类负完全的责任。所以他说，人注定要受自由之累，背负整个世界的重量。

在我们的时代，我们更愿意以各种借口为自己开脱。我们只是无辜的受害者，那些远的近的灾难、失败、不公正，无论个人的、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都不是我们自己的错，而是别人的错。

但在萨特看来，不仅人的情感，我们生而为人的所有基本特质，都是一种自我的选择。即使是那些看起来无意识的行为，也是一种根本性的自我表达。你的每一个行动，无论多小多简单，都取决于更广泛的生命意义。那么，我千里迢迢来到这里，探寻一个陌生的国家，一所陌生的学校，一个我并不了解，也并没有资格来谈论的学问，这种选择背后是一种什么样的自我在推动呢？

走着走着，我已经不再担心赶不上那场音乐会了，甚至开始有一点享受这种迷路的感觉。我也多少理解了这些天在法国感觉到的疏离感，首先恐怕是语言造成的。不懂法语，无法领略法语的精妙之处，意味着我永远无法真正抵达法国智性生活的内核。但是，就像这些弯弯曲曲的小路，如此迷人，即使一个路痴走过来，也觉得满目都是风景。

## 高师的哲学训练到底有什么独到之处？

一位曾在高师读过哲学的朋友告诉我，高师的建筑空间是一种晶体结构，里面错综复杂，跟迷宫差不多。但我粗粗一转，并未感觉到它的复杂，只觉得小得不可思议。

安贝尔教授告诉我，不仅因为这里地处巴黎中心，也因为高师一向有节俭的传统。“我们有世界上最好的图书馆，但里面的桌子很小，没有空调，窗户坏了用透明胶布补一补就好。我们有很多大实验室，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花费很大，除非必不可少，其他都可以俭省。这里没有奢侈的东西。”

入口处两尊半身雕像相对而立，一尊是文学，一尊是科学，标志着这是一所文理兼备的“大学校”。事实上，直到今天，在法国的“大学校”系统中，高师仍然是唯一一所文理兼备的“大学校”。

这让我想起阿兰·巴迪欧，法国当代最著名的哲学家，曾经在一篇自传性的小文章中提到，他的父亲是高师数学系的，母亲是高师文学系的，而他在高师读哲学。就这一点而言，他认为，这就是哲学自身的一个教训：哲学语言永远在数学与诗之间。

数学与哲学，至今仍然是高师的两项桂冠。自1794年10月30日建校起，200多年的历史里，高师数学系一共毕业了1000多人，10个人得了菲尔兹奖。

哲学系呢？在200多年的历史里，几乎每一个对全球思想界产生过广泛影响的法国知识分子，亨利·柏格森、爱弥儿·涂尔干、让·保尔·萨特、马克·布洛赫、路易斯·阿尔都塞、米歇尔·福柯、雅克·德里达、皮埃尔·布迪厄……都在这里接受过哲学训练。尤其是20世纪以来，它不仅是各种“主义”诞生的温床，也见证了它们的种种变迁——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

我向克里朋教授请教，巴黎高师的哲学训练到底有什么独到之处？

他回答说：“我观察美国学生，他们学哲学往往是直接从问题入手的。你会遇到一些哲学系的博士生，从来没读过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儿、斯宾诺莎，但在高师，你在找到自己的问题之前，必须先通晓哲学所有的历史，从柏拉图一直到福柯，到德里达，不是从一个哲学家到另一个哲学家，而是从一个哲学时刻到另一个哲学时刻。”

“每年我都这样告诉学生，他们必须有自由的时间来读书。花上几个星期，无论在图书馆还是在房间



(于慧/摄)

巴黎高师的中庭花园，内有著名的恩斯特池塘

里，阅读一本艰难的哲学书——没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哲学体验了。哲学需要时间，需要与哲学经典（柏拉图、斯宾诺莎、康德、黑格尔、胡塞尔、尼采等等）之间漫长与私人的对峙。”

“这两种训练方式当然各有优劣，比如在法国的模式里，你不容易找到自己的方向，但一旦找到了，会产生像福柯、德里达、德鲁兹、巴迪欧这样的大哲学家。如果你分析这些大思想家，你会发现，他们在哲学之外，都经过了文学、历史、语言、艺术的综合式熏陶与训练。我相信，只有在整体的哲学、历史、文学、语言、艺术的大文科传统中，才能产生那样丰富的思想，那样光彩夺目的人物。”

萨特于1924年以第7名的优异成绩考进高师哲学系。同届校友中还有未来著名的哲学家雷蒙·阿隆，未来的科学哲学家乔治·冈尼兰姆，未来的临床心理治疗创始人丹尼尔·拉加什……

根据《巴黎高师史》（弗朗索瓦·杜费/皮埃尔·贝特朗·杜福尔）的记录，这一届即将在法国知识界形成长达半世纪影响的高师学生，在入学考试中被认为“哲学水平低弱”。主考人的报告是这样写的：“在最优秀的考卷中也很少看到哲学的人格……诚然，在这样的考试中我们并不苛求思想意识还未完全形成的学生有独创性，我们只是希望对于今年‘什么是智慧’这样平常的考题，能有更多的应试者勇于展示个人的思想成果。”

萨特曾经多次提到，自己在高师度过了几年非常幸福的时光，言辞之间有很深的留恋。他尤其喜欢高师自由的氛围。“巴黎高师是这种时刻的一个顶点。它就是自由。学校的规章使我有行动的自由，一个学生可以在校外一直待到半夜，半夜之后他可以翻墙进入。”

当时这个学校被人戏称为“戴莱姆修道院”（出自16世纪法国作家拉伯雷的《巨人传》，“戴莱姆修道院”的宗旨是“做你想做的事，这是一个身心精神自由的理想王国”）。

“高师之所以是高师，是因为在这个学校里毫无纪律可言，校规吗？什么校规？校规逐渐放宽，放宽到半透明、透明抽象的地步了。19世纪20年代末，学校至少还规定学生必须在深夜1点之前归校，晚饭后不能带女朋友进来。然而，攀墙如此便利，简直不在话下。”（《巴黎高师史》）

福柯在高师则过得很不开心。根据詹姆斯·米勒所写的《福柯的生死爱欲》记载，他中学时代成绩时好时坏，19岁时参加巴黎高师入学考试名落孙山，后

来做插班生复读。在高师求学的日子里他郁郁寡欢，厌恶集体生活，曾经两度自杀。他的老师、同学回忆说，当年他曾用刀片自残，在夜里手持匕首追赶一名同学。高师毕业后福柯参加了教师资格会考，又是连考两次才通过。

在这里，你有一种强烈的普鲁斯特式的感慨。那些书本里光彩夺目的名字，曾经在这里学习过、思考过、争论过、生活过的人，如今都已经不在了。还有一些更古老的人，他们的面孔变成了墙上的雕塑，静静地俯视众生。小小的方形庭院中，金黄的银杏树下走过的，是一张张新的、年轻的面孔。有人行色匆匆，赶着上课；有人坐在窗台上悠闲地喝着咖啡，啃着面包；一张空荡荡的木桌上，一个满头鬃发的年轻人正抱着笔记本电脑奋力敲字。

他在写什么呢？我不禁好奇。

萨特曾说，人人都想写，因为人人都想成为有意义的人，使得自己的经历具有特色，否则这一生就会被忘掉。

当然，他的一生已经被深深刻入历史，想被遗忘都很难了。

十几年前，法国哲学家阿兰·巴迪欧在英刊《新左翼评论》上发表文章《法国哲学的探险》，提出20世纪下半叶的当代法国哲学思潮在哲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是继古希腊哲学、启蒙时期的德国哲学之后的第三个重要哲学阶段。

在这篇文章里，他将所谓“法国哲学时刻”的起点和终点定在1943年萨特的《存在与虚无》与90年代初德勒兹的《什么是哲学？》。“法国哲学阶段在他们两人之间展开，历经巴什拉、梅洛-庞蒂、列维-斯特劳斯、阿尔都塞、福柯、德里达、拉康，当然也包括萨特和德勒兹，也许还可以算上我自己。”

这一连串的名字，绝大部分都曾经在高师哲学系读过书。这些哲学家当年如何在高师度过了他们的青春岁月，与他们日后思想体系的形成与演变，以及整个法国哲学的面貌之间，是否有着某些隐秘的关联？

比如法国哲学强烈的跨学科倾向，从哲学到文学、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精神分析、艺术史……与高师对跨学科鼓励有没有关系？高师一向鼓励跨学科之间的对话，不仅是文科之间的对话，还包括文科与理科之间的对话。在高师小小的校园里，这样的对话时时刻刻都在发生。直到今天，学校仍然非常鼓励学生选专业以外的课程，且不得少于总学分的三分之一。

如果从学校内部去探寻，我们还可以找到很多通

往法式智性 (French intellectuality) 的秘密线索。比如高师对于学生生源极其严格的筛选机制，直到今天，巴黎高师每年在法国全国仍然只招收 200 名学生，科学 100 人、文科 100 人。我们按比例转换一下，相当于把全中国的高中生扔到一个过滤器里，然后选出 4000 人，安置在一个北大清华的合并体里。

国外生源的选拔也极其严苛。高师哲学系的中国校友戎恒颖参加了 2012 年巴黎高师的国际选拔，整个文科在全球一共招生 15 人，哲学系只招了 3 个人，但报考的有 1000 人。

一旦考上之后，高师的学生就基本可以跨校跨专业地使用巴黎所有的学术资源。高师哲学系的校友张小星告诉我，他以哲学系学生身份考入高师后，第一年在高师数学系注册了本科高年级课程，第二年无须申请就直接在巴黎四大注册了硕士第一年。硕士两年结束后，又直接在法国分析哲学研究中心 Institut Jean-Nicod 读了一年硕士课程。这些文凭中的任何一个，对于非高师的学生而言，都是要经过申请，且很难获得的。

因为学校小，学生与导师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密，他们日常见面，一起阅读和讨论文本，组织规模很小但水平很高的研讨会。高师的所有研讨会都是开放的，不感兴趣的人听不下去自然就走了，所以是一种“无须关门的筛选”。

我问安贝尔教授，是否对今天所处的这个时代感到失望？毕竟，她曾经和萨特、梅洛-庞蒂、列维-斯特劳斯、福柯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经历过法国哲学的黄金时代。如今，大师们纷纷陨落，法国哲学也似乎陷入低谷。

她抬头看了我一眼，问道：“你有没有读过福柯的一篇演讲《什么是启蒙》？”

“在那篇文章中，福柯引用波德莱尔的一句话，‘没有人有权利鄙视自己的时代’。你能做的，就是关心它，创造属于这个时代的新的思想 (new intelligence)。”

“不要被那些名字的幻象所迷惑。”她说，“那些名字属于过去。今天，他们是经典，是我们必须跨越过去的门槛。”

那一代哲学家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接受了哲学训练，他们基本上都没有参加过“一战”，但在“二战”中感到无力，无法表达自己，直到“二战”之后才找到自己的声音。战争的经验给了他们一种前所未有的成熟度。正是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在巨大的灾难和毁灭之下，在一片荒芜的精神废墟之中，人们

需要那样一种强大的、哲学的声音，帮助他们找到某种个人出路的理论归宿。

对此，德勒兹曾经有过一段非常精彩的描述：“战争胜利时，我们奇怪地蜷缩在哲学史的角落里。人们刚刚知道黑格尔、胡塞尔和海德格尔，我们就像一群年轻的犬狗涌向比中世纪要糟糕的经院哲学。万幸的是，我们有了萨特，他是我们的外在。这真是后院吹来的一阵清风……他是唯一给予我们力量以承受重新开始的新秩序的人。”

今天，法国哲学作为一个“主义”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每一个学科都变得如此复杂，一个统一的哲学声音已经变成一种幻象。“即使福柯的文章，也不是大部头，而是文章的合集。”安贝尔说，“但即使在今天，于最好的心智，最具有创造性的心智而言，哲学仍然是最初、最好的训练工具。”

“在 19 世纪末，高师刚刚成立的时候，只有科学与文学。然后文学爆炸了，扩散到各个学科，哲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哲学也一样，尤其在战后，哲学向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艺术史，甚至认知科学等方向扩散。”

“现在，智识生活的各个领域都有一点哲学，你读到的历史、文学、书评、艺术评论，多少都有点哲学在里面。”安贝尔说，“我觉得这就是哲学在高师的任务。”

## 哲学的种子

“法国大革命后的第一个法案，就是在巴黎创造一个地方，让贫穷而有才华的人，在国家的资助下，有机会成为共和国最好的教授，这一段历史停留在每个人的记忆里。”安贝尔教授说，“毕业之后，我们必须高中或者大学为教育部服务至少 10 年，我不知道现在的规则如何，但很长一段时间如此。如果你不能为教育部服务，就必须把钱还回去。”

她强调，其实这是一种使命感，毕竟，这个学校是在“人类理智的重生”的宏伟理念中建立起来的，担负着法国作为一个共和国的建国理想。

“共和国三年雾月九日法令” (1794 年 10 月 30) 至今仍刻在高师校门的顶端。法令第一条声明如下：“在巴黎建立一所师范学校，召集全国各地受过应用科学教育的公民，由师范学校为他们提供各领域最出色的学者传授教育法。”

这张建校法令上还写着：为了使知识浸透“共和国的每一个角落”，完善“传授人类知识的艺术”，使

得这纯净、充裕、光明的知识源头，从共和国的先人那里一步步地传遍整个法兰西，并在此过程中不失其纯正性。

“启蒙运动”，用康德的话来说，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

如何摆脱这种不成熟状态，成为自身的主人，理性的主体？教育是一个核心的问题。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思想家们认为，正当的公民教育不仅是启蒙的第一要务，也是整个现代社会的起点。如孔塞多在《论公共教育的第一回忆录》中所说，社会对于公民的首要责任是公共教育，因为它是让每个人都找到自己位置的唯一途径——“对于那些仍然被愚昧、狂热和迷信牢牢束缚着的男人和女人，给他们以公民自由权或政治自由权，有什么用呢？”

当时的公共教育委员会在呈交给国民公会的一份报告中指出：“教育的艺术就在于提供一个相应的整体体系，在这个体系里，所有的人类知识都根据其性质和发展的等级而得到体现。”

在人类知识体系的等级中，哲学无疑占据着特殊的位置。哲学就其本性来说，就是培养学生的自由思考和批判理性精神。笛卡儿的《哲学原理》第一章第一句话就是：“要想追求真理，我们必须在一生中尽可能地把所有的事物都来怀疑一次。”

或者如涂尔干所说：“必须继续训练我们的孩子学会清晰地思考，因为这是我们民族的根本属性。它是我们的国民特性，我们的语言和文体的种种特性都不过是它的结果。”

我觉得终于有点明白安贝尔教授所说，那些伟大的名字不过是一个幻象，因为高师真正的生命力在于国民教育与启蒙本身。法国哲学之强，在于它是从娃娃抓起的，从中学，甚至小学就开始了，这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很多大哲学家都做过中学哲学老师，包括萨特、波伏娃、梅洛-庞蒂、列维-斯特劳斯、阿兰·巴迪欧等等。

从1808年开始，哲学就是法国高中的必修科目。这种传统延续至今，法国中学生升入高中以后，根据个人的爱好和特长开始分文科、经济科或者理工科上课，无论选择哪一科，哲学都是必修课，只不过时长不同，文科生每周要上7个小时的哲学课，而经济科和理科的学生则分别要上4个小时和3个小时的哲学课。

每年6月份，法国举行全国中学毕业会考，拿到中学毕业文凭者就可以上大学。按19世纪以来形成

的惯例，中学毕业会考的第一门、考生们最重视的考试科目就是哲学，考试长达4个小时。而且，这些考试不是多项选择题，而是写作。这是1840年任公共教育部长的哲学家库赞规定下来的：以作文的形式来培养法国中学生的哲学自由、理性的思考能力和“有组织的表达、论证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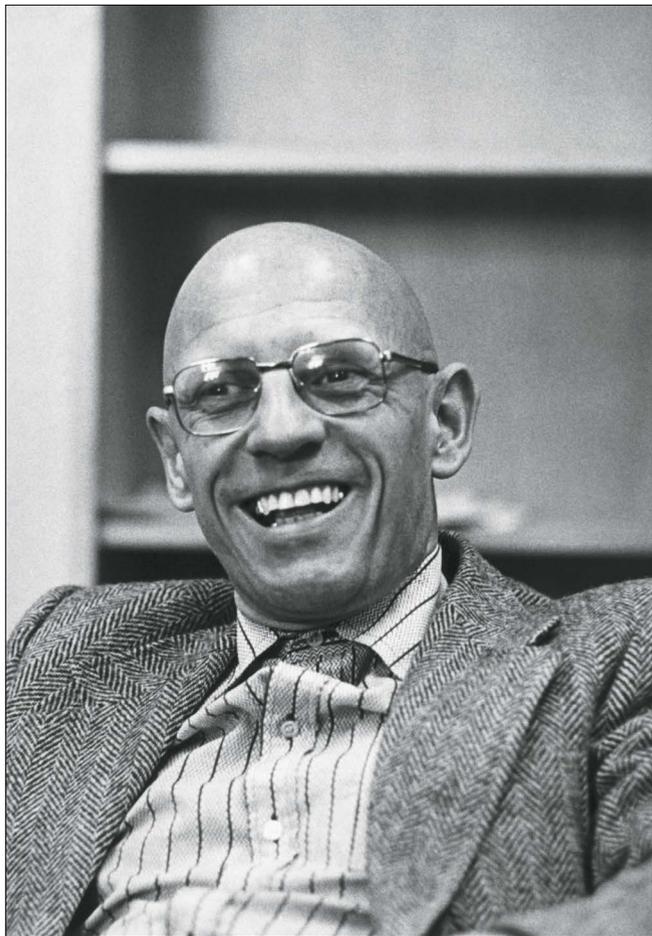
采访到了最后，我觉得高师哲学系培养出来的最牛的人，并不是那么光鲜亮丽的思想家，而是更多默默无闻的在为法国整个中学哲学教育做出贡献的人，因为法国哲学真正的生命力恐怕不在大学，而在中学，甚至在小学，在幼儿园。只要民众之间的理性精神不死，法国的哲学就不会真正陨落，或者消亡。如安贝尔教授所说，它只是在酝酿新的智慧，新的思想。✍

## 法国高中毕业会考哲学题目汇总

	文学科考生试题	经济科考生试题	科学科考生试题
2015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尊重任何生物不是一种道德义务</li> <li>• 我是不是我的过去所造就的</li> <li>• 评述阿列克西·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1840)的一个节选段落</li> </ul>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个体的意识是否只是其所属社会的反映</li> <li>• 艺术家是否给予需要理解的东西</li> <li>• 评述巴鲁赫·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1670)的一个节选段落</li> </ul>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艺术作品是否一定有意义</li> <li>• 政治是否可以逃避真相的约束</li> <li>• 评述西塞罗《占卜论》(公元前1世纪)的一个节选段落</li> </ul>
2014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艺术作品能否培养我们的感觉力</li> <li>• 为了幸福是否必须尝试一切</li> <li>• 解释卡尔·波普《客观知识》(1972)的一个节选段落</li> </ul>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是否只要有选择便能称为自由</li> <li>• 为什么要试图了解自己</li> <li>• 解释汉娜·阿伦特《现代人的处境》(1958)的一个节选段落</li> </ul>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我们生活是为了幸福吗？</li> <li>• 艺术家是他作品的主宰吗？</li> <li>• 解释勒内·笛卡儿《指导心灵的规则》(1628)的一个节选段落</li> </ul>
2013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言语只是一种工具吗？</li> <li>• 科学只局限于确认事实吗？</li> <li>• 解释笛卡儿《致伊丽莎白的信》(1643)的一个节选段落</li> </ul>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我们对国家应尽的义务是什么</li> <li>• 人们是否因认知缺陷而演绎解释</li> <li>• 解释圣安塞姆《论和谐》的一个节选段落</li> </ul>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人们是否能对政治不感兴趣但却按道义行事</li> <li>• 行动是否有助于认识自我</li> <li>• 解释柏格森《思想与运动》的一个节选段落</li> </ul>

## 哲学剧场及其漫游者

文 / 姜宇辉



福柯，巴黎高师校友，法国当代最著名的哲学家之一

今年是福柯诞辰 90 周年，伴随着各种或轰轰烈烈或温情脉脉的纪念活动，这位才情横溢而又桀骜不驯的思想大师再次有幸成为媒体的焦点。

当然有人会质疑“有幸”这个修饰词的恰当性。作为一位向来以极端多变的“面具”示人的叛逆哲人，他真的适合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吗？更明智的做

法难道不恰恰是要把笼罩在福柯本尊之上的重重浮华的表象清除干净，进而袒露出一个真实但又诡谲的思想家的“形象”？或许，平心静气地研读他的那些宏富深邃的篇章，才是最为恰切的纪念方式。

然而，福柯并非仅仅是一个以缜密系统之思辨著称的思想家，他更是一个敢作敢为、以实践和行动为鲜明导向的活生生的个体。虽然我们不必将尼采的“看哪，这人”式的惊呼转嫁于福柯身上，但通观整部西方思想史，确实罕有人能将尼采的生存美学贯彻得如此淋漓尽致。然而，尼采生前始终是一个游荡的影子，但福柯却早已凭借自己的思想和行动的“勇气”征服了整个欧洲乃至世界。而这也是为何，我们不应该仅仅停留在文本，而更需以最强烈的生存体验来接近福柯。我们理应跟随他去领悟和实行的，并非仅仅是知识与权力的考古学和谱系学的分析，而更应该回归福柯终其一生所要探寻的根本主题，那即是主体。阿甘本在集中研讨福柯考古学方法的名文《哲学考古学》中最终落脚于“主体考古学”，这当然是极富洞见的。但他所做的仍然是文本脉络的梳理，而我们似乎更应该从生命历程的角度来重新对福柯这个独特的“主体”的生成、转化、创造的历程进行另一番考古的探查。

回归福柯的思想—生命的源头，巴黎高师自然是一个光芒闪耀的路标。高师的迷宫式空间与福柯的诡谲曲折的生命绵延形成了一种不可思议的完美共振。但这并不是如《雅典学院》那般的宏伟图景：在宏大庄严的思想庙宇之下，器宇轩昂的哲人们正款步走来。或许，福柯与高师之间所绘制出的更接近契里柯的那幅诡秘的超现实主义绘画，在反透视的建筑空间之中，一个孤独的女孩正滚着铁圈穿过街道。曲折的迷宫与游荡的影子，或许还应该配上福柯所激赏的让·巴拉凯的无调性钢琴奏鸣曲。

也正是因此，我一直觉得福柯是与高师的精神（或不如说魂灵）最为契合的思想家。无论是他的思想还是生命都极为逼真地辉映着高师空间的晶体形态，多元，多变，甚至是多价。也正是因此，海杰斯·德贝在为《巴黎高师史》所做的序言中就明确质疑了是否真的存在着一种“穿越时间和空间的把所有高师人统一起来的精神联系”。如果真的有一种“精神”能够

界定“高师人”的身份，如果真的有一种传统能够维系这所名校几百年的风雨历程，那或许恰恰是那种始终桀骜不驯、蔑视陈规、质疑权威、抵抗强权的自由精神。一句话，高师人之所以为高师人，恰恰在于他/她始终是“那一个”，且“唯一”的一个。柏格森、萨特、阿尔都塞、福柯、德勒兹……几乎每位出自高师的哲学家皆以反叛传统、推陈出新为己任。虽然布尔迪厄曾将整个法国高等教育的体系形容为一部陈陈相因的“再生产”的利维坦式机器，但高师却显然是这部机器之中始终难以适配的一环。甚至可以打趣地说，与其说高师所培养的是服务于社会的高资质的知识分子，还不如说它始终是以再生产“反叛者”（加缪语）为己任。这所隐逸于余乐姆大街一隅的看似静谧的精神“隐修院”，却实际上肩负起抵抗整个陈腐僵化的知识体制的重任；这所每年招生不过区区200人左右的小得不能再小的学校，却始终能够蕴生出划破天宇的耀眼流星。11位诺贝尔奖得主，10位菲尔兹奖得主，4位沃尔夫奖得主，再加上不可胜数的文化界、政界及媒体名人，在这份每每为人如数家珍地列举出的傲人成绩单的背后，其实更引发我们对所谓高等教育的真正神髓进行深刻反思。在今天，当宏大叙事日益失势（“人文精神”“大学精神”）、高校实质上日益成为生产符合“标准”和“需求”的知识分子的流水线机器之时，巴黎高师的“非典型性”成功却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不同寻常的启示。固然，如今的高校在外延性拓展的过程中与“外部”的社会结合得越来越紧密，“象牙塔”式的传统形象早已物是人非，但要令这部庞大蔓延的机器良性运转，想必还是需要一个隐藏的自由创造的中心，它既是循环的枢纽，又是造血的心脏。它正如老子所谓的“空”的轴心：“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在结构完备、分工明晰、秩序井然的机器的内部，我们是否也应该留出这样一片无用之用的“空”的场域，在那里，汇聚着看似闲散而又往往离经叛道的思想者。或许，那里才是创造力的真正发生之源。

这一看似空无，但又于无形之中凝聚力量的氛围，相信每个人自亲手推开高师那扇古老大门之际就会清晰真切地感受到。遥想当年，怀着朝圣般的憧憬与崇敬之心第一天迈入高师的大门，本以为迎接自己的会是恢宏的大厅，庄严的塑像，铭刻的牌匾，抑或环绕悬挂于四周墙壁的先贤的照片。然而，这一切都未如期而至。扑面而来的倒是一股浓厚的、略带慵懒而青涩的青春气息，就像转过一个陌生的街角，款步

走进莫蒂亚诺笔下的“青春咖啡馆”。略显昏暗的灯光，并不宽敞的门廊，三三两两聚集在一起的年轻人，交谈着，脸上显露出专注的神情或迷人的微笑。其实这个被昵称为“水族馆”的温馨门廊还颇有几分来头，但这也总是因为它与那些充满自由气息的年轻文人密切相关在一起。不知为何，高师中很多场所都跟水和鱼有着密切关系。像中庭花园中的那处点睛之圆形水池就被唤作“恩斯特池塘”（Bassin aux Ernst），而其中悠闲游动着的红色小鱼很多也有着自己的昵称。甚至是当身为新生的我第一次坐大巴外出秋游之时，车上放的竟也是一则关于金鱼的童话。智者乐水，此种自由自在的智慧气息甚至弥漫渗透于高师的每一处看似不起眼的角落。

还记得当年在入学报到之时，用略显颤抖的手接过一个灰灰的、略显寒碜的小书包，里面有基本信息、学生证和一本尼科尔·马松（Nicole Masson）撰写的高师简史《高等师范：自由之路》（*L'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 : Les chemins de la liberté*），封面上是一张引人注目的古旧黑白照片，上面有四个知识分子模样的人或低头或昂首地走在高师的屋顶之上，而背后的衬景正是先贤祠的宏伟穹顶。开始还以为这只是图像拼贴的效果，但仔细读过内文之后却发现，这堪称是高师学生最闻名的一项异想天开的娱乐活动。漫步或闲坐于屋顶，仰望天宇或俯视巴黎，还有什么能比这更彰显高师人那天马行空的自由境界？翻开这本小册子，跟随作者的动人笔触深入高师漫长曲折的历程，更是对此种氛围有了极为真切的感触。抗争，质疑，批判，否定，几乎已经成了高师学生的生活常态。有时真的很难想象，到底怎样的权威才能真正领导、驯服这帮看似无法无天的天才们。当年住在 Jourdan 大街的宿舍时，也几乎隔三岔五就会被“不明来历”的学生在门下塞进各种传单，或干脆被敲开门接受苦口婆心的教导，其主旨无非都是：对现行的学校管理政策极为不满，希望进行附议、研讨乃至修正。

马松的高师史的标题页上所刊印的照片，就是几个学生或站立、或端坐在窗沿之上，甚至有一个学生展开双臂，状似意欲腾空的雄鹰。而他们身边所环绕着的，正是历代先贤的塑像。在求真意志面前，古与今、大师与晚辈之间的等级界限早已消弭殆尽。也正是因此，高师人每每喜欢援引让·盖恩（Jean Guéhenno）的那段深情寄语：“造就一所大学的，并非是各种规章制度，也绝非是在其中传道授业的大师，而更是那些看似在其中固定聚会的年轻人。”诚哉斯言。固然，

在那些历史悠久的教室和大厅里，在图书馆的一个个保留座位处，人们总是以充满敬意的目光注视着学富五车、挥斥方遒的学界泰斗；然而，一旦走进或宁静或喧嚣的中庭花园，任何等级和界限就涣然消失，唯有为了真理而聚集在一起的激动不安的人们。由此我们方可对萨特当年的豪言心有戚戚：“书籍比课程更有用——确实——而我们用来表达这一点的方式，正是根本不去上课。”（Promotion Letters, 1924）

而当福柯这样的大师最初步入高师大门之时，想必也同样感受到了如此强烈的自由智慧之水的氛围。离开沉闷的外省，一下子投入此种全然开放的思想环境，对于任何充满求真渴望的年轻学子来说都是难以拒绝的强烈刺激。或许，福柯早期思想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僭越”（transgression），亦正是自高师的此种氛围之中自然生发而出。在各种福柯传记之中——尤其是脍炙人口的《福柯的生死爱欲》，他早年在高师的堪称形骸放浪的不端行为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传奇故事。但其实福柯的“僭越”精神更体现在他对欧洲思想传统的深刻背叛。借用尼采的经典格言，在年轻的福柯心中，“重估一切价值”早已是引导知行的金科玉律。德里达那本著名的访谈集被命名为《一种疯狂守护着思想》，其实用于在高师求学时的福柯身上倒显得更为生动贴切。福柯的疯狂，并非仅仅是魏晋名士般的傲然风骨，而更是源自高师嫡传的自由想象——将思想推至极致，于边界之处敞开未知的可能。这也是为何他的博士论文会冠以《古典时代的疯狂史》这一看似离经叛道的题目。“古典时代”（l'âge classique），不正是驱除蒙昧和盲信、进而确证人自身的理性尊严的启蒙阶段？想来拿破仑当年创立巴黎高师之时，也正是基于这个启蒙运动的宏大纲领，试图以理性引领人类走向解放之途。然而，福柯之僭越的勇气亦恰恰体现于此，他回归于近代理性传统的发端之际，在理性与疯狂的混沌未分之处去追问何以二者日后会发生如此截然的分化。在这本近千页的巨制之中，福柯不仅初试其随后日渐成熟的考古学方法，

更是将他的语言华彩展现至惊天地泣鬼神的境地。即便对其中缕述的历史脉络和哲学背景一无所知的人，亦会对其中充满魔力乃至魔性的哲学话语赞叹不已。德勒兹在《差异与重复》的“前言”中曾指出，克尔凯郭尔和尼采真正实现了哲学风格的剧烈变革，将运动引入思索，进而将哲学化作剧场（theatre）。由是观之，至少20世纪的哲学著作中无人能达到《古典时代的疯狂史》中的那种哲学—剧场的登峰造极的高度。那是否亦可以说，这部宏大的哲学戏剧本就应该上演于高师这座年代悠远的思想迷宫与幽灵之城？当福柯挥舞着思想之剑游走于深夜的校园之际，他自身不就化作了戈雅笔下的扭曲的疯人形象？

也正是因此，让·季洛杜（Jean Giraudoux）对所谓“高师精神”的界定颇为切题。他明确强调，高师根本不是“人文主义的大本营”（un centre d'humanisme），正相反，如果一定要说高师人有着何种默认的共同精神契约的话，那正是这样一种“需求”：“大家汇集在一处，但正是为了过上一种独特而又充满激情的个体生活。”（Promotion Letters, 1903）这也能够解释，为何在高师如此浓重的自由散漫、各行其是的生活学习氛围之中，反而能够孕育出种种极具凝聚力的思想潮流。不同个体之间基于志同道合的追求而形成的心灵汇聚，或许远比那些人才计划、培养方案、研究课题所拼凑出的规模效应更为切实。正是这种心灵的自然汇聚，让高师生活的每一天都恍如置身于思想激辩的咖啡馆之中。每个个体随时都可能被卷入一场未知的讨论之中。或许，坐在旁边木质长桌上的人正在研讨的话题也正是令你苦思不得其解的难题；抑或，你一时疏忽走错了教室（高师的教室分布亦是出了名的混沌不堪），但却发现其中正在讲解的内容正契合于你随后要展开的研究计划；哪怕是在食堂就餐，也往往不知不觉就介入到一场关于新上映电影的艺术哲学的辩论中。还记得有一次，正碰上邻座的一位物理学教授拿着一个陀螺向身边的学生讲解自旋原理，结果整整一个小时过去了，周围所有的人都如醉如痴，连餐叉都没有动过。这样的经历，在高师可说是司空见惯。也正因此，萨特所领导的小众群体才会理直气壮地说：“我们根本不去上课！”真正的学习和研究，可以在、而且理应在生活的每一处时空展开。这才是高师人的精神生活。这种对体制的抗拒并非单纯是出自年少轻狂的叛逆，而实在是源自自由思想的切实需要。即便在福柯晚年的最后一次法兰西学院的授课系列之中（《说真话的勇气，治理

其实福柯的“僭越”精神更体现在他对欧洲思想传统的深刻背叛。借用尼采的经典格言，在年轻的福柯心中，“重估一切价值”早已是引导知行的金科玉律。

自我与治理他者II》,1984),他仍然基于研究的需要对学院体制进行了明确的批判。他抱怨说,根据法兰西学院的规章制度,他本来“无权举办封闭的研讨会”,但他所研究的“现代社会治理的实践、形式、理性,就只能通过团队形式来完成”。凭借福柯当时德高望重的地位,这个问题随后当然得到妥善解决。但自由研究与体制之间的对抗,几乎是高师历史中的一个永恒主题。甚至可以不无夸张地说,正是那些汇聚在体制边缘之处的小群体所展开的自由研讨,才真正代表着高师学术发展的真正动向。基于不同背景的自由碰撞,才使得真正的创造性得以激发。也正是因此,出自高师人手笔的著作很少会是那种中规中矩的学院派作品,而总是充满着种种“僭越”的才情。在马松的《高等师范:自由之路》中有两幅并置的摄影图片,左边是一位希腊文教授正在阐释一段深奥的古文,而右边则是一位数学教授正在方程的迷宫中为学生指点迷津,看似学科之间形成了明显反差,但彼此呼应的手势却如舞者一般形成了呼应的韵律。也难怪马松就此总结道:“学科之间的融汇(mélange)造就了高师的独特性与声望。”

然而,行文至此,必然会提出一个根本性问题。在何种意义上,这还是一所严格意义上的“师范”学校?换言之,除了为世界不断贡献一流的哲人、科学家与知识精英之外,它究竟在“教学”方面提出了怎样革新性的主张?当然,就事实上而言,巴黎高师从未彻底偏离它培养教书育人者的初衷。尽管学校始终以出产反叛者而闻名,尽管在历史上也时时有人诟病它并未在教育上提供任何令人信服的范本,但至少就职业规划而言,成为一名称职的教书匠仍然是高师人的首要选择。像萨特这样鼎鼎大名的哲学家在毕业后也仍然会“低就”于高中去教授哲学。而当时我身边的很多临近毕业的师兄师姐们也绝大多数从未考虑过除教师外的其他职业选择。不过,除了这个事实性的层次之外,就教育的本性而言,尤其在教与学这个本质的关系方面,高师确实为世人提供了革命性的思索。正是这一点才使得“normale”并非仅仅是一个名号,而是成为名副其实的桂冠。对这一点,晚年的福柯给出了极为精彩而深入的反思。1984年的法兰西学院演讲系列冠以“说真话的勇气”之名,实际上是试图以“直言”(parrêsia)这个概念为核心,重点总结古希腊哲学之中的主体自我塑造的话语实践。他在其中以苏格拉底、犬儒派哲人为范本重点阐释了“哲学的直言”的三个基本特征,颇值得思索。首先,哲



姜宇辉

学直言不同于单纯的知识传授。虽然二者皆旨在揭示真理,但后者仅仅关注“技术”,而前者则往往会令自身陷入到危险(乃至杀身之祸)之中,由此尤其需要一种“勇气”。其次,哲学直言亦不同于政治性直言,后者始终心系家国天下,但前者却是首先通过“照料自身”而实现的。由此也就导向哲学直言的第三个基本特征,即它并非仅仅涉及认识活动,而是从根本上涉及到生存的伦理和美学的实践。正是在这里,敞开了哲学生存意义上的“师”与“生”之间的全新关系:“你来到这里,就像到了一家诊所,你要得到治疗。”但这并非是要治疗任何一种生理或心理的疾病,而恰恰是要令每个个体首先学会照料自身。这才是哲学式教育的真正目的。从根本上来说,教师并非单纯是掌握知识的权威,亦非完美人格的化身,相反,在教与学的的生活共同体之中,教师与学生在互相介入的哲学生存之中真正实现着主体自身的塑造和转化。就此而言,我想没有任何一所高等学府能够如高师一般实现着此种共同的“修习”。

而高师确实就是这样一处隐修之所,哪怕你仅仅只在其中停留片刻,也会魂牵梦绕地渴欲再度回归。即便身体远游,但灵魂却始终渴望着再一次的试炼之旅。✍

(姜宇辉,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硕士,复旦大学哲学博士。专注研究当代法国哲学理论,尤其是哲学与艺术之间的开放关联。译作《千高原》,专著《德勒兹身体美学研究》《梅洛-庞蒂与中国山水画境》)

# 我的巴黎“游学”经历

文 / 董强



巴黎索邦大学



在游学过程中，可以挑选老师，也可以渐渐找到自己真正的兴趣，更可以博采众长。

2009年，我有幸被法国政府授予“法兰西教育骑士”荣誉勋章。授勋那天，根据传统，我用法语向时任驻华大使苏和先生致了一个长长的答谢词。就在答谢结束，人们鼓掌之际，突然有一丝疑惑向我袭来：对于法兰西教育，我了解多少？

由于有了陈寅恪先生的传奇例子，一个词为人熟知，那就是“游学”。相对于人们平常使用的“留学”一词，游学更适合我在巴黎的读书经历。这也造成了我对法国教育体系的认识是非常主观的。直到后来，我友情担任了几次中法教育部长会晤时的翻译，才对此有了理性认识。我现在就试着将这种理性灌注一些到我纯感性的记忆中，讲述一下我在法国的游学经历。

初到巴黎，我们几个小伙伴就完全晕头转向了。

我们当时是通过一个中法教育项目出国的。这个项目叫“中法合作博士预备班”，听起来觉得有点跟“中美合作所”似的，实际毫无那个机构的阴森可怕。这个博士预备班设立在武汉大学，因为当时在北京、上海都没有找到愿意合作的机构，而当时的武大校长刘道玉非常有胆识，主动请缨。1986年，这一项目落到了武大。1987年，我北大本科毕业，通过一个全国统考，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到了武大。这个项目是在国内学习一年，再到法国学习一年，然后可以获得当时法国称为“DEA”的文凭。DEA是Diplôme des études approfondies的缩写，意为“深入研究文凭”。在当时的学位结构中，它比硕士（Maîtrise）高一些（当时的法国硕士一年就可以拿到）。有了这一文凭，才可以继续“深入”，去读博士。所以，这个班被称为“博士预备班”，是非常准确的叫法。然而，根据当时的项目设计，我们在法国只能享受一年奖学金，拿到DEA，也就是只能拿到“博士预备”，而不再有奖学金允许我们拿博士学位。现在想来，这也是当时北京、上海一些大学不愿意接受这一项目的原因。

然而刘道玉先生的胆识是有道理的——先出国再说。果然，一年以后，等拿到DEA文凭，我们都通过其他途径和办法，自费留在法国，继续学习。但是，到了那个阶段，各种可能性就都出现了。我们发现，原来法国的教育体系与我们很不一样。

首先遇到的，就是大校（grande école）与大学（université）的区别。以及商校系统（école de commerce）与大学（université）的区别。还有巴黎各个大学本身之间的区别。

在中国，大学就是最高的高等教学机构（纯粹的研究机构，另当别论）。到了法国才知道，真正具有威望的，是一些大校。这些大校在理科方面主要包括高科学学校、桥路工程学校，文科主要有高等

师范学校、高等实践学校、高等社会科学研究学校等等。这些学校一旦像我这样直译下来，恐怕会被人误以为是一些二、三流的专科学校，甚至在有大学、大专、中专之分的中国，会被误认为只是大专或中专。或者用现在流行的话，像蓝翔学校。而实际上，它们的地位高于大学。

商校体系对于80年代末出国的学生来说，也颇为费解。费解之余，高昂的学杂费用也让人止步。当时法国政府奖学金一般是每月3500法郎左右（当时还没有欧元），按照现在的算法，也就是每月600欧元，而好的商校如HEC和ESSEC，需要相当于4000欧元左右一年的学费。所以，靠奖学金生活的人，是进不了商校的门的。参照一下，当时中国人的平均工资水平大概是800元人民币，也就是相当于100多欧元。我到现在都很佩服当时那些进了商校读书的中国朋友，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熬过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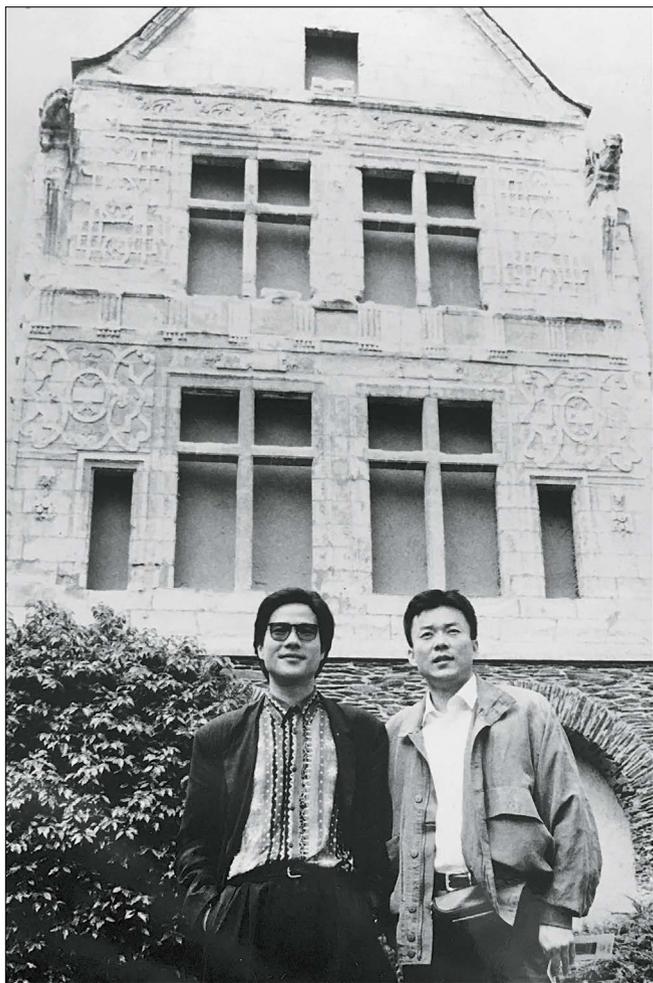
而大学与大学之间的差别，就更微妙了。巴黎的

主要大学不像北京或上海，它们是纯粹用数字来标识的，巴黎一大、二大……十三大。这种数字区分主要与区域有关，所以，对于外国人来说，完全不知如何区分好坏。一般了解的是，巴黎索邦大学是巴黎四大，所谓名门正派，与“大学校”有一拼，但作为新索邦的三大，就不知底细了；巴黎七大也叫JUSSIEU，那是其所在地的名称，是一个人文科学新思想的重镇，有茱莉亚·克里斯特瓦这样出名的老师。巴黎八大就是当时跑中国来与武汉大学共同办学的大学，它的前身是文森大学，位于巴黎东边的文森森林，福柯、拉康等激进的左翼知识分子都在那里授过课，学校后来搬到了北边的圣德尼。我们初到巴黎，就被安排在了圣德尼。这个地方有一座著名的大教堂，是法国最早的哥特式大教堂之一。但整体位于巴黎北边郊区，非常不方便。我们住在离开学校大约三站公共汽车的地方，就更偏僻了，到了晚上，人迹稀少，邻居也大多为阿拉伯人或黑人。一两个月下来，便开始怀疑：怎么著名的巴黎就是这个样子？怎么好像有的地方还不如国内的城市？

直到有一天，一位法国文学系的巴黎同学在家里办了一个派对，请我们去一趟。我们研究了一下，发现需要坐火车到巴黎北站，然后再倒两条地铁线，才能到达。由于乘车不熟悉，到达的时候，早已是华灯初上了。一出地铁，眼前仿佛火树银花，咖啡馆人声鼎沸，才知道，原来真正的巴黎在这里。

这一经历对我们的刺激很大。因为我们突然意识到，留学，留学，我们很可能完全对学习之外的世界，一无所知。等再回到圣德尼，看着周围灰色的HLM（Habitation aux loyers modérés的缩写，即“廉价公租房”之意），我们就发现，已经再也无法安静地待下去了。不是为了生活条件，而是为了能够尽可能了解法国社会。几经周折，我与几个同行的小伙伴都搬到了“城里”。机缘所赐，我住到了圣日耳曼区一间“保姆间”内。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个影响了我接下来的人生选择的地方。

所谓的保姆间，与上海的亭子间有异曲同工之妙。保姆们一般住在一栋楼最上面的阁楼里，房间狭小，一般只有一个洗手池，一张桌子和一张床，上厕所需要到楼道里。唯一浪漫的，是往往有一个很好的窗户或天窗，由于楼层高，只要位置好，就可以看到巴黎的屋顶。那是像音乐乐符一般在蓝天下伸展的，非常美丽。外国学生刚到时，一般只能住进这样的保姆间。然而，搬家至少让我们体验到了法国高等教育体系的一点好处，就是可以有极大的流动性，尤其是到了博士阶段。因为拿到了DEA这个博士的敲门砖之后，或者你索性转学其他学科，或者你就可以在注册博士之后，选学其他学校的课



本文作者董强（左）与著名男高音歌唱家范竞马在法国昂热市古建筑前合影

程。只要授课老师同意，最后参加考试，可以算学分，用于你注册的原始学校。甚至同时在两个学校注册都可以，只要你最后选择其中一个学校答辩，导师也同意，另一所学校就相当于自动放弃。

更为自由的是，一个学校的教授、博导，可以与其他学校的导师联合，在另一所学校开设博士生课程。比方说，当时巴黎八大有一位讲授诗歌的教授，与巴黎三大一位同专业的教授合作，在巴黎高师开设了一门题为“法国现代诗歌研究”的课程，这门课程非常受人欢迎。也解决了我的一大难题，因为我一直在八大注册，同时又已经搬家到市中心，上了他的课，就可以不再老远跑到八大去，而只需要在高师注册上他们的课程就可以了。

正是在这一前提下，我开始了在巴黎的游学。我几乎听了所有当时能叫得出名字的人文学科知名教授的课程，每天不断地换地铁，在不同的学校之间穿梭。也正是在同一处境下，我成了米兰·昆德拉的学生。他当时在高等社会科学学校开设了“小说与音乐”的课程，并招收少量博士生，但必须首先向他递交个人资料。结果，我被他录取了，当时总共只有五个学生。那是他创作《小说的艺术》的时期，许多内容我们在课堂上一起研读过。后来，他指定我成为他《小说的艺术》的中文译者。

每每想到这一段经历，我就会想到我们古老的“孟母三迁”的故事。确实，环境对于人的影响太重要了。圣日耳曼区、拉丁区，这些地方滋养了我，也为我进入这些法国核心的人文精英学校制造了机会。

到了博士毕业，找工作的时候，我就发现，作为外国人，有一定的优势，更有一定的劣势。法国的博士当时分两类，一类叫“国家博士”(doctorat d'Etat)，一类叫“新制博士”(doctorat nouveau régime)。国家博士是以前遗留下来的，当时已经基本不再续招，只让已经注册的人完成他们的答辩。国家博士一般需要七八年才能完成，甚至十来年。一般来说，一个国家博士出来以后，就是一个专业的大专家了，马上可以有副教授职位。而新制博士与我国的博士一样，可能是仿效英美体制的，一般学制为4~5年。在导师的特许之下，最长可以延期(dérogation)三次，最长也就是8年。新制博士出来之后，很难马上找到好工作，要根据法国政府在《官方日报》(*Journal Officiel*)上的正式公告，去投简历，而且从讲师或助理教授开始做起。

此时，如果外国人需要与法国人竞争，还会面临另外一个平行体系，就是是否具有“大、中学教师资格”，法国人叫agrégation。拥有这一资格的人，叫作agrégé。一个拥有大、中学教师资格的人在法国社会中是很受尊重的。一般来讲，人们所说的知识分子，必须有这一资格证书才称得上。一个人如果同时具有新制博士和大、

中学教师资格，他在大学任教的机遇就大为增加。而法国像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出来的每个学生，都经过此类考试，拥有这一资格证书。所以他们本身的素质和能力就非常强。我国读者知道的最有名的故事就是萨特。他第一次考哲学教师资格的时候，名落孙山，第二年再考的时候，就考了第一名。他自此嘲笑这一体制，认为只要掌握一些诀窍就可以成功。相反，在外国学生当中，往往仅仅得到新制博士文凭，他们往往会出现专科能力强、全面素质较弱的现象。这个情况很多人意识不到。

但是，外国人也有优势，那就是从事与自己国家相关的教学和研究。比如说，像东方语言学院这样以教授东方语言和文明为主的学校，作为亚洲人就有优势了。我毕业那年，正好遇上了一个全新的局面：在汉语教学领域，也设立了大、中学教师资格考试，所以需要开设一些相应的课程，提高学生的中文水平。我们开始“吃香”。我应邀开设了一门文学翻译课，讲授如何将中国古典文学和当代文学译成法语。我给学生讲《文心雕龙》，当时来了30多个学生听，第二堂课就只剩下了三个人。我丝毫不介意，还以自己的经验告诉他们，对于文学这样的学科，最后能留下来的，也就是几个人，而这几个人中必定可以出人才。好在这样一门课程没有人数的最低限制。这三个人就一直跟我学到了最后，直到我教他们如何翻译苏童的作品。最后，其中的一名法国学生成为第一个获得汉语教师资格的法国人。强调是第一个法国人，是因为在他之前，有一位中国人成功考取。仿佛是命运的轮回，这位中国人也是从武汉大学的博士预备班出去的，他现在担任东方语言学院中文系的主任。这就是我说的外国人的优势。

回想我的经历，有一点也许是所有国家高等教育的共同之处，那就是名师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尤其对于来自外省或者国外的人，往往最能吸引他们的，就是那些著名的学者和教授，有一种类似“明星效应”的现象。然而，有的是真名家，有的则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还有的，就是不适合你。所以，能够“游学”，是非常难得的经验。因为在游学过程中，可以挑选老师，也可以渐渐找到自己真正的兴趣，更可以博采众长。

现在回想起来，这是在法国高等教育体制中我收益最大之处。✎

(作者简介：董强，北京大学法语系主任，傅雷翻译出版奖组委会主席。2009年获法国政府“教育骑士”荣誉勋章，2013年获法兰西学院大奖“法语国家联盟金奖”。2014年入选“中法建交50年50人”。2015年获法国“荣誉军团”骑士勋章。2016年5月获颁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荣誉博士”称号。2016年10月，当选法兰西道德与政治科学院通讯院士)



巴黎高师数学系主任维泰博(中)、数学教授帕特里克·伯尔纳德(右一)和几位数学系学生

## 浪漫国度的数学传统

文 / 苗千



(于楚众摄)

“在一个民族内，为了产生一位天才，总是需要有几百万人。一个真正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一个人类的群星闪耀时刻出现以前，必然会有漫长的岁月无谓地流逝而去。”——《人类的群星闪耀时》。奥地利作家茨威格这样描述那些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群星。

在几千年的人类思想史进程中，一群人因为出众的智力、严谨的辨析、深邃的思想和独特的文化背景而留下了一连串鲜明的印记，这就是法国的数学天才们。

艺术和浪漫似乎已经成为法国，或者说巴黎这座城市的标签。但是巴黎的另一个特质却少被人提起，这里也是世界上数学家最为密集的城市。现在的巴黎有 100 多条街道、广场以数学家命名，对于数学青年们来说，这同样是一个令人梦寐以求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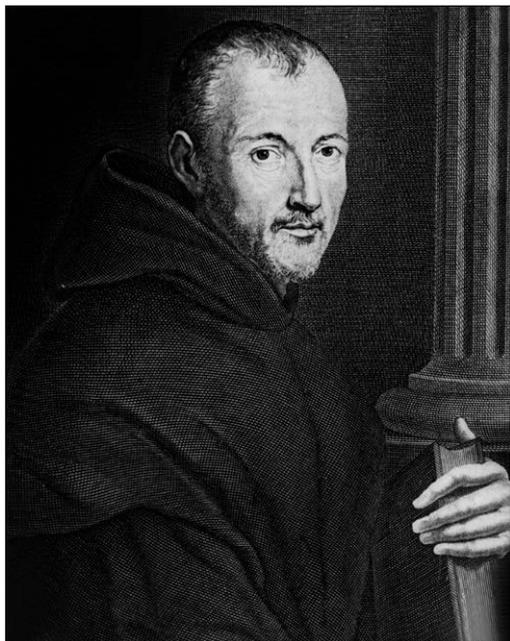
说起当代法国的数学研究，就必然要提到巴黎高师，这所学校以盛产一流的数学家闻名世界。在法国总共 11 名菲尔兹奖得主中，有 10 人是出自高师。可以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所成立于 1794 年，处于巴黎市中心的高等师范学校继承了法国的数学传统。我在巴黎高师的数学系访问了现任数学系主任克劳德·维泰博（Claude Viterbo）教授和几位博士生，又在出租车上与巴黎高师最优秀的毕业生之一、2010 年菲尔兹奖得主、现任庞加莱数学研究所所长塞德里克·维拉尼（Cédric Villani）教授进行对话，希望能从他们的话语中找出法国数学传承几百年的秘密。

数学或许是与天才联系最紧密的学科，有太多关于数学天才的故事流传，那么天才是否是进行数学研究最重要的条件？对于这个问题，维泰博教授的回答老成持重，他认为做数学研究确实需要一点点天分，但是更重要的是努力工作，并且需要一点点品味——实际上对于数学的品味同样也需要通过努力工作得来。没有人生来就是一个数学家，只有通过努力工作才能成为一个数学家。维拉尼教授的观点也类似，他自己虽然在幼时就展现出了数学天分，但也是通过后来艰苦的训练才取得了杰出的数学研究成就。

这两位数学家的回答并不算是敷衍。尽管在数学研究中天才涌现得非常早，但实际上法国 15 岁左右的中学生在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中的排名并不高，在全世界仅仅排名第 25 位，法国学生 495 分的得分也仅仅略高于平均分 494 分。法国数学家能够不断涌现，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学生在预科学校（Prépa）和在大学里高强度的数学训练。

那么，数学的本质是什么？我问出了一个大而不当的问题。“抽象。”维拉尼教授这样回答。善于处理抽象概念，似乎正是法国人的才能之一。在几百年前，利用抽象的“思考”来定义“存在”概念的笛卡儿被称为现代哲学之父。他的名言“我思故我在”，定义了存在的起点。

英国哲学家怀特海称 17 世纪为“天才的世纪”。其中“天才”之所指，在英国是艾萨克·牛顿，在意大利人们会想



1. 法国数学家马兰·梅森 (1588~1648)

2. 法国数学家布莱兹·帕斯卡 (1623~1662)

3. 法国数学家雅克·阿达马 (1865~1963)

到伽利略，但是在法国，这个词却只能泛指。经过了漫长的中世纪之后，正是17世纪一群法国数学天才开创了法国辉煌的数学研究传统，其中的第一人，正是被认为开创了现代哲学的笛卡儿。

勒内·笛卡儿 (René Descartes) 于1596年3月出生在法国安德尔-卢瓦尔省，从小就接受了广泛的教育。他从8岁开始在一所宗教学校上学，到了22岁时获得了一个法学学位。笛卡儿是家里三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自幼身体不好，因此被校长特许可以不用早起，一直在宿舍里躺到中午。他在学校里学习修辞学和逻辑学，还有“数学艺术”，其中包括音乐和天文学，自然哲学和伦理学；在大学修习法学学位时笛卡儿还学习了神学和医学。

笛卡儿认为最重要的知识隐藏在自然界中，因此他热衷于旅行，还曾经短时间地参军。作为哲学家的笛卡儿希望利用数学、逻辑学和哲学来理解现实世界，并且解释一些神学问题。这使他意识到身体和意识之间的区别，进而发展出了哲学的二元论，同时也成为怀疑主义的先驱。

作为数学家的笛卡儿，最大的贡献就在于开创了解析几何。笛卡儿发明的后来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笛卡儿坐标系把代数和几何结合在了一起，从此人们可以用代数方程来表述几何图形，人类从此生活在一个方方正正的，由坐标限定的空间里。正是因为笛卡儿坐

标系太重要，以至于现在的人们很难想象，在没有笛卡儿坐标的时代，人们如何进行数学研究。

“数学家也没有什么不同，我们同样听音乐和看电影。”维泰博教授不希望人们对数学家有过于刻板的印象。“那你一天平均有几个小时研究数学问题？”我问他。“这可说不准，不过最糟糕的情况肯定是一天24个小时都在想着数学，就连做梦都想着数学问题。”他回答。

数学家需要严谨的纪律性来维持工作和生活的平衡，而获得菲尔兹奖完全改变了维拉尼教授的生活。“获得菲尔兹奖之前数学界就已经知道我了，所以对我的学术影响不大，但是菲尔兹奖完全改变了我和其他人的关系，媒体和政治家都来找我，甚至还找我拍了一部纪录片。现在数学家比以前更受尊重，和社会的联系也更紧密了。”衣着浮夸的维拉尼教授对我说，语气中听不出是厌倦还是得意。正是这些与数学无关的社会活动让维拉尼在法国充满争议，很多人都认为数学家不应该过多地介入到世俗生活中。而实际上，积极介入市民生活，乃至政治议题，正是法国数学家持续了几百年的传统。

在笛卡儿之后，17世纪法国数学界的另一位天才布莱兹·帕斯卡 (Blaise Pascal)，同样热衷于市民的日常生活问题。为了解决巴黎的公共交通问题，帕斯卡设计了世界上第一辆公共马车，并且筹划组建了

世界上第一个公共马车服务公司——可以说，这种热衷于公共事务的法国数学家传统，从笛卡儿时代一直延续到当代的维拉尼。

帕斯卡于1623年生于法国克莱—费蒙朗，在1631年全家搬到了巴黎。实际上数学只是帕斯卡一生所关注的众多问题之一，他同时也是神学家、哲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音乐家、教育家和气象学家。帕斯卡在家里四个孩子中排行第三，他的父亲就是一位有天赋的数学家。因为身体的原因，他少年时代一直在家里接受教育，而他的父亲则有意不让他过早地接受数学教育，怕他过早地对数学痴迷而忽略了其他经典学科的学习。

帕斯卡最开始被重点教育学习语言学，尤其是拉丁文和希腊文。尽管数学被划为禁区，反而使帕斯卡对数学的好奇心更为强烈。他从12岁开始就自学几何学，在没有人教导的情况下，他自创几何术语，并且很快证明了三角形的三个内角和等于两个直角。帕斯卡的父亲被儿子对于数学的痴迷所打动，允许帕斯卡开始阅读欧几里德的著作。更重要的是，帕斯卡的父亲开始带着年幼的帕斯卡一同参加巴黎的“梅森学院”（Mersenne's Academy）的聚会，共同讨论数学问题。

法国数学家马兰·梅森（Marin Mersenne）在17世纪创立的“梅森学院”对于法国数学界的发展至关重要。梅森自己虽然不是一流的数学家，但他从1926年开始，就在巴黎自己的修道室里聚集起当时巴黎一流的科学家们共同讨论科学问题，也包括当时已经移居到荷兰的笛卡儿的学说，被人俗称为“梅森学院”，这也成为巴黎皇家科学院（Académie Royale des Sciences de Paris）的前身。帕斯卡在当时梅森学院的学术气氛中迅速成长，在16岁的年纪就已经证明了众多定理，还完成了一篇被称作《神秘六边形》（*Mystic Hexagram*）的短篇论文。他的一系列文章在寄出后，因为过于成熟，甚至被笛卡儿认为不可能出自一个少年之手。

为了减轻收税官父亲的工作，帕斯卡在17世纪40年代发明了一种被称为“帕斯卡线”（Pascaline）的机械化计算器。在40年代末，帕斯卡开始专注进行物理学实验，跟随托里切利的脚步，进行如何用重量代表大气压的实验。到了50年代，他通过与“业余数学之王”、住在外省的皮埃尔·德·费马（Pierre de Fermat）的通信，奠定了现代概率论的基础。在种种科学成就之外，帕斯卡发表的一系列阐明其宗教思想的作品集成《致外省人书》（*Les Provinciales*）

被后世认为是法语写作的经典。

这位在39岁就去世的天才，他的数学成就和各种探索对于几何学、物理学和计算机学等学科的发展都至关重要，甚至影响了牛顿和莱布尼兹的理论。为了纪念他对于大气压强的研究，帕斯卡成为气压的单位。到了上世纪60年代，为了纪念他发明的机械计算机，尼克劳斯·维尔特（Nicklaus Wirth）发明的计算机语言也以帕斯卡命名。

正是从17世纪法国数学研究的源头开始，法国数学家就形成了强调身体与智力的平衡、善于提出猜想、人文功底深厚、积极参与社会事务的传统。在1666年成立的巴黎皇家科学院成为法国科学研究的中心，但是到了法国大革命时期，巴黎皇家科学院被看成皇权的象征，被革命党人解散，法国数学面临着分崩离析的危险。另一方面，也正是在法国大革命等事件的驱动之下，让法国社会明白了具有良好数学素养的军事人才极为重要，因此一系列现代化的学校和研究所，乃至法国独特的预科制度，都在这个时期被建立起来。

在法国失去了巴黎皇家科学院的紧要关头，“法国人的皇帝”——拿破仑成了维系法国数学传统的关键性人物。在1799年通过“雾月政变”上台之后，成为法国独裁者的拿破仑不仅是一位军事天才，同时也是一位醉心于几何学的业余数学家，甚至有几个几何学定理以“拿破仑”命名，即使是在远征埃及的战舰上，拿破仑也曾与拉普拉斯、傅里叶和加斯帕尔·蒙日（Gaspard Monge）等当时第一流的法国数学家讨论几何问题。

为了填补巴黎皇家科学院被解散所留下的空白，拿破仑成立了法兰西科学院（Académie des Sciences），并在1808年宣布，要建立一所“寄宿制的师范学校”，确立了巴黎高师的教学传统。不仅是巴黎高师，拿破仑在作为法国独裁者的时期，还奠定了巴黎另外一所名校，同样建立于1794年的巴黎综合理工学院（École Polytechnique）的基础。这所隶属于法国国防部的学校专门为法国培养高素质的军事人才。被称为“微分几何之父”的法国著名数学家蒙日曾出任这所学校的校长。在拿破仑时代，巴黎综合理工学院的数学研究水平犹在巴黎高师之上。

“你最喜欢的数学家是哪一位？”我问维泰博教授。“这个问题没办法回答，在数学史上重要的数学家太多了，没有办法选出最喜欢或是最重要的一位。”他说。

“如果你可以与任何一位数学家对话，你会选择哪一位？”我又问了维拉尼教授一个类似的问题。“或

许是高斯吧。”维拉尼教授想了想说，“不过我听说高斯是一个不善于交谈的人，或许是伽罗瓦。”

埃瓦里斯特·伽罗瓦 (Évariste Galois) 出生于 1811 年，他算得上是巴黎高师的第一位数学天才。在伽罗瓦只有 21 年短暂的生命中，他以惊人的天赋为数学留下了丰富的遗产，然而他又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愚蠢挥霍自己的才华，早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如果说笛卡儿和帕斯卡都是以一种冷静和克制的态度一生钻研科学，从而能够终生保持着创造力，那么伽罗瓦则是以一种截然相反的、始终充满着澎湃激情的形象，代表了另一类的法国数学天才。

伽罗瓦的父亲虽然没有数学天分，但他痛恨皇权，热烈追求人权和自由，这显然会给年幼的伽罗瓦留下深刻印象。1823 年，12 岁的伽罗瓦第一次上学，在当时被战争分割成自由派和保皇派的法国社会里，学校里的大多数教师都是保皇派。在学校里，伽罗瓦每天早上 5 点半就要从没有供暖的宿舍里起床，穿上衣服开始祈祷，然后进入教室，坐在台阶上，把书本放在膝盖上开始上课。每两个小学生只能分享一根蜡烛。

早上学习两个小时之后才有水和干面包作为早餐。早餐时间只有 15 分钟，小学生们必须快速、安静地吃完，8 点钟继续上课。中午在餐厅吃饭，同时还要听老师进行思想教育，下午的课程从 14 点到 18 点，然后进入教堂祷告，晚上 20 点 30 分上床睡觉。在这样严酷的学校环境中，经常有学生进行反抗，也常有学生被开除，但伽罗瓦后来的行为远比反抗学校更激烈。

伽罗瓦在 14 岁时开始对数学感兴趣，他接触的第一本著作就是勒让德的《几何基础》(Éléments de Géométrie)，他像读小说一样只花几天时间就读完了这部著作，之后他从 15 岁开始研读拉格朗日的论文。伽罗瓦习惯于在头脑中完成大多数的数学研究，却疏于写出推导的每一步具体过程。1828 年 6 月，在没有认真准备的情况下，17 岁的伽罗瓦去参加竞争激烈的巴黎综合理工学院的考试。这所学校不仅是当时法国最好的学校，并且还充满了革命的热情，这两点都吸引着伽罗瓦，结果他失败了。

伽罗瓦在第二年继续参加巴黎综合理工学院的入学考试。一个学生一生只准参加两次这样的入学考试，这也就成了伽罗瓦进入巴黎综合理工学院最后的机会。考试中的一项是两个教授对考生进行面试，伽罗瓦仍然习惯在头脑中完成计算，而懒于写在面前的黑板上。在和教授关于计算的一部分进行争论时，失去耐心的伽罗瓦直接把黑板擦扔到了教授的脸上，他



巴黎高师很早就建成了一批设备精良的实验室 (摄于 1962 年)

也因此失去了进入综合理工的最后一次机会。

伽罗瓦只能并不情愿地进入巴黎高师，但是时间不长他就因为参加政治活动，在 1830 年被巴黎高师开除。失去了生活来源的伽罗瓦在巴黎高师对面贴出广告，愿意做高师学生的私人教师，教授高等代数，但是感兴趣而来的学生很快发现伽罗瓦教授的内容远超出他们的水平，于是很快也就没人来了。



没有工作，没有学校，没有生活来源，伽罗瓦把他生活的一切热情都投入到革命运动中，并且开始写关于高等代数的笔记。1832年5月29日，伽罗瓦被挑战决斗——这在当时的法国非常常见，人们习惯于为生活中的任何一件小事展开生死决斗，这种风气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才结束。

关于伽罗瓦为何被卷入一场决斗，是为了爱情

或是别的什么事情，直到现在仍然有争论。但确定的是，一位罕见的数学天才因为自己的激情和鲁莽，在他的数学天赋还没有得到充分施展的年纪就早早地陨灭了。这无论对于伽罗瓦本人还是对于数学来说，都是一个悲剧。

伽罗瓦在决斗的前夜仍然充满激情地写了一封名为《致所有共和党人》的信，表达他对于法国的热爱。

而在另一封给朋友的信里，预感到自己将要死去，又前所未有的意识到自己数学天赋的伽罗瓦，花了几个小时为他此前向法国科学院提交的几篇论文补充细节（此前这几篇论文因为缺乏细节而被拒），在空白处，他写道：“我没时间了，我没时间了……”

作为一个数学家，伽罗瓦有幸运的一面。他在十几岁的年纪就找到了自己最擅长的领域，他首先开创了“群”这个数学概念，大大拓展了抽象代数的领域，他在群论中的一整套想法被称为“伽罗瓦理论”，至今仍然影响着现代数学的发展。而另一方面，伽罗瓦缺少对于一个数学家来说至关重要的纪律性，他缺乏耐心，无法掌握自己的生活，最终挥霍掉自身的天才。

“会不会有一天，数学家会发现某一种大统一理论，从而找到数学的尽头？”我问维泰博教授。实际上这更像是一个物理学家的问题，大约有100年的时间，物理学家们都希望能够统一量子力学与广义相对论，从而得到一个“大统一理论”，得以解释一切自然现象，我不知道数学家们是否也有一个类似的梦想。

“那么你觉得，在物理学中有可能发现这种大统一理论吗？”维泰博教授反问我，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觉得不大可能发现什么大统一理论，”维泰博教授接着说，“就算是物理学，在19世纪末人们以为已经达到了物理学的尽头，剩下的只有一些细枝末节的计算工作，在物理学的天空上只有两朵乌云了，结果呢？出现了量子力学和相对论，这些理论又有了各自的发展。数学也不大可能发展出一种统一的理论。目前数学的各个分支有一些开始联合在一起，但是各自也都有了更多的发展。不同的数学方向有不同的研究方法，分析和代数的研究方式是不一样的。数学的发展既集中又发散，然后又相互连接。”维泰博教授这样描述他对数学发展的认识。

数学是一个过于广博的世界，它的任何一个细枝末节都可能会耗费掉一位最有天赋的数学家的一生，而数学的整体，又有着某种令人着迷的结构，呈现出一种特殊的美感。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著名数学家弗里曼·戴森（Freeman Dyson），在2008年曾经发表过一个关于数学的著名演讲，他把数学家分为鸟和青蛙两类。

戴森这样描述这两类数学家：“有些数学家是鸟，其他的则是青蛙。鸟翱翔在高高的天空，俯瞰延伸至遥远地平线的广袤的数学远景。他们喜欢那些统一我们思想、并将不同领域的诸多问题整合起来的概念。青蛙生活在天空下的泥地里，只看到周围生长的花儿。他们乐于探索特定问题的细节，一次只解决一个问题。”

戴森自认为是一只青蛙，专注于一个特定的细节，但是数学研究同样也需要追求整体结构的鸟。

戴森认为，20世纪数学发展最重要的大事之一，就是在法国的天空中出现了一群数学之鸟——布尔巴基学派（Nicolas Bourbaki）成立，一群法国数学家致力于出版一系列能将全部数学框架统一起来的数学教科书。这个学派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类20世纪数学发展的进程，而这源于法国数学发展的又一次危机。

尼古拉·布尔巴基，在20世纪30年代被一群法国数学家用作一个激进的数学学派的名称，他们决定以一种法国数学的严谨来为纯数学的所有领域给出清晰的定义和证明。布尔巴基学派不仅有着顽童恶作剧般的神秘性，更影响了全世界几代数学家。站在21世纪，当人们回顾布尔巴基学派对于数学研究的总体影响，可以说他们为20世纪的数学研究指引了方向；但是也有人认为布尔巴基学派为数学研究带来了负面影响，把数学限制在了严密的高墙之内，把它与灵感隔绝。

布尔巴基学派的诞生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关系非常密切。在上世纪10年代，法国数学界尚且有一批杰出的数学家继承了勒让德、拉普拉斯、拉格朗日、傅里叶、庞加莱等法国数学家的传统，但是在1914到1918年之间发生的无比惨烈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使法国失去了一代数学精英。一些年轻的法国数学家开始认为法国在数学研究的领先地位已经被德国人夺走。到了“一战”与“二战”之间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仅存的上一代法国数学家如埃利·嘉当（Élie Cartan）与雅克·阿达马（Jacques Hadamard）虽然仍然受到尊重，却已经步入创造力的末期，法国数学家中的青年一代失去了指引和方向。

权威的缺失也为青年们提供了机会，更多的青年数学家感到不再受束缚。有几位杰出的青年数学家形成一股力量，在1935年成立了布尔巴基学派，开始共同以布尔巴基这个笔名撰写数学教科书。布尔巴基学派的最初成员全都来自巴黎高师，个个都是重要的数学家。学派的建立者之一安德烈·韦伊（André Weil）在数学的各个领域都有重要贡献，并且在代数几何与数论之间建立了深刻的联系，还留下数个“韦伊猜想”。另外几位最初的成员如昂利·嘉当（Henri Cartan）、克劳德·谢瓦莱（Claude Chevalley）、让·迪厄多内（Jean Dieudonné）、洛朗·施瓦茨（Laurent Schwartz）也都是对数学界影响深远的数学家。而布尔巴基学派后来的成员也都有相应的水准，其中包括巴黎高师毕业生、1954年菲尔兹奖与2003年阿贝尔奖的得主让一皮

埃尔·塞尔 (Jean-Pierre Serre)。这些优秀的青年科学家能够聚集在一起并非易事，他们之间很容易发生长时间的充满激情的辩论和争吵，而很多数学教科书就是在这些争吵中诞生的，布尔巴基学派也在这样的气氛中在世界数学领域活跃了几十年。

布尔巴基学派存在的目的是什么，最终又实现了多少？爱丁堡大学荣誉数学教授迈克尔·阿蒂亚爵士 (Michael Atiyah) 评价说，布尔巴基学派有两个主要目标：一是为数学寻找新的、更广泛的基础；二是为数学的结构寻找基础。布尔巴基学派强调“结构”的重要性，这改变了人们对于数学的认识。这个方向实际上与哥廷根数学家大卫·希尔伯特 (David Hilbert) 对于数学的探索，以及后来抽象代数的发展方向相同。但是对于结构的探索并不局限于代数，它在拓扑学和与之相关的几何学科里也有很大的成就，这些领域在“二战”之后都有很大的发展。有人甚至认为布尔巴基学派对于“结构”的追求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社会学研究的方式，其中包括心理学、人类学和语言学。

建立普遍的数学基础是另外一回事。阿蒂亚爵士认为，为数学建立广泛的基础，并不仅仅是一种妄想，同时也是一种教育上的灾难，整个学派都有可能被其自身所压垮。百科全书并不是教科书，布尔巴基学派试图从根本上改变学校教育，整个法国乃至全世界的数学教育都受到其错误的影响，布尔巴基学派也可以说是其自身成功的受害者。

布尔巴基学派过于追求明确的定义和清晰的证明，在某种程度上反而限制了数学的发展。阿蒂亚爵士认为，清晰与严格在数学中的地位当然非常重要，但是它们不能被用作阻挡新的数学理念、新想法产生的高墙。在布尔巴基学派兴盛的年代，一些优秀的应用数学家和有着原创想法的数学家无法融入布尔巴基学派，可能也与这个学派过分强调纯数学的清晰性有关。在布尔巴基学派衰落之后，反而有一些新的数学分支发展起来，其中有很多尚未有清晰的定义和证明。

在 21 世纪，数学的发展早已经与 100 年前不同，如今仅在巴黎就生活着超过 1000 名数学家，而在 20 世纪初，全世界也只有几百名数学家而已。虽然时代已经改变，法国的数学传统依然延续，数学已经成为法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这样的传统，如何在一个国家延续几百年而不衰退？

相比自然科学，数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一门强调师承和传统的学科。《自然》(Nature) 杂志在 2016 年 8 月报道，通过一个名为“数学家谱系计划”

(Mathematics Genealogy Project) 的统计，世界上大多数的科学家都出自 84 个“数学家族”，而其中超过三分之二的数学家都出自 24 个“数学家族”。由此看来，一个国家一旦积聚起数学研究的优势，就很容易把这种优势保存下去。

在 2010 年获得菲尔兹奖的两位巴黎高师毕业生中，维拉尼的导师皮埃尔·路易·利翁 (Pierre-Louis Lions) 本人也是菲尔兹奖得主，而越南裔数学家吴宝珠 (Ngô Bôo Châu) 的导师热拉尔·洛蒙 (Gérard Laumon) 是法国科学院院士。在巴黎高师还有另外一对名师高徒——被誉为“20 世纪最伟大的数学家”的 1966 年菲尔兹奖得主亚历山大·格罗滕迪克 (Alexander Grothendieck)，他在巴黎高师求学时的博士导师，正是 1950 年的菲尔兹奖得主、布尔巴基学派的成员洛朗·施瓦茨。

法国人追求浪漫和纯粹美感的性格是否与数学有某种联系？数学清晰的逻辑与深刻的内涵可能确实与艺术有相通之处——布尔巴基学派对于结构和纯粹美感的追求与人们对于纯粹的法国精神、法国艺术气质的理解在本质上是相同的。但真正令法国数学界人才辈出的原因，在于严格的训练和专门培养。很多法国数学家都提到了自己在预科学校的两年里受到的有针对性的数学训练对自己后来开展数学研究有巨大帮助——无论是报考巴黎高师还是综合理工学院，这些胸怀大志的学生们大学前两年都要在预科学校度过。法国的预科系统最初是为了大规模地训练工程师而设计，到后来则逐渐成为训练顶级数学家的场所，这种传统甚至可以追溯到法国大革命时期对军事精英的培养。

“你会不会担心在未来的某一天，人工智能发展得比人类更聪明，它甚至可以取代数学家。比如说，你只要把问题输入电脑，然后只要待在咖啡机旁喝一杯咖啡，等待人工智能给出答案和推导出数学公式？”出租车一直向巴黎的郊外驶去，维拉尼教授开始显得有些疲倦，我问他一个略带挑衅性的问题。“实际上现在人类的很多工作都已经被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取代了。”维拉尼教授回答，“我不知道人工智能会不会发展到比人类更聪明，但是我相信，数学家一定是最后一种被人工智能取代的工作——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我很高兴可以等在咖啡机旁让人工智能代替我研究数学。”

出租车停下，维拉尼教授到家了。“我回来吃个饭，晚上还要再回巴黎城里去。”他和我们告别。看着这位 2010 年菲尔兹奖得主，被法国人如明星般喜爱的数学家走进家门，我们自己则迷失在巴黎郊外的蒙蒙细雨中。☑

(于晓众 摄)



巴黎高师毕业生、2010年获得菲尔兹奖的数学家、现任庞加莱研究所所长塞德里克·维拉尼

# 塞德里克·维拉尼：一位数学家的肖像

文 / 邈邈

2010年，高师毕业的数学家塞德里克·维拉尼因对非线性朗道阻尼的证明和对玻尔兹曼方程收敛至平衡态的研究，获得菲尔兹奖。在世界所有高等教育机构里，高师人一直是诺贝尔奖、菲尔兹奖和图灵奖的座上宾。巴黎高等师范学校诞生之初，就是一所献给牛顿、贝托莱和拉格朗日的理科学学校，主要教授数学、物理和天文学。数学的意义不仅是一门学科，它更是高师传统和历史系统的一部分。在高师的历史上，尽管哲学与文学的光芒时常盖过数学，但其实数字的讲坛早就先于词语的讲坛而存在。

## “最优秀的人学数学”

离约定采访时间还有几个小时，塞德里克·维拉尼发来邮件：“我必须赶回奥赛（巴黎南郊）的家一趟。时间紧迫，采访可否在出租车上进行？”结束在《世界报》的访谈后，我到巴黎高师接上你们，一路上会经过好些对我的数学研究生涯来说很重要的地方，我们可以在这些地方停下来。”“还有什么选择吗？”我心里嘀咕着，答应下来。

几个小时候后，维拉尼在出租车的车窗里向我们呈现出极其忙碌的形象：电脑摆在膝盖上，两手一边在上面敲击，一边抽空腾出一只手来扶住夹在下巴与右肩的手机滔滔不绝（大概是在商量一场数学报告的事），另一只手则握住POS机付账单。出租车停在街道两旁都泊着车的余乐姆45号街正中，后面的出租车像法国人爱排队一样耐心地等待通过。看上去，维拉尼巴不得脚趾都能派上用场。我毫不怀疑他在忙乱中真的能思考问题。他获得菲尔兹奖的数学定理很多次都是在从博物馆回家的路上或巴黎的大区快铁（RER）上灵光闪现而取得突破的。作为分析数学家和数学熵的专家，他主要思考气体和等离子体的问题——一个体现粒子群混乱程度的数学物理概念，与概率、气体理论、等离子体物理、星系动力学、几何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只是获奖成为公众人物后，

他思考的内容可能有所不同了。

下了车，他靠在离巴黎高师大门（其实是一扇小门，通向一个有看守的几平方米的小房间）大约10米远的墙角，继续打他的电话。我们和他的两只随身黑色拉杆箱被撂在余乐姆街的街沿上。他依旧是那套出镜频繁的标志性装束：敞开的黑色风衣里露出怀表的银色链子，系着红色领带（有时是墨绿色）；天气比较冷，外面搭配了两条宝蓝和嫩黄色有流苏的针织长围巾。当然还有别在胸前的蜘蛛胸针——他收集了世界各地很多的蜘蛛饰品，有的是红玉髓制成的非洲蜘蛛，有的是长着绿色长腿的蜘蛛，据说象征着希望。他妖艳的着装风格在巴黎高师的学生时代就形成了，专一的数学家从20岁就是这样引人注目的穿戴至今。巴黎高师的大门不断有师生进进出出，和维拉尼彼此保持着淡定。我怀疑一个时间紧迫的人守在路边打20分钟电话而不是坐上出租车再说，是否是有效率的。直到他放下电话，对我们说：“在巴黎高师，我度过了8年最重要的学习和研究生涯。我在这儿获得了博士学位，然后做了一段时间助理教授。”然后他拉起行李，带我们在余乐姆街上一路小跑起来——作为法国的数学明星，他似乎正在享受把严肃记者变成狗仔队的乐趣。

穿过余乐姆街，就是玛丽一居里街。以发现钋和镭的法国化学家居里夫人命名的居里研究所就坐落在这里，与高师的生物系近在咫尺。两所机构在这条街上做了200多年街坊，但这里的人流传着一种说法，他们的人擦肩而过，却没有主动说过话，直到近几年高校在中央行政力量的推动下开始融合。与这条街上许多大名鼎鼎的机构——国立高等美术与装饰学院、巴黎市立高等工业物理化学学院、法兰西学院等一样，巴黎高师的门牌也打上了PSL（巴黎科学艺术人文大学）的统一身份标签。维拉尼拐进居里研究所旁边的一道门，站在一栋红砖楼的拱门前。这就是他现在担任所长的庞加莱研究所。这座成立于1928年的数学与理论物理学的殿堂，将法国数学界从当年孤立的困境中解救出来。爱因斯坦曾在这里讲授广义相对论，沃尔泰拉曾在这里向法国学术界介绍生物数学分析，法国的第一家统计学研究所和第一个计算机开发计划

也诞生于此。

维拉尼曾好几次在这些大街小巷里飞奔。2010年克雷数学研究所庆祝佩雷尔曼最终解决庞加莱猜想的那一次，他从圣路易岛飞奔至巴黎第五区的这一核心地带，满身大汗，跑得气喘吁吁，以赶上报告结束时的总结发言。那一天，他正参加完自己的忘年之交、法国数学家保罗·马利亚万的葬礼。这位20世纪下半叶专注于概率论的巴黎数学大师，在维拉尼的数学生涯起步时给了他很多扶持。他微喘着气告诉我，就在见到我们之前，他给几百人做了一场数学报告，给孩子们讲了一堂科普课，在《世界报》做了访谈。而那两只行李箱也成了他“脚不沾地”生活的陪伴。我问他，是否享受这种“名流”的生活。他调皮地吐了吐舌头，天真又羞涩地说：“我觉得还挺有趣的。”“有趣”里面又是一个数学家的野心：“数学家仅仅数学好其实不够，数学研究需要很多其他的技能。你必须非常专一，不断斗争，雄心满满，而且还必须擅长与人沟通——不断旅行，不断遇到不同的人，不断与他们打交道。在这些缝隙里，你不断在学习新东西和尝试新东西之间找到平衡。”

坐上出租车，维拉尼终于有了点放松下来的舒适。他告诉我，获得菲尔兹奖后，人们总是想在他那里听到一个他决定做数学家的“神启”故事，但他总是令人失望。“我并没有神启的经历。”“我从来没有去‘选择’学习数学。在法国，数学非常受重视。通常情况下，如果你的数学很棒，你最后就会从事数学研究。”从小学起，维拉尼的数学就非常好。小时候曾有一些老师夸他是“天才”，但他不太喜欢这个词。“在数学史上有很多真正的天才：高斯、拉马努金、黎曼等等。人们常说年少的人为‘天才’，但谁又知道，这个少年未来究竟能不能真的成就一番事业呢？更何况，美国人爱夸所有人都是天才！”他更愿意将自己的数学成就归因于个人努力与法国教育体系里最严格的数学训练的结合：“17到19岁之间，我在巴黎附近靠近蓬提耶的预科班接受了非常严格的数学训练，学习异常努力。我从预科班考上了巴黎高师。”

法国的预科班教育是法国高等教育一个很特殊的层次，可以理解为全民普及的高等教育机构“大学”和精英学校“大学校”的一个分野，也是法国人平衡大众高等教育与精英教育关系的独特制度。通常，预科班是进入“大学校”的通道。很早听闻法国预科才是世界上最难、最严格的应试和通识教育体系，一位中国留学生向我形容其高强度“胜于国内读两至三年

高三”。法国学生必须在预科学校里接受微积分、线性代数的严格训练，以应付难度相当于“大二”程度的考试。只有约10%的最好的中学毕业生有机会进入预科学习，最后只有百分之零点几的预科毕业生可以进入巴黎高师、巴黎综合理工这样的顶级“大学校”。预科班授课内容的知识面涵盖深广，比如，未来准备进入金融领域的理学商科学学生学习的微积分内容和物理学要学的数学分析差不多。据说，伦敦金融城的量化交易分析师有一半是法国预科体系培养出来的。法国人的数学功底与美国学生比，通常更坚实广博。在牛津大学采访时就曾听两位在美国留过学，再到牛津读博士的经济学和天文物理学者说，美国学生能理解公式和计算，但法国学生理解公式和计算后面的历史——通常是数学教材脚注里才有的那些内容。这种严苛的预科训练和选拔制度，是法国最有历史公信力的精英生产者：综合理工和高师人毫不讳言，简历上的毕业院校就像烙在额头上的“身份印章”，法国企业和政府的核心位置绝大多数都留给这些学校最优秀的毕业生。

在高师上学时，维拉尼爱为宿舍的左邻右舍烘烤自己颇为得意的玛德琳蛋糕，喜欢参加在余乐姆街45号那幢历史性大楼里举办的舞会。维拉尼说：“高师的第三年我当选学生会主席。那一年，我的学习不怎么样，社交和组织工作占用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在数学方面我基本什么事情都没有做。”高师的老师仍鼓励他：“你以前的数学成绩很好，这一年我们知道你没有努力。”老师还告诉他：“如果努力学习，还是可以拿博士学位，当助理教授的。从那时起，我开始重新非常努力地学习。”高师岁月里，他很喜欢晚上在学校昏暗的走廊里散步，看一缕缕光线从一扇门下透出来，仿佛潜艇舷窗中透来的泛着冷光的波浪。后来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时，他也曾在深夜四处漆黑一团的楼里，看到最杰出的数学分析家让·布尔甘办公室门缝里透出来的光。那些享有崇高学术声望的人，都如饥似渴地勤奋工作着。

维拉尼的博士生导师是皮埃尔-路易·利翁，一位偏微分方程的专家。1994年，利翁获得了菲尔兹奖。“他非常强大，思维非常快，异常勤奋。”维拉尼回忆导师说，“我当时想，‘啊，我永远也不可能成为他那样的世界级数学家’。”但随着时间流逝，他也不知不觉变成了一个菲尔兹奖得主——获得菲尔兹奖在高师如此司空见惯，以至于成为每个人心里的隐秘抱负。“高师让我置身于法国数学的传统中，一个历史性的



（行摄众摄）

巴黎高师教学楼内的回廊

系统里：几乎所有获奖的法国数学家都曾在高师读过书。”“法国人不像东欧国家及俄罗斯、越南、中国人那样，在高中阶段就擅长奥林匹克数学竞赛。这种竞赛是一种特殊的练习，实际上与数学研究的现实差别很大。当法国人进入预科班和高师后，一群最优秀的、干劲十足的人聚集在一起，就能创造出一种氛围，创造出伟大的东西。”维拉尼进一步解释，法国数学的传统是——“非常抽象。法国人总是不断追问一些抽象的问题，希望发现优雅的美感，钟爱普遍性的概念，热衷能够影响每个人和全世界的话题。这种抽象的传统渗入到法国的各个学科领域里。虽然很难界定法国数学的‘风格’，但19世纪的时候，法国和德国相互之间影响很深，正是在数学方面的一系列重大发现，定义了这两个民族的身份和自我认知。”

24岁那年，正是在巴黎高师，维拉尼与意大利数学家朱塞佩·托斯卡尼合作作出了他数学生涯的第一个重要结果：波尔兹曼方程的熵增、福克-普朗克方程，以及等离子体熵增之间的联系。一年半之后，他同德国数学家菲力克斯·奥托共同发现了隐藏在索伯列夫不等式与塔拉格兰集中不等式背后的联系，开启

了最优输运领域的冒险旅程。也是在高师，他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他说，自己的博士论文得益于四位精神导师：导师皮埃尔-路易·利翁，学习指导扬·布勒尼耶，以及埃里克·卡伦和米歇尔·勒杜——他曾大量阅读后两位学者的论著，借此打开了通向不等式世界的大门。在他进行博士论文答辩时，高师数学系的老师伊夫·迈耶曾这样对他说：“你的博士论文里有一些神奇的关系和恒等式。若是在20年前，人们或许对这项工作不以为意，因为那时没人相信奇迹！”只有在高师，你才会身处具有发现奇迹的慧眼的人群中，受到他们的鼓励。

在数学家高斯的一部传记中，有一个小故事。一个异乡人在巴黎问当地人：“为什么贵国历史上出了那么多伟大的数学家？”巴黎人回答：“我们最优秀的人学习数学。”他又去问法国数学家：“为什么贵国的数学一直享誉世界呢？”数学家回答：“数学是我们传统文化中最优秀的部分。”10月的《自然》杂志上，刊登了一篇题为《诺贝尔获奖者生涯开始的地方：小型精英机构的毕业生获得诺奖的概率最大》的文章。在世界所有高等教育机构里，巴黎高师以人均千分之



位于巴黎高师附近的卢森堡公园

一点三五的诺奖获奖率位于第一位，远高于居于第二、第三、第五和第七的加州理工、哈佛、剑桥和麻省理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大学崛起，法国地位相对衰落，但在获得诺贝尔奖、菲尔兹奖和图灵奖的顶级数学家和科学家的榜单上，高师仍然地位稳固。它至今依旧吸引着最优秀的人。

### 巴黎的数学家

见到维拉尼的前一天晚上，在巴黎十三区一家叫 pho 13 的越南河粉店，我们和一群在巴黎学数学的年轻人聊到深夜。服务员嗓门神奇得像喋喋不休的鹦鹉，铺满八成熟牛肉的河粉一碗碗端上桌，冒着腾腾热气。



(于毅众 摄)

正在巴黎高师读数学博士的这对年轻夫妇——王华和刘琳媛，有着数学家常有的单纯神情。王华手舞足蹈地谈起这座城市的数学家们，好几次差点把刘琳媛手里的筷子撞落。刘琳媛安静地吃着河粉，兴头上附和两句。

法国人深以数量众多的数学家为其文化上的自

豪：拉普拉斯、拉格朗日、费尔马、傅里叶、笛卡尔、泊松、帕斯卡、伽罗华、庞加莱、若尔当、勒贝格……这些群星璀璨的名字如雷贯耳。过去，莫斯科与巴黎曾是欧洲两个数学家云集的大都会，哥廷根虽然也曾是数学与物理的中心，但它是一个人口数十万的小城。如今，莫斯科作为数学大都会的地位已经衰落，以普林斯顿、加州伯克利为代表的美国成为数学的中心，但巴黎的数学都会地位依然稳固。

那天晚餐时，我在被提及的一长串数学家名字里记住了布尔巴基学派，这个与巴黎和高师都紧密相连的名字。布尔巴基是活跃于巴黎南部有名的数学家秘密团体，成员基本全是高师人。它诞生于法国数学开始衰退，而新兴数学分支蓬勃发展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布尔巴基的事业》一书里，法国数学家 J. 迪厄多内提到了“一战”后巴黎高师的数学教育状况：“打开战争时期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名册时，就会发现巨大的断层，有三分之二的学生都被战争摧毁了。这种情况对法国数学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

战后进入高师的数学学生发现，本该为他们提供指导的年轻数学家大多已被战争摧毁，他们的影响也随之被磨灭。留下来的数学大学者，虽然受人景仰，但都已接近五十，甚至年事更高。这些数学家熟悉的是他们在 20 或 30 岁时学的数学，而对新的数学只有模糊的观念。迪厄多内回忆，当他从高师毕业时，才刚刚知道什么是“群”，而他在高师所学的代数知识不超过预科数学、行列式、方程的可解性和单行曲线。为了复兴法国的数学传统，一批高师的年轻数学家聚在一起。他们举办讨论班，议题都是当时数学的最新成就；他们也以布尔巴基的名义发表论文和出版书籍。王华眉飞色舞地谈起布尔巴基的逸闻：“曾担任过高师数学系主任的昂利·嘉当 (Henri Cartan)，就是布尔巴基学派的代表人物。他曾给布尔巴基学派专门在高师设立了一个职位。近些年，他们又开始活跃，常常以吵架的形式来讨论问题。有一种说法，那些在数学会议上非常不礼貌地站起来和人激烈争论的人，很可能就是布尔巴基成员。”布尔巴基的研讨班现在仍然在巴黎举办，维拉尼就曾参加过。不过他拒绝告诉我，他是否是布尔巴基的成员，“因为这是一个秘密组织，成员不能暴露自己”。

唯有像巴黎这样的大城市，才能产生这样的聚集效应；在这里，数学常常不是一个人单枪匹马地独立开创一个学派，而是由一群人共同开创。这种传统，大概可以上溯到 17 世纪的法国神父梅森。帕斯卡父

子参加过梅森神父组织的数学沙龙，生活在偏远山区、守口如瓶的费尔马，还有隐居的笛卡儿都与他保持着通信。这位神父热衷探讨数学，喜欢旅行和传播消息，定期安排数学家的各种聚会。这个沙龙，就是法兰西科学院的雏形。今天，高师人喜欢这样形容巴黎：“在巴黎没有秘密。”维拉尼也相信，“孤身一人，像骑士或英雄那样做出数学大发现的年代，可能已经过去了”。“不过，有时仍会有英雄孤身杀出一条路来，比如俄罗斯数学家佩雷尔曼。他诞生于俄罗斯的数学生态中，凭借一己之力证明了庞加莱猜想。安德鲁·怀尔斯也是绝对孤军奋战解决费尔马定理的人。”不过这样的“冒险”，也被视为一种高风险策略，为了保密，冒的是在宣布证明之前不与任何数学同行讨论或检验任何想法的风险，其代价是，最终有可能犯一些根本性的错误。

让我好奇的是，为什么巴黎这样一个流光溢彩的都会，能够容纳这么多数学家？在我的刻板印象里，数学家是与“城市动物”格格不入的一群人。他们沉浸于微妙而精细的数学世界，尘世不是他们的乐园。更何况，巴黎的诱惑，大城市的生活方式，何以让人能专注于数学？刘琳媛告诉我，数学系学生都知道一个不成文的规律，即毕业后的收入与数学研究水平并非正相关的关系，甚至是负相关。进入金融行业的人往往只是在数学研究上合格的人，而并非最出类拔萃的人；数学上研究越深入，水平越高，工资却反而越少。在巴黎做数学家，似乎并非易事。

维拉尼毕业以后，在高师当了几年助理研究员。他的生活是相对清贫的，他告诉我：“上百张CD光盘，几乎侵吞了我在巴黎高师时的全部工资。”当向他询问我所听闻的“数学研究水平与收入负相关”规律时，他叹道：“噢！我憎恨做一位金融分析师，无聊的工作！”他很享受在巴黎的数学家生涯。“做博士研究时，巴黎有太多的研讨会和演讲可以听，它至今仍然是世界上课程最丰富的地方。像布尔巴基这样的秘密组织仍然存在着，他们仍在组织研讨会。”高师的数学课质量非常高，但还有很多数学之外的东西让维拉尼兴奋不已。“它的物理、化学、文学和哲学都非常棒，我遇到很多充满好奇和激情的人。对我来说，高师那段时光从文化上让我敞开了自己。我经常去看表演，看电影，听音乐会，有一段时间，我甚至每天都去电影院。你知道，巴黎是电影院的都会，到处都是电影院。哪怕今天我们可以看网络电影了，巴黎仍然遍布着电影院。巴黎给了我丰富的文化体验。我那时

最喜欢的电影明星是奥黛丽·赫本，也特别喜欢俄罗斯导演安德烈·塔可夫斯基，日本电影在巴黎也非常流行，我的大学时代伴随着黑泽明的电影。”在巴黎，他已经开始精心选择自己的服装了，除了穿西服，很长时间内，他还戴着帽子。“法国南部的里昂高师对我也是非常重要的地方，但那里的数学家不像巴黎这样多。在里昂，我好像就是一个人，可以建造我自己的东西，也有更多自由来组织我自己的研讨会，这在巴黎是困难的。”

2009年，维拉尼曾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度过了4个月。普林斯顿与巴黎是截然不同的。“在普林斯顿幽静的环境里，你可以完全不受干扰地专注于学术思考，那儿就像一个孤绝的修道院。但巴黎不同，它每天都不断有很多事情发生。”维拉尼描述里的普林斯顿，更接近我心中的学术仙境，除了需适应无处不在的爱因斯坦从铜像、相片和油画里注视活着的人，其他一切都很完美：包围着它的森林，高效的古老图书馆，与数学系隔着池塘相望的人文科学图书馆；晚上空无一人时，你感到自己“像洞穴探险家，面对装满来自另一个时代宝物的洞府”。“能听到呦呦的鹿鸣，看到萤火虫忽隐忽现的荧光，凝视月亮洒在深色湖面上闪现的点点银色，20世纪最伟大的灵魂，交织成一道看不见的薄雾，笼罩在湖水的上方。”但在巴黎，在一条市区核心地带以先贤祠为中心发散出来的余乐姆小街上，你何以寻找这样的幽思与徜徉之地呢？

但巴黎有它的秘密。维拉尼购买的那些CD，标注了他数学生涯许多重要时刻的回忆：18岁，在巴黎综合理工学院的大厅里，他在高师入学考试口试的休息间隙，听到约翰·列侬的《海象》；21岁，在高师的单人宿舍里，他放起勃拉姆斯的《第一钢琴协奏曲》，一位年轻姑娘使劲拍打他的房间；1994年，他每天早晨听着莫扎特的《安魂曲》醒来，准备教师资格选拔考试——大多数高师人在毕业之际都将面对的考试；1999年秋天，他在亚特兰大撰写第一本关于最优运输的书时，普罗科菲耶夫的《第二交响曲第四乐章》让他热泪盈眶；2003年冬天，他在英国雷丁探索亚强制性的秘密时，萦绕他的是玛丽·拉福莱的《为何这些云》；2006年冬天，他在里昂撰写国际数学家大会学报的日子里，响彻耳畔的是朱丽叶的《维纳斯先生》。在普林斯顿遗世独立的院墙里，像冯·诺依曼在狂野盛宴上将收集的鸡尾酒随心所欲分发给给大家的人，和像爱因斯坦那样偶尔拉拉小提琴、多才多艺的人，逐渐成了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往事。“现在，理性的阿

波罗主义已经搞垮了研究院里浪漫的狄俄尼索斯主义。”也许，反而是在巴黎，酒神的幽灵依然游荡在街头巷尾。

一位巴黎商科学的学生告诉我，巴黎与北京、纽约都有着本质的不同：“你无法想象在北京或纽约做一位数学家，但在巴黎，这是自然而然的。你完全可以用维持生活的钱做自己喜欢的事。”左派政治思想虽然因财务赤字和难民问题备受挑战，但他们对法国社会的影响是深远的：“从生孩子到读大学都不要钱，普通人没有任何物质上的担忧。巴黎依旧保持着它的重税，富人依旧很难富起来，普通人则过得很舒服，对难民也有超乎寻常的同情。”更何况在高师，正式学生签的是学生公务员合同，不仅不缴纳学费，还接受法国政府津贴。刘琳媛告诉我，高师给她每个月的钱足够她不操心生活：“免费的博物馆，免费的公共文化场所，游泳俱乐部季票 19 欧元，还有夸张的医疗福利，足以让人专心于数学研究。”在巴黎，反市场化的思维仍然富有生命力：在这里，艺术家很可能不愿出卖自己估价最高的艺术品，银行家很可能放弃职务去大学当一位学校乐团指挥。

从 26、27 岁开始，维拉尼就受到加州伯克利与斯坦福大学的职位邀请，30 岁时，美国的邀请更是纷至沓来。他说，他虽然喜欢美国，但“从未考虑过久居美国”。当普林斯顿邀请他延长在高等研究院的访问时，他毫不犹豫地回到法国，就任庞加莱研究所的所长。他开玩笑说，他“无法想象久居一个面包质量不佳的国度”。对甜品和奶酪的爱恋，就像乡愁的寄托，几乎成为维拉尼回到法国的巨大牵引力：酥脆的长棍面包、酥软的船形饼干、果味孔泰奶酪、柔美的羊奶酪、芳香的埃舒尔尼亚克奶酪、绵软的布里亚—萨瓦兰干酪、辣椒橄榄油……这些都是在美国找不到的。

更深处的，是内心的归属感。他告诉我：“我是一个生活于法国文化氛围中的人。法国的语言、文学和历史，都构成了我的一部分。我热爱雨果的小说——虽然他的思维不同于数学家；我也热爱巴尔扎克——我的同事拉佛阁，也是菲尔兹奖获得者，非常痴迷巴尔扎克，读过两遍他所有的作品。”他也喜欢大仲马的冒险小说，还喜欢给他的孩子们即兴乱编永远没有结尾的“考拉克冒险故事”：一只被父母抛弃的小渡鸦和年轻的主人亚瑟为寻找一个密码，深入马戏团和阿拉伯集市，展开一场横穿法国和埃及的惊险旅程。对维拉尼来说，数学就是“一场冒险”。“冒险”这个词，也常常出现在法国哲学家的长篇大论里，这种行



巴黎街边精致的面包店

径蕴含着激发出人类高尚情感和强烈精神体验的英雄主义。

在今天高师的数学系里，与化学和物理相关的有些数学专业已经采用英语作为论文语言。但维拉尼告诉我，即便如此，学生们还是在用法语思维，“至少我就是如此”。法国人的思维，根植于它复杂又精微的语言中。维拉尼曾猜想，匈牙利之所以能够产生埃尔德什、冯·诺依曼、费耶尔、黎兹、魏格纳、齐拉特、拉克斯、波利亚等很多伟大的数学家，是因为“匈牙利语要求倾听者时刻集中注意力，在最后一个单词蹦出来之前，永远猜不到对方正在说的意思会不会被彻底颠覆”。在异国人看来，法语也是一门奇特的语言，特别是对数字的表达上。法语的数字不是纯粹的十进制，而是十进制、二十进制和六十进制的混合。100 以内的数字，1 至 16 是十六进制，17 至 69 是十进制，70 至 79 是十进制、十六进制与六十进制的混合，80 至 99 是十进制、十六进制与二十进制的混合。这种奇特的表达形成于历史，是法国传统的一部分。

有个笑话，说法国男人搭讪时，不会要女人电话号码，而是直接切入正题，因为要号码实在太麻烦。比如，176988472 这个号码会被念作：100 加 60 加 16，4 个 20 加 18，再 4 个 20 加 4，再 60 加 12。在这种与众不同的语言环境里启蒙，思考世界的方式大概也更复杂吧。维拉尼告诉我：“法国人相信，任何

一个问题都有普适的解决方式，信奉抽象和纯粹的美。法国是一个非常理想主义的国家。”很多巴黎的数学家，被美国大学邀请去任教一段时间，薪水优渥，但几年后还是会回到巴黎。像普林斯顿和麻省理工这样的美国顶级大学，虽然有世界最好的师资，但却难培养出伟大的美国数学家，很多人都是别国的“外援”。与美国人用工程师的方式培养数学家不同，对法国人来说，数学是一种美学追求。

### 从高师开始的旅程

走进那扇记载着高师在法国大革命后建校历史的石门，穿过有一个问询处的回廊，推开厚重的门，再穿过恩内斯特池塘所在的中庭，进入另一侧的回廊，然后进入另一个中庭，向右经过一个现代化的图书馆，数学系就藏在余乐姆街45号的深处。在这里，今天的高师学子们依然相信，数学家所执着的理论研究也许不会立即被应用，但会在一个漫长的历史时间里产生价值；认识与理解世界是数学家的第一要义，而不是改变世界。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数学家的兴趣更集中于经典的、具体的问题，对大的理论体系建设并不热衷。数学研究更加趋于专业化、技术化，与技术的结合也更加紧密，计算机、移动通信、医学、气候变化……数学的应用无处不在。但在高师，数学系的博士生们告诉我，推动每个人研究的动力，主要还是“兴趣与品位”，尽管他们对工业、企业界的实际需求要比前辈敏锐得多，也更擅长用数字技术来沟通和分享自己的想法。数学的发现过程正变得越来越开放。我问数学系主任克劳德·维泰博，高师毕业的数学人有什么独特之处。他回答：“品位。他们对数学有一种优雅的品位，这种品位是在微妙之处不断打磨而成的。它取决于你遇到什么样的人，与什么样的人交流。”

维拉尼就是这样一个高师人。从余乐姆街45号开始，他进入了一个最优秀的数学家云集的世界。完成博士答辩三年后，他同合作者朗洛·德维莱特一起发现了弹性理论中的科恩不等式与玻尔兹曼理论中熵增的联系；随后，他与达里奥·科尔德罗-艾劳斯甘和布鲁诺·纳萨雷特一起揭示了最优运输与索伯列夫不等式之间的关系；2004年，他作为访问教授来到伯克利，遇到了未来的美国合作者约翰·洛特，他们合作阐明了如何将来自经济学中的最优运输想法应用到非欧几里德几何以及非光滑几何上，也就是里奇综合

曲率问题，这个理论打通了分析与几何之间的界限。一个个不经意的碰撞，从无到有地演绎出新的数学定理。正是这些相遇，让他坚定地投身于探索各种早已存在的和谐关系。他曾感叹：“世界充满了多少让人意想不到的联系啊！”在他的数学旅途中，有一首法语歌《水手与玫瑰》，其中一段歌词深得他心：“人们从不曾发现，一根情丝遥相牵，起点都柏林花园，终点水手在天边。”

数学深处的优雅，大概是数学家才能领略到的风景。维拉尼向我们举了一个有关优雅的例子：当高斯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校长让他们做100以内的连加运算。高斯把1~100的数字顺序排成一列，再倒序排成一列，上下两个数字相加都等于101，一共有100组，总和是10100。1加到100和100加到1的总和是相等的，那么除以2就是1加到100的和了，即5050。“这非常优雅，非常美！既然1~100已经很复杂了，为什么还要把100~1再重新列一遍？这完全出人意料。它非常可靠，而且可以无穷地推广，这个数列可以扩展到1000、10000，方法完全具有普适性。它的推理也非常漂亮，把一个加法运算完美地转化成乘法和除法运算。这就是优雅！优雅存在于数学的解决方法中。”

维拉尼时常不确定，当生活中邂逅的人问他“你研究什么”的时候，他们是否真的有兴趣知道答案。他有时会深吸一口气回答道：“我发展了一个关于完备局部紧度量测度空间上的里奇曲率的下界的综合性概念。”得到的几乎总是懵懂又惊叹的反应。他会耐心地普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使光线弯曲的曲率，非欧几里德几何的基石；他也会向人们解释，当曲率为正时，光线相互靠近，当曲率为负时，光线发散。他会耐心地继续讲，曲率这个光学概念，与统计物理学中的概念密度、熵、动能、极小能量这些概念都是结合在一起的，而他所做的工作，就是解决“如何在一个像刺猬一样不光滑的空间上讨论曲率”的问题，这就是“最优运输”，一个涉及工程学、气象学、计算机科学和几何学的概念。

当数学家说，他在研究“是什么让原子们自发组织起来，而不是静静地彼此远离？为什么我们会联成一个整体存在，而不是溶解在宇宙中”这样的问题时，数学像星空一样浪漫；当物理学家将这个“物质稳定性问题”以数学形式提出并求解时，这个过程又是艰深的。有时，人们会请维拉尼写下一个数学公式留作纪念（这种事往往发生在法国）。那些对普通人来说

根本看不懂的公式和几何图形，更像一件晦涩难解但又神秘玄妙的当代艺术，兴许还营造了某种印象派的氛围。他非常宽容地对待那些充满好奇却又无法理解他的数学的公众：“没有人理解我那本《一个定理的诞生》书里的数学公式，它们的存在就是为了装饰和气氛。”

就任庞加莱研究所所长之前，他曾问过自己这样的问题：“现如今，有谁愿意做一个整天被行政琐事烦扰的研究机构负责人，每年屈从于越来越复杂的法规条文？领导一个如此繁杂的研究所，这兴许是研究生涯的末日。”但他还是接受了这个职务。获得菲尔兹奖后，他不断出现在报纸、广播和电视节目中，不断会见各色人物，从政治家、艺术家、大学生、企业家、革命家、国会议员到法兰西共和国总统……他总是反反复复被所有人问同样的问题：你如何开始对数学产生兴趣的？法国人的数学为什么这么厉害？菲尔兹奖是否改变了你的生活？得到最高荣誉后，现在的科研动力是什么？你是天才吗？佩戴蜘蛛饰物有什么意义吗？

与隐居起来的数学前辈笛卡儿和帕斯卡截然不同的，维拉尼并未逃避热闹的世界。相反，他积极介入其中。他告诉我，菲尔兹奖并未改变他在数学圈里的生活。“全世界的数学家构成了一个圈子，这个圈子的人并不是很多，人们早已相互认识。”菲尔兹奖对他的影响，是改变了他与数学之外世界的关系，特别是与政治家、工业界和媒体的关系。“我开始接受媒体采访，出现在电视节目和纪录片中，我也开始做公开演讲，每年都有成百上千的邀请。我最近还参与了法国申请 2025 年世博会的项目，作为代表法国文化的六个人物之一，与法国大厨、作家、宇航员、企业家和航海家的另五位代表一起代表法国。政治家也开始尊重你，向你征求意见，希望让你参与各种事务。”但数学家对政治通常都持批评态度，而当电信行业、云行业、做优化的人，都来找他给建议时，他也并没有时间去解决他们的问题，而是向他们指出，哪些领域的哪些研究和研究者可以为他们提供解决方案。

21 世纪伊始，庞加莱猜想的证明改变了数学的全貌。更大的剧变是，数学与技术的关系更加密切了，这为数学打开了全新的世界，算法与数字科学的大发展，使得数学的应用越来越广泛。维拉尼清晰地知道自己名声的来源：“数学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在上升，因此也更受尊敬。工业界越来越需要更多的数学家，在很多公司里，数学家都居于高层地位。随着用途越来越广，数学已成为现代人一个不错的职业。”当代

的数学家也许是更幸运的。纯粹数学的发展往往是超越时代的，甚至是超越理论物理学的。维拉尼崇拜的伽罗华所建立的理论，在一个多世纪以后才开始应用于量子力学；非欧几何学被用来描述引力场、复分析在电气动力学中的应用也是如此；圆锥曲线一直被认为是富于思辨的头脑中无利可图的娱乐，它在近代天文学和万有引力定律中发挥作用，已经是它诞生 2000 多年之后的事了。过去，数学家的工作难以被人们理解，他们像无用的梦想家；现在，数学家的工作仍然难以被人理解，但人们早已意识到，我们这个时代是如何受惠于数学的。

维拉尼心目中的数学英雄，从玻尔兹曼、麦克斯韦、约翰·纳什到阿兰·图灵，都以前所未有的创造性把数学的抽象应用到了另一个科学领域，如经济学、物理学、计算机或工业界。维拉尼认为他们“非常好地证明了数学对于理解现实非常有效的观点”。他觉得，应用能够真正将数学融入整个人类社会；在美与实用之间，数学一直在反复摇摆，寻找着平衡。

但与爱因斯坦和尼尔斯·玻尔的时代相比，科学家的角色又有很大的变化。“爱因斯坦成了知名公众人物，成了上帝一样的存在，他是独一无二的。今天，语境已经不同：与他的时代相比，科学家的数量要多得多；他们研究的问题也更加复杂，更加全球视野，常常跨越多个大洲。科学家仍然可以扮演公众角色，应该说，是作为科学界的代表和符号来影响年轻人。”维拉尼并不讳言，菲尔兹奖的国际声誉，让数学家受到太多的国际关注，但它的好处是：“它总是让年轻的脸庞出现在公众视野里，而不像 70 多岁才拿诺贝尔奖的科学家们那样，不再有精力与公众和年轻人对话。”毕竟，数学家做出创造的黄金期，主要还是在中青年时代。

汽车在巴黎并不顺畅的城市交通和市郊的道路上不断刹车、颠簸，我们尽力忍住想要作呕的冲动。在这一个多小时的旅途里，维拉尼偶尔露出一些疲惫，谨慎地打了两个呵欠，有一次几乎用意念撑起了使劲儿靠拢的上下眼皮。在这趟开往南郊的旅程中，他最终决定接起一个响了数次的电话。我大概听出，他告诉对方，现在还没有时间。放下电话，他告诉我，来电的是一个突尼斯书法家。他每年都去非洲几次，那里的人对科学家有着极大的热情。这位书法家想和他一起写一本给孩子的字母童书，从数学家角度为 26 个英文字母选一些能代表它自己的词。“哦，可怜的阿萨德，我总是在忙！”



(于楚公 摄)

## 巴黎闹市中的理工教育

文 / 苗千

“小的就是美的。”(Small is beautiful)

弗雷德里克·切维(Frédéric Chevy)教授的实验室设在巴黎高师物理系的地下室里，实验室里激光器和电脑密密麻麻布置在一起，让人难有容身之地。在里边只待了一会儿就觉得气闷，大致参观过后我们回到他的办公室，切维教授开始讲述他在巴黎高师物理系求学和做研究的感受。

“法国非常重视理论教育，所以很多学生刚考进

巴黎高师物理系的时候都会觉得有点别扭。很多学生在入学的时候只想着研究超弦理论或是天体物理学，而我们作为教师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告诉新生，物理学是一个非常广阔的学科，并不一定非要选择超弦理论、粒子物理学或者天体物理学这样的题目，这只是物理学里非常狭窄的一部分，连物理学整体的百分之一都不到。”切维教授说，“当然我也能理解这些学生，因为我也曾经处在他们这样的位置。当你还是一个中学生的时候，你往往只能从流行杂志里了解物理学，而关于粒子物理学、天体物理学这些领域被描述得有点过分了。我必须告诉学生们，做实验其实也



(于晓众 摄)

左图：巴黎高师物理学家弗雷德里克·切维

右图：巴黎高等物理化学学院院长让-弗朗索瓦·若昂尼

很有意思。我们每周开学术探讨会，大家共同讨论，这是接触真正科学的第一步。”

经过老师们的疏导之后，仍然想做基础理论研究的高师物理系学生大概会从 99% 降到三分之一左右，切维教授认为这算得上是成功的。高师物理系总共有五个研究组，其中有一个组研究天体物理学，一个组研究理论物理学，另外三个组都是做实验物理研究，切维教授自己就是利用激光研究冷原子的性质。“无论是做基础物理还是理论物理研究，数学训练都很重要，高师的学生都要有扎实的数学功底。”切维教授说。但另一方面，这也有可能使学生忽略了动手做实验的能力。在对比之下，高师学生的优点和缺点都更突出：高师有很多德国学生，切维教授认为，德国学生和法国学生之间很有点互补的意味。德国教育在很大程度上与法国相反，在实验物理学上的训练非常扎实，数学上的训练也很不错。在实验室里，德国学生往往表

现得更独立，上手实验更快，而很多法国学生即使是在面对一个实际问题时，第一反应也是做计算。

在 8 年前开始举办的国际物理学家竞赛 (IPT)，法国学生参加了过去的五届，切维教授也参与训练参赛的法国学生，他认为这类竞赛反映了法国学生的很多问题：面对一些开放性的问题，只做理论计算是得不出答案的；一些法国学生甚至在不知道该如何建立数学模型，不知道如何进行近似计算的时候，就马上开始计算。老师需要告诉他们这是错误的，最开始应该先做实验。经过培训之后，可以看出学生们的进步都很大，最近法国学生在国际物理学家竞赛中的表现都很不错。

重视理论教育，强调数学功底，这可以说是巴黎高师的传统之一。巴黎高师出产了众多世界一流的数学家，相比之下，尽管在进入 21 世纪后仍有两位巴黎高师的校友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但是与英美大学相比，高师理工科教育的名气并不算大。现代理工科

教育和研究体系在全世界大多数大学里都比较相似，为了培养未来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实验仪器日趋复杂昂贵，实验室的规模日益扩大。我身在莺歌燕语的巴黎中心，想知道在法国最好的学校如何在螺蛳壳里做道场，培养未来的理工科人才。

我的疑问或许很快就不再成为一个问题，巴黎高师正在参与融入一个更大的体系之中——正在组建的巴黎科学艺术人文大学（PSL）正联合在巴黎中心的几家研究机构，成为一个现代的综合性大学，其中既包括巴黎高师这样重视理论研究的学校，也包括像巴黎高等物理化工学院（ESPCI）这样更重视实践操作的机构。巴黎科学艺术人文大学并非简单地把几家相邻的研究机构合并，而更像是一个合作框架，促进各个研究机构之间可以有更多的互动与合作，而构成它的各个研究机构又都希望在合并后能够继续保持各自的个性。

让一弗朗索瓦·若昂尼（Jean-Francois Joanny）教授毕业于巴黎高师物理系，他现在担任巴黎高等物理化工学院的主任。这个学院与巴黎高师比邻而居，也将成为巴黎科学艺术人文大学的一个重要部分。若昂尼教授这样解释法国的教育制度：法国教育有两个平行的线索，一个是进入大学，另一个是进入“École”。École可以理解法国特有的精英研究机构——巴黎高师和巴黎高等物理化工学院都属于这种École，而要进入这样的学校，竞争远比进入普通大学激烈。高中毕业生首先要经过两年高强度的预科训练和考试，这相当于普通大学的一、二年级，之后再参加竞争激烈的École入学考试，层层筛选下来最终被录取的都算得上是法国学生精英中的精英。

巴黎高等物理化工学院有三分之二的学生来自预科学校，另有三分之一则是通过面试直接录取，以此保证学生背景的多样性。这个学院的校园不大，给人的感觉更像是个中学，很难想象曾经有六位诺贝尔奖得主在这里工作。学院创立之初居里夫妇就曾经在此进行放射性研究，而居里夫人的学生，法国最重要的物理学家之一保罗·郎之万（Paul Langevin）曾在这里工作了几十年。

若昂尼教授介绍，巴黎高等物理化工学院每年只录取不到100名新生。这一方面是为了保证新生的高水平，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尽量混合学校里教学和科研的关系——学生一旦被录取（相当于大学三年级），马上就可以进实验室工作。在学生最初两年的学习过程中，大约有一半的时间要在实验室里度过——通过研究进行教学正是巴黎高等物理化工学院的精髓。

“所有人认识所有人。”若昂尼教授这样形容这个

精致学院里的人际关系。在这样的环境里，非常容易实现交叉学科的研究，“interface”（界面）是若昂尼教授反复提到的一个词。虽然每个学生被录取时都在物理专业或是化学专业，但实际上在入学之后，每个学生都要经过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的训练，建立起跨专业的背景知识，而这种混合必须要以大量的实验室训练为前提。因此，在这所学院里极少有纯粹的“物理学家”或是“化学家”，大量的研究项目都需要各个学科专家的相互配合。

“另一方面，”若昂尼教授接着介绍，“因为我们的学生数量很少，我们总是尽量让学生读博士，这是成为一个优秀工程师的最佳途径——训练一个优秀的工程师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们尽快开始研究。我们的学生在之前的训练里已经对实验室工作很熟悉了，所以读博士对他们来说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我们大概有70%的毕业生都会选择读博士，之后再进入工业界。”这个比例高得令人吃惊，称得上是法国版本的精英教育。一般情况下（在两年预科学校训练之后）的本科教育只需要三年，而为了读博士，则需要再多花一年的准备时间。一个法国学生，在中学毕业后和读博士学位之前，需要经过6年的高强度训练，或许这正是法国的工程师技术水平扎实可靠的根本原因。

郎之万正是这种法国式理工科精英教育和研究的最好例子。他曾经有20年的时间担任巴黎高等物理化工学院的教务长，随后作为校长在这里又继续工作了25年。虽然郎之万被人们认为是一位物理学家，他对电磁场、统计力学、广义相对论都有深刻的研究，但他同时也致力于应用方面的研究，他在战争期间发明了声纳系统——这也成为巴黎高等物理化工学院的核心理念：模糊学科之间的边界，把教学和研究相结合，把基础科学研究和应用研究相结合，让不同领域的人可以毫无障碍地合作。

这种传统如今仍在延续，巴黎高等物理化工学院现在同时进行基础和应用研究。若昂尼教授本人进行软凝聚物（Soft Condensed Matter）领域的研究，虽然他自认为是一个纯粹的物理学家而非工程师，但是他的研究组与工业界和商业公司都有紧密的合作。若昂尼教授会去参加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等各学科的学术会议，他甚至曾经发表过关于癌症治疗的论文——在与生物学家合作研究过程中，他只需要关心其中的物理学问题。在各实验室的孵化下，巴黎高等物理化工学院平均每年会诞生3个创业公司，获得50个专利。

在美国大学里，不同学科会归属于不同的院系，而巴黎高等物理化工学院因为自身体量不大，并没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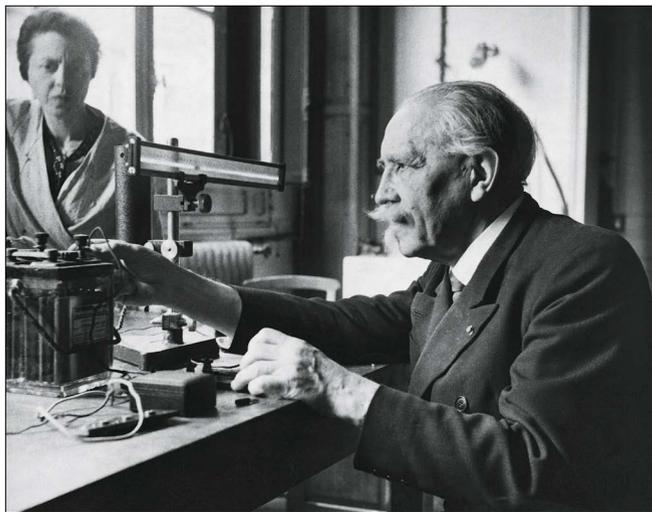
(于魁众 摄)

上图：若昂尼教授（右）在巴黎高等物理化工学院的实验室里与同行交谈

下图：巴黎高等物理化工学院的研究人员正在调试仪器



(于魁众 摄)



法国物理学家保罗·郎之万（1872～1946）

不同的系，只有9个不同的研究单元，其中2个有关生物学，3个有关化学，4个有关物理学……但实际上，每个人都应该和每个人合作，在不同学科领域的交界处进行合作。当你走进某一个实验室，你不会知道身边的人究竟是化学家还是物理学家——若昂尼教授认为，这种小而精的机制运行得非常完美，这正是巴黎高等物理化工学院得以成名的原因。

但是小也有小的缺点。若昂尼教授解释说，如果你的体量很小，外界往往看不到你。美国或是中国的大学都比巴黎高等物理化工学院的规模大太多，因此这些学校往往不太愿意和我们合作，这也正是组建巴黎科学艺术人文大学的原因之一。建立一个有共同理想、更广阔的大学——巴黎高师仍然做非常基础的研究，而巴黎高等物理化工学院也保持自己的个性。各个机构共同工作，然后建立一个大学，这样就可以既保持小研究所的特点，也可以具有大学的优点。

“在巴黎高师有15个系，其中7个属于自然科学部分，另外8个属于社会科学部分。自然科学系中最有特点的是认知科学系——研究大脑如何理解和处理信号，这需要多个学科的融合，还需要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参与，这个系非常年轻，大概15年的历史。”巴黎高师科学部的主任伊夫·拉斯洛（Yves Laszlo）教授向我介绍巴黎高师的院系构成。“数学系是属于自然科学部分吗？”我追问一句。“我希望是。”拉斯洛教授回答。大家都笑了。

我的问题并非没有来由。属于自然科学的各个学科之间联系越来越紧密，而数学的研究和教育方式自

成体系，对于研究者的天分和师承的要求也更高，两者之间的区别不可谓不明显。严格来说，巴黎高师并不是一所独立的大学，更像是一个研究所，它即将成为巴黎科学艺术人文大学的一部分。在这个居于闹市的学校里，因为相对狭小，7个自然科学系之间的关系也就尤其紧密。“最好的地方就在于跨学科研究，每个学科的人都可以自由地结合工作，规模太大了反而难以进行活动和合作——比如说我们想研究一个单独的细胞，就需要物理、化学、生物学、数学等多个学科的合作。在巴黎高师每年有4000多个各领域的学术研讨会。”拉斯洛教授介绍。

“小的就是美的。”他这样总结了一句。的确，当自然科学教学和研究的模式普遍向着越来越大发展，反其道而行之，保持小规模紧凑感，反而可能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那么，作为法国最优秀的学校之一，巴黎高师是否愿意融入到正在组建的巴黎科学艺术人文大学之中去呢？“对于政治家来说，巴黎科学艺术人文大学最大的意义就是未来可以在国际大学排名中位置靠前一点。”拉斯洛教授的语气中有些无奈，“政治家们只关心排名，巴黎高师的规模太小，在国际大学中的排名总是太靠后。大约在两年以后，巴黎科学艺术人文大学就会作为一个大学参加世界大学排名，肯定会更靠前的。”——当然，这只是表面上的理由，对于研究者来说肯定还有更重要的理由。

“我们并不太在意排名，但是成立巴黎科学艺术人文大学之后，我们会更容易进行国际合作。”拉斯洛教授继续解释巴黎研究大学在政治之外的意义，“巴黎科学艺术人文大学将是一个真正的大学，在两年以内就可以这所大学的名义授予硕士和博士学位。巴黎高师的每个学生都有一个导师（mentor），如果学生太多我们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因此保持小而灵活的特点更能够为研究提供多样性，更容易开展一些前沿学科的研究。而创造出巴黎科学艺术人文大学这个新品牌，又可以通过深入的国际合作，招收更多背景丰富的、更多样化的国际学生，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主流好学生。我们需要更多样化的学生，更多的国际学生，我们需要有更多的选择。”

“巴黎高师的学生可以非常自由地选择课程。他们以后可以留在学院里做研究，也可以做出其他任何选择，在公司、大学、实验室里，都可以创造出价值。高师有最好的学生，但是他们也必须成为好市民，要尽到对社会的责任。”拉斯洛教授这样形容巴黎高师的教育理念，也道出了巴黎高师在巴黎的中心进行理工教育的真正价值。■

# 有一种路线，叫做跟着自己去发现

心·旅 生活 全新跨界旅行车蔚领 随心出发



生活没有界限，是因为你已经超越了界限。在生活中发现旅行，在旅途中遇见生活，这是一种能力，也是一部车。全新跨界旅行车蔚领，特具SUV风格跨界造型，革新动力组合让出发随心所欲，舒适质感内饰让享受绵延全程，全面安全配备让旅途泰然无忧。生活与旅行，都市与路上，从此不再设限。

车之道，为大众

## C-TREK | 蔚领



扫码了解更多



Volkswagen

# 巴黎街头的博雅教育

文 / 张星云

有别于英美国家，法国高等教育中的博雅教育并不是来自课堂，而是来自拥有悠久文化艺术传统的社会中。

初到巴黎上学的人很可能会特别震撼，巴黎的大学并不像想象中那样。在寸土寸金的巴黎，学校没有任何财力扩建。每所学校都特别小，只有几栋教学楼，除此之外没有其他设施。没有英美国家一望无际的大校园，没有球场和运动场，没有学生的活动中心，很多学校甚至连食堂都没有，每天中午要和附近的几家中小学学生一起共用市立学生食堂。

更麻烦的是住。当初，19世纪在巴黎南部建设大学城（Cité Universitaire）时根本没有想到后来的大学进行了大规模扩招，如今大学城内的学生宿舍只提供给国际交换生和极少数通过正规渠道申请的普通学生，即便在巴黎公立学校有奖学金的学生里，也只有30%的人能够住上大学城。结果是，几乎所有在巴黎求学的学生都要自己找房子住。在这座房价仅次于伦敦、香港、东京的城市中，学生们要与社会上有工作拿着薪水的人竞争租房房源，而在巴黎，一间20平方米左右的单间月租金起码700欧元。

没有了大校园、食堂和宿舍，似乎巴黎的学生们没有了象牙塔。为了省房租住在郊区，就要每天坐很长时间的公交车去市中心上学。为了感受巴黎生活，就要寻遍租金最低的顶层阁楼和质量较差的房源。然而这并不是坏事，衣食住行，学生们都是以一名普通巴黎人而非学生的身份充分与社会接触。

有别于英美国家强调博雅教育，法国的高等教育更加注重专业性教育。学生们在学校上完课，就四散进入到巴黎这座城市之中。也正是巴黎这座著名的文化城市，成了教授法国学生们博雅教育的最好老师。“二战”后的巴黎经历了两次文化大发展和一次教育制度的改革，在政府、资本和知识分子的推动下，博雅教育散落到巴黎各处的咖啡馆、博物馆、书店、电影院和大大小小的不同活动中。

## 拉丁区的兴衰

“二战”后的拉丁区（Quartier Latin）曾经是法国现代历史上最先兴起也是最著名的艺术文化交融之地，开启现代法国最伟大的文化繁荣期。以至于直到今日，大部分中国人对法国文化和知识分子的认识只停留在这个时期。在经历了1968年“五月风暴”后，这里的文化气氛被政府和资本不断打压，如今拉丁区西侧的圣日耳曼德佩区（Saint-Germain-des-Prés）已经成了著名的旅游目的地，林立的奢侈品店旁，如织的游人在花神咖啡馆（Café de Flore）紧挨着坐成一排，尝试从一杯贵得离谱的咖啡中回味当年萨特、波伏娃的哲学韵味。但隐藏在街角的众多传统书店和独立电影院，依然在顽固偏执地对亚马逊和好莱坞电影做着抵抗，为那些想要真诚汲取上世纪法国文化光辉的人们保留完整的精英知识分子精神，给他们提供最好的课堂。

当年引领这场文化运动的人不再是传统的大学教授，而是一批新兴知识分子，有像萨特、波伏娃和梅洛-庞蒂这样被冷落甚至被逐出大学的教授们，也有让·包兰、马塞尔·阿兰这样的文人。圣日耳曼德佩大街十字路口的花神、双叟咖啡馆和里普酒吧成了他们常去之地，也是《新法国评论》（*Nouvelle Revue française*）、伽利马出版社（Éditions Gallimard），以及其他杂志编辑和出版商们经常聚集的地方。1945年10月，萨特在让·古戎街（Rue Jean Goujon）的现在俱乐部（Club Maintenant）做了一场名为《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的演讲。令萨特吃惊的是，他的听众是一群从附近索邦大学（Sorbonne）跑过来的年轻学生们。这场演讲第一次显示出巴黎的精英思想核心已经离开了索邦大学，并在接下来的20年里逐渐壮大。

新兴知识分子们将正统的文化精英逐出了这个街区，书本代替了讲台，咖啡馆里的高谈阔论代替了传统的课堂，思想代替了传统教育。文学界的新人们打破了教会、法兰西学院和大学的权威，并在与各种艺术类型的融合中成为独立的思想体系。

这里的年轻人形成了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们被称



法国先贤祠周边是巴黎拉丁区学校最集中的地方

左图：2001年5月9日，时任教育部长雅克·朗（右二）访问莫里哀中学。那段时期他尝试进行了一系列的教育改革

右图：巴黎的花神咖啡馆（摄于1978年）



为“圣日耳曼德佩人”（Germano-pratins），他们不分性别地一律偏爱黑色衣服，与原本住在该区的各类公司职员和退休职工和谐共处。那时的大学生们除了在拉丁区歌舞升平，巴黎的其他地方无论在文化还是经济上均与他们的生活和愿望距离很远，他们依然处于高压的家长制和严格的社会等级制度下。这种强烈的反差最终引发了法国社会的一次震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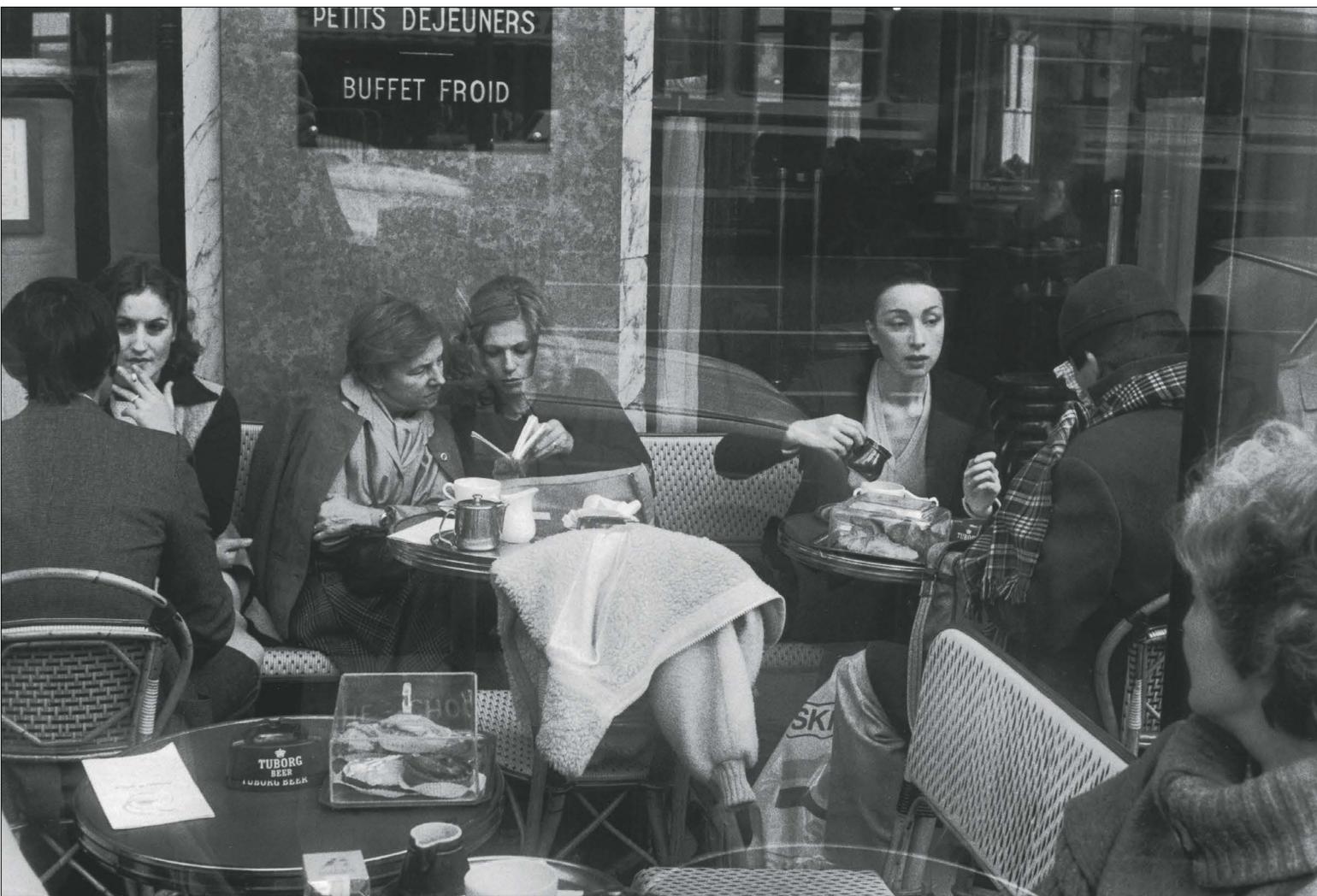
1968年“五月风暴”快速起势，也迅速崩溃，却对法国高等教育影响深远。当时学生们对高等教育提出的夙愿在此后通过另一种政治改革形式实现了。随着教育部长埃德加·富尔（Edgar Faure）提出的指导法通过，作为“五月风暴”的发源地，索邦大学被拆分成13个校区，在巴黎的各个角落另立校舍。

“五月风暴”发生后，巴黎政府采取的第一项行动，便是将拉丁区具有历史意义的鹅卵石路铺上了沥青。学运期间“铺路石底现沙滩”（Sous les pavés, la plage）的革命口号与鹅卵石一起象征性地被替代，取而代之的是更方便快捷、更现代化的沥青。巴黎，乃至整个法国，也进入了一段一味追求现代化的时代。

此后拉丁区逐渐失势，巴黎一代精英知识分子也逐渐落幕。

可以说，整个20世纪的最后20年，巴黎的文化和政治生活都置身于右派的紧缩和左派的幻想之中。1969年总统夏尔·戴高乐在全民公投失败后离任，继任者乔治·蓬皮杜和吉斯卡尔·德斯坦都在一味强调法国在欧洲的政治地位，而非广大巴黎群众的生活品质，殊不知他们早与全球的主流政治渐行渐远。按照当时法国知识分子的说法，那是一段资本和秩序力量疯狂打击报复巴黎的日子。

就在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1981年执政的前一年，75岁的萨特去世了。如同上世纪维克多·雨果的葬礼一样，萨特的葬礼也是那个时代举足轻重的大事。1980年4月的一个阴霾早晨，5万多人参加了他的葬礼，萨特长眠于蒙帕纳斯公墓。报纸上说，萨特的死既是巴黎知识分子真正意义上的死亡，也是象征意义上的死亡，预示着巴黎作为世界知识分子之都的终结。在接下来的10年间，罗兰·巴特、雷蒙·阿隆、西蒙娜·德·波伏娃、米歇尔·福柯、



居伊·德波、雅克·德里达等人相继离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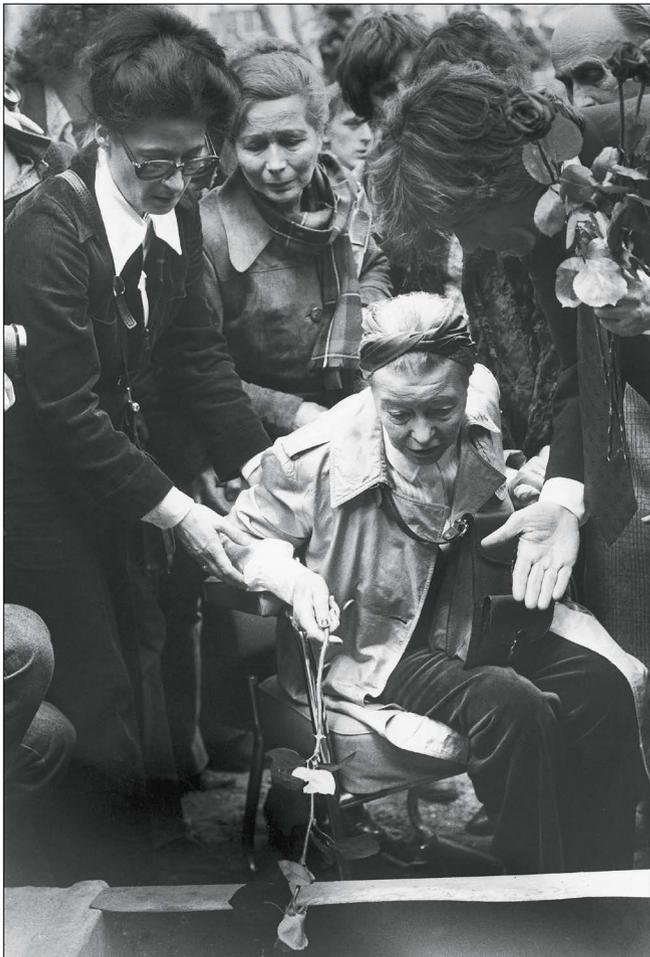
他们的离世，使曾经鼎盛的圣日耳曼德佩区知识氛围渐渐衰落。后继无人更使人们意识到这一代知识分子的伟大，圣日耳曼德佩逐渐因他们的离世而更负盛名。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圣日耳曼德佩区完成了商业化改造。

双叟和花神咖啡馆成了外国游客最喜欢光顾的地方，而正对双叟咖啡馆的主街成了标准的旅游配套服务区，如今奢侈品店林立。知识分子、艺术家和年轻人再也喝不起这里咖啡馆的咖啡，他们更因付不起日渐膨胀的房租而相继搬离，这里成了寸土寸金之地。

失势的索邦大学和高度旅游商业化的圣日耳曼德佩区周边，如今依然留着很多当年文化繁荣时期的书店和电影院，几十年上百年没有变化。双叟咖啡馆背后的圣日耳曼德佩电影院只有一个电影放映厅，每

天只重复放映同一部电影，每周更换一次电影，但选择的电影都很独特。索邦大学旧址旁边的一条小道香波隆街（Rue Champollion）特别窄，与繁华的圣米歇尔大道平行，只隔了一排楼，却特别安静，除了一家小旅馆和一家超市的进货后门，三家拉丁区最著名的独立电影院 La Filmothèque du Quartier Latin、Refllet Médicis 和 Le Champo 并排而立，每个电影院有一或两个厅，每个厅只能坐二十来人。这里从来不放映院线电影，只以回顾展映的方式将电影大师们的片子进行系列放映，排队进电影院的不是年轻人就是老年人。

拉丁区依然存在的独立书店也是旧时代的遗产。1981年，在以午夜出版社（Édition de Minuit）为首的出版机构努力下，法国议会通过了对图书价格实行统一定价的法律，规定图书价格由出版社按成本定



1980年4月19日，波伏娃在萨特的葬礼上献花

价，并在固定位置明确标示，任何图书销售机构不能以超过标价5%的折扣来进行促销，以保证独立书店不会因连锁书店的大规模优惠价格而倒闭。尽管如此，没有谁能够抵挡住电子书和网络化的冲击，如今法国依然有2000至2500家书店，这在全世界也依然罕见。拉丁区任何不起眼的街道或者拐角，都可能看到专业领域的旧书店，科技、考古、摄影、艺术等各个领域的古书成了热爱知识的人取之不尽的宝藏。

### 总统工程

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法国再也没有知识分子能像过去一样在公众生活或是主流观点中占据一席之地。大众传媒的兴起导致精英知识分子不再拥有编辑信息的掌控力，电视辩论节目迅速使一批如贝尔

纳—亨利·列维（Bernard-Henri Lévy）这样的新知识分子产生，受众广泛，但也充满着流行文化。与知识分子的弱化相比，是政府政策的逐渐强硬。巴黎现在的文化繁荣，很大程度上是因为80年代左派执政时期的文化政策。

法国当代的博雅艺术，源自博物馆。如何将博物馆的历史馆藏与社会生活交融是当时的问题。1981年，社会党赢得大选，密特朗当选总统，他是法国战后历史上第一位左派总统。为了符合大力扶植文化的左派精神，密特朗治下的政府在巴黎建造了一系列大型公共文化建筑，被称为“总统工程”，成为其政府的最大政绩。

密特朗放弃了前任德斯坦计划建造的拉德芳斯新城，继续将原来的奥赛火车站改建成一座19世纪艺术博物馆。他力主将政府财政部迁出卢浮宫，对后者进行扩建改造，请来贝聿铭设计了玻璃金字塔，使卢浮宫进一步成为全世界最全面顶级的博物馆。

在时任教育部长雅克·朗（Jack Lang）推出的政策下，学校被要求组织学生参观博物馆。2002年，时任部长的雅克·朗与当时的文化部长卡特琳·塔斯卡（Catherine Tasca）一同起草了一纸名为“艺术与文化”的高等教育议案，通过调动老师、学生和家長，让小学到大学的学生们更好地进行艺术实践，并走进博物馆，启发学生对艺术的鉴赏能力。除了将艺术史纳入大学课程外，雅克·朗希望高等教育机构与艺术机构更加紧密地合作，通过对老师的教育，让体育老师、数学老师也懂得如何解释艺术。“一切经验显示，进行文化艺术实践会帮助学生们学习其他科目。话剧会加强对语言的掌握和使用，音乐则提高孩子们对计算和数学的兴趣。”雅克·朗在议案中写道。

雅克·朗随后还推出了“全民精英文化”和“全民精英学校”的计划，但都无疾而终，最终在左派下台后，仅以口袋书的形式出版。“我不认为应该把艺术、思想或教育领域的高层次追求与平等精神相对立。”雅克·朗在书里写道。

除了博物馆和美术馆，密特朗还决定建设巴士底歌剧院（Opéra Bastille）。巴士底歌剧院的建设初衷是为了减轻巴黎歌剧院（Opéra de Paris）的负担，后者设施陈旧、狭窄破旧，虽然票价昂贵，且演出时一票难求，但经营依然处于亏损。密特朗希望现代化的新歌剧院可以提高演出场次，并将票价便宜一半，以吸引更多的百姓观众来剧院看演出。当时曾有多处地点可供选择，巴黎规划协会为了发展右岸巴士底和

圣马丁运河地区而建议在此修建，最终爱丽舍宫同意了方案。为了节省空间，设计师欧特取消了剧院内的休息室，取而代之的是在各个楼层修建的半圆形走廊，检票处被设置在了剧院各个入口处。这里形成更少的私密空间和更多的公共空间，巴士底歌剧院门口的广场担任了原本剧院大厅的作用，结伴而来的观众们在露天广场上等待持票的朋友，进而盘活了周边，一个遍布咖啡馆、酒吧和演出场地的年轻街区诞生了。

也正是在此之后，巴黎人对古典音乐的热爱不断增加。法国对古典音乐的积淀一直不及德国和奥地利。40年前，人们看歌剧的唯一选择便是挂着红色丝绒帷幕的巴黎歌剧院，而今现代化的巴士底歌剧院吸引着更年轻的观众，更多从未观看过古典音乐会的人去了巴士底歌剧院，古典音乐的普及也让更多人前往各地区的国立音乐学院学习业余课程。

密特朗两届任期内的最后一项总统工程，即1991年秋开工的弗朗索瓦·密特朗法国国家图书馆（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François Mitterrand）。在13区塞纳河左岸，这座大型的现代建筑里收藏了1100万册图书，书架总长度为400公里，当时的建设总成本就高达70亿法郎。无论是蓬皮杜艺术中心、巴士底歌剧院、卢浮宫的改造计划，还是法国国家图书馆的建设工程，都受到了当时朝野的各方质疑。右派在野党认为密特朗不顾经济危机，不注重复苏经济，反而修建文化公共设施；而左派党内则认为密特朗好大喜功，虽然政府施行去中央集权化政策，本应让地方政府获得更多可支配预算，但在短短7年里，总统工程总共花掉了300多亿法郎，且绝大部分都用在了巴黎。

这几座文化机构的现代设计在当时受到了众多批评，认为远远偏离奥斯曼式巴黎的审美，卢浮宫广场上的玻璃金字塔成为各方论战的永恒源泉。但这些现代建筑对当地街区的形象改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公共教育空间的设立吸引了更多的年轻人，一场城市士绅化改造（gentrification）即将到来，只不过在总统工程建设期间，人们对此并没有明确的定义，也不知道该如何评价。

而今的国家图书馆附近被称为“新拉丁区”。巴黎第七大学的崭新校舍、巴黎社会科学院、东方语言学院等环绕左右，国家图书馆一侧建起的MK2电影院拥有20多个放映厅。塞纳河另一侧，电影资料馆和贝尔西体育场相连，人们不曾想到一套完整的学生生态体系在这里发芽。

## 文化普及运动

除了总统项目之外，80年代的文化普及政策更使得法国人民至今受益，也是当代法国博雅教育真正确立的根本。真正的推动者便是当时密特朗政府内阁的文化部长雅克·朗，他被视为在法国历史上马尔罗之后最有贡献的文化部长。“文化政策是一种精神和远见，而不只是国家行政的一部分。文化政策首先是公共部门与社会生活的一种关系。和密特朗一起，我们将艺术、文化、教育和知识深入地根植于社会，让百姓接触到文学、音乐、戏剧和绘画，并以此为工具改变整个社会。”雅克·朗曾这样表达他对文化普及的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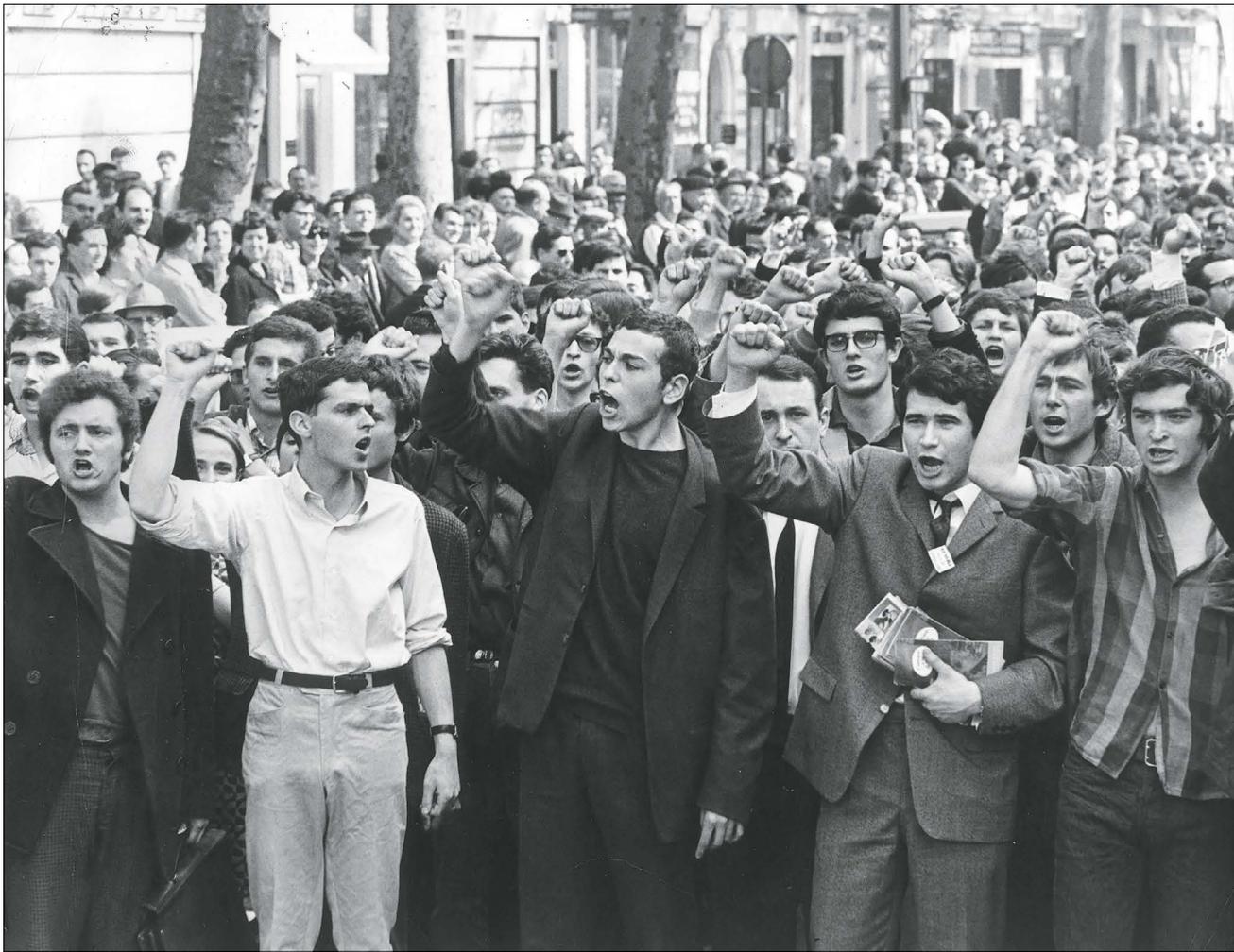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主任研究员娜塔莉·海因里希（Nathalie Heinich）认为，博物馆、图书馆和音乐厅的建立本应是为了文化普及，但它们作为最“权威”的公共文化机构，却一直与百姓存在距离。而80年代的文化普及改革，正是要改变这类公共文化机构与百姓间的关系。“因为那时我们已经不可能把电视连续剧、漫画、八卦杂志之类的再进一步普及，它们已经是大众文化了。”海因里希说道。

虽然1983年密特朗政府曾出台过一系列财政紧缩政策，但唯独文化部和研究部没有受到影响，而文化部的财政预算甚至从1983至1985年逐年上升。同样，在1992至1993年的失业大潮下，当时身兼文化部长和教育部长两职的雅克·朗总能拿到最高的财政预算。

在获得政府强力支持下，雅克·朗提出了一系列全民文化节日，希望打破精英教育与普通民众的界限。原本在六七十年代充满暴力和反抗精神的法语“游行”（manifestation）一词，在雅克·朗治下首次与文化相连，“文化游行”（manifestation culturelle）由此在法国不断发展。

法国音乐节便是最著名的例子。雅克·朗上任后的第二年，便在法国舞蹈音乐总监莫里斯·弗勒

文化政策是一种精神和远见，而不只是国家行政的一部分。让百姓接触到文学、音乐、戏剧和绘画，并以此为工具改变整个社会。



1968年5月17日，法国“五月风暴”期间，巴黎的学生们在拉丁区游行

雷 (Maurice Fleuret) 的建议下开创了法国音乐节。音乐节的核心精神是“制造音乐”(Faites de la Musique)，以取音乐节 (Fête de la Musique) 的法语谐音。每年6月21日当晚到第二天早晨，城市里的大部分公共机构都被要求向公众开放，很多街道临时改成步行街。音乐节鼓励所有业余爱好者走上街头，三五成群，拿着手中的各类乐器，找片空地尽情演奏。第一年音乐节，雅克·朗亲自走到架在巴黎街头的钢琴前为大家弹奏了几曲。

文化部组织各种职业和业余的乐队，在各类公共空间里进行免费的音乐演出，让所有职业、所有阶层的百姓在每年这一晚能够接触到古典、爵士、摇滚、说唱、电子、世界音乐等所有音乐类型。在一个完全

开放的环境下，街头成了所有人的舞台。据统计，参加音乐节的15岁至17岁的年轻观众们，其中23%的人会在当晚即兴上台演奏或者唱歌。

法国音乐节的传统延续至今，每年的音乐节当晚，全法国有500万业余音乐爱好者参加1.8万场演出，外加1000万观众。根据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 (INSEE) 的数据，97%的法国人都知道法国音乐节，其中10%的人曾在音乐节上演奏过，79%的人至少一次作为观众参加过音乐节。音乐节在文化普及方面的影响是深远的，如今全法国15岁以下的孩子中，除了有1000万人在中小学上音乐课外，还有170万人在课余作为兴趣爱好经常演奏乐器，另有8万人在公立或私立音乐学校注册了专门的乐器学习课程。30

多年来，音乐节不仅成了法国文化的重要部分，这项节日现已遍布全球 120 个国家和地区。

除了音乐节，雅克·朗还创造了一系列赋权于民的文化普及活动。法国遗产日（Journées du Patrimoine）于 1983 年开始在法国举办，随后于 1991 年推广到了整个欧洲。每年 9 月的一个周末，所有博物馆、教堂、剧院等文化遗产建筑，甚至很多因企业或政府机构占用而日常不开放的银行、议会、法院、市政府、总统府等历史建筑都会免费向公众开放。

法国电影节（Fête du Cinéma）也于 1985 年开始举办，每年 6 月底戛纳电影节之后的几天时间里，大部分电影院会集体降低票价，让更多人来电影院看电影。为了吸引年轻观众，电影院还会组织系列电影连放展映。电影节票价政策几经改变。1985 年创立之初，在原价购买第一张电影票之后，电影节期间其他电影票价均为 1 法郎。从 2012 年起，原价 8 欧元、10 欧元的电影票价在电影节期间改成了统一的 2.5 欧元，如今涨到了 4 欧元。这些文化节不仅在全世界宣传法国文化，更对当地文化产业以及艺术教育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在法国众多非旅游小城市，每年最重要的文化节日便是音乐节，甚至比国庆节吸引的参与观众都要多。

## 布波族的城市士绅化改造

雅克·朗之后的各任文化部长再无声名远扬的建树。同样，在八九十年代蓬皮杜艺术中心、卢浮宫、密特朗国家图书馆相继建成之后，巴黎的文化大建设时代结束了。已经拥有 50 年历史的文化部长职务，近几年在内阁中的地位逐渐降低。由于政府从 90 年代开始一直在执行去中央集权化政策，如今地方政府的文化预算要比文化部的财政预算多两倍，社会甚至出现了是否要取消文化部长的讨论。

法国博雅教育正面临着文化产业的兴起和互联网的冲击。文化部主推的博学文化被视为服务于社会精英，与年轻人喜爱的网络流行文化有着明显的距离。文化普及与精英教育之间的矛盾依旧存在，而曾经在学校里教授文化艺术课程的方式似乎已经走进了死胡同。

文化部自上而下对文化普及的介入受到了阻碍，而自下而上的大众文化传播也不一定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大众文化传播深受文化产业的影响，甚至被市场所控制。“文化产业不会考虑保护国家文化遗产，也

不会鼓励创新或最高级别的文化创作，对文化普及的贡献其实并不大，因为文化市场只对拥有庞大受众的付费文化活动感兴趣，而大部分的多元文化都没有什么变现能力。”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海因里希如此说道。

面对文化部财政预算的日益减少，非政府机构对文艺事业的资助（mécénat）也是在 80 年代由雅克·朗创立。近几年法国政府出台了极其宽松的税务减免政策，使得诸多私营企业创办了自己的艺术基金会。路易·威登基金会（Fondation Louis Vuitton）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逐渐壮大，并于去年在博洛涅森林建成开放自己的新基金会美术馆。

与 80 年代通过总统的意志在市中心突兀地建造公共文化建筑不同，90 年代末至新世纪初巴黎更关注环境本身，当时的新博物馆项目“东京宫”就是采取这样的理念。东京宫原本是法国政府为了纪念 1937 年举办巴黎世界博览会而建的建筑，由于当时的相邻大街叫东京大街（Avenue de Tokyo），故取名为东京宫。在蓬皮杜艺术中心建成之后，东京宫曾一度空置，两幢建筑中间的广场成了滑板少年们聚会玩乐的地方。希拉克成为总统之后，才决定将它改造成当代艺术中心，将受众定为年轻人，开门时间定为每天中午 12 点到晚上 24 点。如今，这里成了全巴黎当代艺术的中心，而少年们依然在东京宫的广场上练习滑板，装饰艺术风格的建筑外墙和广场雕塑被涂鸦喷得五颜六色。

像其他国际化大都市一样，新世纪后的巴黎也同样面临着全球化的威胁。星巴克对传统咖啡馆的侵占，亚马逊网对独立书店的冲击，贫富差距导致巴黎郊区骚乱频发，以及东欧移民和叙利亚难民的涌入，一切其他城市需要面对的问题，巴黎都要面对。郊区问题是巴黎城市发展中在所难免的困难，大量移民的涌入和上世纪 70 年代建造的廉价住宅楼成了郊区问题的起点。

与 80 年代通过总统的意志在市中心突兀地建造公共文化建筑不同，90 年代末至新世纪初巴黎更关注环境本身，当时的新博物馆项目“东京宫”就是采取这样的理念。



如今圣日耳曼德佩区商业气息浓重，双叟咖啡馆总是挤满了游客



最初要改造成商业中心的奥赛火车站，如今成为 19 世纪艺术博物馆

早在 90 年代初，密特朗就曾希望通过政府政策解决郊区问题，于是进行了维莱特公园（Parc de la Villette）修建项目。这里原先是巴黎市郊的屠宰场和肉类批发市场，紧挨着东北部移民聚居区。密特朗希望在德斯坦执政期间修建的科技馆和音乐城两个公共教育机构旁，建设一个占地 55 公顷的现代公园，他希望在这个大型的开放空间里，附近不同种族、不同文化的居民可以相遇交流，以达到当时为它赋予的“共同生活”这一试验性的社会身份。但很遗憾，如今看来这种“共同生活”的概念缺乏实践手段，公园长期以来隶属于文化部，当财政预算吃紧的时候，相比维莱特公园，卢浮宫、奥赛、蓬皮杜这些纯粹的博物馆更具优先性。维莱特公园成了一次失败的试验，如今非常冷清，仅仅成了科学博物馆或音乐厅外的花园。

民间的调和作用往往比政府的政策来得更快，布波族在巴黎的出现激活了一些曾经贫困落后的街区，正是在这种“野生”的环境里，新的文化土壤诞生了。这个源自《纽约时报》记者大卫·布鲁克斯（David Brooks）发明的词“布波”（Bobo）是“布尔乔亚一波西米亚”（Bourgeois-bohemian）的简写，指的是在信息时代，随着高度的创作空间与快速的财富累积而来到中上层阶级的新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兼具布尔乔亚中产阶级的消费能力与波希米亚人的创意与自由，将创意和情感转化为产品，以此推动文化的发展。

正是巴黎布波族在城市中的迁移，从而产生了城市士绅化改造。巴黎东北郊的贫困移民街区 18 区、19 区由于生活环境恶劣，而成为整个巴黎房租最便宜的地方。大量年轻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相继搬到了这里，他们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让该地变化巨大，曾经脏乱的街道被清新或工业风格的小咖啡馆取代，酒吧成了小众乐队经常演出的地方。由于年轻知识分子对文化的开放性，原本居住在那里的移民并没有被赶走或隔离，一种多种族的多元文化在这里汇合。于是，在这些街区，在摩洛哥水烟馆旁边能吃到最正宗的法国牛角面包，可以在印度飞饼店旁边的咖啡馆里看书，或者在一家当代画廊边上吃碗越南米粉。法国的博雅教育一步步地离开课堂和大学，进而钻进了街头，通过青年亚文化的方式延续至今。☑

（参考书目：《Que faire du ministère de la Culture》，Pierre Nora 编；《巴黎城市史》，贝纳德·马尔尚著；《五月风暴，四十年反思》，汪民安编；《巴黎秘史》，安德鲁·哈塞著）



《三联生活周刊十年》 《三联生活周刊廿年》  
《有关品质》  
《生命八卦》

限时 **8.5折**

## 典藏特惠

### 慢享20年的文字与时光

1995-2015年，  
三联生活周刊20年的成长历程，  
我们先后四辑出版这套精选文从，  
包括经典栏目作品集及主创个人作品集。

扫码直接购买



微信



淘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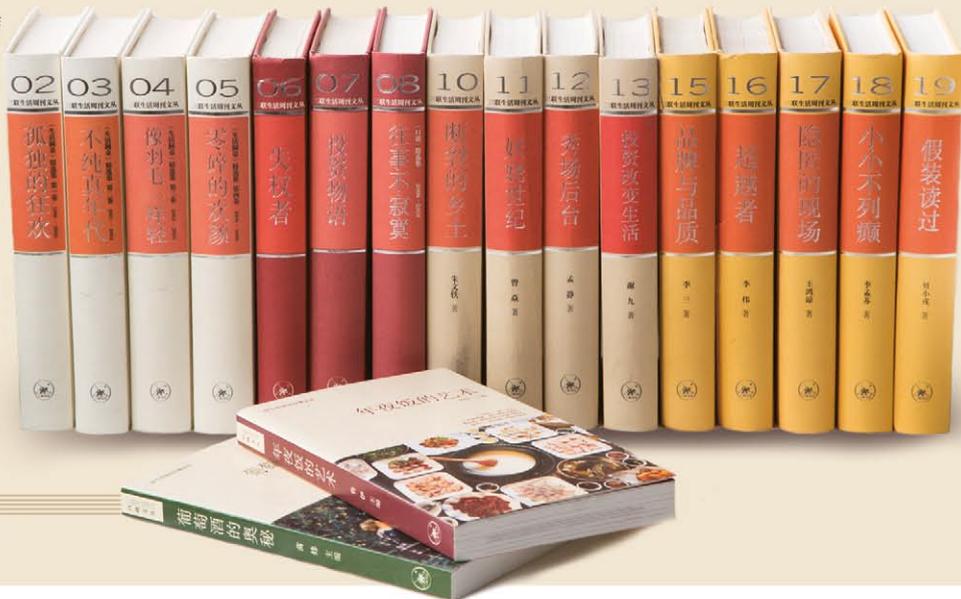
淘宝店铺搜索“三联生活周刊 lifeweek”

微信关注“三联生活周刊”公众号，进入微店

《三联生活周刊》精选文从  
与《葡萄酒的奥秘》、  
《年夜饭的艺术》

单本 **6.5折**

2本及以上 **4.5折**



十年	孤独的狂欢	不纯真年代	像羽毛一样轻	零碎的欢颜	失权者	投资物语	往事不寂寞	有关品质	断裂的乡土	妖娆世纪	秀场后台	投资改变生活	生命八卦	品牌与品质	超越者	隐匿的现场	小小不列颠	假装读过	廿年「精装版」	廿年「精装版」	葡萄酒的奥秘	年夜饭的艺术
10元	8元	8元	8元	8元	8元	8元	8元	8元	8元	8元	8元	8元	8元	8元	8元	8元	8元	8元	78元	88元	48元	49元

如需购买整套文从产品，欢迎致电读者服务中心：010-84050451/84050425，或登录官网商城：<http://shop.lifeweek.com.cn/>

# 人民币恐慌性贬值

主笔 / 谢九

10月份以来，人民币汇率开始新一轮的贬值，目前在岸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已经突破6.8的关口，创下6年来的新低。

人民币汇率连创新低，引发了市场对于人民币持续贬值的恐慌性情绪，很多普通民众也开始加入换购美元的队伍之中。

10月1日是人民币正式加入SDR的日子，在此之前，市场曾有传言，人民币成功入篮之后，中国政府可能会放任人民币贬值。虽然这种类似阴谋论的传言在逻辑上很难成立，但人民币走势在10月份却确如传言所说开始持续下跌，这更加深了市场对于人民币持续大幅贬值的恐惧。

人民币贬值主要受到两大因素的驱动，一是美元加息，二是中国经济基本面疲软，未来人民币是否会持续大幅度贬值，也应该主要从这两大因素分析。

如果细究这一轮人民币贬值不难发现，近期的人民币贬值，其实主要是针对美元贬值，对于欧元、英镑等其他主流货币，人民币其实还是呈现升值趋势，人民币并没有对其他货币全面贬值，而仅仅是对美元贬值，可见这一轮人民币贬值的主要驱动因素还是美元升值压力所致，中国经济的基本面相比较而言是次要因素。

美元的升值压力主要来自12月份美联储的加息预期，自从去年12月美联储首次加息以来，美联储对于第二次加息屡屡爽约。按照美联储年度计划，今年在11月和12月分别各有一次议息会议，11月份美国总统大选还没有尘埃落定，所以11月加息的概率不大，因此，12月份就成为美联储年内最后的加息机会。如果美联储12月份继续回避加息，美联储的市场信誉会受到较大损害，加之美联储对年底加息做出的各种明示和暗示，市场预期12月份加息已经是极大概率事件，因此美元开始迅速走强，美元指数已经逼近100关口，创下7个多月来的新高，对于其他全球主要货币均强势上涨。在美元的强势面前，人民币贬值其实还不算最多，英镑、欧元贬值幅度更大。

不过，美元的强势有可能被市场过度放大了，一

是因为美联储12月加息的概率虽高，但也并非没有悬念。过于强势的美元将会对美国的经济带来更多负面冲击，一个很可能出现的局面是：美联储还没有正式加息，对美国乃至全球经济的伤害就已经提前显现。比如因为美元加息可能会导致美国国债价格下跌，最近包括中国、日本和沙特等美国主要债主在内的央行，开始集体大规模抛售美国国债。如果抛售行动继续升级，可能会导致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这也就意味着美国融资成本提升。对于严重依靠债务扩张维持运转的美国经济而言，意味着数十年来的印钞权将遭遇严重挑战。另一方面，海外央行认购美国国债的积极性下降，美国将来发行债券的规模可能会出现下降。而未来美国经济依然需要高额债务的维持，同时，美国不得不提升国债利率以提升吸引力。但这会提升美国的财政压力，美国国债的利息支出在过去几年高速增长。目前国债在美国财政开支比重中已经超过10%，而这还是建立在过去美国国债利率持续走低的背景之下，一旦未来美国国债利率上升，利息支出可能会成为美国财政难以承受之重。

所以，面对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的压力，年底美联储加息也并非没有变数，即使美联储不得不履行年内加息的承诺，2017年的加息节奏也会大大放缓。如果保持一年加息一次的节奏，这将是美联储最近几十年来最弱的一轮加息周期。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美元的强势以及人民币贬值的压力，可能是被市场过于放大了。

除了美联储加息之外，对中国经济基本面的担忧构成了人民币贬值的另外一大压力。由于当前中国经济依然面临诸多压力，使得未来的中国经济仍有继续下行的风险，使得市场对于中国经济的未来依然信心不足。首当其冲的是房地产问题，从三季度经济数据来看，房地产投资反弹支撑了整体投资增速回暖，不过随着新一轮房地产调控展开，房地产投资萎缩可能会在明年开始显现，以PPP为代表的基建投资能否充分对冲房地产投资的下滑，将成为明年经济是否继续企稳的关键。

一向敏感的债券市场，近来出现了长期利率低于短期融资成本的倒挂现象，目前国内的10年期国债收益率跌至2.65%左右，创下2006年以来的最低，

而7天回购利率则上升到3.00%，出现这种利率倒挂现象一般预示着市场对于未来经济的信心不足。投资者预计未来经济仍然低迷，长期债券价格会出现上涨，因此借入短期资金来购买长期债券，导致的结果就是以7天回购为代表的短期融资成本上升，而长期债券收益率下降，极端情况下二者出现倒挂。

中国经济虽然依然面临增长压力，不过从最新公布的三季度经济数据来看，中国经济还是出现了一些难得的亮点，暂时呈现出企稳的态势。第三季度GDP同比增长6.7%，连续第三个季度维持在6.7%的水平上，止住了继续下滑的势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PMI指数、规模以上企业利润等关键指标也都保持了稳中趋暖的势头，尤其是9月份的PPI数据结束了54个月的负增长，同比上涨0.1%，环比上涨0.5%，成为近期中国经济数据中的最大亮点，这预示着长达4年多的工业领域通缩可能即将结束，将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企业投资的信心。

无论从美元升值，还是中国经济自身来看，人民币兑美元确实存在一定的贬值压力，不过在这两大压力之下，也还存在诸多对人民币构成支撑的力量，包括美联储加息的不确定性，中国经济的企稳，中国高息债券对海外资金的吸引力等等，这也就意味着，人民币贬值的恐慌性情绪在很大程度上被过度放大。

从去年8月份央行开启新一轮汇改至今，人民币

贬值幅度已经超过10%，2016年内贬值幅度也超过了4%，目前美元/人民币汇率突破6.8元，为6年来的新高。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出于保护出口贸易的目的，人民币曾经暂停升值的步伐，改为重新盯住美元的策略，一直到2010年6月才开始重启新一轮的升值。当时金融危机后人民币暂停升值，汇率大概就维持在6.83元左右，在这个水平线上停留了约一年半的时间，目前美元/人民币的汇率，再度回到这一水平线附近，预计短期之内大幅突破的可能性不会很大。

在人民币贬值的恐慌性情绪驱使下，很多人也做出了一些不太理想的投资选择。对于经常性使用美元的人群，储备美元防止贬值确有必要，但是对于大部分没有美元需求的人群，贸然兑换美元可能并不明智，比如因为担心人民币持续大幅度贬值，一些普通人将人民币兑换成美元，并持有美元现金，事实上，这样不仅不能起到规避贬值风险的作用，反而可能带来不必要的损失，因为人民币虽然对美元呈现贬值趋势，但是一年贬值5%已经算得上很大的贬值幅度，如果持有人民币做一些简单理财，基本上也可以获得4%左右的年化收益，如果兑换美元之后，美元理财收益很低，大概在2%左右，再考虑到汇率兑换手续费，其实并没有太大的收益空间，如果是兑换美元之后持有现金，规避的贬值风险可能还不如持有人民币理财产品所获收益。☑

## 大家都来听一点古典音乐



读者服务热线电话：  
(010) 84050425 84050451  
84681046 84681042 (传真)  
E-mail: dzfw@lifeweek.com.cn  
《爱乐》杂志网址：  
<http://www.lifeweek.com.cn/philharmonic>

### 《爱乐》2016年第十一期要目

#### 古典音乐欣赏入门系列 95

- 20世纪伟大的英国作曲家布里顿
- 宋然、詹湛、孙健、杨丹赫对布里顿的《青少年管弦乐指南》、《战争安魂曲》、《彼得·格莱姆斯》和弦乐四重奏的精彩解读

**纪念册** “西东合集”管弦乐团在阿尔罕布拉宫的首演

**逝者** 瑞典的夜莺：珍妮·林德(下)

**专访** 克伦佩勒访谈录：关乎人生的对话(下)

**话题** 指挥艺术历史中的继承关系梳理(二)

从雷丁修道院开启的英国音乐之旅

**爱乐笔记** 迟到的萨蒂

**现代音乐** 现代作曲家米尔顿·巴比特访谈录

**歌唱家档案** 女高音歌唱家玛格丽特·普莱斯访谈(上)

**唱片说明书** 富特文格勒指挥的《勃兰登堡协奏曲》(下)

**作品** 从柯达伊到舒尔霍夫

**专题** 与内维尔·马利纳大师的“一面之交”

**我的爱乐往事** 查令十字街4'33"

### 《爱乐》2017年订阅须知

2017年《爱乐》月刊，每期240页，全年12期，零售单价：20元，全年定价：240元。

2017年《爱乐》邮局发行，邮发代号：

82-24，读者可到各地邮局直接订阅，也可汇款至杂志社订阅。全年订阅8折优惠，订阅年价：192元。欢迎咨询、订阅与作为礼品馈赠他人。或在卓越网订购：[www.Amazon.cn](http://www.Amazon.cn)

**邮局汇款**：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9号B座

邮编：100125

收款人：爱乐

**银行汇款**：开户行：工行王府井金街支行

户名：三联生活周刊

账号：0200000719004641092

**网上支付**：[www.lifeweek.com.cn](http://www.lifeweek.com.cn)



# 国家公园

我们到底在建什么？

主笔 / 徐菁菁



黑龙江省小兴安岭伊春大平台风光

2016 年是世界上第一个国家公园体制——美国国家公园体制建立 100 周年。而在中国，一场建立国家公园的摸索才刚刚开始。它不仅仅关乎自然保护，而是一个国家对生态资源的全面审视，一场伤筋动骨的体制改革。

北京师范大学虎豹研究团队已经在中国东北的温带针阔混交林工作了 10 余年。在东北的茫茫林海中，他们架设了超过 3000 台红外相机，用于探明中国境内的珍稀濒危物种——野生东北虎和东北豹的种群及生存状况。而最近一年多时间里，他们 10 余年的调查和研究成果直接推动了一件引人注目的工作。这项工作足以吸引国际顶尖科学杂志《科学》(Science)



湖南城步县白云湖国家湿地公园

的记者跟随团队深入东北地区森林。“冯利民及其所在的北京师范大学研究团队同事们已经说服并正在协助中央政府建立一个面积约为1.5万平方公里的国家公园，保护这些大猫脱离灭绝的危险。”《科学》记者写道，“这个国家公园面积比美国黄石公园还要大60%。”《科学》的官网在主页显要位置刊登了报道：“一个新公园能够拯救中国的大猫吗？”

这个东北虎豹公园仅是中国国家公园建设中的一部分。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提出：“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建立国家公园体制。”2015年1月，国家发改委等十三部委发布的《建立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提出在北京、吉林、云南、青海等9个省份开展“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按照《试点方案》要求，这9个试点省份需要择地并编制一份为期3年的试点实施方案，报给国家发改委评审。

世界上第一个国家公园是1872年建立的美国黄石国家公园。1916年，美国建立国家公园管理局，标志着世界上第一个国家公园管理体制的形成。在过去一个世纪里，国家公园已经成为世界保护地领域最广为人知的名称。1948年，世界自然保护联

盟（IUCN）成立，这个拥有超过1200个政府和非政府机构成员的组织的核心工作之一，就是在国家公园发展方面提出具有权威性和建设性的建议。1994年，IUCN出版了《保护地管理类别指南》（*Guideline for Protected Area Management Categories*）一书，确立了新的保护地分类系统并建议世界各国依照实施。IUCN将国家公园（National Park）纳入保护地（Protected Area）6个类别之第二类，认为国家公园主要是以生态系统保护和游览为目的实施管理的保护区，对该类陆地或海洋自然区有以下要求：（1）为现在及将来一个或多个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保护；（2）禁止有损于保护区规定目标的资源开发或土地占用活动；（3）为精神、科学、教育、娱乐及旅游等活动提供一个环境和文化兼容的基地。

但事实上，用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北京代表处科学与政策创新中心王蕾博士的话说：“全球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完全按照IUCN的保护地体系来构建自己的国家公园体系的，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现实情况。国家公园，没有一个法定定义，也没有全球认证体系，中国完全可以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来。”

政府之外，“建立国家公园体制”的说法一经提

出首先挑动了自然保护界人士的神经。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保护生物学教授吕植同时也是非政府组织“山水自然保护中心”主任。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多年来一直在青海三江源地区从事生态保护工作。2014年，在政策尚不明朗的情况下，吕植在一篇论文中发问：“中国国家公园：挑战还是契机？”她提出，“建立国家公园制度”的提法可能导致三种情形：在现有的保护地体系中增加一个新的“国家公园”类型；将现有的“公园”类型保护地组合形成国家公园；利用建立国家公园体制的契机和中央政府对生态保护的重视，从根本上理顺我国自然保护地的管理、立法和分类体系。在三种情形中只有第三种能够真正提高整个保护地体系的有效性，而它必须理顺管理机构，建立健全法律体系。“过去两年多的发展证明，中国现在是在往第三条道路上走的。”王蕾说。

非政府组织和自然保护研究团队都成为这条道路上的推动者。“从‘山水’来说，可期待的是随着政策空间的放开，若干的科学研究和保护实践可以得到更好的推动和推广。”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的赵翔告诉我，三江源国家公园试点成立后，他们和试点境内的杂多县人民政府的合作又多了一条：基于基础研究和社区保护实践，形成政策建议和报告，提交给政府。2016年，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和杂多县人民政府合作，参与建立了“澜沧江野生动物补偿基金”，“希望未来在国家公园区域内推动”。

在中国东北，东北虎豹保护的前景让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教授、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物种生存委员会猫科动物专家组成员冯利民感到兴奋。2015年1月，在经过了10余年默默无闻的科学观测后，北师大研究团队把在吉林全省监测到东北虎27只、东北豹42只，以及有关中国野生东北虎豹生存挑战和机遇的研究成果拿到了吉林省委书记巴音朝鲁的办公桌上。

“东北虎主要分布于俄罗斯锡霍特山脉至中俄交界的区域，现在大概有540只野生东北虎。东北豹世界上仅有一个种群，生活在吉林东部中俄交界区域。”冯利民说，“我们的研究发现由于放牧及强烈的人为干扰，东北虎豹在我国境内的个体活动主要局限于中俄边境约5公里的狭窄区域。它们活动频繁的珲春保护区面积仅为1087平方公里，加上与之接壤的俄罗斯豹地国家公园，共约4000平方公里区域。2012～2014年，这个区域的虎豹数量快速增长，已经超出资源承载力的3倍，正面临资源耗竭和种群崩

溃的威胁。”但是东北虎豹种群向中国的进一步有效扩散在既有条件下难以实现。研究团队的结果显示，在珲春保护区西侧，S201省道向北通往黑龙江东宁，两侧的村庄、农家乐、工厂，形成一道人工的阻隔。

“找到巴音朝鲁书记时，由于虎豹保护承载的使命和特殊的需求，我们希望通过探索生态保护体制和运行机制的改革，为虎豹建立一个特别的保护区。”冯利民说，“随后，我们又向中央政府提出‘关于实施中国野生东北虎和东北豹恢复和保护重大生态工程’的建议。”在这个建议中，第一期建立6000～8000平方公里的虎豹生态保护示范区，将吉林省珲春、汪清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及周边区域连成一个整体，使得目前中俄边境区域的东北虎、豹种群获得稳定安全的生存空间。第二期将周边的天然林保护工程实施区纳入建设范围，形成2万余平方公里的保护区，形成世界上最主要的虎豹保护区和避难所之一，为未来中国长白山和小兴安岭全面恢复虎豹种群奠定坚实的基础。这个建议得到党中央的高度重视，虎豹保护进程快速推进。“2015年1月我们提出了虎豹保护战略，3月‘两会’上得到中央领导人的重视，6月份习总书记做出重要批示，2016年3月东北虎豹保护被明确列入国家‘十三五’的建设内容，2016年4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召开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启动部署会。从我们向中央提出建议，到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计划启动，前后不到一年时间。”“我们建议中第一、二期保护工程，计划需要5～10年的时间，如今，我们协助规划了1.5万平方公里的国家公园，等于是一步完成了。”如今，S201省道沿线的小村庄已经开始启动移民工程，未来这条道路两侧的人为干扰将被消除。同时，围绕建立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体制和机制改革也正在全面试点和展开。

但人们还不敢百分百地乐观。“因为尚未有具体的方案出台，总体格局上仍然是观望。”赵翔说。

国家公园到底会给中国带来何种变化？《建立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颁布近两年来，9个国家试点的建设究竟如何？为此，我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苏杨进行了专访。

**三联生活周刊：**国家公园是世界保护地领域最为人熟知的概念，但各国国家公园的内涵外延都不尽相同。就中国而言，我国九类已经形成管理体系的保护地类型（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风景名胜区、地质公园等）都有挂“国家牌”的，甚至有的



(张小平摄)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苏杨

地方干脆早已直接命名国家公园。那么现在，当我们说国家公园的时候，我们是在指什么？

**苏杨：**虽然我们已经有多种保护地挂上了“国家”的牌子，但是中国的国家公园目前还处于事实空缺状态。以往的“国家”牌并不是由中央政府认证的，国家部委可以挂牌，如环保部和国家旅游局挂牌的汤旺河国家公园；地方政府也可以挂牌，如云南的各个国家公园；企业也可以挂牌，如青海的昆仑国家公园。

像美国等采用国家公园体制对遗产地进行的管理有两个明显的特点：第一，国家保护。国家公园一定要明确资源属性为国家所有，由较高级别政府承担主要管理和保护事权，将这些资源保护好；第二，全民公益，即公益性是国家公园体制的核心，进入国家公园一定要成为政府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

2015年1月，国家发改委等13个部委联合发布的《建立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中对未来建立的国家公园的目标表述得很清楚：通过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实现中国保护地体系的“保护为主”和“全民公益性优先”。以这两条原则来衡量，中国既没有建立国家公园体制，也还没有国家公园。我的一己之见，对目前情况的准确描述，应该是还处于中央统筹安排的国家公园体制试点过程中。除此以外的国家公园，显然都是“伪”国家公园，或者是自己挂了个国家公园牌

子的旅游景区。

**三联生活周刊：**对于普通的中国人来说，国家公园和现在我们光顾的旅游景区相比，能够实实在在带来什么变化和好处？

**苏杨：**从游客角度，建成后的国家公园应该有4个方面的变化。第一个是价格相对较低的门票。第二，对于游客来说相当重要的是，国家公园内将会有专业的、以科学和历史为两条主线的环境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第三，公众的参与。一方面，国家公园将招募大量志愿者。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公众参与的体现，是公众监督。第四点，国家公园的餐饮、住宿等存在消费弹性且非基本公共服务，都由以项目为单位的特许经营商来提供，绝对不是公园管理局自己经营。有了这四点，你在国家公园的体验会跟在普通商业景区非常不同。

**三联生活周刊：**《试点方案》中提出，建立国家公园体制要实现中国保护地体系的“保护为主”，是否说明我们现在的保护地体系存在重大问题？

**苏杨：**与我们资源价值比起来，我们做得不够好。中国的生态环境不如欧美，这么说需要把生态和城市人居环境区别开来。只讲生态的话，云南一个省的高等植物种类比整个北美或欧洲多得多。举个例，作为生态系统旗舰物种的猫科豹亚科动物，整个欧美都没有一只野生个体了，但中国还有虎、豹、雪豹、云豹四种。中国人常觉得瑞士环境好，但瑞士基本没有原生态和珍稀物种了，就连狼这样的常见食肉动物也屈指可数——世界自然基金会专门成立的瑞士狼项目团队的首席科学家在野外两年都没有见过其研究对象。而我们去三江源国家公园试点考察，一下午能够见到几百只野生动物。在玛多县的一座山上，我们不仅看到岩羊，还能看到狼在捕食。精彩的野生动物景观并不是只有在非洲才能看到。

前些年我们对生态破坏得比较多，但这10多年，各种严谨的评估都显示，我国面上的生态在恢复。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保护就完美了。这是因为，除了面上的生态，对重要的保护地的管理，总体来看，多数遗产地存在着没有保护好、没有服务好、没有经营好等问题。中央启动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目的之一，就是通过具有龙头作用的国家公园体制建设带动整个保护地体系的统一、规范、高效化。

**三联生活周刊：**是否能这样理解：我们建设国家公园体制是为了重塑我们的保护地体系？

**苏杨：**这是个重要的目的，但必须强调的是，我

们说“保护为主”，绝不是将国家公园体制的功能仅限于生态保护，不能把国家公园简单看作自然保护区的升级版本。很多业内人士都没有意识到的，“保护为主”的后面还有“全民公益性优先”，而全民公益包括了很多内容：爱国教育和环境教育、带动社区发展等。

美国国家公园有两个维度，一个是历史文化维度，这使它成为一个爱国主义的教育基地。另一个是科学的维度，美国国家公园是为科普和科研服务的一个基地。此外，美国的国家公园也注重对周边社区产生的经济效益。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每年都会发布一本测算其经济效益的报告。在2013年的报告中，详细说明了国家公园参观者在周边社区总共近146亿美元消费支出的具体构成，以及如何产生了14.3万个就业岗位。美国今年国家公园的预算大幅度增加到约30亿美元，这是国会批准的。你要把它狭义理解为加强保护的话，是把它的重要价值低估了。

而中国的国家公园体制，还承担了一个重任——生态文明体制的先行先试区。自中央《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提出生态文明八项基础制度以来，这些制度如何落地、绿水青山如何转化为金山银山，始终是执政者的难题。在国家公园这样的资源价值高、发展压力小、社会支持强的区域，显然更利于把八项制度配套建设起来。目前的国家公园试点区，多数在八项生态文明制度配套落地上初见端倪。比如中央确定的钱江源国家公园试点区所在地浙江省开化县，就是全国第一批取消对领导干部GDP考核的地方。武夷山国家公园试点区，则是统一、规范的生态文明试验区福建实施方案中的重点，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先行区。

**三联生活周刊：**你特别强调，我们目前建立的是“国家公园体制”，而非仅仅是“国家公园”，怎么理解“体制”二字？

**苏杨：**挂牌子是很简单的，但任何社会公益事业要达到目标，必须以体制为基础，否则目标不可能实现的。像我们三江源国家公园试点区，国家直接行使所有权，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未来属于中央，它是作为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的。这样的话，地方编制可以突破，资金主要由中央财政给。这就保证了它能吸纳一批人才进去，它的重要功能才能够得到实现，所以我们特别强调体制的意义。

**三联生活周刊：**《建立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由国家发改委牵头，这是出于什么考虑？

**苏杨：**与国家公园建设关系最密切的有三个部门：林业、住建、环保。我个人认为林业系统条件最好。林业系统的保护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等则占了保护地面积的近九成，且有林权、有机构、有森林公安的队伍，所以它管理力量是最强的，客观地说，林业系统的自然保护区也是管得最好的。环保部是自然保护区的综合管理部门。住建部则管理着风景名胜区。但是，如果由这些部门来牵头设计国家公园体制会存在一个问题：全民公益的体制是很难由部门建立起来——可能出现国家利益部门化。

因此我们在进行体制设计时必须让一个专攻体制设计的超脱的部门去做。国家发改委是综合性的体制改革部门，未来也不可能去具体管理国家公园事务，所以体制建设阶段由它来牵头做，如果要让别的部门牵头做，那就可能变成一个部门利益的划分了。

**三联生活周刊：**你提到过后来出台的方案与大家，特别是保护领域的人员和机构的期望有区别。首先一个建立的是体制试点区而非国家公园，我们怎么理解体制试点？

**苏杨：**允许你用不同的模式去尝试，保护需求的差别要体现到管理体制的差别上。例如，对人地关系的处理，保护需求就决定了不同的国家公园，其土地权属制度安排必须因地制宜。像三江源这样的地方，它的人地关系不仅是相对宽松的，而且维持原住民适当的生产生活是有利于自然保护的。原住民的游牧状态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物质上的循环。如果你要把草场用围栏围起来，或者把人都赶走，这个地方的生态质量反而会下降。世界上类似的还有很多例子，比如朱鹮习惯依赖人工稻作生存，如果禁止了传统农耕生产，反而可能灭绝。这就是日本朱鹮灭绝的重要原因之一。这就意味着我们在体制的设计上不能采取封闭管理。而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试点区，则是另一种人地关系：需要尽量把人员清除出去，把地还给老虎，否则人和兽会直接产生很严重的冲突。三江源和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土地权属相关制度设计，自然有别——这都要求必须搞试点，一刀切肯定是不行的。

**三联生活周刊：**最后确定的9个试点区是如何选择的？

**苏杨：**从合理性而言，国家要考虑生态系统的类型多元化，要考虑东中西部布局，也考虑了兼顾文化遗产保护需要，所以也确定了一个以文化遗产为主体的试点区——北京八达岭。从可行性而言，也需要地方有主动性，地方没有积极性是建不成国家公园的。■





## 美国国家公园 最好的构想

主笔 / 徐菁菁

华盛顿史密森尼美国艺术博物馆（Smithsonian American Art Museum）二层北大厅陈列着一幅宽约 2.1 米、长约 3.6 米的巨幅油画：金色的壮观山谷铺陈开去，远方，山谷尽头，直泻而下的瀑布笼罩在滚滚升腾的白色水雾中。1872 年，美国哈德逊河派画家托马斯·莫兰根据自己的探访经历画下了这幅《黄石大峡谷》。国会付给莫兰 1 万美元，买下画作将之悬挂在参议员画廊展示。那是美国政府第一次出资购买一位美国艺术家的美国风景画作。正是在这一年的 3 月 1 日，总统尤里西斯·格兰特签署了《关于划拨黄石河上游附近土地为公众公园专用地的法案》，宣告了世界第一个国家公园——黄石公园的诞生。

荒野何以被冠以国家公园之桂冠？黄石的诞生存在许多传说。其中最为著名的一个来自沃什伯恩探险队。1870 年，蒙大拿准州国土局总测绘师亨利·沃什伯恩带领一支 19 人组成的探险队奔赴黄石河上游（Upper Yellowstone）地区，对那里独特的间歇泉、热泉、瀑布等地理景观进行考察。根据该考察队成员兰福德的回忆，1870 年 9 月 19 日晚，考察队在位于

美国黄石国家公园景观（左、右图）



左图：美国哈德逊河画派画家托马斯·莫兰作品《黄石大峡谷》

右图：美国加州约塞米蒂国家公园景观

吉本河(Gibbon)与火洞河(Firehole)交汇处露营时，他们围绕如何利用所发现的土地进行了一次“不同寻常的讨论”。“有人提议，利用我们的探险成果，可设法占据最有前途的一块景区。如果谁能抢先占有黄石下游瀑布对面三块区域的土地，并设法占有沿峡谷延伸的河流地带，这块地皮最终会成为土地所有者的摇钱树。”然而，毕业于耶鲁大学的年轻律师科尼利厄斯·赫奇斯提出，这块区域的任何一块土地都不应该为私人所有，应将整块地盘划出来设为一座伟大的国家公园。这个别具一格的想法令大家茅塞顿开。

篝火传说的真实性一直受到历史学家的质疑。事实上，这个标榜“公共性”的理想主义故事的背后存在着套商业逻辑。当时，北太平洋铁路公司正在修筑连通五大湖区与太平洋普吉特海湾(Puget Sound)的铁路。该公司非常希望通过宣传和推广铁路沿线的土地，加快公司所属土地的销售，也希望黄石地区能够成为热门旅游目的地，带来可观收益。而沃什伯恩探险队的经费正是源于北太平洋铁路公司。探险归来，沃什伯恩还获得公司资助开展巡回演讲以宣传黄石奇观。

但逐利并不是成就黄石的根本性因素。1870年左右，黄石探险成为一股热潮。1871年，国会还拨专款

4万美元支持了宾夕法尼亚大学杰出的地质学者海登(Ferdinand V. Hayden)的科学探险。在探险报告里，海登不但对其所见进行了科学性的描述，还附之以美学和情感体验：“湖躺在我们面前，静静的如一张大薄片，闪现着极精细的深蓝色调，这是我所凝视的最美丽风景之一……如此景色值得一生回味。”1865年，南北战争刚刚结束，新的统一的美国正在重塑之中。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将先前偏僻的土地带入到美国人的心理意识层面。

一种力量更强大的情感转变孕育已久。新大陆的发现和美国的建立本身就是一个开拓荒野的过程。最初，对拓荒者而言，荒野对生存构成难以克服的威胁，是一片蛮荒与道德真空。开化新大陆意味着用光明代替黑暗，秩序代替混乱，邪恶变为良善。拓荒时代的无数日记、讲演以及回忆录都将荒野表现为一个必须由一个“拓荒者大军”去“征服”、去“镇压”、去“击败”的“敌人”。

黄石的第一次发现是在19世纪初。1803年，美国完成了路易斯安那的购买。为了勘察土地的基本情况，总统杰斐逊派遣刘易斯上尉和克拉克中尉于1804到1806年对密西西比河流域、哥伦比亚河流域进行了考察。在探险队返回途中，一位名叫约翰·科尔特



(John Colter)的队员选择留下来继续行程。他在1807年冬天到达了黄石河源头，发现了现今塔尔瀑布(Tower Fall)附近的地热区。科尔特向他的朋友描述自己看到的奇观：“大地像是烧开了的锅，到处冒着浓烟和气泡，有浓重的硫黄气味。”他的所见与沃什伯恩和海登并无不同。然而，当时的人们把他描述的景象戏称为“科尔特的地狱”。以至于黄石获得了一些并不美好的地名：地狱咆哮河、地狱清汤河、恶魔之釜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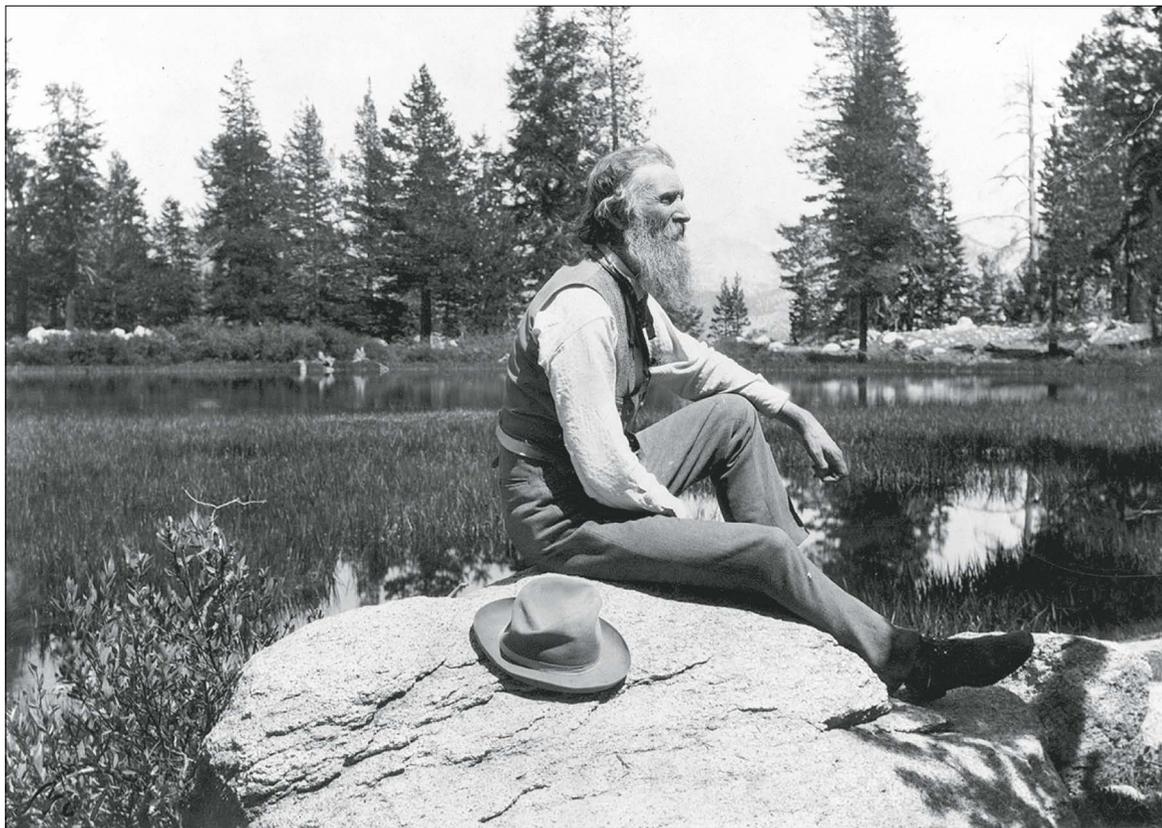
而在同一时间，在欧洲，人们已经对荒野有了新的认识。壮美作为新的美学类别被广泛应用。自然美不再被局限于祥和、富饶和井然有序。1763年，伊曼纽尔·康德在《论优美感和崇高感》中提出，自然界中的野性形象，如山脉、沙漠、风暴，也有可能审美层面上惬意人意。自然神论者则赋予荒野一种特殊

的意义，他们认为，作为纯粹的自然，荒野是上帝借以展示其力量和卓越的最畅通的媒介。换句话说，到18世纪中叶，荒野已经与美丽和神圣联系在一起了。

这股潮流也逐渐影响到了新大陆。19世纪初，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这种情况：无论是谋生还是大范围的旅行，人们都有可能不必与荒野发生接触。在东部城市，作家、艺术家、科学家、度假者和绅士阶层中出现了以非拓荒者视角看待荒野的潮流。这种新的审美很快和国家的现实需求勾连在了一起。自独立以来，美国人一直在寻求某种独一无二的“美国的”东西。这种东西要有足够的价值将这些新大陆的居民变为骄傲自信的公民。然而，美国短暂的历史、单薄的传统，以及微不足道的文学和艺术成就似乎都不足以与那些骄傲的欧洲国家相抗衡。但有一种东西是欧洲所不具备的。1833年，作家查尔斯·芬诺·霍夫曼

左图：自然学家和自然保护主义领军人物约翰·缪尔

右图：1958年6月1日，到黄石国家公园游览的青少年看到了棕熊



(Charles Fenno Hoffman) 在西部旅行中写道：“与深邃的森林相比，罗马强盗建立的庙宇算什么，封建压迫本身得以在其中滋长起来的城堡算什么，前者乃血迹斑斑的组织，而后者的专制迷信又算什么！森林，在那里，只有上帝的目光洞察无余……与幽暗树林中统治一切的亘古寂静相比……那些依然在教堂过道中嗡嗡作响的伪饰虚荣的赞歌又算什么！”

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美国的国家公园构想初现雏形。1864年美国总统一林肯签署了一项法令，将加州的约塞米蒂(Yosemite)河谷作为加州政府管理的“州公园”加以保护，“作为公共游乐和消遣之用，永远不得转让”，这是美国国会第一次讨论“公园议题”。1851和1852年，约塞米蒂溪谷与内华达山脉的巨树红杉的发现在美国产生了极大的反响。《共和国》报评价说，“走遍整个阿尔卑斯山也不能看到堪比约塞米蒂的庄严美丽”。而“与代表欧洲文明繁荣的遗址不同”，那些自基督教诞生以来一直是存在着的巨树红杉是“活着的文明”。

与约塞米蒂相比，黄石的出现更恰逢其时。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在《美国史中开拓疆域的意义》中指出，从获得“美国特性”的背景来看，19世纪70年代是边疆不断开拓的年代，是不断地获得“美国特性”的时期。1865年南北战争终结，1869年大陆横断铁路竣工，此刻的美国继续寻找到一些标志物，使其在精神层面得以统一。

1870年，就在沃什伯恩探险队返回海伦纳后不久。一场圈地运动就在黄石展开了。迪尔洛奇市的两名印刷工人进入到了火洞河盆地，在那里留下诸多标记，计划圈占其中包括间歇泉景观的土地。1871年，一位名叫马修·麦克盖克的探险家从北部进入到黄石地区的加德纳(Gardner)河，并在那里设立界标，表明自己对该地的所有权。很快，麦克盖克便在河边建起一些简易的洗浴室和小屋，利用含有矿物质的河水为病人疗养，并于1871年8月根据《宅地法》提出了土地申领要求。同年夏天，还有人在黄石河与拉马河





约塞米蒂国家公园的地标景观“穹顶”

(Lamar) 交汇处建造了一座小桥，在那里征收过桥费；也有人向政府提出申请，要求获得猛犸热泉 (Mammoth Hot Spring) 附近的土地。这样的状况让那些希望让黄石承载国家认同和国家精神的人们担忧不已。一场将黄石河源头保留为联邦政府公园的行动很快在华盛顿展开了。

1903年，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 (Theodore Roosevelt) 来到了约塞米蒂。他请求 65 岁的自然学家和自然保护主义领军人物约翰·缪尔 (John Muir) 与他同行。罗斯福在晚宴上和缪尔悄悄从后门离去，两人纵马进入森林深处，在一株历经千年岁月的大红杉下扎营。第二天，两人继续在山谷里游荡。那天夜里，锡耶纳山里飘起了雪花，当曙光再次照亮峡谷的时候，两人醒来，发现睡袋已经被几寸的积雪覆盖。

“那是我这辈子最美好的一天。”罗斯福总统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缪尔告诉总统，如果美国希望保护约塞米蒂，就必须将由加利福尼亚州政府代管的峡谷归入联邦层次的国家公园。罗斯福总统终其一生成为

美国自然保护史上最强大的支持者，在他的引领下，一系列全新的国家公园被建立，约塞米蒂峡谷也终于回到联邦政府的管理之中。

但从今天的眼光看，黄石和这一系列国家公园的建立并不被认为是国家公园体系的开端。联邦授权的几座国家公园各自为政，并没有统一的管理方法和条例。国会慷慨地给黄石划拨土地，但随后划拨的资金却姗姗来迟。尽管是一个国家级机构，国会却要把它委托给地方委员会管理。游客在黄石公园的地热喷泉口涂鸦刻字纪念自己到此一游，约塞米蒂的千年巨树被挖出可以开车穿过的隧道来吸引游客，公园附近的农牧民将自己的牲口赶进国家公园的草甸放养，偷猎者把枪口瞄准了公园中那些本该受到保护的野生动物。

今天，美国所有的国家公园访客中心都立有一块纪念铜牌，它们是为一个人而设置的。1914年夏天，企业家和慈善家斯蒂芬·马瑟游览了约塞米蒂国家公园和红杉国家公园之后，被公园的状况震惊。从此，

马瑟致力于通过组织各种公众运动呼吁建立公园独立管理机构。1916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国家公园组织构成法》，于8月25日在联邦内政部建立了国家公园管理局。斯蒂芬·马瑟成为新机构的第一任局长。这一改革是真正具有启发意义的国家公园体系的开端，标志美国以国家公园为核心的行政管理体制形成。

今天，直属于联邦政府内政部的国家公园管理局负责对国家公园体系内409处国家公园的管理，形成以“国家公园管理局——地方办公室——基层管理机构”为主线的相对独立的垂直管理体系，地方政府无权干涉。国家公园规划设计由国家公园管理局下设的丹佛设计中心独家垄断，全权统一负责规划的组织实施。为保证国家公园的公共性原则，其运转经费主要来自联邦政府，财政拨款占到国家公园开支的70%。1965年，美国国会通过《特许经营权法》，允许私营机构采用竞标方式缴纳一定数目的特许经营费，获得在园区内开发餐饮、住宿、纪念品商店等旅游配套服务的权利。企业和个人的捐款也是国家公园的资金来源之一。国会特许的国家公园基金会为私募基金筹款人。

制度的建设伴随着国家公园发展的另一条主线：从“为何保护”“为谁保护”到“如何保护”的演化。

黄石国家公园的建立是以保护景观而非自然生态为出发点的。1917年，艾诺斯·米尔斯(Enos Mills)受国家公园管理局局长马瑟的聘请，撰写了《你们的国家公园》一书。书中如“风景工业”“风景是最有价值的资源之一”“大部分‘未开发’”等功利主义的用语随处可见。1919年，亚德(Robert Sterling Yard)的《国家公园的书》(*The Book of the National Parks*)同样强调，国家公园要满足人民的娱乐。

1914年，黄石国家公园内由私人出资修建了面积达465平方米的游泳池，1933年由查尔斯·A.汉密尔顿收购并改建，直到1950年才拆除。1932年，喷泉丘区域附近又建立了一个纪念馆、一个圆形剧场、一个海恩斯摄影馆，两个加油站，两个储存室和一个大操场。汽车营地和客栈区域甚至设立了“喂养熊”娱乐项目。1920年年度报告里，在公园里喂养熊“对大部分游客而言已经成为最有趣的公园特征之一”。30年代后期，公园还出现了专门看台以供游客观看灰熊表演。

国家公园管理局直到1929年才开始成立自然科学项目，而且使用的完全是公园管理局的富翁生物学

家乔治·赖特的私人基金。虽然公园管理局很快也开始为赖特的项目提供资金，但是，在1936年赖特因车祸不幸去世后，原本正在扩大的以赖特为首的生物专业人员的影响力骤然减少。

“二战”后，随着美国由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过渡，美国人的环保思想开始从保护主义(Conservation)向环境主义(Environmentalism)转型。50年代中期，经济增长和效率依然是这个国家的主导理念。50年代中期以后，污染和有害化学物质以及人口增长等备受关注。60年代，生态学进入人们视野，主流环保思想更加以生态为中心。决策层面，《荒原法》(*Wilderness Act*)、《濒危物种法》(*Endangered Species Act*)，以及《国家环境政策法》(*National Environmental Policy Act*)相继出台。1963年，美国国家科学院在它的报告中对国家公园管理局提出尖锐批评，并呼吁管理人员通过强化科学研究来确保维护公园的生态系统。报告将公园称作是一个“由相互关联的植物、动物及其栖息环境组成的系统”，并敦促将这一系统视为“生物银行”。同在1963年，由当时的著名生物学家、加州大学教授利奥波德(A. Starker Leopold)担任主席的一个特别顾问委员会，公布了自1916年通过立法建立国家公园管理局以后最具有影响力的一份报告文件。报告强调了加强生态管理的必要性，主张让每个大型自然野生公园成为美国原生态的缩影。它提出，每一公园内原有的生物群都应维持不变，必要时，尽可能将一切还原到白种人首次涉足时的状态。

“利奥波德报告”的影响力源自它针对复杂的生态问题的一系列有说服力的阐述，也源自它对美国原生态的憧憬重新激起了美国人的浪漫爱国情怀。这种憧憬从几乎最深刻的层次揭示出公园存在的文化意义——始终作为公园民意基础的浪漫爱国主义，以及与拓荒时代息息相关的群山莽原对这个国家的起源与命运的强大象征性。

从此，生态的还原和保护成为未来国家公园的管理和规划的重要内容。

20世纪上半叶，人们就逐渐意识到黄石国家公园不能被当作一个封闭的系统进行管理：一些大型动物如灰熊会突破黄石国家公园边界，到相邻的大提顿以及周围的森林中活动；公园周边的森林地带允许一系列的人类活动会影响黄石国家公园的生态系统稳定性。1950年，黄石公园南部仅16公里之遥的大提顿国家森林被建设为大提顿国家公园，以更好地保障灰

熊、麋鹿等大型野生动物的迁徙环境。1960年以后，为了进一步加强周边保护地的协调，生态学家以及国家公园管理局和国家森林管理部门共同努力建立大黄石生态系统（Greater Yellowstone Ecosystem，简称“GYE”），并成立了大黄石协调委员会（Greater Yellowstone Coordination Committee，简称“GYCC”），以此来控制管理统一的区域性生态系统。现在的大黄石生态系统由2个国家公园、6个国家森林、3个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3个印第安原住民保护区以及州立土地、城镇和私人土地组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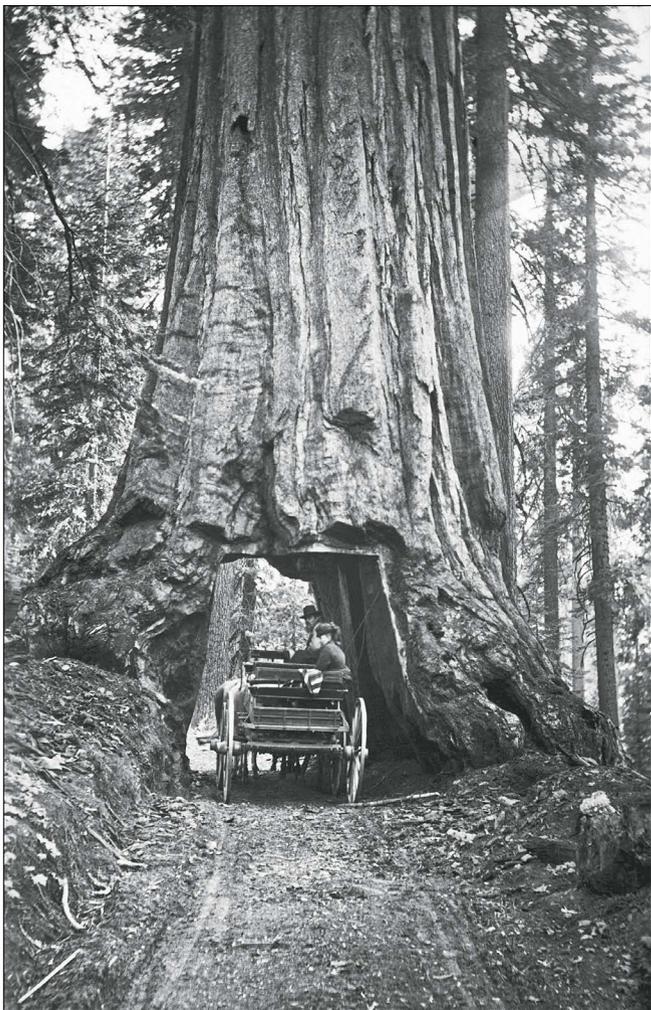
今天的大黄石拥有忠实的狼群研究团体，“狼迷”拿着对讲机互相交流，而且车上挂着和狼有关的各州车牌。但是事实上，由于黄石地处美国落基山脉北部

怀俄明、蒙大拿和爱达荷三州交界，当地发达的畜牧业促成了彻底的灭狼运动。黄石的最后一匹狼正是死于国家公园员工的枪口下。

作为处于食物链顶端的掠食猛兽，狼在野生环境生态平衡中扮演着终结者和清道夫的重要角色。通过数十年来对黄石国家公园的美洲野牛（Bison）、角鹿（Elk）、骡鹿（Mule Deer）和驯鹿（Moose）等大型草食动物种群的追踪观察，科学家发现部分种群出现体质下降的现象，并且种群有过度膨胀的趋势，危及当地的森林资源以及生态平衡。尽管公园内也有棕熊、黑熊、美洲狮等大型动物，然而美洲狮数量极其稀少，其捕食量不足以影响大型食草动物的种群数量。而熊的食物以植物根茎、浆果为主，很少主动捕杀大型食草动物。基于恢复已经开始倾斜的生态平衡的考虑，美国国家渔业和野生动物局于1987年向国会提出恢复黄石国家公园大灰狼种群的提案，并于1991年获得国会拨款，在国家公园局和国家森林局的咨询指导下对放狼归山的后果进行研究。经过几年的研究和听取创纪录数量的公众意见之后，放狼归山计划得到内政部最终签署首肯，并于1994年启动实施。1995年秋到1997年，31只从加拿大捕获的大灰狼以及10只来自蒙大拿冰川国家公园的幼狼戴着无线电跟踪脖圈，放归黄石国家公园野外。

伴随科学研究的发展，人类在国家公园的角色也越来越清晰。上世纪50年代初，斯塔克·利奥波德（Starker Leopold）告诉他的学生，应当在科学管理基础之上使黄石国家公园稳定持续发展，国家公园管理局应当允许野火燃烧。当时，他的学生觉得这是天方夜谭。35年之后，1988年夏天，国家公园管理局第一次不再插手阻止黄石国家公园的野火。黄石国家公园的商业经营者抱怨，着火将影响该公园的旅游业。但事实表明，1988年夏季大火之后，1989年游客数量显著增多。烧焦的松树皮为麋鹿提供大量营养，同时有助于山杨种子扩散。

作家和历史学家华莱士·斯特格纳（Wallace Stegner）说：“国家公园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好的构想。”19世纪末，国家公园的理念从美国传播到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移民定居国家。20世纪前半期，瑞典、意大利、罗马尼亚、希腊、西班牙、冰岛、爱尔兰和瑞士都设立了国家公园。英国、法国、比利时等国家不同程度地在它们亚洲和非洲的殖民地设立国家公园。今天全世界以国家公园命名的保护地已有将近4000个。☑



约塞米蒂国家公园内直径8.3米的巨杉。树底部挖出的隧道吸引着游客（摄于1900年）



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中心的两只熊猫玩耍的萌宠

## 9 个国家公园试点

### 北京八达岭国家公园

北京八达岭国家公园包括今天的八达岭国家森林公园。八达岭国家森林公园地处北京市延庆区，在万里长城的八达岭和居庸关之间，总面积约 30 平方公里，最高峰海拔 1238 米，分布植物 539 种、动物 158 种、林木绿化率达到 96%，为中国首家通过 FSC 国际认证的生态公益林区。八达岭国家森林公园有红叶树（黄栌）5 万多株，华北地区面积最大（约 0.47 平方公里）的天然暴马丁香林，及杏花、梨花等高价值独特景观资源。

### 中国东北虎豹国家公园

中国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范围涉及吉林省和黑龙江省，核心区域面积为 9960 平方公里，森林资源蓄积

约 1.4 亿立方米。区域内野生动植物资源丰富，现有陆生野生动物 367 种，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野生动物 60 种，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12 种。现有野生植物约 3890 种，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第一批）》的野生植物有 11 种，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2 种。

### 湖北神农架国家公园

神农架国家公园试点区整合了神农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神农架国家地质公园、神农架大九湖国家湿地公园、神农架国家森林公园四大保护地的资源，总面积达 1170 平方公里。全区森林覆盖率达 90% 以上，自然保护区内森林覆盖率达 96%，是湖北境内长江与汉水的分水岭、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重要的水源涵养



福建武夷山风光

地。其生态资源的完整性、独特性和唯一性独树一帜，几乎囊括了北至漠河、南至西双版纳、东至日本中部、西至喜马拉雅的所有动植物物种。

### 钱江源国家公园

钱江源国家公园试点区位于浙江省开化县西北部，面积约 252 平方公里，包括古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钱江源国家级森林公园、钱江源省级风景名胜区分区等三个保护地，及连接以上自然保护地之间的生态区域。开化是钱塘江的发源地，森林覆盖率高达 80%

以上，拥有大片的原始次生林，是全国 9 个生态良好地区之一；空气质量常年为优，钱江源国家森林公园、古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全球负氧离子浓度最高的 5 个地区之一，被誉为“华东绿肺”。

### 湖南南山国家公园

南山国家公园位于湖南邵阳城步苗族自治县，它整合了南山国家风景名胜区、金童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两江峡谷国家森林公园、白云湖国家湿地公园，白毛坪乡、汀坪乡部分具有保护价值的区域，规划总



(视觉中国供图)

保护区，总面积达 12.31 万平方公里。三江源地处地球“第三极”——青藏高原腹地，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是我国和亚洲的重要淡水供给地，有着“高寒生物种质资源库”之称，是野牦牛、藏羚羊、雪豹等多种珍稀野生动物世代生息的家园，也是亚洲最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和全球最敏感的气候启动区之一。

### 武夷山国家公园

武夷山国家公园试点区包括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武夷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和九曲溪上游保护地带，总面积约 983 平方公里。武夷山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关键地区，分布着世界同纬度带现存最完整、最典型、面积最大的中亚热带原生性森林生态系统。其动植物资源极为丰富，拥有 2527 种植物，近 5000 种野生动物，是地球同纬度地区保护最好、物种最丰富的生态系统。同时，该地区人文历史悠久，被列入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名录。

### 云南普达措国家公园

普达措国家公园位于滇西北“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中心地带，由重要湿地碧塔海自然保护区和“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哈巴片区之属都湖景区两部分构成，总面积约 1313 平方公里，海拔在 3500 米至 4159 米之间。普达措拥有湖泊湿地、森林草甸、河谷溪流。植被以长苞冷杉为主，根据不同的海拔及阴阳坡分布着杜鹃、箭竹、苔藓、忍冬、云杉、高山松等。草甸主要为高草草甸，水生植被主要为香满群落、光叶子菜群落等。栖息的动物包括国家一级一类保护动物黑颈鹤。云南省试点方案目前还在重新上报待批过程中。

面积为 619.14 平方公里，占城步县面积的 24.02%。试点区内野生植物资源丰富，拥有罕见的山顶湿地和高海拔牧场，是原生性顶级群落。区内野生动物达 1158 种，是东亚的候鸟迁徙通道，包括中日保护候鸟 39 种、中澳保护候鸟 8 种等。

### 青海三江源国家公园

三江源国家公园范围包括青海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及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扎陵湖、鄂陵湖、星星海、索加一曲麻河、果宗木查和昂赛地 5 个

### 大熊猫国家公园

大熊猫国家公园横跨四川、陕西、甘肃三省，面积达 2.02 万平方公里。其中，四川园区涉及成都、绵阳、阿坝、雅安等 7 个市（州）、19 个县，全省 70% 以上的大熊猫栖息地和 80% 以上的野生大熊猫种群，即超过 1.4 万平方公里的栖息地和 1100 只野生大熊猫被划入园区。园区分为核心保护区、生态修复区、传统利用区、游憩教育区等，重点保证栖息地生态系统原真性和完整性更高，恢复大熊猫栖息地之间的联系，扩展大熊猫生存空间。（文 / 钜君）



(插图: 张悦)

## 小众崛起的中国版本，并没有那么简单

文 / 杨璐

在时髦的消费升级概念中，经常有一个激动人心的解释系统，互联网技术打破了旧世界的规则，建立起新世界的秩序，那些不可撼动的商业巨头陨落了，新的商机崛起，现在是更好、更贵、更个性的天下。如果你读过牛津学者詹姆斯·哈金的书，就知道这个 Niche 理论可以套用的名单一长串。而我们，想知道中国的版本。

也许洗发水这个微小的品类是个再合适不过的观察对象。过去的 20 多年里，它的市场被少数巨头占领着，从营销到渠道建立了高高的壁垒，新来者看不到什么空隙。可几乎一夜之间，巨头们的市场占有率下滑了，年报并不好看。比如，宝洁全球 CEO 大卫·泰勒在 2016 年纽约消费者分析集团年度会议时说：“在

中国这个我们的第二大市场，没有一个核心品类在增加用户数，甚至大部分还在下跌。”

前半部分的故事看起来很符合 Niche 的因果关系，后半部分却令人迷惑。我们很难把爱茉莉集团第一洗发水“吕”叫作小众，也不会认为洗发水的鼻祖施华蔻是小众，这两种都是中国互联网上销量巨大的品牌。当然，那些更贵更有品质、只在欧美日韩潮人中流行的洗发水，搜索引擎也能让我们毫不费力地买到。而如果翻阅 20 多年前的媒体报道，今天赋予这些网红洗发水的赞美之词，当时几乎原样不动地用在这些失落巨头身上。

我去采访了从业几十年的行业专家、消费品大数据研究员、近十年在巨头公司工作的从业者、新品牌创业者、新传播、新渠道商们，串联起这一轮消费升级的路线图，没有充分发展的市场遇上了全世界发展

最快的电商，物质匮乏被安装了时空之门。比起商业畅销书里的叙述，中国市场要复杂得多，有趣得多。

## 被抛弃的开架洗发水

我实在想不起来最后一次从超市或者屈臣氏买洗发水是什么时候了。比较想得起来的一次非开架购买是在2012年或者2013年，我在欧洲逛街进了一个专卖手工皂的小店，当时国内的精油皂或者有机皂是用来洗澡和洗脸的，而这家的明星产品用来洗头发，它有各种不同的颜色和味道，我觉得很新鲜，可以自用可以当小礼物送人，也很实用，因为像我这样频繁出差的人，固体比液体要方便。我忘了具体卖多少钱，但是肯定不便宜，可还是买了好几块，顺便还买了做成香皂形状的润肤按摩芭。

女孩们儿应该立刻知道我买的是Lush了吧？这是一家发源于英国小城的品牌，做成固体产品是因为可以减少胶瓶、胶袋的生产、运输和丢弃，每年节省数以百万计的包装原料。吸引我的新鲜感其实是提醒消费者过度包装的行为艺术。除了标榜环保，这个品牌的价值观还包括，超过80%的原料是纯植物，所以它适合素食者使用，这些植物是新鲜的水果、花草和植物，从采购原料到制作每天都保持新鲜，以及反对动物测试，这是它因为缺少安全备案程序而至今无法进入中国内地的原因。

品牌讲述道德故事和生活理念跟洗发头的效果有关系吗？理智地讲，还是列出产品成分表进行分析更有说服力。可这并不影响Lush赢得消费者的心，我回国之后立刻知道我同学早就爱上了这个牌子，她一直爱到现在不动摇。而淘宝上的代购当时就成了气候，店家多到我根本不敢买，因为销量足够开厂造假货了。

也有朋友不喜欢这个牌子，觉得它洗发效果一般，明星产品、针对脱发的“再新洗发皂”会头发涩，香味也太重。在选择洗发水作为观察这一轮消费升级的切入点上，“直男”领导觉得好奇的地方在于这个行业从产品、渠道到营销都被巨头们设立了很高的壁垒，新进入者的生存成长空间是哪里来的。我想，根源不在于商业战术，而是女性消费者对于洗发水的执念。让女人敞开心扉地描述喜爱的洗发水是什么样子，并不比描述她们爱的男人是什么样子答案要简单。我是“颜狗”，包装是决定我购买的重要因素，但是我喜爱的风格并不能总结概括，一般说来只能凭当时的心血来潮，还有我对味道很在意，不喜欢浓重黏稠的香气，偏向于精油或者清新的味道，可如果遇到东方香料风

格的产品，通常那种味道很古怪，我一定会买。在洗发水评论帖里，有人追求打开头皮毛孔的感觉，有人追求发型的空气感和顺垂，其实这是两种相反的状态，有人追求温婉盈润，还有人追求的是能够去见前男友的效果。这些要求是作吗？不不不。追求新鲜感是天性，哪怕差别是细微的，大概每个女人都可以轻易分出同样一个颜色的不同牌子口红的区别，然后买下它们，更何况是差别更大的洗发水。购物不仅仅是为功能支付，它是娱乐，最起码可以打发无聊。

这种欲望在过去的十几年里是从来没有被满足过。当我开始自己做主的时候，跟同学们在连锁超市和屈臣氏里买洗发水，最纠结的是选择，不是因为选择太多，而是太少，每次想用不一样的，可是新产品的周期很漫长了，在那些没有新产品的时候，我们简直是在货架上寻宝。大部分的货架被宝洁系的海飞丝、飘柔、潘婷、沙宣、伊卡璐，联合利华系的力士、夏士莲、多芬、清扬，丝宝集团的舒蕾所占据，少部分货架留给广告很土的国产洗发水，功效只有干性、油性、混合性、干枯受损发质的分类，功能型洗发水就只有去屑一种。香味是浓稠的人造香精或者清淡的人造植物香精，洗后的感觉基本上都是顺滑或者除了清洁看不出效果。

回头看去才知道一路走来物质上多么贫乏。现在，我们的发质类型可以被分得更细，比如说细软变塌发质、敏感头皮、稀疏细软发质、蓬乱毛躁发质，毛躁分叉发质、干涩易打结发质、极度干枯发质等等，有些品牌还有头发头皮的测试卷，问题详细到是否经常戴帽子、作息规律、是否湿发入睡、头发干燥梳理时卡在哪个位置等，得出更加贴合你自己头发头皮状态的结果。而那些扑朔而难于领会的喜好，在无硅油氨基酸、无硅油加各种精油，及欧美、日、韩配方风格、环保植物派、化学成分分析派或者更多新潮小众未知的派系中消解了，总能找到一款勉强符合你要的比如夏日午后的感觉。

巨头产品的货架却犹如时光凝滞，品牌、外观设计、风格气质没什么变化，已经让人失去了继续探究它们这些年研制、调整产品线的兴趣。潘婷曾经推出过按照爆款潜质研发的“乳液修护润发精华素”，号称“在北美、中国和日本消费者盲测中获得第一”，可上市之后就没了声息。那么多眼花缭乱的选项，为何要去仔细研究20年如一日的潘婷瓶子里是不是换成了更高级的配方呢？很多评论里指出，宝洁公司在大众品牌下进行产品档次提升的策略是失败的，不无道理。现在的行情是大家越来越识破大牌低端线，所谓“副牌”

的商业把戏，它一度非常流行。那更没道理去买一个开架牌子的高端线，这不符合正常的消费心理。

几乎联合垄断洗发水市场的帝国在不知不觉中被蚕食了。最近一段时间经常传来宝洁的坏消息，它的财报并不单独列出中国市场，可根据欧睿国际的数据，这家巅峰时占中国市场份额 60% 的巨无霸，从 2009 到 2014 年份额是逐年下降的。它在中国的老伙伴联合利华，2014 年第三、四季度曾经销售大降 20%，现在虽然从引入海外线、渠道下沉、调整去库存等很多方面应对，可依旧没有松口气，CEO 保罗·波尔曼在跟国际分析师讨论业绩时说，要读懂中国市场非常困难。

在 360 公司公布的 2016 年第二季度洗发水搜索量排行榜上，排在第一、二位的分别是巴黎欧莱雅和爱茉莉的吕，联合利华比较年轻的品牌清扬在第三位，宝洁中国里高端品牌沙宣排在第六。如果去查看美妆微博和微信公号，结果会更沮丧，在一份很受欢迎的洗发水口碑榜上，被讨论的洗发水是 Kerastase、L'Oréal Paris、Rene Furterer、Sebamed 等品牌，它们不是小众洗发水，但是在洗发护发上形象专业。更惊悚的标题，还结合了心灵鸡汤的手段——《人生的进步，从拒绝在普通超市买洗发水开始》。

## 旧时代，巨头们的壁垒

日化类巨头们曾经在中国市场创造过奇迹。1989 年，宝洁公司在中国推出了洗发水品牌海飞丝和飘柔，根据当时的调查数据，海飞丝上市的第一个月，在广州市场的认知率就达到了 99%，1992 年 3 月，宝洁又推出了潘婷洗发水，这三个品牌洗发水奠定了宝洁的洗发水业务在广州、北京、上海三个城市的领先地位。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飘柔、海飞丝和潘婷能占据中国洗发水市场的半壁江山，联合利华旗下的力士、夏士莲和欧莱雅瓜分 25%，新老国产品牌只有 15% 的市场空隙。日化领域专家、中略资本创始合伙人高剑锋告诉我，洗发水本来就是舶来品，蜂花是中国第一瓶洗发露，那还是短缺经济的时代、卖方市场，洗发水比老一辈用的肥皂、洗发膏已经是进步了，还谈不上配方，只要能生产出来，就能卖得掉。

宝洁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进入中国，相当于师傅打徒弟，中国人还习惯把洗发产品分成肥皂、洗发膏、洗发水三类时，最先进入中国的宝洁告诉我们，海飞丝是去头屑的、飘柔是洗护二合一、潘婷是修护滋养为特色。一直到 90 年代中期，媒体提起宝洁都是先进理念的代表，市场细分，每个产品只突出一种特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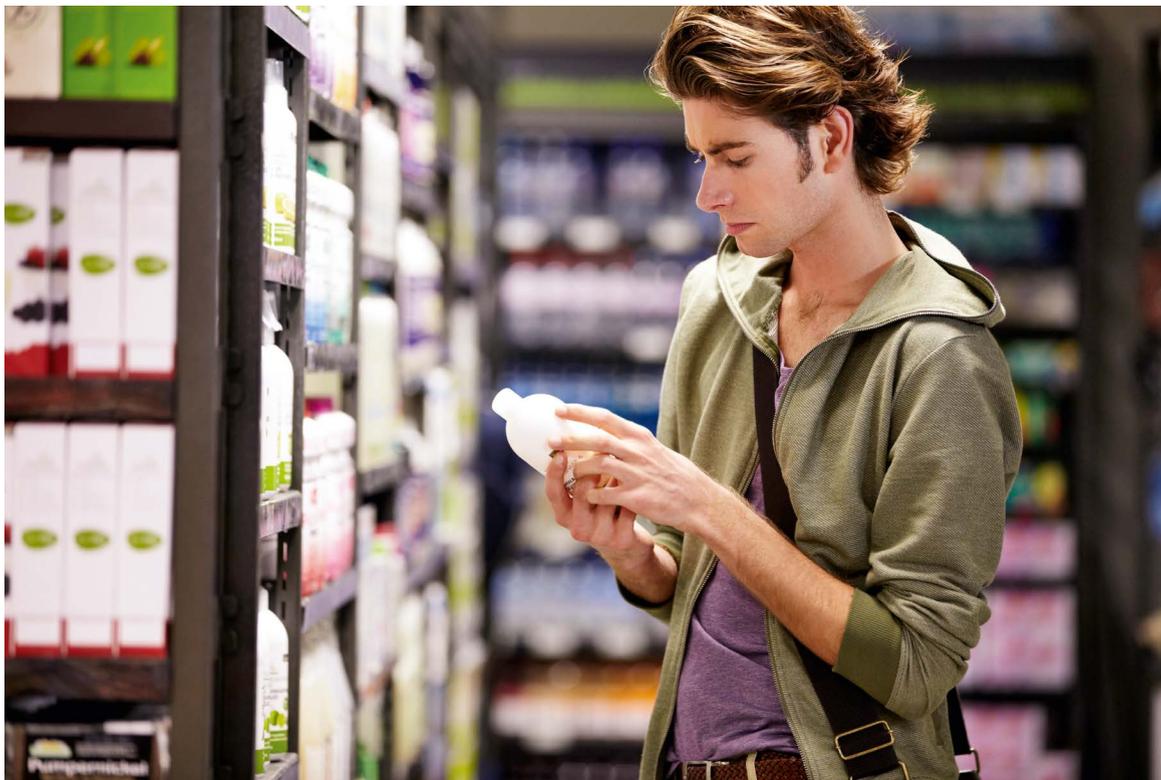
对消费者定位准确，进入中国初期着眼于爱接受新鲜事物、收入较高的 18 岁到 25 岁的年轻人。到了 90 年代后期，因为产品线增多和普及，消费人群扩大到 40 岁。

这些产品概念容易习得，可是快消品巨头们玩的是建壁垒的游戏，要想进到这个俱乐部，就得圈地和烧钱。圈地就是建渠道。宝洁登陆广州的时候，中国洗发水市场犹如新大陆。高剑锋说，整个市场刚从区域分割的计划体制转向市场经济，原有日化品牌的影响力都局限于地区市场，全国的销售渠道也没有打通。瓦解国营供销体系的是大量个体户批发商的兴起，这些自我摸索的散兵游勇遇上了渠道正规军。“宝洁进来建了渠道，那些个体户或者国营供销社里单干下海的，宝洁给资金、方法、人员。现在线下日化领域大的渠道经销商相当一部分是宝洁扶持起来的。它实际上帮着建了中国快消品的渠道。后来娃哈哈、乐百氏这些品牌走向全国，也是通过渠道这样的方法建立起来的。”高剑锋说。

到 1999 年宝洁在中国分了华南、华北、西南和华东四个销售区域，分销商们把产品卖到批发市场、杂货店、企业客户、洗浴中心、美容美发店等目标消费者出现的所有场所。宝洁公司 80% 的销售额都是通过这分销商销售的，他们一起创造了 1996 和 1997 财年宝洁在中国销售额的巅峰。1999 年之后，适应中国新兴的大型商超、连锁店和越来越多用高利润在渠道上与宝洁竞争的品牌，宝洁把渠道改成分销商、批发商、大型商超和沃尔玛的划分，直接控制销售量巨大的大型商超和沃尔玛。分销商手里剩下批发市场、中小型零售店和农村市场。

跟宝洁想到一块儿去的是联合利华，它几乎同时进行了改革，大超市、量贩店的物理货架就成了最直观的竞争场地，陈列和格局都经过严谨的计算，大型超市的货架在 5 层以上，中间货架是 1.6 米黄金分割线，用来摆放最畅销洗发水，顶层和底层摆放一般产品。有过近 10 年宝洁工作经历的前中高层员工告诉我，每个大卖场洗护发区的货架是有限的，宝洁、联合利华、欧莱雅占了其中的大部分，这些品牌势力范围划分之后，剩下零星的分给其他品牌。要想进入这个行业，首先货架都拿不到，壁垒就这样建立起来了。

烧钱是为了营销。高剑锋说，那个时代的洗发水还谈不上配方成分的竞争，再好的产品得让消费者知道它的存在，方法只能是在媒体上打广告。打广告无论从技术还是资金都是巨头们的强项。宝洁公司的前中高层员工告诉我：“英文中肥皂剧这个单词就是从



宝洁来的，宝洁从前做肥皂的，在广播剧后面投放广告。广告是宝洁的强项，它有一套严谨的做法，为了取得良好的促销效果，在文案形成之前、成片制作之后、产品试销等几个环节进行测试，对目标客户做市场调研，最终投放后获得客户市场的认同、带动销量。”

在海飞丝、飘柔的时代，主流的电视广告还是“省优”“部优”，宝洁推出的广告已经是经过传播效果考验的作品，一则广告只传播一个关键的一点，去屑、柔顺或者滋养，善于利用权威部门的测试、验证或者顾客现身说法。与力士用中国人不熟悉的外国明星、模特做代言人不同，宝洁虽然邀请过张德培这样的名人代言，可另一种风格也让人印象深刻，寻找与目标客户年龄、气质相接近的群众演员。这些广告，让中国人都知道了深色衣服上落头皮屑影响个人形象，知道了二合一，知道了头发分叉需要养护。

这些精心制作的广告在电视里频繁播出，广告词耳熟能详。根据历史数据，宝洁每年会把销售额的20%左右作为广告费进行投入，它把媒体比作超市货架，央视广告就是货架上的黄金位置。2004年宝洁投得央视黄金时段广告的王，并从此蝉联多年。到了

2013年，根据当时的报道，它是中国最大的广告客户。“这样大的购买量，单支的成本就很便宜。这方面的壁垒在于，单点传播的成本优势和广告制作的严谨让宝洁做出价低质高的广告，从后面超车很难。”宝洁公司前中高层员工说。像联合利华这样旗鼓相当的对才有实力与它竞争。2007年联合利华在中国推出洗发水品牌清扬，这场狭路相逢的战役被广告和营销领域时常引用，业内人士告诉我，硬生生超车的结果来自洗发水上市第一年在营销上砸了5000万美元，连着亏损几年才把投入追回来。

渠道和营销是市场份额的双保险。在上世纪90年代到2009年之前，宝洁和联合利华一起占了市场份额的大部分，中国洗发水丝宝、霸王、拉芳等一直试图挑战这个格局。一度成绩很好的是丝宝集团，它发明了一种终端拦截的办法，在各种货架区，选择紧邻行业第一宝洁的位置，派出海量的销售人员拦截消费者。“让你本来奔着飘柔去的，最后买了舒蕾。那个时候，宝洁不注重线下，舒蕾通过这种方式取得了利润。”宝洁前员工说。舒蕾的年销售额一度仅次于飘柔，占13%的市场份额，但是势头没有保持几年，

宝洁、联合利华都采用了同样的策略，货架前的争夺让渠道的成本上升，飘柔降价挤占舒蕾的二、三线和乡镇市场。丝宝要在渠道和品牌两方面砸钱，逐渐捉襟见肘，2007年被拜耳斯道夫收购。

## 新时代，新规则

清扬主打去屑功能，对阵已经在中国经营十几年的海飞丝。清扬的去屑创新是“维他矿物群”，宣称自己是消费者信任的“头皮护理专业品牌”，海飞丝针锋相对以去屑专家的身份联合中国皮肤医师协会、中国健康教育会召开“全国头部皮肤健康峰会去屑技术高级研讨会”。看广告和营销动作分不出他俩的所以然来，在百度百科上有人提问：“清扬和海飞丝，哪种洗发水的去屑效果好？”

这是现在我们习以为常的获取信息方式，可互联网的发展打破了电视时代日化巨头们砸钱建立的壁垒。营销方式改变了，传统广告被网络传播取代。过去，洗发水品牌通过广告向全体消费者宣布它的新产品、新系列、新配方。可搜索引擎技术让我们从被动的观众变成主动的寻访者，在互联网上精确查找需要的信息。通过互联网，我们认识了非常多没有进入中国的品牌，自然也没有在中国投广告。过去我们无从知道它的存在，现在却能熟知它的历史、市场份额等最详细的信息。爱茉莉旗下的高端洗发水“吕”，2015年进入中国，它不必像清扬一样烧钱打铺天盖地的广告来获得存在感，它在2013年左右就是个网红牌了，美妆论坛和帖子里详细介绍它各种颜色的功效、它换包装的信息，以及从各种渠道买到后的使用口碑。爱茉莉2016年第二季度的财报里，海外业务增长了60%，中国区经理说中国的销售平均每年增长47%。“吕”不是特例，资生堂旗下的护肤品牌CPB在2001年就进入了中国，没怎么打广告一直默默无闻，可到了互联网时代借助社交网络的传播，它的增长在资生堂的销售数据里非常显眼。

传统广告失去的还有左右消费者购买决策的能力。互联网时代更重视口碑。它最早来自经验丰富的明星和彩妆师，当自媒体发达之后也可能是普通人出身的“网红”，一种是小白鼠达人，他们用的品牌多，在网上介绍新鲜时髦的品牌和使用感；一种是科学派，他们有生物、化学知识，看得懂成分表也熟悉化妆品的生产过程，能够穿透眼花缭乱的营销概念，从科学角度分析效果。甚至也许是熟人在社交网络上发了一张照片，就撩拨起你的购买同款的兴趣。

网上大量的使用心得和科普内容还让我们习得很多洗发水知识，无硅洗发水就是网上流行起来的观念。硅油可以抚平毛鳞片，起到顺滑头发的作用，但人们争论它会不会导致脱发、堵塞毛孔或者发丝干燥。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从化学结构、头发构造、洗发水成分到使用感，UGC分析得专业又透彻。比较早讨论硅的作者“美羊羊\_本尊”告诉我，她因为自己受到脱发困扰，就在美国论坛上做了很久功课。在美国，这是个已经被讨论很久的问题了。“美羊羊\_本尊”常驻美国，她和搭档“竖条纹大叔”是拥有30万“粉丝”的科学美妆领袖，他们合称为“美容大王与化学家”，在公号上向“粉丝”介绍偏重欧美系的成分分析和使用感受。在“美羊羊\_本尊”发表文章的同时，日系无硅品牌以清单形式也被美妆论坛介绍进来。

中国开架洗发水也陆续推出无硅配方，跟20多年前要通过广告教育观众“去头屑”不同，互联网缩小了信息差，网友们自学的知识比传统广告的含量大多了。开架品牌的广告和产品很难说服追逐时髦概念的消费者心悦诚服地购买。互联网打开了一扇窗，为什么不尝试那些欧美日市场上口碑好又新鲜的洗发水，而要在面目相似的海飞丝和清扬之间纠结？

渠道壁垒也被互联网瓦解了，购物品类打破了货架上的限制。快消品的线下渠道像血管一样在广袤的国土上不断下沉，越往末梢成本越高。新进入者既不用烧钱在这些传统渠道上，也不用像舒蕾和飘柔一样招大量促销人员在货架前搞终端拦截了。虽然网上流量也要竞争，但那是另外的游戏。新时代最早的黑马是施华蔻，这个发明了洗发香波的专业护发品牌在2005年进入中国，从来没有投过大量电视广告、在大超市和屈臣氏里也占有不多的货架，一直销售不好，根据中华全国商业信息中心的统计，2013年全国洗发护发市场品牌占有率中，施华蔻连前十名都没进去。

从2011年入驻天猫旗舰店开始，施华蔻却逐渐成了网红，2015年的“双十一”，它一个品牌的预售销量相当于宝洁、联合利华、资生堂旗下所有洗发水预售销量总和，当天卖出300万瓶洗发水，是那一年“双十一”洗发水销量冠军。施华蔻的网络名气来源于丽人丽妆的操作，创始人黄韬因为拍下“papi酱”的首支广告而受到关注。黄韬很善于观察、让自己的决策顺应发展趋势，他告诉我：“当初选择跟施华蔻合作是因为它的研发能力非常强、洗发水品质好，但是传统意义的渠道和营销弱，这就很适合跟我们合作。而且从前洗发水的模式是广告覆盖全中国，所有人是一种人，产品是通用型的产品。现在的消费是越来越高

级、细分和知识化，施华蔻把发质分成 100 多种，产品就有 20 多个系列，它是符合这一轮趋势的，做起来。”

除了施华蔻，黄韬还操作着 60 多个化妆品牌，跟全球十大化妆品集团都有合作，包括兰蔻、雪花秀、娇兰这样第一梯队的品牌。黄韬告诉我，化妆品电商渠道补充的是线下专柜缺失的地区，三、四线城市和县城还没建出能让这些专柜入驻的高级商场，可有一部手机就能像去专柜一样买东西了。智能手机把更多人接入互联网，他们对品牌的认知与一、二线城市是一样的了。

甚至那些没有进入中国市场的品牌，现在也有了通过电商渠道做中国人生意的机会，从前是淘宝代购、微商这样积少成多，现在还有电商大平台的海淘板块和创业海淘 APP。菠萝蜜是一个以日本、韩国市场为主的海淘创业团队，他们公司在当地有仓库，也有团队专门跟各化妆品公司谈合作。创始人雷婷婷告诉我：“日韩公司在营销上非常精通，很理解中国的网络传播。比如我们合作某款商品在中国的首次发布，他们会要求我们请一些行业领袖造势。当我们跟去年一个爆款面膜合作，创始人非常愿意到直播间里面对中国消费者。他们非常看重网络这个渠道。” Lush 抗拒动物测试而没法进入中国内地，但是他们与黄韬合作在天猫开设了旗舰店，下单之后要花几十元的国际运费、等待更长的时间才能到手，买得这么麻烦还是有营销空间和渠道。黄韬告诉我，他公司策划在香港特区 Lush 的旺角旗舰店直播现场制作手工皂，直播之后销量翻了五倍。

## 中国版本，爆款与长尾

现在中高端洗发水成了市场热点，360 搜索指数洗发水排名第一的巴黎欧莱雅在 2009 年进入中国，它避开了大众线上与宝洁和联合利华打硬仗，而是在中高端领域跟汉高施华蔻、资生堂水之密语竞争，现在同施华蔻一样，在这一轮消费升级中受益。在阿里研究院发布的中国互联网高端消费橙皮书里，最具代表性的洗发水品牌是 Kerastase，它是欧莱雅旗下的高端专业沙龙品牌，有在线头发头皮测验和线下沙龙，把头皮和发质的状态分得特别详细，针对每种需要护理和改善的问题都有产品，它不是定制的，却让你觉得非常贴心。

一瓶 Kerastase 的价格大约能买 4 瓶开架洗发水，可在互联网新世界里，人们对价格并不敏感，愿意在

使用感上花钱，并且这种趋势从一、二线城市扩展到三、四线城市。一个可参考的数据来自阿里研究院，研究员吕志彬告诉我，他们去年做了一个消费品线上和线下的对比，把几个高端护肤品的门店地址和销售地址对比，45% 的阿里销售额都是物理店铺没有覆盖到的。根据品牌开店的原则，那些没有专柜的地方通常被认为消费能力不够、不够发达的三、四线城市。雷婷婷也有类似的体会，她告诉我：“一开始设想海淘 APP 应该是在一、二线城市比较多，可从消费者地址反馈看，三线城市的增长超过了一线城市，包括新疆、西藏、内蒙古这些事先想不到的地区。”

回到传统巨头身上，清扬与海飞丝在全国各地的货架上紧挨着摆放，它们的价格差不多、传播方式差不多，渠道争夺的手段差不多，像两个贴身肉搏的双胞胎。牛津大学教授詹姆斯·哈金在《小众行为学》里写道：“在过去的 20 年里，许多我们熟知的主流品牌和它们的竞争对手之间的优势已经模糊甚至消失了。就像通用汽车公司、好莱坞大制片厂，它们制造出来的东西都差不多。”“美羊羊\_本尊”的描述印证了詹姆斯·哈金观察到的小众市场：“其实在美国开架洗发水里，宝洁系还是市场份额的大赢家，但是中高端品牌，选择余地比中国大，无论是沙龙线产品、精品植物线产品还是科技线产品，都有不少品牌而且很容易买到。它们非常注重品牌文化的传播和塑造，然后吸引认同自己的消费者。像雅诗兰黛旗下的沙龙线品牌 Aveda，它输出的是绿色环保，产品完全使用可回收包装。这在美国中产阶级中，是可以寻求到一些消费者认同感的。”

互联网解决了信息差和渠道问题，这一轮我们的消费升级就跟美国中产阶级的购买行为同步了吗？不能这样简单地归纳，360 搜索指数排行榜第二名的“吕”是在韩国占 40% 市场份额的洗发水，另一个几乎出现在所有无硅洗发水推荐清单上的 Reveur，获得过 Cosme 大赏，在日本家喻户晓。当然，“美羊羊\_本尊”提到的 Aveda 也是中国网络上口碑非常好的洗发水品牌。中国市场长期被定义为中低端，货架上物美价廉却也单调乏味，互联网消除了信息和渠道障碍，涌入中国的既有大众也有小众。

我们的市场更像是消费后进生的弯道超车，从销售渠道上讲，爆款和长尾的分类更加贴切。雷婷婷说，海外商品有时间差，当地可能已经是非常受欢迎的国民品牌了，中国互联网上的讨论和传播还要逐渐红起来，一旦在互联网上被广泛讨论，销售量就很大。爆款年年有，可也有经过当地市场验证的，口碑很好，却在

中国不太被人知道的品牌，可能它的产品形象、理念很符合中国消费群的审美，那就依靠图文或者直播推荐，做成长尾商品。比如中等规模的 Matsuyama，在日本也不是广为人知，但它的百年老店、简洁设计、温和配方，非常符合中国正流行的性冷淡风，在微博上被美妆博主推荐过，菠萝蜜的团队就去厂里拍了视频。

在生产领域上，经验丰富的从业者感受到行业壁垒的坍塌，看到了从前难以想象的创业空间。唐亮和团队都来自宝洁公司，去年创业洗发水品牌植观，不像早年国产品牌一样盯着大众市场，而是做正流行的概念，高端的氨基酸洗发水。第一个变化来自消费者的心态，大家只想用真正好的东西，哪国的品牌并不重要。黄韬在业内成名是曾经把相宜本草旗舰店做到天猫护肤类的第一名，那是个国产品牌故意起个外国风格名字的时代，反倒是相宜本草坦荡地承认自己是国货却杀了出来。身处行业内的唐亮也观察到了这种变化，他提出的口号是 Made for China。另一个变化来自业内规则，氨基酸表面活性剂的原料是普通的 5~10 倍，通常用在高端清洁产品上。唐亮说：“这是一个很小的领域，不能按照传统方式推广，第一是成本高，第二是传统大公司的成本结构负担不了这么

重的东西，洗发水成本只占他们百分之二十。”中国消费者最熟悉的氨基酸洗发水是科颜氏，它因为爱惜头发如命的徐熙媛写书推荐而走红，这并不来自科颜氏公司的广告，在国内洗发水行业看来，这依旧是个小众洗发水。创业的植观团队，对标的就是科颜氏。

新的传播渠道和营销渠道让这样高成本的洗发水既避开了烧钱圈地的传统生意方式，也因为更有识别度和亮点而获得存活的可能性。唐亮找日本的配方研发机构、法国的包装设计公司，一起设计产品雏形，这些方向正是现在中高端消费者喜爱的元素。他不花钱打广告，而是挑选一批种子用户，反馈使用感受，跟团队一起打磨产品，正式推向市场的最后一次测试，种子用户达到 2000 多家。他还以“植观 TT”为名在知乎上注册账号，用专业知识给网友们详细回答关于洗发头的各种问题。他的回答专业而清晰，被转发很多，如果搜索氨基酸洗发水，很容易就看到他的答案被引用。这些营销手段跟他之前十年的行业经验完全不同。他也不用像从前一样去拜访线下的经销商、铺渠道，除了天猫和微店，社交网络的复制粘贴可以在各种网络空间里无限扩展他的销售渠道。■

（感谢实习生甘兰蕙子和肖楚舟对本文的帮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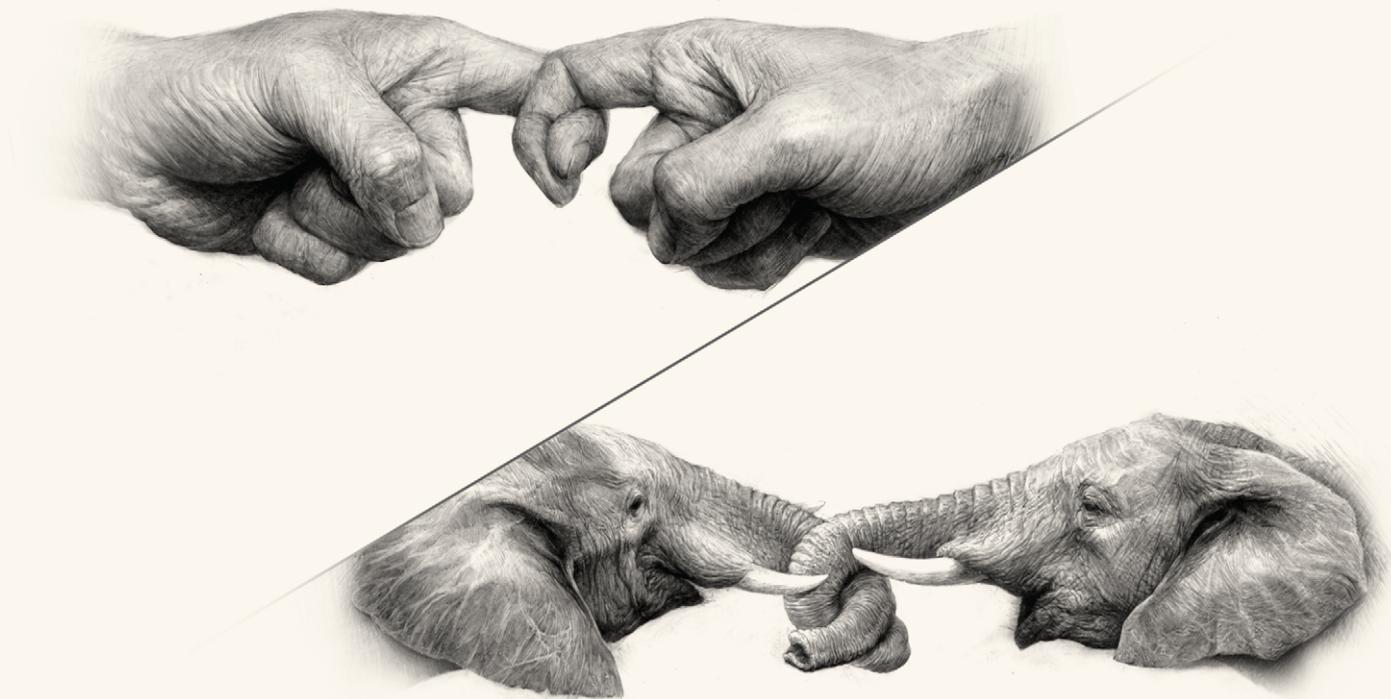
松果  
一万个生活家

我是黑麦，  
我为 1000 个人做过私厨家宴。

来松果，  
和我一起吃饭。

# 勾起手指，连结拯救的决心

## Link your fingers to support elephants



拒绝购买象牙制品，支持象牙禁贸。勾勾手指，把拯救大象的承诺传递下去。

Reject ivory and support the ban. Link your fingers to pledge your support for elephants!



拯救大象不能没有你！扫描二维码  
或登录 <http://www.wwfchina.org/ivory>  
传递爱的承诺。



共同发起全球拒绝  
非法野生生物贸易行动

**TRAFFIC**

the wildlife trade monitoring network  
国际野生生物贸易研究组织

# 吉利为何再造新品牌？

主笔 / 李三



吉利汽车集团总裁安聪慧

“在过去9年时间里，智能手机对世界的改变远远超过汽车在过去130年所带来的影响，而LYNK & CO将打破这种状态。”

LYNK & CO是谁？它是吉利汽车集团旗下的一个全新品牌，于10月20日在柏林正式发布。正如LYNK & CO高级副总裁魏思澜(Alain Visser)先生所说：“这个世界可能不需要一款新车，但是一定需要对汽车的新的理解。”

魏思澜从字面上逐字解释了这个新品牌的含义：LYNK & CO代表着互联和开放；LYNK寓意博采东西方汽车工业优势，融合东西方文化，通过创新科技，在人、场景和体验之间建立全新连接模式；CO则代表着互联网时代开放与协作的精神以及无限可能。乍听起来，这个品牌的表述有些绕口，也许这和它的出身有关。其研发团队来自位于瑞典哥德堡的吉利汽车欧洲研发中心(CEVT)，设计团队从现代都市生活中的节奏和场景切换中找到灵感，为LYNK & CO品牌定制独特的设计语言。该品牌的所有车型和细节都将连入LYNK & CO云，让车成为互联网的一部分，可实现通过互联网驾驶或者控制汽车。除此之外，新品牌还将拥有自己的APP Store，这意味着LYNK & CO不仅是拥有智能触屏并连入云端的汽车，更是一个开放的互联网平台。此外，它还可以通过数字钥匙分享汽车，为汽车共享和租赁提供了全新的技术支持。

吉利汽车欧洲研发中心(CEVT)位于瑞典哥德堡科技园区，最早这里是瑞典的港口也是造船业的发源地，北欧、瑞典能够走向全球，也是发源于这个造船的核心区域。后来这里发展成为拥有很多创新公司的产业园区，这里距离沃尔沃大约有五六公里，乘车大

概十来分钟。

当地时间10月19日，吉利汽车集团总裁安聪慧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三联生活周刊：**吉利品牌近两年上升势头很猛，为什么要再造一个全新品牌？

**安聪慧：**吉利今年增长得比较快，我们年初的销量计划是60万辆，现在看来将达到70万辆，下半年的月度同比增长将在70%~80%，全年则预计也将高达40%。这样的销量坚定了我们对于2020年实现200万辆目标的信心。

吉利自造车之初便认识到，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能够全球立足，进入发达国家市场，而200万辆正是立足的基础和门槛。但要进入这些发达国家市场，一定要基于高技术标准，单靠吉利的技术来说还比较薄弱，而LYNK & CO的产品是吉利在CMA模块架构上的首款产品。

**三联生活周刊：**对于吉利控股集团而言，这个新品牌肩负着怎样的使命？

**安聪慧：**对于吉利控股集团来说，更重要的在于细分市场。吉利也好，沃尔沃也好，这些年的变化最重要的就是贴近市场，在充分了解细分市场和消费者需求的情况下定制未来的发展方向。从细分市场来说，沃尔沃是豪华汽车品牌，吉利是中国的自主品牌。对中国来说，豪华品牌占10%左右市场份额，自主品牌现在大概是42%~43%份额，剩下

还有 40% 多的细分市场，我们应该怎么来开辟呢？在这个细分市场中，我们缺产品，也缺品牌。因此，从市场的需求角度出发，我们需要 LYNK & CO 这样一个定位中高端的品牌。

就全球市场来说，我们要进入发达国家市场，一定是采用更高的技术标准和规格，单靠吉利的技术相对还是比较薄弱。所以我们以 CMA 模块架构为基础，用沃尔沃的技术标准要求，以此进入发达国家市场，完全就能够应对了。

**三联生活周刊：**LYNK & CO 品牌的出身有什么特别之处？

**安聪慧：**LYNK & CO 品牌的设计来自于哥德堡设计中心，中心就坐落在 CEVT 旁边，也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建筑，这里聚集了非常多优秀的设计人才。LYNK & CO 品牌体现了欧洲的设计、欧洲的研发、全球制造、全球销售，体现了我们在未来整个技术的竞争力，尤其是在互联网方面、在新能源方面。

设计方面，LYNK & CO 品牌的主要设计是由彼得·霍布里（Peter Horbury）先生带领我们的欧洲设计团队完成的，彼得·霍布里原来是福特豪华车的总设计师，现在是吉利汽车集团的设计高级副总裁。负责研发的方浩瀚（Mats Fagerhag）先生，是吉利汽车欧洲研发中心 CEO，此前他是萨博的研发总负责人以及通用欧洲的研发总监。

从 LYNK & CO 名字可以看出来，我们在互联网的大时代背景下，致力于以互联网、新能源领域的科技创新，打造出全球有竞争力的产品。如果用一个简单的表述，除了在油耗、安全等最基本的方面，我觉得 LYNK & CO 代表着新能源 + 互联网的未来方向。

**三联生活周刊：**LYNK & CO 品牌如何体现互联网元素？

**安聪慧：**所谓互联网并非显示屏大一点、多装几个 APP，而是互联网驾驶，在现在想到的和没有想到的环节，都融入互联概念和技术。LYNK & CO 品牌的一个核心就是要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传统的个性化定制还停留在主机厂的数据库里，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产品配置。但对 LYNK & CO 品牌来说，除了一些安全方面不能妥协，我们要充分满足消费者的个性需求，要让他们深度参与到产品中来，未来消费者可以追踪到自己的订单在生产供应的哪个阶段。

**三联生活周刊：**吉利目前在全球的战略布局是如何进行的？

**安聪慧：**吉利控股集团下属有吉利汽车集团和

沃尔沃汽车集团。在吉利汽车集团里面，还有一个伦敦出租车。有三个品牌：沃尔沃、吉利以及一个专业的品牌英国锰铜，就是伦敦出租车。从定位上来说，伦敦出租车属于专业小众，沃尔沃则是豪华汽车品牌。

我们目前在全球只有四大设计中心、四大研发中心，哥德堡只是其中一个设计中心，此外还包括上海设计中心、巴塞罗那设计中心、北美加州的设计中心。研发中心也有四个：哥德堡、宁波、杭州以及英国的考文垂。

**三联生活周刊：**欧洲研发的核心工作包括哪些具体内容？

**安聪慧：**吉利汽车欧洲研发的核心工作之一就是全新中级车模块架构 CMA。它并非建立在一个全新的、从零开始的平台上的技术，而是在沃尔沃积累了大量技术基础上，与吉利联合投入来共同开发的基础架构，我们叫模块化架构。可以很自豪地说，这个模块化的架构在全球未来是绝对领先的，模块化架构不仅满足于我们现在传统汽车的需要，还可以满足新能源的需要、自动驾驶的需要，就是从整个的定义来说，这才是真正的一个互联网 + 新能源的汽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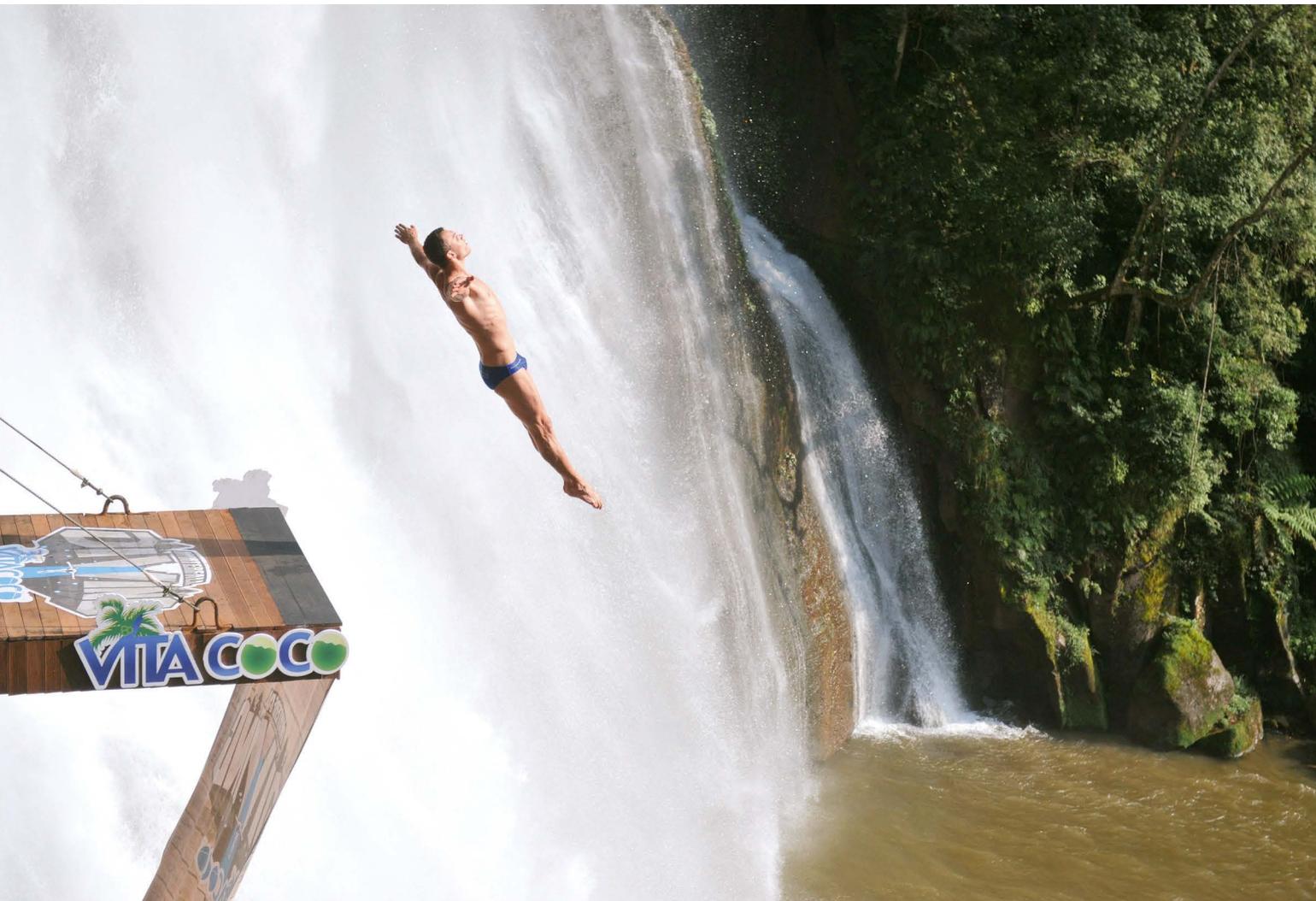
**三联生活周刊：**吉利曾经施行过多品牌战略，但在 2014 年又决定品牌重新回归吉利。而现在重新打造新的品牌，如何汲取当年多品牌战略失误的教训？

**安聪慧：**吉利之前确实走过弯路，但 LYNK & CO 品牌的建立和吉利以前的做法完全不同。首先从一个产品来说，原来吉利英伦帝豪全球鹰，从产品上没有拉开差距，它们技术水平、产品档次，只是通过名称、品牌、造型等方面加以区别，但在本质上，细分市场是一样的。

LYNK & CO 则不一样，从产品本身的技术来说，它和吉利、沃尔沃之间是有区别的，它拥有自己的细分市场。从产品的技术定位而言，LYNK & CO 的技术水准、产品属性都不尽相同，细分市场的需求不一样。一切还是来源于市场，消费者的需求是不一样的，现在定位很清晰。

当然，这三个品牌之间，肯定会有一定的交集，但大方向来说，细分市场定位不冲突。怕的就是同样的品牌很多，但产品没有差异化，那就很难生存和发展。

吉利 2020 年 200 万辆目标一定要实现。200 万辆里包括吉利品牌、LYNK & CO。我想，到 2020 年，LYNK & CO 最起码要贡献 30 万~40 万辆销量。☑



首届 VITA COCO 瀑布跳水精英赛在贵州赤水大瀑布景区举办

## 十二勇士挑战飞瀑

### ——首届 VITA COCO 瀑布跳水精英赛捷克选手折桂

10月22日，首届 VITA COCO 瀑布跳水精英赛在贵州省赤水市赤水大瀑布景区举行，12名来自国外的顶尖跳水高手上演了一场“勇敢者的游戏”，其中来自捷克的米歇尔·拉蒂尔在第二轮比赛中倒立起跳，完美连贯的动作赢得了128.2分的最高分，最终以209.95分的总分一举夺得比赛冠军。

#### 12勇士在彩虹上翻腾入水

首届 VITA COCO 瀑布跳水精英赛的举办地赤水大瀑布高76米、宽80米，是我国丹霞地貌上最大的瀑布，

也是我国长江流域上最大的瀑布。此次比赛是在赤水大瀑布后方设置距离水面27米高的跳台，当选手起跳入水，时速将达到83公里/小时。

参加2016 VITA COCO 瀑布跳水精英赛的选手分别来自美国、哥伦比亚、捷克、保加利亚、法国、德国、澳大利亚、墨西哥、乌克兰、白俄罗斯等10个国家，其中年纪最小的选手23岁，年纪最大的选手40岁。

比赛当日赤水大瀑布阳光明媚，还出现了美丽的彩虹，但瀑布带来的风力以及喷薄的水雾给运动员带来不少压力。另外，由于瀑布水量突然增大，主办方考虑到



运动员的安全问题将原计划进行的三轮比赛改成了两轮，并及时在河道上游减缓了瀑布的流量。其中，第一轮（1跳）进行规定动作，难度系数3.8；第二轮（1跳）为自选动作，参赛12名选手可根据自身和竞争情况选择难度。

据悉，获得首届VITA COCO瀑布跳水精英赛的前三名分别是来自捷克的米歇尔·拉蒂尔、以4分之差屈居亚军的哥伦比亚选手米格尔·加西亚和来自保加利亚的托尔多·斯帕索夫。

### “超人”高难度跳水一举夺冠

获得此次比赛冠军的米歇尔·拉蒂尔外号“超人”，他在第二轮比赛中完成的动作是倒立起跳，向后翻腾两周半，转体三周，难度系数5.7，是除目前极限跳水世界纪录保持者凯尔·米特里内外所选难度系数最难的动作。他一出场就展现了强大的气场，被解说员大赞有“超人范儿”，最后非常成功地完成了所有动作。

“超人”告诉记者，他跟中国非常有缘，因为他是在中国深圳开始的悬崖跳水生涯，曾经历了7个月的艰苦训练，而此前自己曾是体操运动员。拉蒂尔曾在悬崖跳水过程中因腹部入水导致被水拍伤吐血，还扭伤了手腕，也因为一直在跟自己的伤病作斗争的经历，被朋友们亲切地称为“超人”。他说：“我很喜欢跳水比赛，练过这么多的体育项目，悬崖跳水对我来说是最特别的一个项目。”

据裁判介绍，拉蒂尔的空中姿态和入水都比较完整，而且动作难度很大，所以五名裁判都给他打出了高分。

### 悬崖跳水将有望在国内推广

“中国悬崖跳水第一人”杨光担当了此次VITA COCO瀑布跳水精英赛的解说。杨光是10米台专业跳水运动员，19岁因伤退役后开始接触悬崖跳水。他表示，目前国内运动员接触悬崖跳水项目比较少，除中国缺少培养极限运动的文化土壤外，竞技体育的不同训练方式也使得国内外选手对待极限跳水等项目的观念产生了差

异。“不过悬崖跳水项目已经列入了世界锦标赛，而我作为爱好者也在努力让这个项目在国内发展起来。”杨光说。

据杨光介绍，悬崖跳水起源于南美洲，一般都是在大自然中举办，受环境的影响比较大。在本届VITA COCO瀑布跳水精英赛中，风力、水流等非人为可控的因素很多，这就要求运动员首先要具备适应环境的能力。杨光表示，极限跳水项目门槛较高，首要条件便是选手的跳水基本功，其次才是胆量等冒险精神的需求。“没有从小训练的基础，单凭胆量是没有办法完成的，因为跳水这些技巧型项目讲究的就是童子功，必须从小训练，过了一定的年龄，再怎么练都达不到那种水平了。”

作为此次比赛的主裁判，肯·格罗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从1998年就开始担任各种极限跳水比赛的教练，18年来一直在努力让悬崖跳水运动进入奥运会。“目前全世界仅有数百人参加悬崖跳水运动，虽然这项运动本身难度很高，对自然环境的要求也很高，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事这项运动，也让我们看到了努力的成果。”





## 《行尸走肉》：末日生存和社会寓言

文 / 驳静

10月23日，《行尸走肉》第七季第一集首演，单是美国本土电视端的观众数就超过了1700万，这个数字几乎是《权力的游戏》最高纪录的一倍。

关于《行尸走肉》(The Walking Dead)，最简洁的一句话介绍是，瑞克有一天从医院醒来，发现世界被丧尸占领，从此带领团队开始末日求生的故事。故事当然不会这么简单，但多讲一句，都不免沦为剧透。死的是谁？第六季结束后，这个问题缠绕了《行尸走肉》剧迷们一整个夏天。



2



3

1. 美剧《行尸走肉》拍摄花絮。尤金的扮演者乔什·麦克德米特(左)和塔拉的扮演者阿兰娜·莫特森

2. 《行尸走肉》第六季剧照。格伦和尼古拉斯被困于垃圾箱上

3. 《行尸走肉》第七季剧照。新角色尼根登场

《行尸走肉》第六季，瑞克团队算是遇到了有史以来最大的滑铁卢，尽管以往也有过几次反败为胜的绝地反击，但这一次的对手尼根，明显是各方面都比瑞克强悍的狠角色。更狠的是，尼根举着一根他起名叫“Lucille”的棒球棒，上面缠满铁丝，说：我现在要用它杀死你们其中一个人。

“Was it you?”（是你吗？）格伦的扮演者史蒂夫·元（Steven Yeun），跟剧组其他工作人员一样，走到哪儿都被问到这个问题。不过，在所有上榜的人当中，格伦的“呼声”最高，倒并不是因为剧迷不爱

他，恰恰相反，大家太希望不是他。但事实是，漫画中，格伦正是死于尼根之手。“一切证据都指向是他，但不是他的凭据我也能找出十个。”

格伦是瑞克团队成员当中六个核心元老之一，除此之外，他的特殊之处在于，他是好莱坞历史上如此受欢迎的电视剧中少见的亚洲男性。“他还泡到了白人姑娘。”这大概也是历史上的头一回。“非得等到世界末日，种族歧视才会消失吗？”有人这样嘲讽好莱坞对亚洲男性的刻板印象。亚裔男生，通常扮演的是智商高但木讷的书呆子，以英文不好作为喜剧里的梗，

更是常态。

所以这么特殊的格伦，没人希望他会在第七季开场就死掉，留下有孕在身的玛姬。但，格伦之争，毕竟已经持续了一整季。

## 第 100 集和第 100 期

第七季的预告片已明白地表示，这个人不会是瑞克，那么是谁呢？这大概美国电视剧历史上被保护得最好的秘密之一。剧迷们等不了那么久，于是开始通过各种方式寻找蛛丝马迹。最常见的是查看 imbd 网上每一集的演员名单，谁不在上面了，谁就可能挂了。当然这招早就不管用了。

在外景拍摄地佐治亚州的锡诺亚，居民或远道而来的剧迷，会爬到树上或房顶，就为了看一眼摄影场地里正在发生什么。但在侦查与反侦查这一点上，剧组还是技高一筹，为某些不在场的演员安置替身成了常有的事。

《行尸走肉》的漫画原著兼电视剧的执行制片罗伯特·柯克曼 (Robert Kirkman) 说：“保密是既艰难又有趣的负担，除了第一集死的是谁这个显而易见的秘密，我们还有一整季的秘密要守护。”为了保密，剧组甚至还拍摄了 11 组镜头，表演的分别是瑞克团队每一个人的死，其中玛姬的那段最终还是被泄露了。

剧组的每个人都签过保密协议，剧迷也知道，问了也无济于事，但他们总归不会死心，只要有机会，就会发问。柯克曼本人的应对策略是，每次抛出去的答案都不一样。“弩哥”的扮演者诺曼·瑞杜斯 (Norman Reedus)，就在 10 月举行的纽约漫展上，面对提问时干脆说：“要不我脱了上衣吧。”

同样吊胃口的剧情，还发生在第六季第三集。这回的主角依然是格伦。他和同伴尼古拉斯被困在一条街巷中，前后两个出口都堵满了行尸，不可能逃得出去，二人唯一的倚仗，是个一人高的垃圾箱。所以二人站在垃圾箱顶，全无生路。更令人绝望的是，尼古拉斯的精神状态不稳定，他企图自杀，就在那一瞬间，他举枪自尽，掉落的同时，还连累了格伦。就这样，二人都掉到了围涌在垃圾箱周围的行尸堆中。画面的一半被汹涌而上的行尸们占据，他们掏着内脏，鲜血横流，画面另一半则是格伦在绝望地嘶吼。

这个镜头的障眼法，让格伦看上去既可能死了，也可能没死，总之显得非常暧昧。但最后是一个俯拍镜头，行尸堆叠，很难想象这样的绝地之下，格伦还

能生还。

这集播完，“格伦死没死”成了社交网络的重大议题。一部分人这样自我安慰：“被猪队友坑，这太不符合主角的死法”，或者“按原著，他是死在尼根的棒球棍下，这里应该逃过一劫”。更多人为自己的判断找论据：“他脸上只有悲伤和无奈，而没有疼痛，如果吃的是他的肠子，疼的感觉怎么会不演出来呢？”

不过，这段刻意为之的暧昧镜头，还是引起了许多人的反感，大家一面不愿就此失去格伦，一面又想“给编剧寄刀片”。就像有些剧评人说的：“即便能理解剧组的立场，是为了让我们与玛姬感同身受，但使用这种手段也太下三烂了。”当然，对剧组来说，观众这种全情投入，就是他们想要的效果。

实际上，从该剧最开始，就在传达“没有人是安全的”这一理念，正因为这样，这部剧中的角色不停地有人死去，其中不乏核心成员。杀掉某个角色，成为《行尸走肉》的主基调之一，在某种程度上，这还不断地推动着剧情。

在漫画中，格伦 5 年前就死了，而且是在具有纪念意义的第 100 期，而第七季的第一集，正好是该剧第 100 集。这些细节上花的工夫，让口口声声“要弃剧”的剧迷，也感慨一句“讲究”。

从 2014 年第五季第一集的 1730 万收视观众开始，《行尸走肉》就已经是全美有线台历史上收视率最高的电视剧，这个纪录至今还没有剧集能打破。当晚，它的收视率甚至还超出 NBC《星期日橄榄球之夜》一大截。

## “如果丧尸爆发，最困难的事是假装不兴奋”

硬要分类，丧尸片算是灾难片类型中的一个分支。但在《行尸走肉》2010 年上演之前，丧尸作为文化现象，已经流行了大约 10 年之久。

西方语境里的“zombie”一词，最初的来源是非洲的巫毒教。关于它的起源，其中一个较为令人信服版本发生在 17 世纪被法国殖民的海地。当时的法国殖民者在非洲开垦了大量甘蔗地，奴隶们就在这片土地上日夜劳作。对彼时的海地人而言，生活异常残酷，他们在饥饿与过度劳作之下，唯一的出路其实是死亡。所以不堪重负的奴隶时常徘徊在自杀与否之间，大多数时候，唯一阻止他们这样做的，是对死后变为丧尸的恐惧。因为死后仍然是奴隶，并且在甘蔗田里永久地劳作下去，是他们最大的噩梦。

巫毒教与奴隶主共同编造了这样一个谎言，试图降低奴隶的自杀率。这一招效果不错，后来丧尸这个词逐渐在欧洲大陆流传开来。不过，直到近十年来，丧尸这个形象才成功占领美国流行文化的一块领地，与吸血鬼一起，成为欧美大陆流行的怪物风潮之一。

作为文化现象，又都是怪物的一种，丧尸与吸血鬼常常被比较。吸血鬼毕竟胜在有颜值，而这些从喉咙深处发出吼叫，走路一瘸一拐，人不人鬼不鬼的丧尸，有什么讨人喜欢的地方？许多人想不通。

Facebook上，有一个丧尸爱好者给自己的小组起名为“如果丧尸爆发，最困难的事是假装不兴奋”。克莱姆森大学（Clemson University）丧尸文化的研究者莎拉·劳罗（Sarah Lauro）教授说重要的就是“兴奋”这个词。经济崩溃是虚的，而人类社会的崩溃，借助丧尸为载体，却十分形象。特别是击中头部，看着它倒下的那一瞬间，一切都很具体。

另一个有趣的说法是，如果说吸血鬼是少女的幻想，那么丧尸就是少男的幻想。

柯克曼觉得两者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关注的主体。一个吸血鬼主题的故事，往往讲的是吸血鬼本身，而丧尸故事，则意味着真正的主题是人类如何应对丧尸。“它构成的是由外向里的观察视角，人们不可避免地要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这是什么？它为什么会发生？这太可怕了，我该怎么办？”

丧尸电影大概充当了流行时尚中的T台模特角色。早在1968年，乔治·A·罗梅罗（George A. Romero）导演的《活死人之夜》（*Night of the Living Dead*）在美国上映。就像50年代阿西莫夫在《我，机器人》中制定了“机器人三定律”，罗梅罗在这部被称为“丧尸类型片鼻祖”的电影中制定了“丧尸四定律”。后来的类似作品中，基本遵循他设计的这四条定律：因某种原因复“活”；不吃同类；人被咬伤后会被感染成为丧尸；要杀掉丧尸，必须爆头。

《活死人之夜》之后，无数影片都围绕这四条定律展开故事，BBC影评人阿尔玛·哈弗里达森（Almar Hafliðason）称其为“恐怖电影界的一道新的曙光”。不过，丧尸真正进入大众流行文化领域，还是本世纪初。

2003年，《行尸走肉》漫画出炉，同年，出生于70年代的作家布鲁克斯（Max Brooks）出版了一本《丧尸生存手册》，畅销一时。除了写作还同样从事电影行业的布鲁克斯说，有那么10年时间，他一度想宣称丧尸类型片已死。直到90年代末，他察觉到了回暖，

他觉得丧尸是人类对世界末日和死亡的双重恐惧与想象。悲观地讲，面对环境和未来，人类社会只会遭遇越来越多的打击，恐惧只怕会加剧。

“但是没想到回归的势头这么猛烈，而且可以持续这么长时间”。

他说的这个回暖，最早来自1996年的电子游戏《生化危机》（*Resident Evil*），这是电子游戏中第一次出现丧尸形象，此后以它为基础改编的系列电影也大受欢迎。电影当然是它流行的最大功臣。除了罗梅罗此后的“活死人系列”，2003年，丹尼·博伊尔（Danny Boyle）的《惊变28天》（*28 Days Later*）也影响重大。

更何况，在世界末日这张白纸上，创作者们可发挥的空间实在太大了，丧尸作为外部危机，又增加了幸存难度值。无论是电影还是游戏，丧尸画面效果容易做得很出彩，游戏创作者更是认为：“它们不是人，却又是人，血腥和暴力特效用在它们身上，给玩家带去的刺激显然是事半功倍的。”

罗伯特·柯克曼则认为，丧尸这一文化现象会长时间地流行下去，他觉得丧尸是人类对世界末日和死亡的双重恐惧与想象。悲观地讲，面对环境和未来，人类社会只会遭遇越来越多的打击，恐惧只怕会加剧。

## 你的末日野心有多大

丧尸占领地球，末世乱象，你是幸存者之一。光是这样一个假设，就已经足够令人心潮澎湃。你尽可以自由地想象，对付丧尸，自己最擅长使用什么武器，必杀技又是什么。在《行尸走肉》中，最著名也最令人向往的两样兵器，一个是弩，一个是日本武士刀，使这两般武器的，也因此得名“弩哥”和“刀女”。我仍然记得刀女第一次出现时的样子，她身着长袍，脸隐藏在帽子中晦暗不明，武士刀划过漂亮的弧线后停在身侧，而身后，是她用铁链锁住的拔掉牙齿砍掉手臂的两具行尸。她在第二季最后一幕，几乎以从天而降的方式出现，十分惊艳。

另一个可以想象的境况就没那么令人愉悦了：丧尸以外，你杀戮的底线是什么？

一开始，瑞克的理念是“不杀人类”，十分理想



《行尸走肉》剧照。瑞克和他的儿子卡尔

化。很快，这个想法在弱肉强食的生存挑战前难以为继。杀人是必须的。这个立场第一次旗帜鲜明地登场，是在第二季的酒吧场景中。瑞克和格伦去那儿要领回受了刺激正借酒浇愁的农场主赫谢尔，走之前闯进来两个陌生人。这一场的气氛调控非常到位，五人之间的对话内容是家常闲谈，空气中却是凌厉的剑拔弩张，枪战几乎一触即发。果然，僵持之下，瑞克在对方拔枪之前迅速解决掉了对手。

前两季，算得上瑞克在面对末日时的价值观重塑过程。最直接反映团队价值观的，是他们在面对新人时提的三个问题：你杀过多少行尸，你杀过多少人，以及为什么杀这些人。任何犹疑都会被认为是问心有愧，那么这个人或许并不值得信任。

但如果你野心稍大一些，假设自己是团队首领，你不得不面对的考验是，后末日的文明消逝时期，你的团队所遵循的理念是什么，延展开来，则是你所建

构的社区会处在哪种秩序当中。

瑞克团队是典型的以家庭为关系纽带的群体，第一季中的幸存者到后期只剩六个，瑞克团队就是以这六个核心成员为中心的家庭关系的总和。这种“亲戚选择”和“互惠利他”的合作形式，生物学家在几百万年前就找到过自然来源。

丧尸爆发意味着社会失序，人类社会回到西方哲学传统所说的“自然状态”。在所有造成世界末日的起因当中，丧尸是最适合重新建立各类社会秩序的一种。人类文明在失去能源后所剩无几，对生产资料的获取方式几乎回到原始社会时期，而人类的思想又处在与之极为不匹配的超前状态。

在这样的矛盾下，《行尸走肉》为构建各类社会模型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自由空间。按照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在《利维坦》（*Leviathan*）中的理论，自然状态就是“所有人杀所

有人”。这正是《行尸走肉》中各团队之间纷争的本质。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城邦的看法都是“合理城邦必须存在”，而且有与之相匹配的人性。

自从丧尸爆发，瑞克团队一路走来，遇到了各类社区，最为典型的是总督领导的“Woodbury”。对不知情的居民而言，这个社区无疑是末日里的桃源，他们日常生活质量与末日几乎无异，水电供应俱全。总督本人却是一个独裁者形象，对内，他擅长煽动和蛊惑人心，但决策上却丝毫不容他人置喙，对外，为了掠夺资源毫无底线。

Woodbury 崩溃后的另一个典型社区是“Alexandria”。领导者迪安娜原本是一位国会议员，社区里也时常有议事会，重大决策通常也由投票决定。这显然是个末日乌托邦，只不过，其中的成员仍然不堪一击。

短暂出现过的医院，则是一个由女警为首领的阶级性显著的社区，并且每个成员的存在意义也以劳动生产力为唯一称量标准。以法律为运行基础的社团也出现过，只不过他们所拟的两条法律极为简单粗暴：“谁先宣告某样物资的所有权，它就归他”以及“撒谎者死”。其中的“圈地标为己产”，大概能叫卢梭重新追溯其为不公平的起源。

但不论是哪一种社区模型，将安全性倚仗于堡垒的防御能力，而不加强团队成员的战斗力，都是行不通的。无论是 Woodbury 还是 Alexandria，这里的生活看上去很美好，许多成员甚至纯真到对外面世界的残酷一无所知，但最终还是逃不掉倾覆瓦解的命运。

## 资本主义的栅栏迷恋

第三季中，瑞克团队一度逃到一所监狱避难。想来还挺讽刺，原本是限制人自由的地方，由于铁丝网，竟成了为数不多的安全之地。原本因犯罪而成为阶下囚的人们，也反而因此平安活到现在。

丧尸世界中，铁丝或高墙之内，才有文明社会之光。

这两个意象，正是彼得·斯洛特戴克（Peter Sloterdijk）在《资本的内部》（*Im Weltinnenraum des Kapitals*）一书中提到的“栅栏”。书中，斯洛特戴克写道，资本主义某种程度上由创造特权空间为运作前提，门禁森严的庄园、保卫齐全的百货公司，甚至欧洲大陆这片堡垒，都是为了将没有钱的不受欢迎的人群拒之门外。

被拒绝的大部分人就是那些看上去不像本地人、不会本地语言的外来者。丧尸当然没有被列入其中，但它们本身的属性以及与所在世界的关系，若和斯洛特戴克描述的外来者对比来看，会发现两者之间何其相似。

1851 年为第一届伦敦世博会设计的水晶宫，正是资本主义栅栏迷恋的明证。在由园艺师设计的透明华丽的水晶宫内，曾展出过当时最丰富的动植物和工业产品。水晶宫这样一个封闭环境中，温度可控，而且绝对卫生，这个空间以外的战争、种族灭绝、奴隶以及传染病就显得毫不相干。斯洛特戴克将其称为“资本主义的完美蓝图”，他写道：“今天谁能否认，西方世界尤其是欧盟的初级诉求，就已经暗含了一个如此伟大的内在？”

而栅栏外的世界，正是霍布斯所描述的“自然状态”——“没有艺术，没有文学，没有社会，最糟糕的是人们总是处在致命暴力的恐惧与危险中。人的生活孤独、贫困、卑污、残忍而短寿。”如今的生活里，还有新成员丧尸。

从这个角度，《行尸走肉》在欧美如此受欢迎的原因之一，正是来自他们对当下所处世界的一股隐忧。

特朗普宣称要在墨西哥边境修建一堵墙，欧盟在难民政策上反反复复。实际上大家对恐怖主义威胁和移民，的确一直以来都忧心忡忡。他们最大的噩梦莫过于被他们驱离舒适的家园。

但阻止外来者侵入，至少在《行尸走肉》里，从来没有实现过。瑞克一行人，从农场开始，一路寻找到的安全堡垒，每一次都以被丧尸攻占而告终。更可怕的是，“我们”成为“它们”，只差一个“bite”（噬咬）的距离。

无奈的是，他们还是必须不断寻找，它的首要标准仍然是安全，要能够将行尸阻挡在外。对栅栏的迷恋又不得不关乎生存。

第一季开头，瑞克在去往亚特兰大的高速路上，满眼看到的都是被抛弃的车。荒废车辆的镜头重复出现在这部剧中，几乎成了通往大城市之路的标配。《卫报》的一篇文章试图在现实中寻找对应之处，它举的例子是 5 年前的日本福岛核事故。2015 年，波兰摄影师波尼辛斯基（Arkadiusz Podnieszinski）进入禁区，拍到的照片当中也尽有废弃的车辆，毁掉的居所，人类世界的崩塌。“核事故后的福岛，就像《行尸走肉》里的末日世界。”

# 从《欲望都市》到《离婚》：年龄和经历

文 / 张月寒

《欲望都市》女主角最新的一部作品《离婚》开始播出，我们和该剧主创莎伦·霍根（Sharon Horgan）谈了谈这部新剧。

从上世纪90年代至2004年，《欲望都市》这部美剧在全球引起了巨大风潮，到现在仍是百看不厌的经典。而剧中主演莎拉·杰西卡·帕克，也因为在这部剧中标志性、深入人心的表现，女权主义的精致台词以及剧中交替纷繁的时尚穿搭，还有现实生活中她本人的人生选择和接受采访时所透出的真正亲和力，成为很多人的榜样性力量。而今年10月份在鼎级剧场播出的这部新美剧《离婚》，是她在2004年《欲望都市》最终季完成后，首次重返小屏幕、自己在策划阶段就参与的一部电视剧。

我们望着她，在纽约某棕石公寓为“单身也可以很精彩”呐喊了整整一代人，又在票房都超过30亿美元的两部《欲望都市》电影中目睹她终于结婚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而如今，她又在这部最新的美剧《离婚》中出轨、挣扎、背叛、暴露。

这部剧的发生背景是纽约郊外一个富人区——韦斯特切斯特县（Westchester County），拍摄时间也是在冬季。帕克在剧中饰演女主角弗朗西斯，她和丈夫罗伯特已经有了各种矛盾很多年。但是第一集开头我们是什么都看不出来的，只看出对互相有点厌倦、觉得彼此碍眼的中年夫妇。而后，他们一起去参加了朋友——拥有连绵透明落地玻璃窗巨大宅邸的一对夫妇——的生日派对。在这次生日晚宴上，各种中产阶级夫妇的矛盾和问题在一点一点堆积、爆发，终于，一声枪响过后，本剧的主题——离婚，扑面而来。

与《欲望都市》最大的不同是，《离婚》中，帕克的形象终于不那么完美、正面、积极了。《离婚》中为我们展现的，是一个缺点满身又似乎很“作”的中年女性。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女主角本人是这部剧里的“反派”。出轨的是她，提出离婚的也是她，提出离婚后因为情夫不是认真的转而再向丈夫示好决定不离婚的又是她。截至目前剧集更新为止，男主角罗伯特的形象是倾向于观众同情的一方的。这与《欲望都市》中男女角色的设置截然相反。该剧主创莎

伦·霍根告诉本刊，他们就是想要拍摄一种不那么完美，甚至不负责任、很“作”的一种中年女性形象。“这和以往不同。”莎伦·霍根说，“而这和帕克本人的形象又是极冲突的，因为她本人是一个那么容易讨人喜欢的人。由这种形象去演绎这个不那么讨人喜欢的角色，难道不会非常有意思吗？”

离婚，是不是总是一种丑陋的过程？这是本剧探讨的核心点之一。当你经历和另一个人的“合法分手”，当初将你们聚集在一起的那种美好、已经共同生育了几个孩子的纽带，究竟在这场“浩劫”中还能剩下多少呢？

加拿大作家克里斯多福·孟在《亲密关系》一书中说，一段关系中，“痛苦的浮现”是件好事。他说现代人寻找这种亲密的“灵魂关系”，其实就是在黑暗中摸索。因为事实上在寻找伴侣这件事上，我们是没有任何指引的，只是一种内心的深层呼唤在不断跌跌撞撞。有些人撞得鼻青脸肿终于放弃，有些人却幸运地找到，从而结为夫妇。而在《离婚》中，正是探讨这种密质、胶着的“亲密关系”之后，两个人想要解体，究竟要经历些什么，以及探讨美国当今社会中产阶级夫妇走向离婚的最深层原因。

主创莎伦·霍根在采访中介绍，她和HBO一起研发这部剧做了很长时间的准备。最初有这个想法是在4年前。在和帕克吃过一次午饭后，她们探讨了这部电视剧的许多细节。而莎伦·霍根感觉帕克最感兴趣的一个点其实是“背叛”。这种背叛具体指什么呢？在剧中，弗朗西斯的出轨很显然是一种“背叛”，而在婚姻咨询那一集中，丈夫罗伯特自曝自己曾经差点开始的一次出轨被“9·11”打断，还有自己长期和一个大学女同学的交往，被弗朗西斯认为是“精神出轨”，这些是否都是帕克所感兴趣的“背叛”呢？目前此剧更新仍未结束，相信每播出一集，观众都会对此有一种更深层的感受。

在具体写剧本时，莎伦·霍根说有很多灵感是从她自己的生活中直接吸取过来的。虽然她本人没有经历过离婚，但是婚姻生活中的很多细节是可以产生灵感的。“有时，当我们凝望别人的生活时，我们会突然生出某种想法：哦，我想要那种生活。或者，哦，我不想要。这也是我们设置第一集，当弗朗西斯看见她的朋友差点用枪崩了她丈夫以后开始思考自己人生的一



美剧《离婚》剧照

个原因。一直以来，我们行走于自己的生活中，也许一直是被蒙蔽了双眼的行走。而剧中的那声枪响，有可能正是弗朗西斯的觉醒之敲。这一点也可以说来自我的直接经验吧。在现实生活中我也经常看着别的伴侣们的日子，然后反思自己的生活。”莎伦·霍根告诉本刊。

在采访中，霍根多次强调这部电视剧的类别是“喜剧”（Comedy）。“这不是一场华丽的、好莱坞式的‘离婚’，而是一场乱糟糟的、中产阶级的、现实感十足

的‘离婚’。所以，我认为这一题材用这种喜剧的形式表现是十分重要的，否则，它会变成一部十分沉闷、无聊的戏。”莎伦·霍根说。

细观这部剧，虽然它不是我们期待的那种典型的美式风格喜剧，可是其间深刻内敛的英式幽默还是时不时泛了出来。这或许由于莎伦·霍根是一个英国人。台词诸如“她（戴安的宠物狗）受不了房间里的空气所以把自己噎死了”（She couldn't handle the



美剧《离婚》主创莎伦·霍根

atmosphere in the house so she choked herself to death), 这种典型英式幽默台词也只有曾经写过《Pulling》《Catastrophe》的莎伦·霍根才写得出来。而剧中弗朗西斯的出轨对象朱利安的英国口音也是呼之欲出。最为讽刺的一点是, 丈夫罗伯特一直称朱利安为“法国人”——英国人一直不喜欢法国人, 殊不知在美国人眼里, 基本分辨不出他们的区别。这种自嘲之风, 也是英式幽默中典型的一点。

诗人考珀曾经说: 家庭的幸福, 是你唯一可享的天佑, 那是来自天堂的幸福, 不受人类堕落的左右。1799年, 汉娜·莫尔在《女性现代教育体系之责难》中引用了这句诗, 并在书中认为婚姻像圣礼一样能为男女双方提供一种相互的满足感。

虽然, 不管是考珀还是汉娜·莫尔, 都是终身未婚的。

在那时, 《婚姻法》让离婚变得困难和昂贵。而现在, 离婚没有了那么多宗教的负担和中世纪时财产分配的不公, 但终究, 它还是一件耗人心力的事。具体到这部美剧, 离婚这个行为在刚刚更新了几集之后, 就已经向我们展露了许多人性中无法想象的丑恶行为。其中矛盾最集中的一个爆发点, 就是婚姻咨询室

里的那个片段。

目前已有很多评论认为这部电视剧是对婚姻咨询的一种讽刺。婚姻咨询在西方国家是一种普遍现象, 一般出现矛盾自身无法解决的伴侣, 通常会看一个具有执照的心理咨询师, 让他(她)分析彼此间的问题, 以期能修复关系。西方人一般也认为, 婚姻咨询是一对夫妇在离婚前为自身做的最后一次努力, 虽然经历过婚姻咨询仍然离婚的夫妇在西方国家中仍有很多。

《离婚》中, 收费不菲的婚姻咨询师在面对弗朗西斯和罗伯特相互的倾诉、争执、吵架时没有任何反馈, 只静静地坐在沙发椅子上, 不时拿笔记着什么。而在婚姻咨询室外等待的另一对夫妻设置其实颇有深意。第一个星期, 那个妻子顶着半边熊猫眼, 明显是家庭暴力的结果, 弗朗西斯禁不住望着她; 第二个星期, 镜头就拍摄这个被家暴的妻子已经跟她的丈夫有说有笑。很多剧评都说这是这部剧最“黑暗”的某一点。而我也认为, 这个镜头深层琢磨下去, 是极恐的。

此剧一出, 相信很多人不免会将《离婚》和《欲望都市》比较。如何将之前《欲望都市》中太过鲜明的“凯莉”形象和《离婚》中的弗朗西斯区别开来? 莎伦·霍根说: “当然, 她看起来不同了。这个角色

也是非常不同的，但我们并没有刻意往某种特定的方向去塑造莎拉此次的角色。”

该剧在纽约的冬天拍摄，剧中让人感动的漫天雪景是纽约郊外冬季的一大特色。而在《欲望都市》中衣着上一直布料非常少的莎拉，此次终于套上了实用但并不臃肿的冬装。和《欲望都市》一样，帕克的服装造型在这部剧中同样是一个亮点。作为定位为一个将近 50 岁的女性角色，服装师为其选择的更多是优雅连衣裙，剪裁合体的各种大衣也是她的常穿之款。然而，当弗朗西斯剧中穿着高跟鞋收拾丈夫堆在房间外边吃剩的碗盘时，还是会让人寻思：在家里也会穿高跟鞋吗？

之前《欲望都市》被认为是女权主义的某种呐喊，催生了一大批不同年龄层的女权主义者，那么，《离婚》是否也同样是一部女权主义美剧呢？

“你可以认为这是一部女权主义的电视剧，我自己也是个女权主义者。然而，这也是一部关于一个已经到了中年的女人，在某一天突然开始意识到自己想在生活中拥有更多的电视剧。她的野心，她本身的性格本色，她将家庭放在第一位的本能，这一切都让她开始意识到，她其实已经缺失了很多自我。这是一部关于一个中年结婚女人寻找她结婚之前某种自我的故事。”

关于“缺失自我”，剧中集中体现为弗朗西斯的

房产中介说，在过去的几年中，中介带弗朗西斯看了无数房子，以便为开画廊所用，但弗朗西斯却总在最后一刻临阵脱逃，导致自己想开一个画廊的愿望一直没有实现。

截至目前，在鼎级剧场播出的第一集或许是最精彩的。派对，香槟，闹剧，最后以他们富有朋友的枪声作为平凡生活的一个凸点。从这以后，一件事牵扯出另一件事，牵扯出十几年的婚姻生活褶皱中所隐含的秘密、矛盾。这一对夫妻，从亲密关系迅速走入敌对状态，用时非常短。然而，第一集也很容易让人联想到 1966 年的经典电影《灵欲春宵》(Who's Afraid of Virginia Woolf)。该电影当时上映之后引发了巨大的波澜，规定只有 18 岁以上的观众才能观看，也是美国现有 G、PG、R、NC-17 电影分级制度的开端。《灵欲春宵》通过两对夫妇近乎狰狞的矛盾展现了美国 60 年代光鲜表面下诸多的社会问题以及上流社会知识分子的深层精神病态。而《离婚》第一集里郊外夫妇的各种争吵、矛盾、歇斯底里，也让人非常明显地感到了《灵欲春宵》的影子。

无论如何，莎拉·杰西卡·帕克，这个曾经在全球女性惊人一致的共鸣情结中诞生的“美剧女王”“时尚教主”，在《离婚》中是否会让观众产生新的共鸣或带来惊喜呢？这一切，都需要观众自己去获知。☑

## 《新知》2016 年第 5 期上市

(总第 17 期)



读者服务热线电话

(010)84050425 84050451

读者服务部 E-mail: dzfw@lifeweek.com.cn

新浪微博 @新知

微信公众号: 新知 WISSEN

关心一些恒久的事情——理性进步,智识生活的乐趣,美

*Wir müssen wissen. Wir werden wissen.*

### [ 新知 2016 年第 5 期要目 ]

#### Entrée

天空中的微生物

宠物之魅

八卦人生

小人国和暗物质

#### Main

奇美拉的“美丽新世界”

人形动物的人文主义

动物的生活: 后人类主义、鱼和庄子

梦狼: 中世纪北欧狼人与斯塔克家族

鸚科的傲慢与人类的偏见

从“人猿泰山”看人与动物的理想国

本世纪第一个灭绝的类人猿?

冰岛 DNA 档案

#### Fusion

哥白尼颠覆了人类中心主义吗?

当诗歌遇见达尔文和进化论

一切的开始: 伦敦动物园今夕

北京动物园的回忆

丰容: 为动物提供情趣

克服杂草焦虑症

#### Dessert

我们如此不同,又如此相同: 一个人类学家的观察

真实世界中的虚假感觉: 再谈“瓮中之脑”

难道还能给太阳也申请个专利吗?

帕普特和他的 LOGO 教育微世界

影像报道: 奥特伊赛马, 可怕的疾驰

月光下

1BOOK140 短评

### 《新知》2016 年订阅须知

《新知》双月刊, 每期 160 页, 全年 6 期, 零售单价 20 元, 全年定价 120 元。

2015 年珍藏礼盒, 合订本已上市。

2016 年刊开始征订!

读者可到三联生活网订阅: [www.lifeweek.com.cn](http://www.lifeweek.com.cn), 全年订阅 8 折优惠, 订阅年价 96 元。

或在卓越网、京东商城等订阅: [www.amazon.cn](http://www.amazon.cn) / [www.JD.com](http://www.JD.com)





波兰导演扬·克拉塔的戏剧作品《人民公敌》亮相第四届乌镇戏剧节

## 扬·克拉塔：在剧场讨论政治

文 / 奚牧凉

在扬·克拉塔看来，让演员和观众即兴探讨社会问题，其实就是在延续易卜生原著中的精神，“易卜生的戏剧，就是要讨论社会中很难的问题”。

演到第四幕的时候，除了男主角“斯托克芒”的饰演者，其他所有演员都退了场——不只是走下舞台，而是拉开乌镇大剧院的大门，走出去，消失在观众的视野中。随后，“斯托克芒”对错愕的观众们说：“谁懂波兰语，能给我翻译一下？是的，你们不用看字幕

了，下面我要说的这些话，是完全即兴的。”

这是来参加今年乌镇戏剧节的波兰导演扬·克拉塔，在他的这部波兰克拉科夫老剧院作品《人民公敌》中特意安排的桥段，每场演出中的核心段落。扬·克拉塔赋予了“斯托克芒”绝对的自由，以至于当我们追问今晚“斯托克芒”会说到何时，扬·克拉塔再次力图让我们相信：真的，这一段完全由他自己决定，我都不知道。在这一版《人民公敌》此前的演出中，其他“退了场”的演员会好奇地在剧场外偷听今晚“斯托克芒”要说什么。而扬·克拉塔对“斯托克芒”也难免有不同意的时刻：“你想得太简单了，事情不是

你想的那样！”但他转念一想，还是不能打断他，因为在这部戏中，对观众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这就是他的权利。

在扬·克拉塔看来，戏剧与观众交流，是非常关键的事。

## 戏剧，社会的艺术

在我所亲历的那场《人民公敌》中，“斯托克芒”和观众谈到了贪腐、空气污染，波兰1989年从人民共和国变为共和国，还点到了“大跃进”和“文革”。“听说每个中国人都有一辆车，这会不是很污染？”“在你们国家，官员如何收受红包？”在以“社会问题剧”闻名戏剧史的挪威著名剧作家易卜生的《人民公敌》原著中，至第四幕，本就有一场“斯托克芒”与其他角色的“市民大会”。在扬·克拉塔看来，他让演员和观众即兴探讨社会问题，其实就是在延续易卜生原著中的精神，“易卜生的戏剧，就是要讨论社会中很难的问题”。

我所亲历的那场《人民公敌》演出，可能是语言的隔阂增大了中国人和波兰人交流的难度，也可能是现场观众比较羞涩，直到说起政治家控制媒体，观众席中才第一次响起应和的掌声。但此版《人民公敌》在波兰演出时，收获的反响则完全不同。几乎每场演出，都会有观众站起来与“斯托克芒”对话。有些观众会愤愤然：我们是来看戏的，不是来看你谈论社会的！（甚至曾有一场，15名观众拂袖而去）。而另外一些观众则会随即反驳回去：你们闭嘴，不喜欢出去，我们觉得演员讲得很好！每一场演出的即兴所带来的意外，后来甚至成为扬·克拉塔的预期。

其实选择排演《人民公敌》，也是扬·克拉塔与观众对社会的一次讨论。易卜生134年前创作的《人民公敌》原著，故事发生在挪威的一座小镇，镇上的浴场是小镇经济的支柱与希望。但主人公斯托克芒医生却发现，浴场已经被污染了，他的良心让他坚持将真相公之于众。但巧的是，小镇的长官就是斯托克芒的哥哥。因为害怕浴场被污染的真相会重创小镇的经济，他鼓动民众压下斯托克芒的声音，并最终使斯托克芒成为“人民公敌”。而波兰第二大城市克拉科夫，如今面对的境况竟与《人民公敌》的剧情如出一辙：一方面，作为中欧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它曾见证文艺复兴时期波兰作为欧洲东部最繁荣、最强大国家的辉煌。如今城内遍布的历史名胜，让克拉科夫成为波兰

重要的旅游城市，每年有1000万的游客来此观光。而另一方面，克拉科夫又是欧洲第三大污染城市，因为空气污染，一年内有超过200天不宜出门。当环保主义者贴出抗议空气污染的招贴画时，政府会反问：你们抓着克拉科夫的污染不放，不怕影响旅游业吗？这可是我们这座城市财富的来源。

在此版《人民公敌》中，国家背景被有意淡化。“我们选了一个挪威的故事。挪威和波兰很远，他们应该和我们没什么关系吧。”扬·克拉塔狡黠地说。

回看扬·克拉塔的创作经历，他此前的几乎所有作品，其实都和《人民公敌》一样，或多或少带有社会、历史、政治的意指，这让论者已将其作品直接标签为“政治剧场”。早在2003年他的第一部独立职业作品《钦差大臣》中，扬·克拉塔就将果戈理的这个带有“官场现形记”色彩的故事，从19世纪的俄罗斯，移植至了上世纪70年代社会主义化的波兰。正是这部作品，让扬·克拉塔一炮而红。扬·克拉塔之后的代表作《H》，首演于2004年，改编自《哈姆雷特》。这次扬·克拉塔又将这个观众耳熟能详的故事，从丹麦的王宫搬入了上世纪80年代的反共组织——团结工会的大本营格但斯克造船厂。《H》的重点落在了原著中的年轻一代——哈姆雷特、雷欧提斯、霍拉旭，以及罗森格兰兹和吉尔登斯吞，按照中央戏剧学院沈林教授的理解：“今日波兰青年一代抚今追昔，就成为哈姆莱特，带着警惕和狐疑观察、考量今天的统治者和他们的制度。谁被谋杀、被遗忘、被占据了王位和床第？难道是游荡在空旷船坞里那昔日的团结工会理想？”而即将在11月4日至6日于首都剧场精品剧目邀请展演中演出的《李尔王》中，扬·克拉塔又将原著中的核心人物李尔王变为了梵蒂冈教皇，他要将自己的财富分配给女儿。这部引发观众讨论当今梵蒂冈教会宗教权力的作品，让扬·克拉塔荣获了专门颁发给波兰最佳莎剧呈现者的“金约里克奖”。

按照扬·克拉塔自己的话说：“对我来说，戏剧是一种社会的艺术，它是发现社会中的问题、危险，

在此版《人民公敌》中，国家背景被有意淡化。“我们选了一个挪威的故事。挪威和波兰很远，他们应该和我们没什么关系吧。”扬·克拉塔狡黠地说。



波兰戏剧导演扬·克拉塔

并处理、解决它们的方式。”

### 被反对，证明戏剧很重要

2013年1月，扬·克拉塔从公开招募中脱颖而出，成为克拉科夫老剧院的院长。这所波兰最古老的剧院之一，历史可上溯至1781年。波兰戏剧史上几乎所有伟大的导演，如格洛托夫斯基、康托，都曾是其的合作伙伴。而相较于克拉科夫老剧院的悠久历史，扬·克拉塔走马上任时，可能确实太年轻了，2013年他刚满40岁。且不论扬·克拉塔作品激进的政治诉求，就是如此版《人民公敌》所展现出的荒诞不经（譬如斯托克芒的哥哥没有戴原著中的礼帽，而是戴了一顶草绳编的孔雀开屏式的头冠），便可以让我们明白，为什么当年扬·克拉塔的上任会引发喧嚣的争议。甚至于扬·克拉塔“叛逆”的发型，都看起来可能不该为一所历史悠久的剧院的掌门人所有——其他地方皆

剃光，唯有一竖条头发突兀立在后脑勺中间，仿佛一片平地之上簇被刻意留下、整齐修剪过的灌木丛。

近两年曾来华的波兰戏剧大师陆帕，既是扬·克拉塔的老师，也曾是克拉科夫老剧院的导演。在公开招募时无人与他沟通，日后才得知自己的徒儿成为院长的他，对这一结果十分不满，直接表示扬·克拉塔不适合领导剧院，他不会再在剧院工作。陆帕对扬·克拉塔的不支持不是个例。剧院中一些60多岁的功勋演员，也拒绝尝试扬·克拉塔的新风格；还有一些20多岁的演员，如扬·克拉塔所言，“头脑也像60多岁一样保守”。对于这些演员，扬·克拉塔的处理无奈而果决：要么您主动离开，要么我请您离开。

如今上任已三年，扬·克拉塔这位其实待人和善而富有雄略的导演，终于证明了自己，逐渐将剧院的航向转向了他所憧憬的方向——多元化、社会化。今年上半年，中国实验戏剧导演田戈兵与克拉科夫老剧院合作的《十诫》首演，获得了波兰观众的两极评价：一般每场300多观众，60多人会不悦退场，200多人会表示“嗯，有意思，我要回去想一想”，另有至少十几人则会喜爱至极热烈鼓掌。在扬·克拉塔看来，与这位来自遥远中国的导演合作，便能给剧院带来他所期待的多元化风格：“我觉得和田戈兵的合作很成功，因为他的经验和我们完全不一样，这样的冒险很有意思。我们的观众也在慢慢习惯这样的新风格。最大的问题倒是在评论家，因为他们说：‘奇怪，这样的东西我不懂！’”

而扬·克拉塔坚持的“戏剧不能把自己关在假的世界里，要和真的世界有联系”的观念，也让克拉科夫老剧院的观众群得以逐渐年轻。因为克拉科夫老剧院是波兰全国仅有的两家隶属于文化和民族遗产部的剧院之一，扬·克拉塔曾被人担心当局会对他不满，而现在他不无自豪地说：“你看，政府把官员都换掉了，还是没有换我嘛！”不过如今在克拉科夫老剧院里，还是会有反对扬·克拉塔的右翼分子，故意吹喇叭干扰演出。对此，扬·克拉塔反倒毫无愠怒，因为他在西欧国家如德国发现，那里的人们对戏剧的态度是“有礼貌的无所谓”，人们只是觉得，有品位的人应该每年去看几场戏剧而已。“德国人很难在剧场中受到侮辱。即便希特勒被摆在舞台，德国人也只是会觉得，‘嗯，希特勒，他们有这样的艺术处理’。”而在克拉科夫老剧院中能听到的喇叭声，扬·克拉塔表示：“很好啊，我很高兴。因为这恰恰证明了，戏剧对这个社会很重要。”



## 麦语云栖：在长城脚下，归去来兮

或许在还未理解“离开”二字真正意义的时候，我们也会跟着歌儿唱“到不了的都叫作远方，回不去的名字叫家乡”。后来是陶渊明的“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好似当头一棒，直击我们内心对于田园、对于家乡、对于生命之根的渴望。在司马台长城脚下，有一间拥有温暖名字的酒店——麦语云栖，它遵循着“寻觅自然之境，发现设计之美”的理念，以独栋田园式院落的方式打造出“中国北方第一家最舒适自然的度假美宿”，成为都市人安放在自然之处的“家”。

麦语云栖始于2013年。作为设计者和投资者的墨臣团队来到司马台新村，一下被这里吸引。沿途绵延不绝的山峦、满眼的开阔、令人意想不到的每一处转角后的新风景，令他们回想起家乡已逐渐远去的那山那水，唤回繁忙都市里那份久违的宁静与轻松。记忆中一个个隐隐的发光点，撩拨着他们心中越来越迫切的回归。于是他们开始雕刻那些从城市生活中抽离的时光，用乌托邦式的青山绿水和悠闲的田园氛围，将都市人从交通堵塞、雾霾、工作等压力的牢笼中解放出来，心静如初，回归自然。

麦语云栖从无到有，前后经历了两年光阴，由此也开创了全新理念的乡村度假模式。“麦语云栖”这个名字极具画面感，宛如清风吹过金色麦田，营造出阵阵舒缓的麦浪，沙沙如语；朗朗晴空中空游至此，天地景致相映成趣。简单四个字，顷刻间却将一幅幅自然幽静的田园景象呈现眼前。

有别于大众印象的酒店，麦语云栖并没有采用个性张扬的装修风格，它营造出的氛围更像是“家”的感觉，自然舒适，温暖随意。由于麦语酒店的原始建筑，是当地政府对村民住房改造后建成的“农家乐”型村落，因此酒店在改造前便接到了“不允许对既有建筑的外观及色彩加以改动”的要求。这对于建筑师而言，就好似一次苛刻的命题作文。于是，赖军和他的墨臣团队克服了重重困难，对整体的既有空间进行了整理与改造。

麦语云栖的建筑风格以艺术、环保的理念为出发点，选用具有温暖质感的实木、老榆木，自然朴素的红砖、混凝土，做旧钢材和金属材料作为结构及装饰元素，彰显酒店现代自然气质的同时，增添整个空间的叙事意味。酒店内的家具也为此专门设计，清新原木搭配简约轮廓，删减掉所有繁琐，以舒适为导向，强调回归自然。别墅中的私人庭院以小麦色为主色调，与室内风格相呼应。户外桌椅、儿童游乐设施以及花草小景的布置装点，营造出一片悠然惬意的小天地。披着午后暖阳，和家人好友围坐于庭院，品一壶茶，说一席话，体会时间慢下来的美妙滋味。开豁与私密性兼具的完美空间，为举办室外婚礼、烧烤派对、露天电影等各种户外活动提供了无限可能。

麦语云栖的多种户型足以满足不同人群的度假安排。除了独立卧室与盥洗室，设计者还将客厅、Mini吧台、娱乐室、棋牌室、简易厨房等公共区域融入其中，让整个空间更有“家”的样子。充足的室内采光，带给别墅“主人”温暖舒适的入住体验。源于墨臣自身的设计者身份，麦语云栖时常还会举办艺术展览、讲座等活动，在自然轻松的氛围里与艺术来一次亲密接触，岂不妙哉。

对比出差途中的匆匆一宿，麦语更适合与家人、朋友的温馨团聚，或开展团队建设和会议活动。入住一间别墅，就如同进入了私属桃花源，在这个只有你们与自然美景的地方，真正找回如孩童般轻松、快乐的自己。在麦语云栖的创始人赖军看来，它不仅是一间酒店，更是一个开放包容的如“家”一般的居所，为都市人呈现一种生活态度：归去来兮，适当地放慢脚步，自在地解放身心，把时间交还给最亲密的人，回归珍贵美妙的生活本身。

无论身在何处，生活都是一段关于美学的旅行。美，是要用眼睛去发现的；美，是要用身体去体验的；美，是要用心灵去创造的。美，并非遥不可及。麦语云栖，带您探寻可触摸的生活之美。



陈思诚

# 陈思诚：“成才”的远大前程

记者 宋诗婷

《士兵突击》里，袁朗对成才说：“你的路还很长，比许三多要长得多，同时，你的迷茫也要比他多得多。”10年后，这话放在陈思诚身上，似乎依然受用。

司机走了几次冤枉路，终于把车停在象山影视基地的春秋战国城门口。我撑伞下车，随工作人员走向片场。9月末，江浙一带雨水密，影视城里开工的剧组不多，陈思诚一人身兼编剧、监制、主演的电视剧《远大前程》正在这里拍摄。

转过一道弯，几辆集装箱车一字排开，隐约听到不远处的热闹。走到车队尽头，再转进一个院子，刚刚若隐若现的热闹就都在眼前了。

工作人员带我绕过电线、反光板、散落的桌椅和候场的演员，钻进院子一角落座。“今天是一场群戏，在楼上拍着呢。”顺着说话人的目光抬头看，二层楼高的脚手架上，穿雨衣的场工正在调整灯光。灯很亮，光打下来有暖意，把阴雨天给照晴了。

“安静！”隔壁屋里传来一声吼，“开始！”院子里息了声，灯光里的二楼房间开始有响动。“停！”又一声吼，一楼二楼都安静了。扭头往屋里看，刚吼过的导演突然起身，“噫噫噫”跑上二楼。导演一走，整个院子又热闹起来。

“我也带你去见见监制吧。”工作人员带我绕过监视器，从刚被导演发泄过愤怒的楼梯上楼。走廊昏暗，除道具、桌椅占道外，还横七竖八地站着、坐着些群众演员和工作人员，走到尽头一侧偏房，工作人员和守在门外的人简单交代，对方就示意我们可以进去。

推开门，屋里一张床、一把椅子、一张桌子，桌上一台电脑、一个水杯，陈思诚正坐在电脑前打字，身上穿的是戏服——一尘不染的白衬衫。

“你好，但是，我在写剧本。”

“没关系，我们晚上再聊。”

半分钟照面，我们从屋子里退出来，下楼。“《远大前程》一开拍就是这样，监制一边拍戏，一边写剧本，白天拍，晚上写，拍戏间隙也得找个安静地方继续写。”工作人员说。大家都改了口，拍《北京爱情故事》（以

下简称《北爱》）《唐人街探案》时，陈思诚是陈导，在这个片场，陈思诚是陈监制，导演谢泽是谢导。

雨下了一天，没有停的迹象，计划中的夜戏拍不了了，剧组早早收工。明天就是中秋节，陈思诚的父母也来了象山，老婆、孩子一直都在，借着雨，忙里偷闲，可以安稳地吃个晚饭。

## 远大前程

“这是我最后一部电视剧了。”晚饭后，陈思诚在半岛酒店的大堂里接受采访。晚上10点，餐厅关了灯，我们借着大堂的昏暗灯光聊天，一开始他有些疲惫，但聊着聊着就渐入佳境，话匣子关不住。

这种交流状态，三位《远大前程》的年轻编剧也体验过。三年前，陈思诚导演的电影《北爱》正在后期制作阶段，那时，他已经有了《远大前程》的基本构思——以民国时期的旧上海为背景，讲一个关于选择的江湖故事。有了想法他就迫不及待地开始实施，边盯《北爱》的后期，边找来三位年轻编剧聊剧本。“陈导和我们见面时，通常都很晚了，开始他是躺着聊，越聊越兴奋，就坐起来、站起来聊。他真是精力旺盛。”编剧周航说。

《远大前程》的故事发生在民国，但圆的是陈思诚的江湖梦。与编剧聊剧本，他也常常从金庸的武侠小说聊起。小时候，陈思诚看武侠小说，看“87版”《射雕英雄传》，看李连杰的《少林寺》，从那些江湖故事里，他读到英雄气魄，读到兄弟情义，读到铁骨与柔情。“陈导的记忆极好，金庸小说里的一些情节，他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我们要靠三个人拼凑起来的记忆才能和他抗衡。”周航说。

读得不过瘾，陈思诚就自己动手写，十几岁的年纪，有写尽恩怨情仇的野心。若干年后，光线传媒买了四部金庸小说的版权，邀陈思诚做导演，想拍哪一部，任选。

“反而没有了欲望，前辈们都拍尽了。”陈思诚的表演和创作总是“欲望”先行，拍金庸小说的欲望没有了，但江湖梦依然未泯。如今，这个梦沾染了知识分子的习气，开始和民国产生联系。“中国近代史上最精彩纷呈的时期，黑白两道、十里洋场，那个年代

的选择，那个年代的儿女情长、兄弟情义，精彩纷呈、惊心动魄。”陈思诚总说，他对创作小情小爱的东西没有兴趣，聊起天，也不屑于讲述过往轶事，更喜欢谈论宿命、选择和时代，“喜欢格局更大的东西”。

为写这个江湖梦，陈思诚看了大量民国时期的历史书和人物传记，剧本琢磨了三年，最终的故事很宏大，分成“浮生”“乱世”“碎梦”三部分。“第一部的剧本是我写的，正在拍着，第二、三部主要是三个年轻编剧在写，但他们毕竟经验有限，我要从头到尾改一遍。”

如果再晚开机一个月，陈思诚就有足够的时间改完剧本，但他等不及了。“明年3月，我想开拍《唐人街探案2》，后面还有很多电影项目，《远大前程》现在不拍，以后就没有机会了。”

拍过电影的导演都很难回头拍电视剧，除非为了赚钱。回不了头的原因在于，电影精雕细琢的过程能让创作者更有成就感。“《远大前程》3.5亿元投资，但我必须剪出50集，甚至60集，但我拿2亿元投资，只需要拍一部两个小时的电影，多从容啊。拍电视剧太苦了。”对比现在白天拍戏，晚上改剧本、看素材的苦日子，陈思诚更怀念拍《唐人街探案》时的自在：活儿干得漂亮，生活也过得舒坦。

## 看清自己

中秋节当天，也是象山一年一度的开渔节。连下几天的雨依然未停，开渔节不得不临时取消，海边刚刚架好的演出台也被拆得凌乱不堪。剧组却要照常开工，外景拍不了，只能拍内景。

“哪里敢停，每天上百万元的消耗。”陈思诚隐约有担心，在片场的不远处，剧组耗资数百万搭建了民国街景和一个大杂院，连续的阴雨天，他怕场景受损，影响后面的拍摄。

“你去看看那个场景，特别棒。”陈思诚说，剧组从横店转场到象山，因为这里允许搭建场景。“未来这个场景就留下了，如果再有人用它拍戏，我们就和象山影视基地分摊收入。”

陈思诚觉得，一部影视剧能留下点什么是件特别美好的事。“你知道龙凤铃吧？”他自问自答，“那就是我在《北爱》电视剧里造出来的东西，但它现在大理、丽江都能买到，已经成了云南特产。真作假时假亦真，戏剧以这样的方式回到生活中，很有趣。”

《北爱》的取景地腾冲是陈思诚喜欢的地方，他很懂得在作品中为自己谋福利。喜欢云南，就把程锋

和沈冰的爱情故事写在云南，喜欢希腊，就让电影版《北爱》里中年夫妻的周年纪念日在爱琴海边过，喜欢泰国，就把整个《唐人街探案》剧组拉到泰国。“下一步我想探索纽约，后面还想去日本，我就写日本。”

他用编剧能力为自己谋得了福利，回看他过去10年的发展，迈出的每一步似乎都是在为自己谋取权利和自由。

这种目标明确的人生轨迹从10年前的《士兵突击》开始。陈思诚在剧中饰演成才，能力出众又野心勃勃的成才像是许三多的对立面。那部剧让包括王宝强、段奕宏、李晨、张译在内的所有主角都迈上了新台阶，唯独陈思诚从中受益最浅。“在那之前，我几乎没演过男二号，《士兵突击》里我的片酬还是最高的，播出之后，大家都很有名，只有我那个角色遭到最多诟病。”

陈思诚当然会失落，“但很快就调整过来”。在《士兵突击》之后的这10年里，张译和段奕宏一部戏接一部戏地演，逐渐接近（或已经成为）影帝，王宝强成了国内最卖座的喜剧电影明星，李晨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真人秀节目里。唯独陈思诚转变最大，正如他自己所说，他用10年时间，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做蛋糕的人。

他是这些人中最早摆脱军旅题材的——从拒绝主演《我的团长我的团》开始。

“我不想重复自己。”这句话几乎成了陈思诚接受采访的标配。“成才”之后，陈思诚接受的最大挑战是接拍娄烨的电影《春风沉醉的夜晚》。

“我不太喜欢纯文艺片，我的电影片单都是《肖申克的救赎》《教父》那种。”陈思诚说。

“那为什么要去拍《春风沉醉的夜晚》？”我问。

“没试过怎么知道？试过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陈思诚答。

试过之后，陈思诚破了自己对电影节的迷恋。“戛纳也有嫡系，多少金棕榈大奖我们都不记得了。我们都看不懂，你凭什么让老百姓看懂？什么是好电影？你最起码能让我看得进去，不然吹什么牛？”

走过国际A类电影节的红毯后，陈思诚放弃了拍文艺片的念头。很多年前，他也有过这种浅尝辄止的放弃。刚念大学时，他曾签约华纳唱片，差点成为一个职业歌手。“前两天我还在和组里的郭采洁聊，当歌手好无聊啊，去一个城市，等一晚上，唱几分钟。音乐的表达太短暂了。体验一下就索然无味。”

与写出好音乐相比，他对自己写出好剧本的能力更有自信。事实上，《士兵突击》后不久，他就开始



陈思诚拍摄电影《唐人街探案》时的工作照

谋划“做蛋糕”。2008年，他写过一个名为《奇迹》的剧本，讲一个关于拳击和兄弟情的励志故事。“想奥运会期间拍，没成，过去了，就放下了。”

《春风沉醉的夜晚》之后，他又写了一个有关都市青年青春迷茫的成长故事，他把最初的剧本大纲和头两集故事递给投资人看，投资人感兴趣。趁热打铁，陈思诚把自己关在宾馆里写了一个半月。写完这个故事，他也一并敲下了自己的导演权和男主角戏份，那部电视剧就是《北爱》。

如今，陈思诚在拍摄现场已经有了不怒自威的气场。前一天拍摄，场工的手机突然响起来，正在写剧本的陈思诚慢悠悠抬头，一字一句地说：“把手机都关上。”一瞬间，从演员到工作人员，全都安静了。

“拍《北爱》时，很多东西都是捉襟见肘，你没有那么高的话语权，说白了，你是一个雏儿，大家都不知道你未来是个什么东西。”当时，他每天睡四个小时，全靠意志力撑着，戏拍完，头发掉了好几把。

陈思诚作为导演的自信一直都有，缺的只是威信。拍完《北爱》电影后，他接受采访说，这部电影只是帮他拿到走进电影圈的入场券，他真正擅长的题材，

还一部都没拍呢。那时，他脑中酝酿的就是《唐人街探案》——一个混合了喜剧和悬疑两种类型片的新电影模式。这次冒险尝试为电影带来了超过8亿元的院线票房，以及他期待已久的好评。《唐人街探案》上映的那一刻，陈思诚的自信和威信开始重合。

### 争议和责任

“今天的导演还是拿着范儿呢，刚才把放片花儿的剪辑小哥吓坏了。”探班的编剧杨蕊调侃，“不过也正常，毕竟在片场嘛。”

三位编剧和陈思诚合作三年多，眼看着他一点点卸下防备。“最开始见面还戴着墨镜，恨不得上了妆再来，挺端着。”周航拿起一根烟，戏剧化地回忆了一个细节，“有次找我们聊剧本，他戴了墨镜，雪茄搁在嘴里，抽了一口，明显是不会抽，一声咳嗽憋在嘴里，紧接着有一股舒缓的烟气就飘出来了。这一套动作行云流水，看不出破绽。但紧接着聊起剧本，他就把雪茄给灭了。”

杨蕊接过话头：“最近确实变化不小，彻底不端

着了，恨不得脱了鞋坐床上聊。”

“有点装”，这是很多人对陈思诚的印象，这个标签也是从《士兵突击》开始的。观众总容易对角色动情，转而将这种感情结结实实地投射到演员身上。《士兵突击》里的成才聪明、自负，有理想却野心外露，是戏里最没有观众缘的角色。电视剧版《北爱》里的“疯子”程锋也锋芒毕露，没有能讨好人的谦逊。

角色的特质映射到陈思诚身上，他就成了那个“有点装”的人。很多时候，演员塑造角色，角色也反过来塑造演员。现实生活中的陈思诚的确和成才、程锋有几分相似。他们都是进取型人格，有点心高气傲，善于主动争取机会，总想做领头羊。

“他永远都要赢。”董萌是陈思诚的大学同学，也是《远大前程》的制片人，有段时间两个人都喜欢玩杀人游戏，他告诉我，“约定今天12点结束，如果他输了，就得再玩一次，什么时候他赢了，游戏才算结束。工作上他也有这个劲儿。”

最初，陈思诚对“赢”的理解简单粗暴，就是要出名，要做明星。“毕业大戏我都没排，就去赚名利了。”陈思诚把毕业大戏的男一号推掉，接了个电视剧，演男三号，那部戏就是李亚鹏、周迅主演的《海滩》。“那时候觉得，这是一个机会，这戏能火，不能算浮躁，算是很务实吧。”这部戏的遭遇让他失望，《海滩》没火，火的是李亚鹏和周迅谈恋爱的八卦。

妻子佟丽娅和好友袁弘总为陈思诚的情商担忧。袁弘还记得，有次两人一起出席一个电影首映活动，现场有提问环节。“这就是一个游戏嘛，大家都知道。但他较真，说媒体问的问题太无聊，能不能问点有意义的，和电影相关的问题。场面非常尴尬。观众都是通过媒体了解艺人的，这哥们儿，媒体会怎么写？”

“我和丫丫（佟丽娅）说，你老公这种性格啊，太适合真人秀了，绝对有戏。”袁弘说。这话被陈思诚听到了，他要起艺术家脾气，立马表态：“你说什么？我才不会上任何真人秀！”

陈思诚承认自己身上带刺。“所有软体动物的外壳都是硬的，内心太柔软了，不得不用一个假象把自己包裹起来，去抵御别人，或者掩饰自己的脆弱，以前还是不自信吧。”

“我觉得，陈思诚的情商还是挺高的。”董萌有不同看法，“你看，他维系住了他生命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人。”

董萌记得，上学时，陈思诚和班主任的关系很好，通常情况下，学校不允许学生在“大三”前拍戏，但陈思诚“大二”就开始拍戏了，他能处理好两头的关系。

导演了《北爱》和《唐人街探案》之后，大家觉得，他的才华越来越配得上“有点装”的特质。“以前，他在微博上评价一部电影，好多人说他装，现在他评论点什么，大家都说，陈导有见解。”

外人的评价说变就变，但陈思诚身边的人大多信任他，甚至依赖他。“一部部戏拍下来，他都是对的，他一直在成事儿，你能说他错吗？”董萌说，工作上，大家心甘情愿被他控制。

在整个家族里，陈思诚也起着绝对的主导作用，一部分是性格使然，一部分是继承了父亲的责任和担当。

堂弟陈跃10年前就跟着他，先做助理，如今是剧组里的制片主任；另一位弟弟马峥是《远大前程》的执行制片人，中戏毕业，是陈思诚的学弟。

演员戴墨是陈思诚的表弟，当年考中戏也受陈思诚影响，毕业后演了几年话剧，这几年，陈思诚常带着他拍戏，这次还在《远大前程》里为他写了一个角色。“是时候让他被更多人认识了。”陈思诚胸有成竹地说。

“我哥就是我们整个家族的骄傲。”戴墨还记得，刚进中戏时，正赶上陈思诚的一场汇报演出，那是他第一次看到哥哥站在舞台上，“觉得他整个人是有光环的”。

入学后，陈思诚隔三岔五给戴墨列书单、电影单，戴墨的记性不如陈思诚好，想来想去，只记得书单里有孟京辉的话剧和顾城的诗。

中秋节当晚，陈思诚和家人吃团圆饭，几个在剧组工作的弟弟们的父母也都来了。陈思诚话不多，多数时候都在和三位编剧聊剧本和前程，反倒是他的父亲成了全场的主角，招呼大家吃螃蟹，喝泡了红枣、话梅的上好黄酒，跟每个人都聊上几句。

在陈家的上一辈人中，陈思诚的父亲是那个可以把大家聚在一起的人，如今，陈思诚有了儿子朵朵，他也接过了父亲的责任，成了整个家族的大家长。“姥姥去世了，没有老人在，就感觉一个家貌合神离。我哥又把这家撑起来了，把大家聚到了一起。”戴墨说。

采访的尾声，陈思诚主动聊到了王宝强。当年，他想演许三多，导演康洪雷却让他演成才。“现在想想，如果我演许三多，演得再好也是塑造。但宝强就是许三多。”

至今，陈思诚和王宝强都是好朋友。他们的出身和成长经历大相径庭，陈思诚却打心眼里喜欢王宝强。“他是个天才，我读了那么多书，走了那么多弯路，悟到一些人生道理。他比我小，也没念那么多年书，只能说是天赋。”

# 人各有命

文 / 袁越

2016年10月5日出版的《自然》(Nature)杂志刊登了一篇文章,认为人类寿命的极限是115岁,很难再增加了。文章发表后立刻有人反驳说,这篇论文只是基于现有的大数据所做的统计分析,缺乏生物学基础,也没有考虑到将来可能的技术进步,故不可信。

说到寿命极限的生物学基础,此前大家比较关心“端粒”(Telomere)。这是染色体的一种保护装置,细胞每分裂一次,端粒就缩短一小截,直到短得不能再短了,细胞就没法再分裂了,于是有机体也就离死亡不远了。

最近又有一个新的长寿指标引起了科学家们的注意,这就是DNA的甲基化模式。甲基化(Methylation)是最常见的一种DNA修饰方式,这种方式并不能改变遗传信息,却可以改变遗传信息的读取方式。这就好比一本书的书签,虽然改变不了书的内容,却可以指导阅读者先从哪一页读起。

科学家们早就知道,每种类型的细胞都有其特定的甲基化模式,这就是为什么同样一套遗传信息却可以导致细胞分化成不同类型的原因。2013年,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遗传学教授史蒂夫·霍瓦斯(Steve Horvath)分析了8000个基因样本的DNA修饰方式,发现有353个甲基化位点的分布模式和年龄有着非常好的对应关系,可以用来判断细胞的真实年龄。

换句话说,他找到了一个远比出生证更加准确的指标,用于判断一个细胞或者器官的真实的衰老程度。

霍瓦斯教授用这个方法分析了人体内不同组织和器官的真实年龄,发现差异很大。比如,大部分人的心脏细胞要比其他细胞年轻9岁,而大部分女性的乳腺细胞则要比其他部位的细胞衰老2岁。他还分析了健康器官和生病器官(比如恶性肿瘤)的年龄差异,发现患病器官内的细胞衰老程度普遍要比健康器官更大。

上述两个结果是有联系的。众所周知,乳腺癌是女性最容易患上的癌症,而心脏则是人体内最不容易患癌的器官,这个结果说明癌症很可能是细胞衰老导致的。

问题在于,霍瓦斯教授并不知道甲基化模式和衰

老之间谁是因谁是果,这就好比说一个人老了之后头发会变白,但你总不能说他之所以变老,是因为头发白了。

为了解答这个问题,霍瓦斯教授及其同事们进一步分析了1.3万个血样的DNA,发现一个人的DNA甲基化模式几乎是与生俱来的,和他的生活方式无关。比如,有的人生活规律、饮食健康、心态阳光,但甲基化模式却比同龄人老很多,反之亦然。霍瓦斯认为,这个结果说明甲基化模式就是人体的衰老生物钟,而这个钟是天生的,和生活环境和方式等后天因素无关。

举例来说,霍瓦斯发现很多人年轻的时候就比同龄人显老,这样的人到了老年时往往也比同龄人老得快,而且死得也早。

霍瓦斯教授将研究结果写成论文,发表在2016年9月28日出版的《衰老》(Aging)杂志上。他强调说,这个结论并不能说明生活方式不重要。事实上,像抽烟或者工作压力大之类的因素比甲基化模式更能决定一个人的生死,后者只不过增加(或者降低)了死亡的概率而已。据他计算,两个同样都抽烟、工作压力很大的60岁男性,张三的衰老生物钟走得比别人快,属于人群中的前5%,李四的衰老生物钟正相反,属于人群中的后5%,那么张三在10年后死亡的概率是75%,李四是46%,虽有差别,但都挺高的。

既然找到了原因,就有可能逆转这一过程。比如日本科学家山中伸弥发明的人工诱导多功能干细胞的方法就可以把一个细胞的衰老生物钟归零,理论上相当于重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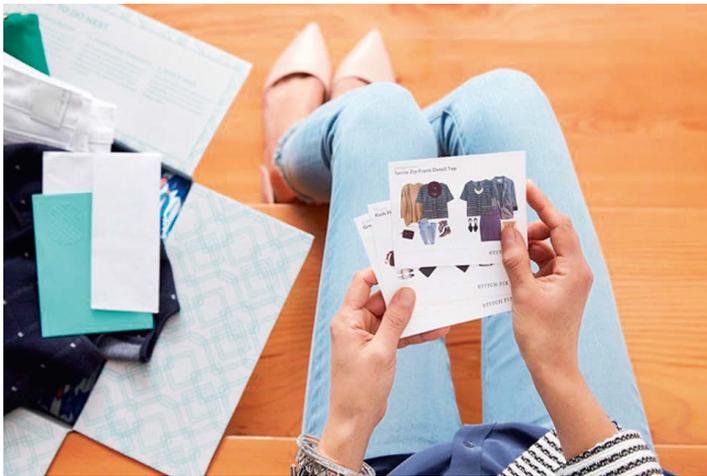
当然了,目前这个延寿的方法还处于理论探索阶段,距离实际应用尚有很长的距离,但这并不妨碍很多人试图联系霍瓦斯,让他测一下自己的衰老生物钟到底是快是慢。人寿保险公司对这个项目也很感兴趣,一直在劝他将其商业化,但霍瓦斯教授拒绝了这些要求。

不过,霍瓦斯承认他私下里测了一下自己的生物钟,发现比他的实际年龄(48岁)快了5年。“得知结果后我当然有点不高兴,但也并不是太担心。”霍瓦斯说,“这个结果只能说明我大概活不到100岁了,仅此而已。”



1

4



2



3

1. 开在洛杉矶市西区威尼斯海滩的 Parachute 酒店，所用床上用品皆为该品牌自家产品
2. Stitch Fix 根据大数据结合造型师为顾客提供定制礼盒
3. 觅海宝在伦敦时装周发起的“全球博主陪你逛”，将西方前沿时尚带入中国

## 电商的野心

记者 / 杨聃

若认为电商的崛起只是消费渠道的变化，未免有点天真了。将来在这个平台上，内容和产品孰先孰后会成为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

### 迅速扩张的版图

不做电商的品牌是没有未来的吗？对于大众市场来说，答案是肯定的。就连作为零售渠道本身的百货商场都开始跃跃欲试了。今年9月初，巴黎老佛爷百货（Galeries Lafayette）宣布收购私营电商网站



4. 按月订购美妆电商的礼盒

5. 移动端 App 开发商 Selectionnist 让消费者可以迅速找到杂志上对应的线上商品

BazarChic。

经过 10 年的努力，BazarChic 成长为拥有 640 万社群成员的法国电品牌，专攻精选销售活动。这项收购的目的很明显是老佛爷百货想要强化其全渠道供给，而大百货公司投资私人销售网站这一趋势早在 2011 年连锁百货巨头 Nordstrom 收购闪购网站 HauteLook 时就出现了。

如今，对于这类频繁发生的收购案例，巴黎银行证券部 (Exane BNP) 奢侈品负责人卢卡·索尔卡 (Luca Solca) 认为，无论是哈德逊湾集团收购网站 Gilt Groupe，还是家居家纺零售巨头 Bed Bath and Beyond 收购家居闪购网站 One Kings Lane，“在快速变化的零售世界中，百货公司肯定也希望保持这种‘摩登入时’的面貌。他们通过并购吸收数字化实力，为自己的核心业务‘异花传粉’。历峰集团并购 Net-a-Porter，就是成功的做法”。

经过一小段焦点模糊的过渡期，品牌们终于意识到电商的目的并不是对实体零售的赶尽杀绝，而是趋于将线上销售与线下体验模式进行资源整合。为此，只在网上售卖的床上用品品牌 Parachute 在美国加州的洛杉矶市西区威尼斯海滩开了一家 Parachute Hotel 旅馆。这家约 205 平方米的旅馆所用的从床垫、

被褥到毛巾和浴巾都是 Parachute 自家产品，算是给潜在客户创造了提前体验的机会。

想去这家酒店可以上 Parachute 的官网预订，每晚 600 美元。酒店旁都是精品店、餐厅、瑜伽馆，离海滩也很近。不过，它并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酒店。事实上，Parachute 是把威尼斯海滩精品店的阁楼装修成了“旅馆”。房子里除了有卧室还有厨房和餐厅，总共可以容纳 4 个人，但正式的床只有一张，另外两人可以支个折叠床，这种随意程度感觉更像是 Airbnb。

为了增加市场占有率，电商们可谓绞尽脑汁想出了各种方法。比如年初在美国如火如荼的按月订购，就帮助男装电商 Trendy Butler 等一大波创业公司成功融了资。早在 2013 年底，就有企业家认为按月订购的商业模式将会是未来电商行业的大趋势。对消费者来说，可以选择的订购内容也越来越丰富，每月的礼盒从化妆品、手工啤酒到宠物食品，可以说应有尽有。

这种模式的核心商品就是商家每月送出的礼盒和会员身份，相比于其他品牌那样先销售商品再吸收会员，按月订购看起来更加直接有效。然而，事实证明并没有所谓的捷径，许多采用按月订购模式的电商却因为付费细节不够清楚招来了非议。

按月订购美妆电商的开创者之一 Birchbox 迟迟未见盈利，几经努力才从现有投资者手中获得了一笔 1500 万美元的“救命钱”。有专家提出，只要订购盒子里面的商品搭配对了，还是有市场前景的，比如用大牌搭配新锐品牌，这样一半一半的搭配降低了“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风险。一方面用知名品牌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另一方面也增加了新锐品牌的曝光度。

WSL Strategic Retail 战略零售公司创始人温迪·利布曼 (Wendy Liebmann) 认为，订购盒子模式当中最大的受益者是初创品牌，他们有机会让更多目标消费者了解到品牌本身并试用，这可比纸上谈兵的宣传要精明多了。

## 远离价格战

面对急速扩张的版图，电商之间的竞争太激烈了。以国内跨境电商的大众市场为例，要买价格竞争空间大的产品会去天猫国际，要买化妆品会想到小红书，母婴产品有蜜芽宝贝，书籍有亚马逊等等。

庞大的市场被不同的定位趋于精准地细分着。时尚生活方式是多品类的聚集，高端一点的有 Net-a-Porter，轻奢的有 Shopbop，不仅如此，无数品牌自营和集团并购的案例还在陆续上演着，时不时夹杂着刚刚拿到融资的年轻用户体验平台。

“消费者选择跨境电商无非两种原因，一是同样的东西电商价格更便宜，二是有些产品在国内买不到。很多做大众市场的电商会选择用价格吸引消费者。对我来说，在价格空间的竞争并不是一个长期可持续的竞争方式，因为这种差异在逐渐减小。”觅海宝创始人林艳 (Jacqueline J. Lam) 对我说。这是一家有英国政府支持面向中国消费者的海淘 App。

从去年陆续开始，服装品牌像香奈儿、腕表品牌如百达翡丽都在调低中国境内的定价，同时调高欧洲的售价就是为了平衡国内外的价差。价格是很重要的因素，但电商通过低价向消费者谋求到的忠诚度是不牢靠的。

“我知道追求‘物美价廉’的心态在中国消费者的心中根深蒂固，但更重要的还是对产品的需求。提供更新、更适合她们的东西才是长久的。”林艳补充道，“在模式方面免邮、包税都是必然的。”为的是减少消费者在购物过程中的顾虑。

另一个创业公司 Stitch Fix 则试图把试衣间

搬回家。客户只需要支付 20 美元的造型费，Stitch Fix 就会根据其个人偏好和需求推荐 5 件时尚单品来定制盒子，快递到客户手中。在家试穿后，把喜欢的留下，不要的退回。只要成功购买其中任意一件，20 美元的造型服务费就能抵扣。

2015 年 Stitch Fix 的销售额有 2.5 亿美元，《福布斯》预计今年还将增长 50%，这都要归功于“数据科学+造型师”的模式。像 Stitch Fix 和觅海宝这样的电商，虽然售卖的是时尚与高级生活方式品类的产品，但归根结底技术公司的属性主导了他们的思维模式。事实上，不仅仅是电商因为社交媒体带来可量化的推广效果。有戏言称广告界越来越像金融界，而时尚公司越来越像科技公司了。

通过数据，电商能更快速地了解客户。“我们会通过不同的数据去分析她们，当然这涉及很多种类的数据，最直接的数据就是看她在平台上的购买行为，从哪个入口进入，先浏览了哪些品类等，喜欢哪些，不喜欢哪些，整个过程产生的数据都能用来改善用户体验。”林艳解释道。

想想实体店的销售的确可以和顾客进行面对面的沟通，记录他们的需求，但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导购也不可能同时注意到每一位消费者的全部，比如他们怎么逛，摸过什么，看过什么，先向上看还是先向下看等这种细节。而我们自以为用手机 App 执行的非常私人的购物行为，所产生的能让电商在另一端接收到的数据，是多么令人细思极恐。

在消费者越来越不耐烦的大环境下，电商终于等到了它的“天时、地利、人和”。快要被说烂的“即秀即买”，让电商或者说线上消费市场有了用武之地，原本从设计师到消费者中间有很多环节的供应链被打通了。

## 销售之外的更多属性

当打开觅海宝 App 主界面，可以看到它集结当红姐妹肯达尔·詹娜 (Kendall Jenner) 和凯利·詹娜 (Kylie Jenner)、时尚博主 Susie Bubble、韩国美妆博主 Pony 和中国网络红人封帆等社交网络达人的街拍与穿搭，再往下拉才能看到出镜单品的同款及类似款。“通过购物过程产生的数据，我们发现她们并不是在买一种产品，而是一套完整的搭配，她们在买一种风格。”林艳解释道，“这是一种新的模式，消费者

需要被启发，她们不会完全去模仿，除非真的适合。”

其实，很多电商不再青睐用模特来呈现产品的效果，“单纯的美”在购买决定上的说服力已经不足够了。网红们因为有了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才有了喜欢他们的“粉丝”。从千禧年之前的超模，到千禧年之后的明星名媛，再到近两年开始流行的网红博主，消费者跟随对象的改变是有原因的。

超模是美，但这种美太有距离了，相比之下明星名媛就有性格多了，这让消费者和偶像的距离稍稍拉近了一些。到了网红和博主的时代，这种距离感可以忽略不计了。“如今的消费者需要的不再是一张完美的脸，而是能提供一种可企及的生活方式的人，他们可以是任何行业里的任何人。”林艳说。

在伦敦时装周期间，觅海宝发起了“全球博主陪你逛”的口号，就像主页面的内容那样，有点让人分不清这到底是电商还是一本电子杂志。其实，电商衍生内容的做法并不少见，Net-a-Porter 还曾出过纸刊呢，不过现在看来，那时的内容颇具说教化。

像社交媒体一样，电商开始用“看内容”来关联到“买产品”。这个所谓的内容开始变得越来越有趣，它不只有图片，有视频，甚至有直播。与此同时，买的过程显得越来越“自然”，甚至是必然。老字号 App 就是这样一款能让你迷失在内容中的电商，确切地说，目前它的媒体属性大于销售属性。

“先看故事再买东西，这个逻辑是不会变的。”老字号平台 CEO 田瑜说。之前在阿里巴巴 6 年的互联网工作经验让她习惯性地把我理解中的消费者称为“用户”。对他们来说，目前卖货并不是最关键的一步。这个平台上的商家都是中华老字号，很多是只知道名字对不上产品的品牌。在田瑜看来，要想卖得好，需要的可不是电商这种“入时”的渠道，而是企业全方位的改造，就像供应链的创新、管理的创新，还有文化的宣讲。

“老字号觉得自己用户老化了，缺传承人，营销方式更赶不上时代了。我认为，老字号是缺产品的创新。”田瑜对我说，“大家听到稻香村、同仁堂的时候都知道这个名字，但不会去对应某一样货品。它只有大的品类，缺少了和用户单点的关联。我们就是要帮老字号找到这种与实际用户关联的场景。”

在“定制”这个频道，消费者不仅能找到一家老字号为新生儿定制一只胎毛笔这类的实物，还能还原一个传统的场景。10 月底的安昌古镇，一场江南水乡



“老字号”策划了一场在江南水乡安昌古镇举办的乌篷船婚礼

的乌篷船婚礼，让消费者感受到数百年来这些老字号所坚守的东西。

脱离产品之外，老字号平台是想创造出一些用户能够参与进来的体验。“平台是有属性的，它要符合一个产业的特性，能聚合为产业创新的各种工具。对于我们的老字号品牌来说，他们太缺少用户关注了。”田瑜希望借由 App 让消费者与品牌实现点对点的链接。“什么东西能把中国文化遗产得很好？我认为是商业。今天在这些百年以恒的产品背后，它一定沉淀着一些中国的哲学。”

通过老字号平台，这些传统的东西都被讲出来了，而他们想吸引的是当下的年轻人。产品的发掘，传承人的寻找，甚至是匠人学院的建立，都是基于平台在一点点展开的目标。那“电商”这个属性还要它做什么呢？销售永远是必要的，另外一点就是所谓的“C2B”。

“对于大规模的实体产业个性化，不可能真的做到千人千面，所有供应链的柔性只能做到一定程度上而已。事实上，有了一定需求的汇聚之后供应链能够快速响应，这已经叫个性化了。”田瑜拿电视做比喻，用户不可能知道自己需要的这台机器的具体技术参数是怎样的，中间需要有一个技术人员把这个东西分析出来，综合成主流需求再由供应链来响应。

田瑜解释道：“这一过程中，商业的经验和数据的分析都是必要的。老字号 App 作为电商是能够得到数据，但还需要专业的人员来解读，才能转化成产品和营销的创新。那就是更加深入产业内部的课题了。”

# 开机看球！你到底开的是什么机？

文 / 张斌



5月2日，2015-2016 英超赛季期间，英国莱斯特城球迷在观看球赛直播

英超和 NFL 得意了很多年，前者名扬四海，后者绝对统治，共同特点就是贵得很，媒体版权价值飙升天际。BSkyB 和 BT 一路推波助澜，将英超单季英国国内版权价值突破了 50 亿英镑关口，外加海外市场贡献，可达 83 亿之巨。英超了不起，NFL 更传奇，到 2020 年的美国版权包裹，总价值接近 500 亿美元，电视台和美国人民一道为这个号称“国家运动”的联赛打工。

不曾料想，两个巨人联赛新赛季同时遭受相同挫折，比赛直播电视收视率有显著性下滑，评论家不失时机地发声：“人们最终会对足球关机吗？”BSkyB 英超新赛季收视率较之上赛季同期下降五分之一，NFL 则折损了 20%。更让人心惊肉跳的是，BT 的欧冠收视成绩居然下滑了 40%，险些拦腰斩。

想当年英超与 BSkyB 相互成就堪为典范，BT 入局后则更加突显了英超的全面市场价值，作为工具可以搅动英伦的电信入口大战，因此也才有了版权价值犹如脱缰野马。在美国，体面的大电视网都会不惜血本杀入 NFL 的版权竞争格局，押上身家。到底发生了什么？

《大西洋月刊》都表现出了关切，给出了 NFL 新赛季疲弱的四大理由。首先，大选之年嘛，戏份充足，通吃一切，每四年便印证一次，今年尤甚。再者，当下美国“断网者”愈加时髦，割断有线电视网，投奔

Netflix，电视直接受损。第三，Twitter 本赛季有权利在周四晚间直播 10 场比赛，拿着手机看流媒体直播，岂不快哉。最后，没了曼宁等一干巨星，暂时的平庸不足为怪。NFL 总裁态度鲜明，不找任何借口，积极寻找原因所在。

在没有明确结论之前，最明智的说法似乎应该是，造成收视下滑的原因非常复杂，里约奥运会、天气的阴晴变化以及缺乏重量级对阵都能左右数据。BSkyB 的负责人宣称，新赛季以来最精彩的 15 场比赛都实现了充分直播，利物浦与曼联的“红色周一对决”还创下了近三年英超在国内转播的最漂亮收视数据——280 万人。好比赛人人需要，英超和 NFL 不该出现断崖式的收视下降，最合理的解释是当你说开机看球时，到底打开的是电视机还是手机？还是计算机？还是什么其他移动设备？或者，打开这一切都不便宜，还不如呼朋唤友到酒吧里边喝边看更自在些。

BSkyB 和 BT 新赛季都竭力向公众推广用官方应用在手机和其他移动端来观看比赛直播，BSkyB 的用户可以在一个名叫 Match Centre 的应用中观看流媒体直播，那些此前未曾收看 BSkyB 的受众还可以使用 Now TV 的应用在移动端每天计费地享受直播服务。BT 新赛季在移动端的用户增长达到了可喜的 17% 的增幅，但直接导致自身传统大屏幕用户的流失，BSkyB 同理。求新生的同时，伤的不仅仅是手腕了。

最大胆的结论应该出炉了，在移动互联网的时代里，小小的屏幕将成为一切的中心，信息高度密集，人们已经越来越不愿意守着一场观赏度平庸的比赛度过宝贵的 90 分钟，因此直播过程居然不似以前那么重要，碎片化在击碎传统价值体系。以上这种趋势，年轻人群中更为显著，常有父母抱怨，如今孩子们只有在听到直播过程中的嘈杂声，才会从 Snapshot 或其他什么社交工具中抬起目光，匆忙掠过之后，继续低下头。其实，这不也是很多大人的日常写照吗？

社交媒体和移动互联网力量汹涌澎湃，但除此之外，球员价值虚高，比赛观赏性下降也是收视受损的要因。野火烧不尽的盗版信号很容易就找到需要的人们，过往几年英超曾不遗余力地希望可以剿灭盗版，结果证明基本徒劳无功，人们喜欢免费是不需要理由的。☑

# 国产航母的“内在气质”是什么？

文 / 宋晓军

10月26日，当俄罗斯海军“库兹涅佐夫号”航母还在参战“首秀”的途中时，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在第六次回答记者有关中国首艘国产航母建造进展时说：主船体已在坞内合拢成型，正在开展设备安装和舾装等建造工作。这个消息一出，就引起了我身边关心军事的朋友们的热烈讨论。于是，有朋友借之前国防部发言人比喻首艘国产航母“既有外在颜值，更有内在气质”的一句话问我：首艘国产航母的“内在气质”是什么？对此我的回答只有四个字：科学、合理。

要解释这四个字，不妨先回顾一下美国的“福特级”航母设计、建造过程的一些例子。与中国首艘国产航母对俄航母的参照相类似，“福特级”除了采用“尼米兹级”航母的基本船体外，其他设计采用了很多新技术。为此，美国海军和承包商专门根据《国防装备项目工作分解结构手册》(MIL-HDBK-881)为“福特级”航母制定了三级的工作分解结构计划。第一级：航空母舰系统。第二级为从属第一级的9个单元——1.0：项目集成；2.0：舰体；3.0：系统测试；4.0：训练；5.0：数据资料；6.0：保障设备；7.0：现场作业；8.0：基地和工业设施；9.0：相关计划接口。第三级还有从属于第二级每个单元下面的N个分单元。如从属于

“2.0舰体”单元的有10个分单元——2.1：舰体结构；2.2：动力装置；2.3：电气设备；2.4：指挥和监视设备；2.5：辅助系统；2.6：舾装和家具；2.7：武器装备；2.8：舰艇整体集成；2.9：舰艇设备保障服务；2.10：航母航空系统。

作为全球研制航母经验最丰富的美国，编制标准、规范的工作分解结构计划，是为了满足管理部门、管理人员和开发人员的需求，使航母研制计划按预期时间表顺利推进。同时，由于“福特级”航母采用了13项新技术，那么在上述第三级每个含有新技术的分单元下面，又要求采用新技术的承包商还要制定一个由N级和N个单元构成的项目分解结构计划。如在“2.10航母航空系统”分单元下，还要制定一个“电磁弹射系统工作分解结构计划”。这样更有利于管理部门对采用新技术的系统进行成本核算和技术成熟度跟踪，以防止航母项目发生成本超支、进度延误等问题。2011年9月，“福特级”航母首舰“福特号”162个大型建造模块合拢成型后，美国政府问责署于2012年6月至2013年9月对项目展开调查。在2013年9月5日问责署发布的“调查报告”中指出，受几项新技术成熟度的影响，航母研制费用已从2008年的105亿美元上升到128亿美元，超支达22.3%，而且延迟了航母初始作战能力的形成。为此问责署向国防部和海军提出了5条“补救”建议。

通过“福特级”航母设计、建造过程的一些例子可以发现，对于研制航母这类大型且系统复杂的武器平台而言，不仅要有一个科学、合理的工作分解结构，而且还要适量地采用成熟的新技术。其实中国海军和工业部门早在首艘国产航母开工建造前几年，就赋予了“辽宁号”航母作为科研试验与训练平台的功能。而这一安排本身不仅是要为首艘国产航母的研制制定出一个科学、合理的工作分解结构计划，同时还要在吸收“辽宁号”航母科研试验和训练有益经验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工业基础和科研能力，科学、合理地适量采用成熟的新技术，对首艘国产航母在功能和性能上进行改进和提高。当然，如果俄航母真在叙利亚战场上实现了参战“首秀”，其经验和教训也是非常值得中国首艘国产航母借鉴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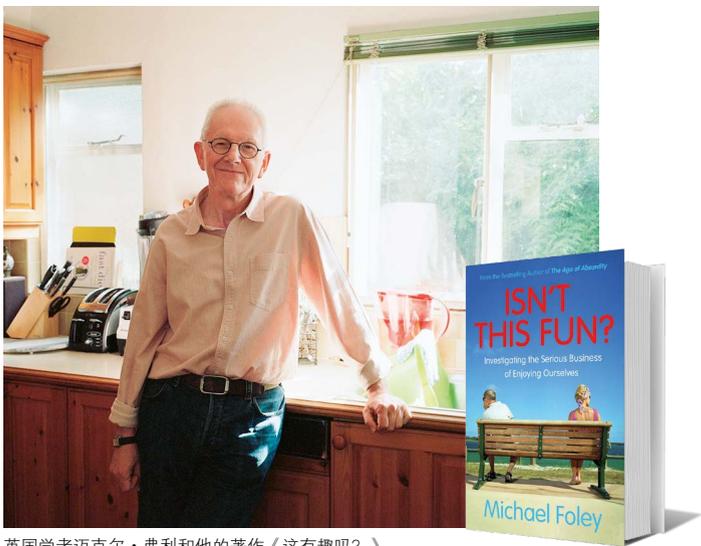


10月18日，俄罗斯“库兹涅佐夫号”航母编队前往地中海执行反恐增援任务

# 快乐是一件严肃的事

主笔 / 薛巍

英国学者迈克尔·弗利说，乐趣并不简单，它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



英国学者迈克尔·弗利和他的著作《这有趣吗？》

## 享乐的定义

如今，做一个从来不去夜店、不参加派对的无趣的人会受到别人的非议。英国学者迈克尔·弗利在《这有趣吗？》一书中说：“如今拒绝相信乐趣就相当于在中世纪承认自己是无神论者，会受到严厉的惩罚，会遭到社交网络的放逐。”在现代社会，没有人会对追求乐趣有什么非议，乐趣成了人们迫切想要得到的东西，它甚至变成了一种义务。弗利说：“在前现代社会，人的义务是拯救自己的灵魂，在现代社会，人的义务是挣钱，在后现代世界，人的义务是享乐。工作要有趣，教育要有趣，宗教要有趣，政治抗议活动要有趣。甚至战争也要有趣。在一个关于马岛战争的纪录片中，一位年轻的英国军官高喊‘这很有趣！’然后他的脑袋就被炸掉一块。现在人们需要把一切事情看作趣事，要求一切都得有趣。”

但其实乐趣是很晚近的现象。在人类 20 万年的历史中，除了过去几百年以来，都是毫无乐趣可言的。这不仅是因为生活很艰难，而且是因为不存在乐趣这回事。弗利说，乐趣（fun）这个词的现代意义直到 18 世纪才出现，被认为源自古英语中的 fon，意思是欺骗或戏弄。“这确实很合适，因为乐趣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人为的，对它的回答经常是谎言，比如别人问你是否觉得某件事有趣，你会回答说是的。”

弗利追溯了乐趣正当化的社会原因。现代社会认为，人生的指导原则是理性，人们用理性确定目标，并且理性是实现这些目标的最高效的方式。这导致人们把自然当作控制和使用的对象，而不是尊重的对象。对此，乐趣以玩耍、以为了做而做的活动来制衡理性。

快乐总是转瞬即逝，怎样才能长久地快乐呢？弗利说，为了快乐而去做一些事情是工具主义——做一件事是为了另一种东西。工具主义的问题不仅在于世界不会听从我们的意志，而且在追求目标时，我们总是要紧张地注意着一切是不是会满足我们的希望。“快乐就像地平线一样，它往后撤的速度总是超过我们追赶它的速度。也许解决的办法在于停止追逐，转而沉浸于没有其他目标的乐趣和游戏之中。玩乐就像是抓住了正在打盹的快乐。”如诗人威廉·布莱克所说，“谁想要抓住欢乐不放，便会将展翅的生活毁光，谁要是亲吻擦身飞过的欢乐，便会将生活在永恒太阳升起时刻。”

弗利区分了乐趣和快感：“乐趣不是个人的，而是社会的。自由的个人排斥过去那些神授予的、嵌在家庭、社会结构和自然中的东西，喜欢自由，但错过了社交带来的温暖、固定角色的确定性以及仪式带来的安慰。乐趣以一种新的归属感来弥补这一损失。乐趣在本质上是群体性的。独自一人能够获得快感，但得不到乐趣。”

对乐趣最好的辩护是把它描述为游戏，对它最有效的攻击是斥之为享乐主义。享乐主义其实很复杂。首先，伊壁鸠鲁并不是许多人想象的享乐主义者。在他看来，最大的痛苦是挫败，避免挫败最有把握的方法就是没有欲望。从根本上讲，他是一个禁欲主义者。

他不是个美食家，认为简单的食物跟奢侈的饭菜一样提供同样的快感。他说对少许东西感到不满足的人，对什么都不会感到满足，最不需要奢侈品的人享受得最多。享乐主义现在被理解为对食物、性的极度热爱，但这只是享乐主义最粗俗的形式。除了感官享乐主义，还有重视理智的享乐主义，珍视心灵上的快感甚于肉体上的快感，追求道德、审美和精神上的满足。唯一倡导纯粹感官享乐主义的哲学家是亚里斯提卜，他是苏格拉底的一位学生，后来抛弃了他的老师的教导，创建了古利奈学派。

弗利说：“很奇怪的是，现代社会有着享乐主义的倾向，但没有多少享乐主义思想家。享乐主义者们应该欢迎对他们的理论支持才对？缺少享乐主义哲学的原因之一是势利。谁也不愿被视为只对感官享受感兴趣的人。美食家认为他们不是贪吃之徒，而是高雅的鉴赏家。”

## 从享乐主义到个人主义

为了躲避享乐主义粗俗的一面，现代思想家如卢梭和尼采把享乐主义重新塑造为个人主义。享乐主义认为好的生活就是个人获得最多的快感，所以它是一种个人主义。在卢梭、尼采以及之后的许多哲学家看来，现代社会的主要目标是个人的自由，要充分利用这一成就的话，就应该拒绝家庭、亲人、群体的要求，可能的话就独身，摆脱义务和约束。

历史上一直有人寻求隐居——荒野中的预言家、山上的中国圣人、巴黎阁楼里的诗人，但这种趋势直到现代才开始获得动力。在18世纪，卢梭发现了有着独特的内在生活的自我，在19世纪初的浪漫主义时期，自我被视为精致、高尚、敏感的动物，需要加以保护，不受恐怖的工业和粗俗的悠闲的侵害。知识分子和艺术家日益感到需要逃离人群，先是被带到高山上去体验崇高，接着是到阁楼里体验景象。在19世纪下半叶，诗人波德莱尔、小说家福楼拜和思想家尼采不仅都独居，而且都渴望孤独、摆脱义务。福楼拜在信中说：“我给自己建了一个塔，让波浪冲击它的基础吧。”但这些孤独的圣人都严重地依赖着他们的母亲。

波德莱尔躲债的时候要去跟他母亲一起住，福楼拜需要他母亲的陪伴，他移居到巴黎时，在同一幢楼里给他母亲找了一套房，尼采的母亲经常给他送食物和新衬衫。独自居住的人确实获得了一种独特的欣喜，诗人兰波枪击过他的爱人，后来又去非洲冒险，他跟他的同时代人狄金森的生活差异极大。狄金森是一个拘谨的独身女性，在一个小镇过了一辈子，但他们的诗歌中有着类似的欣快。

但独居太久的人会变得愤怒。比如菲利普·拉金，为了保护他的自由，他一个人生活，拒绝向他的爱人做出承诺，也不卷入不适合他的社会活动。但他说他是一个怒不可遏的人。这可能是因为孤独造成的自大狂要求控制一个不变的世界，就像个人的世界被全面控制、不会变化，但世界不但拒绝受到控制，而且坚决要以最误入歧途的方式变化，所以会惹人发怒。独居有助于创作，但会让人对自己的能力和信念感到满足，变得蔑视他人，跟同伴住在一起可以提供一种反对的力量、阻止极端行为。所以最坚定的独身者也意识到不可以永远独身。扎特图斯特拉从他的高山上下来了，梭罗离开了他在树林里的木屋。卢梭说：“隐居是快感的死亡。真正的快乐是我们跟他人分享的快乐。”新的社会结构找到了个人和群体之间的平衡，新的群体往往是松散的、非正式的、临时的，成员不断变化，没有明确的成员的标准，没有上下等级、没有领导者。在许多情况下，成员相互不认识。好像属于一个群体的乐趣比真正的群体活动更重要。这把我们带回了伊壁鸠鲁，他堪称都市群体之父，因为他认为快乐不是在山顶孤独地沉思，而是坐在家中的花园里跟朋友一起讨论人生的意义。他接受成员的标准也很现代，只要求性格活泼、有好奇心。■

最坚定的独身者也意识到不可以永远独身。扎特图斯特拉从他的高山上下来了，梭罗离开了他在树林里的木屋。卢梭说：“隐居是快感的死亡。真正的快乐是我们跟他人分享的快乐。”

# 花衣小丑埃科

文 / 乔纳森



意大利作家翁贝托·埃科和他的著作《树敌》

读埃科的书，我们固然能领略一种博学，但偶尔会感觉，那只是把质数 983、991、997……一直数下去的博学，我们已浑然忘却当初干嘛要领略这种博学了。

《树敌》是翁贝托·埃科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随笔集，从时间上讲，它是最新的（意大利文版原著问世于 2011 年），可在我们读来，它又像是一部旧的随笔集，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其中有太多题材让我们有似曾相识之感：《天堂之外的胚胎》说的那点儿事不是在《倒退的年代》里的《论胚胎的灵魂》一文中已经讲过一遍了吗？《岛屿缘何总难寻》的话题在《植物的记忆与藏书乐》里的《关于岛屿志》已开其端，而《雨果，唉！论其对极致的崇尚》一篇引用《笑面人》里约瑟安娜大叫自己爱的就是丑人一段，其实在《丑的历史》里已引过一回了；同一篇文章引用的《九三年》

里对吉伦特党人、山岳党人诸豪杰的列举，不是也早在《无尽的清单》里抄录过一大通了吗？甚至标题作《树敌》一文，也像是将《密涅瓦火柴盒》里的《羞耻啊，我们居然没有敌人！》以及《倒退的年代》里的《外国人和我们》等文搅拌在一起。我们想说，埃科啊埃科，您像处理过期月饼一样以旧充新，真的心安理得吗？

当然，当然，我们无意苛求，七十几岁的老学者还文思泉涌，新想法、新材料活蹦乱跳，也不现实。其实，如果说《树敌》一书对我们尚有吸引力，这吸引力恰好就来自这“自我重复”的一面。“自我重复”像是无意中加的着重号，无形中变的黑体字，让我们一下子看出，作者在灵感已如雨余沾地絮之际，其思想的游丝真正牵系所在。

事实上，“无尽的清单”就是埃科惯用的写作模式。而清单的秘密，无非是列举、列举，乃至穷举。我们或许可以将书中的《寻宝》一文视为此类“无尽的清单”式的写作范例。这里的“宝”特指基督教的

圣物，比如“伯利恒马槽的一块残片、圣斯德望的钱袋、刺进耶稣肋骨的长矛、圣十字架上的一根钉、查理曼大帝的剑、施洗者约翰的一颗牙、圣女亚纳的臂骨、捆绑耶稣使徒的锁链、福音书作者圣约翰的一片衣服、最后的晚餐的一块桌布残片”（《树敌》中译本第70～71页，译文略有调整，下同）。有一段写得不动声色，实颇俏皮：“使徒圣巴尔多禄茂的一具遗体存放于罗马，而另一具遗体则存于贝内文托的圣巴尔多禄茂教堂。不管其中哪一具，按说都应该是没了头盖骨的，因为一块头盖骨在法兰克福大教堂，另一块在卢恩修道院。而第三块头盖骨则不知来自哪具遗体，它现存科隆的修道院。”（第77～78页）

圣物流传，虚虚实实，埃科的寥寥数语，点破了其荒唐之处。问题是，埃科从来不喜欢让自己开列的清单停下来。他评价雨果作品，用了“过量的诗学”的说法，其实他的文章也是“过量的诗学”；若能在适当的时刻停下来，那就不叫“过量”了。《寻宝》中列举的各式各样的圣物，粗粗数下来，也有上百个之多。它们不是圣巴尔多禄茂的头盖骨，但对我们而言，它们跟圣巴尔多禄茂的头盖骨已没有本质的区别，是圣斯德望的手骨，还是圣佳琳的肋骨，又有什么关系？反正我们已知道了，这些圣物的来源不甚可靠，很可能是后人附会的。埃科的“过量”，体现了他的博学。但有时想想，我们要想列个“无尽的清单”，也并非什么太难的事，比如我们可以相对轻松地列一个质数的清单：2、3、5、7、11、13……关键在于，当你列到967、971、977……的时候，大家可能就要打断你了，或者在这之前就早早打断你了，因为为了说明一个相对简单的概念、事实或规律，没有必要没完没了穷举下去，大家的脑力都该多分些份额到别的地方去。

博学，也分不同的类型，有深邃透辟的博学，有融会贯通的博学，也有只停留在一个平面上的博学：这根趾骨在这里，那根趾骨在那里……这样的博学，我看可以称为博物学家式的博学。博物学家的闻见当然广，但其分析手段实在有限，好像最擅长的也只是分类而已：臂骨啦、肋骨啦、头盖骨啦……

《树敌》中《火之炫》一文展现的，便是博物学

家式的博学。操作方式如下：收到题目——火，好了，开工！第一步，把古今著作中关于火的说法全找一遍，愈偏僻愈好，愈偏僻愈见出我能旁人所不能。收集得差不多了，好，第二步，开始分类：神圣之火、地狱之火、炼金之火、显灵之火、重生之火、焚毁之火……够篇幅了？齐活儿！不难看出，博物学家的分类法实际上是相当粗糙的，因为他们未必掌握事理的本质，因此往往停留在表面的、偶发的差异上。各种“火”的相互关系如何、有无统摄性的规律、它们之间有没有矛盾……种种难点，无暇计及，亦无力计及。

读埃科的书，我们固然能领略一种博学，但偶尔会感觉，那只是把质数983、991、997……一直数下去的博学，我们已浑然忘却当初干吗要领略这种博学了。

不甚深刻完满的博学，还有一个副作用，就像读了太多色情小说，有可能扭曲人对现实的判断。且以书中《天堂之外的胚胎》一文为例。这篇貌似评述古人言说的文章其实指向一个当代话题——堕胎。埃科接连引述了奥利金、德尔图良、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那等神学家的观点，尤其从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大全》里引了又引。那么，埃科的意图是什么？他无非想说：“教会虽每以托马斯·阿奎那之教义为矩矱，然在此问题（指堕胎问题——引者注）上，却决意不声不响背离其观念。”（第100页）虽然埃科对自己写此文的目的有所限定——“本文并不想评价目前存在的各种争议，只想澄清托马斯·阿奎那的观点。”——但在我看来，这种炫博的文字仍然是学究气的，归根结底是无用的、无意义的。首先，问题的症结在于，托马斯·阿奎那尽管是一位了不起的神学家，但对于21世纪关心堕胎是否合理、是否违反道德准则的人们来说，他不是绝对的权威，也就是说，不管他对某一事物、某一现象作何评价，我们没有因为是他说的就得听信之这样一个前提。我们是否听信之，完全取决于他说的是否符合事实或是否予人启迪，而非取决于他曾一度具有的神学上的权威性。而我们读过埃科所引《神学大全》数段言论后所能得出的结论恰恰是，托马斯·阿奎那在胚胎是否进得了天堂这一问题上的言说是模棱两可、混乱不清的——如果不是荒唐

武断的话。埃科对教会的指责，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书呆子做派。我们都知道，《神学大全》是一部特别庞大的著作，2008年出版的中文全译本有19册之巨，教会不可能凡事皆以《神学大全》为典据，就算教会真心乐意听从托马斯·阿奎那的教训，也不大可能像闲着没事的教授那样在十几册大书里细心巡弋、从容寻绎。其实，在这里，存在一个我们应当如何对待古人言说的问题有待解决。在我看来，古人说的对不对、好不好，是我们应首先考虑的，甚至是唯一值得考虑的。而在那些“不敏”而好古的酸丁那里，好像只要是古人讲的，尤其是有名的古人讲的，哪怕它其实是平庸乃至可笑的，也会得到特别的尊崇优待。要我说，像《天堂之外的胚胎》这样的文章，是大可以不写的。托马斯·阿奎那到底支持堕胎还是反对堕胎，真的重要吗？这样的问题就留待科学、开明的头脑去思考吧。

埃科读过许多书，读过许多偏僻的、一般人罕觐罕闻的书，他也花了好些工夫钻研、解析那些微妙或玄奥的文学作品，但说起来很有意思，他最喜欢的书，恐怕并不是他专门研究过的奈瓦尔的《西尔薇》或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倒很可能是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或欧仁·苏的《巴黎的秘密》。

也许对埃科来说，微妙、玄奥终归是枝叶，而滴洗不去的则是故事，是故事的架子。这一点，我们不难从他自己创作的那些小说中窥见：试想一下，埃科的小说有什么现代派的写法？有什么繁复意象？有什么精妙语汇？他想写的，压根儿不是奈瓦尔或乔伊斯那样的小说，他的追摹对象恐怕一直是大仲马或欧仁·苏。埃科的小说里是没有有血肉的人物的，他笔下的人物是为了实现其功能而设置的，他在意的只是故事，而且只是故事的架子，这个架子要么靠复杂的情节搭建，要么由特定的理念支撑。他只关心骨头、骨架，对肌肉、血液不甚措意。当然，在思维的复杂程度、深刻程度上，埃科的小说是超越了大仲马或欧仁·苏的作品的，可是，埃科的复杂或深刻，也不过是他所处时代所不难达至的一种复杂或深刻罢了。这就意味着，就他们代表其所处时代的一种并非多么高深的思维水平而论，埃科跟大仲马或欧仁·苏是没有多大差别的，我们大可以说埃科是20世纪晚期的大仲马；要是大仲马能活到20世纪晚期，他也会像埃科那样写小说的。

因此，究其实，埃科在文学上的鉴赏品位恐怕仍是通俗小说式的。我们自然并不是说他欣赏不了但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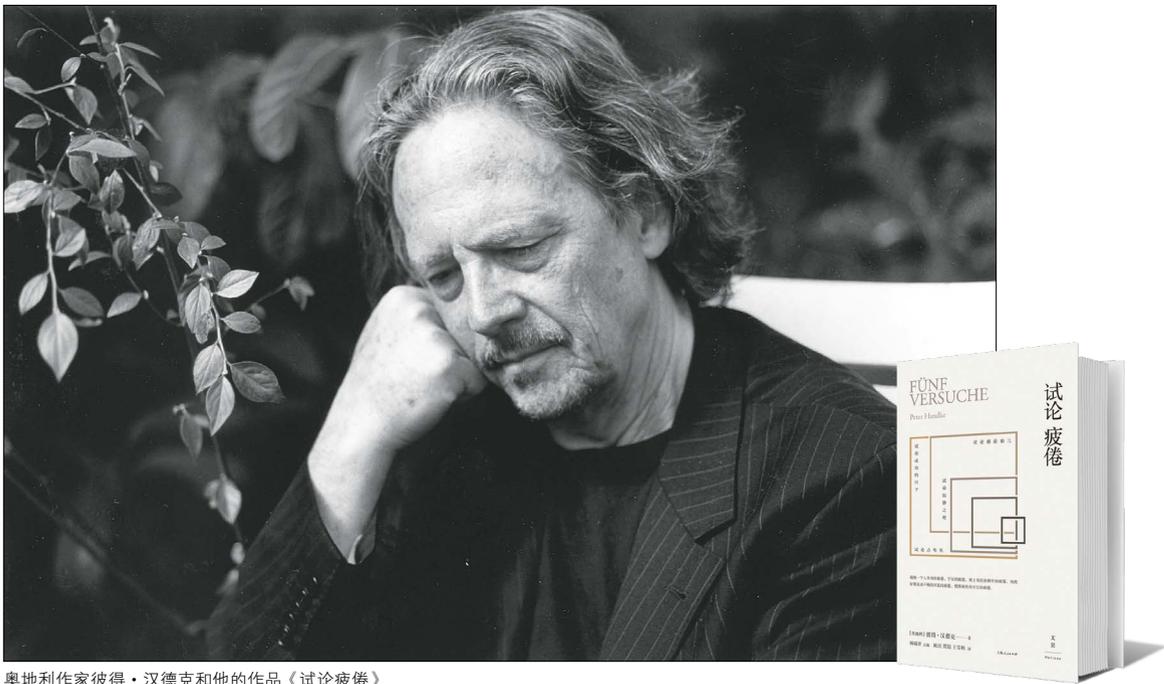
或普鲁斯特，而是说他的系恋、他的根源是在通俗小说这里，在这里，他最自在、最安逸、最巴适。明乎此，就不难理解埃科为什么会在《雨果，唉！论其对极致的崇尚》《我是爱德蒙·唐泰斯！》里对雨果、大仲马那些通俗小说味道极浓的叙事大加赞赏了。说“我是爱德蒙·唐泰斯！”就跟说“我是包法利夫人！”一样，是一种明白无误的自我认同、自我归属、自我定位，等于说“我是大仲马”。我只能说，埃科的自我定位是相当准确的，再无其他了。

在《树敌》《电视女郎与保持缄默》《关于“维基解密”之反思》等文中，埃科又回到了《带着鲑鱼去旅行》《误读》式的小品文写法。笑料多半来自具象的归谬法。对现象夸张再夸张，直到你觉得它太荒唐，不得不笑了。不过，我读埃科的小品文，从来没笑过，我觉得它们都不好笑。夏志清评价伍迪·艾伦，说他那是“硬滑稽”，我看大可移赠埃科，用以总结他的小品文。“硬滑稽”之所以不滑稽，就因为它的“硬”。在《关于“维基解密”之反思》中，埃科悬想在未来，为了避免泄露，机要信息的交换将不得不回到原始的方式：“比如在卢里塔尼亚的宫廷化装舞会上，某位白面小丑，偶尔退避至烛光照射不到的阴影下，摘下面具，露出奥巴马的脸，对面的书拉密女则迅速撩开面纱，我们发现那是安格拉·默克尔。”（第260页）这种憨豆先生式的表演，即是典型的“硬滑稽”，其中幽默的空气已相当稀薄。利顿·斯特拉奇（Lytton Strachey）曾专门写过一篇文章，论证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位“幽默家”（humourist），仿此，我们不妨说翁贝托·埃科是位“不幽默家”（unhumourist），既然以峻刻严冷著称的俄罗斯小说家可以有诙谐的一面，一贯想借插科打诨讨读者欢心的意大利小品文作家自然也可以是不幽默的。

《树敌》《电视女郎与保持缄默》和《关于“维基解密”之反思》分别指向移民问题、新闻审查、信息安全。对埃科表达的那类观点，我一向并无异议，不过，对于我而言，他始终是个“开明的普通知识分子”。所谓“开明”，是说他讲的多半并无不妥；所谓“普通”，是说他的“开明”在知识界属于平均水准。他既不是伏尔泰、狄德罗，也不是萨特、福柯，听他谈任何问题，都不可能有什么拨云见日、醍醐灌顶的透彻感。他手里没有劈开冰海的利斧，有的只是花衣小丑（harlequin）的那根棒（slapstick），这里打打，那里敲敲，发出几下清脆的撞击声罢了。☑

# 彼得·汉德克究竟需要撕掉多少标签？

记者 孙若茜



奥地利作家彼得·汉德克和他的作品《试论疲倦》

“先锋”“反叛”“愤怒”“政治性”……对于彼得·汉德克来说，这些标签都不如“世界蘑菇大王”。

奥地利作家彼得·汉德克，被定义为文学史中“活着的经典”。他因此更像是一个存在于我们想象中的人物，想象他的严肃，想象他的愤怒，想象他会因为一个无趣的提问扭头而去，想象他因此并不好相处。以至于，就连这种想象似乎都是小心翼翼地进行的。我们还喜欢给这种想象贴标签，先锋、实验、反叛、后现代以及政治性等等。一厢情愿。直到，汉德克在前几天完成了他的第一次中国行，用他温和的方式，在我们面前做出撕掉身上的标签和破除想象的努力。

首先是《骂观众》，这是彼得·汉德克在中国被提问最多次的一部作品。这部他在1966年创作的剧本，

使他一举成名。它完全没有遵循传统的戏剧规则，没有情节、对话、戏剧性人物和行为等等，演员从头到尾站在舞台上“谩骂”观众。这种反传统审美的呈现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也成为他最早被翻译成中文的作品之一。与之同期进入中国的，还有他同年写作的小说处女作《大黄蜂》——一部同样反传统的作品，一个童年经历战争的人回忆战争中发生的种种，是作者的亲身经历。和传统小说不同的是，书中没有脉络清晰且连续的发展情节，更多的是事件的细节以及具体的感受。

对于其早期作品的熟悉及对后来作品的陌生，使得汉德克阶段性的创作风格被很多人想象成了他创作的整体样貌，甚至于他整个人的处事风格。有关愤怒、反叛、实验精神的判断，大多来自于这里。更重要的是，那种反叛精神恰恰与中国读者在接受这些作品时的内在经验和需要不谋而合，形成了很强的认同感。因此，大量的问题不断反复地指向这里。

汉德克打破了这种想象。他否定了《骂观众》的创作是一种语言的实验，创作灵感也不是来自文学，而是他想要写一个作品，用来复制披头士的那首《I Want to Hold Your Hand》里的精神，对当时正在读大学的他来说，它意味着一种解放。《骂观众》就是汉德克用以表达这种精神的形式。他说，这部自己只花了6天写成的剧本，“它甚至称不上正规的话剧作品，更多的是一部完整的话剧之前的引言部分”。

他继而撕掉了提问者给他贴上的“反戏剧”和“后现代主义”的标签。“我创作时，根本没有‘后现代’这个词。”他并没有否认自己在尝试戏剧的最初阶段有意地对传统戏剧做出改变，但这个阶段在他的创作生涯中极为短暂，仅仅集中在最初的5年，远不能构成一种概括。从70年代开始，他的戏剧创作形式就回归到了经典话剧。他说，直到不久前刚刚写完的话剧，他都是在遵循传统。“综合来说，我的第一批戏剧，或说早期戏剧是一些更友好的戏剧。而我现在的戏剧反而更多的是只具有一种友好的形式而已，而我的内容反而是一些反戏剧方面的东西。”

但问题还是反复，汉德克终于被引入了一种更为符合人们之前想象他的样子，开始对提问表示拒绝：“中国的观众总是抓着《骂观众》这出戏不放，对我来说有一点不礼貌，老追问这一部。这个问题让我感觉像是在问我小手指的指甲，但是我整个人在这里，那只是很小的一个部分。我有很多的作品，那只是我早期的一个小小的作品，我觉得这特别遗憾，甚至让我觉得有一点心痛。”

一路从上海到乌镇再到北京，汉德克在公开场合的回应逐渐显得疲倦。他开始更加明确地表现出自己对问题质量的审度——只有中国德语文学研究会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举办的德语年会上，对于台下的德语研究者们的提问，他表现出了充沛的兴致，一度主动提出“再来几个问题，我们再结束”。——其他的公开活动中，虽然他也会在结束时礼貌地说上一句感谢：“很多人的问题对我来说就是打开了一扇一扇的窗户。”但回答问题时，却完全没有附和跟含混，或还会不时地发出反问，这让现场的气氛有时略显紧张，但这正是一个作家应该有的态度。

汉德克的政治标签主要来自西方的主流媒体。最早是因为1968年的戏剧《卡斯帕》的成功。它讲述了19世纪德国纽伦堡的一个街边少年，只会说：“我也想成为那样一个别人曾经是那样的人。”人们教他

讲话和语法，最后他被谋杀。“对我而言，杀死他的那把刀就是语言、语法，这部戏的主题可以理解为语言是可以杀人的。”汉德克说，“这部戏首演的同一天，发生了大学生骚乱。于是整个欧洲批评界对这部戏的反应都是充满热情的，媒体当时说，这部戏就像是巴黎街头的学生们创作的一样。”

“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我只是想表达一个主题，就是一个青年人是怎么被社会毁掉的。”汉德克说，“我从来都不是一个很具政治性的人，基本上我写作的出发点从来都不是来自于社会上大多数人参与的运动。”至少在《卡斯帕》时，他就并不是主动进入社会活动的公共视野的。

人们再一次开始从政治的视角审视汉德克，是在90年代。不再是充满热情，而是一种集体性的攻击，是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政治标签。汉德克回忆说，攻击集中在他1996年发表了游记《多瑙河、萨瓦河、摩拉瓦河和德里纳河冬日之行或给予塞尔维亚的正义》后，这篇文章当时被全文刊载于《南德意志报》上，记述了他在1995年底在塞尔维亚的旅行。通过自己的观察，他描述了南斯拉夫解体后的现实，并将矛头指向西方主流媒体无视事实的一系列报道。“（文章发表）之后的四周，一片死寂，而后骂声一片。”很多人站出来批评他。

汉德克说：“要是我不这样表达自己的看法的话，那我的人生中就缺少某些决定性的东西。”他并非拥有很强的政治性的说法依然可以继续成立，那是因为他所表达的政治观点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一种民族认同感。他的母亲是斯洛文尼亚人，因此，对于塞尔维亚，对于南斯拉夫，他有着一种很特别的情感。

他没有因为反对而停止发声，而是始终表示自己对于战争的痛恨，对于遭受战争的平民的同情，以及对于西方人道和正义假象的嘲讽。“我无须辩解，但是要让人们听到我在想什么。”当时，已经有20年没有附和德语文学朗读传统的汉德克主动向苏尔坎普出版社提出做一次朗读之旅，以表示对北约轰炸南斯拉夫反对。“在人们众口一词地支持北约轰炸南斯拉夫时，却对轰炸所造成的几千平民的死亡视若无睹，在人们批评米洛舍维奇对于平民的屠杀的同时，却忽略了北约的轰炸也是对平民的屠杀，同样是一种不顾民意的专制暴行。”

1999年，在北约空袭的日子里，他两次穿越塞尔维亚至科索沃。同年，他的戏剧《独木舟之行或者关于战争电影的戏剧》在维也纳皇家剧院首演。为了表

示对德国军队轰炸的抗议，汉德克退回了自己在1973年获得的毕希纳奖，这个德语文坛的最高荣誉。2006年3月18日，他参加了米洛舍维奇的葬礼。这再一次掀起轩然大波。媒体群起而攻之，他的剧作因此在欧洲一些国家中被取消演出。“那么多人针对我，是大家都受到了主流媒体的左右，他们的报道是听从了一边倒的政治家的摆布，而民众对这件事情并没有一个非常独立的见解。”汉德克说，“西方主流媒体所操控的对作家进行的攻击一直就有，‘二战’之后实施的就有三个，针对马丁·瓦尔泽、君特·格拉斯，还有我。”

汉德克也不是反对一切标签，他说：“我自己是一个关于蘑菇知识的世界冠军，我认识所有的蘑菇品种。”“我是世界蘑菇大王。”这是他喜欢的头衔。2012年，他写作了《试论蘑菇痴儿》，里面讲述了一个痴迷于寻找蘑菇的人，一个因此失踪的人。这是他从1989的《试论疲倦》开始，以“试论”为题创作的第五部作品，此前还有《试论点唱机》《试论成功的日子》和《试论寂静之地》。这也是我们目前能读到的，由中国德语文学研究会副会长韩瑞祥主编，世纪文景出版的9卷本汉德克作品中，创作时间最近的一部，写于70岁之后的作品。

“试论”是一种法国传统的写作形式，最早蒙田也在这种形式下写作过。“我在法国生活了将近30年，所以从法国的文学作品当中接受了试论这样一种文体的写作。”汉德克说，在德语中，它类似散文，也是柏拉图曾经提出来的一种哲学的研究问题的方法。比如《试论疲倦》，就是在问自己“疲倦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然后就此来写一个论述。

因为人物和情节的存在，《试论蘑菇痴儿》在形式上更接近于一部中篇小说。里面的主人公和汉德克的经历有着很多相近之处，生长于同一个村庄、同样学习法律等等，因此是带有自传性质的写作，被看作有关其人生的回顾和反思。作家承认这种自传性，至少对于蘑菇的痴迷，他就和主人公完全一致。

“这5篇试论可以看作一种断片式的对我人生的描写，都有个人的影子在里面。但是，你在里面不仅可以看到作家的影子，同时也可以看到你自己的影子。”汉德克这样说，意味着我们可以因此在文中探寻到他的秘密，但也依然可以把它当作一个单纯的寻找蘑菇的故事，仅仅体会那种对事物痴迷的力量和寻找的乐趣。毕竟，除此之外的汉德克现在的写作，我们知之甚少，而《试论蘑菇痴儿》也不过只是他“手指上的一片指甲”。

## 《读书》2016年第十一期目录

- 商伟 言文分离与现代民族国家：“白话文”的历史误会及其意义（上）
- 陈彩虹 在无知中迎来第四次工业革命
- 佐佐木力 “没有卫生间的高级公寓”
- 王炎 海内存知己
- 短长书
- “富布赖特”往事（顾钧）·怀念老友刘叔新（李行健）·苏兴先生琐记（郭杰）
- 汪晖 承认什么，何种政治？
- 张承志 轻轻地触碰（二）
- 李玫 文献纂集 嘉惠学林
- 苗怀明 既欲求真 宁设计辛苦

## 品书录

- 以“体用”阐释文气（左东岭）·物质技术如何改变中国文学生活（杨早）·理想的学术普及还有多远？（孙焘）
- 张宗子 鲁迅的样子
- 张飞岸 罗伯特·达尔的红与黑
- 田飞龙 立法者林肯的神话尺度
- 叶隼 从“文化学”的建构谈起
- 马子木 邓之诚及其清史研究
- 刘晓峰 “俘虏第一号”
- 金婕·弗罗斯特 德拉菲尔德及其时代
- 河西 沙和尚与炼丹术
- 汪民安 杜尚、劳森伯格和“八五新潮”美术运动



《读书》  
生活需要读书，  
丰富生活

读者服务热线电话：(010)84050425, 84050451  
读者服务部 E-mail: dzfw@lifeweek.com.cn  
邮购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9号B座《读书》编辑部  
邮政编码：100125 国内代号：2-275



## 文学就是从最肮脏的媒介中寻找最纯洁的宝贝

——专访彼得·汉德克

“先锋”“反叛”“愤怒”“政治性”……对于彼得·汉德克来说，这些标签都不如“世界蘑菇大王”。

**三联生活周刊：**《试论蘑菇痴儿》是你被译成中文的作品中距离现在最近的一部创作，在这其中，主人公痴迷的“蘑菇”，就是蘑菇本身吗？有没有象征成分？

**彼得·汉德克：**没有任何象征意义，我关注的就是找蘑菇的这个过程。“一朵玫瑰花就是一朵玫瑰花”，对我来说，一个蘑菇就是一个蘑菇。我自己就是一个非常喜欢采蘑菇的人，我是世界蘑菇大王。我只收集野生的蘑菇，而不是人工养殖的，我关心的就是不能被养殖的这些蘑菇本身，这是大自然里面的物种。花、树、草都可以人工培养，一些蘑菇也可以，比如我们常在蘑菇汤里面吃到的那种，或者木耳等等，但是有一些野生蘑菇，有200~300个品种是完全无法由人工养殖的，我就是对这些感兴趣。我人生的第一笔钱就是10岁的时候把采来的蘑菇卖了，然后用那笔钱去买了书。

**三联生活周刊：**这么问是因为那篇文字里有很多自传性的因素，以至于“蘑菇痴儿”就像是，或者说你的镜像。过去的几篇“试论”虽然也有你的影子，但是并没有一个实际的人物形象出现。

**彼得·汉德克：**你的判断是对的。这5篇试论可以看作一种断片式的对我人生的描写，都有个人的影子在里面，《试论疲倦》《试论成功的日子》等等都是在讲我自己。但是，你在里面不仅可以看到作家的影子，同时也可以看到你自己的影子，在不经意间找到对照。每一个读者看到《试论疲倦》时都会想到自己什么时候是疲倦的，会想到自己的身体感受。读《试论成功的日子》就会想到，对于你来说什么才是成功的美好的日子。《试论点唱机》，它在我的青少年的生活里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意味着我能听到自己喜欢的音乐……而这个《试论蘑菇痴儿》，是讲你对一种事物的痴迷，开始可能只是热爱，然后慢慢变成一种痴迷，

变成疯狂。这是一个很奇怪的故事，从传统意义上来讲人们一般把它当作散文，但其实它是一篇中篇小说，就像是托马斯·曼的《威尼斯之死》一样的中篇小说。

**三联生活周刊：**在这几个试论里，谈到疲倦，讲到厕所，在人们固有的认识里，这些都不是有关美好的事物，但你都是从欣赏的角度，给它们赋予了新的意义。是有意反其道去打破固有的观念吗？

**彼得·汉德克：**可能厕所、疲倦会让人有不好的联想，或者形成一种固定的想法，我接受大家的想法，但是又想超越一般性的想法，关键还是想要叙述。比如《试论疲倦》，讲述疲倦的各种各样的方式，关于疲倦的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感受，并不是想打破什么，打破惯例或者固有的思维都并不是我的目的，我只是去叙述，去讲述。

像是《试论寂静之地》，就是指厕所，你可能也有过这样的感受：在一个社交场所，你不停地听到别人说话，你也要不停地说话，但是突然在某一个时刻，你变得像自闭症患者一样不能说话，没有办法和别人交流。这个时候你本没有上厕所的需要，但是你会想要去厕所待一会儿，关上门，因为那是一片寂静之地。过一会儿，你缓缓地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出来了，你又能说话了，休整好之后从厕所出来，又可以重新社交。我从来没有想要打破传统或者打破规则，只是觉得这是一个可以更深入地去探讨的话题，疲倦，寂静之地，蘑菇的主题还是挺有意思的。

**三联生活周刊：**有意思的是你让这种探讨带有一种研究性。

**彼得·汉德克：**其实这个可以当作纯粹的文学作品来欣赏，一方面是文学，一方面是研究，文学也应该有这种科研性。只有具备了研究的特性，才能称得上是一种娱乐，是一种文学。我说的这些话是从一个读者的角度出发，而不是作家的角度。我希望读到这样的文学作品，讨厌娱乐似的文学，那种就是为了让分散一下注意力，放松心情，我非常不喜欢，文学是为了让人集中注意力去阅读的。但是当今的文学还是以娱乐性的为主，那些都不是文学，要是上帝在的话，就会把那些作家都赶出上帝的庙宇。佛也会这样做的，佛可能会拿笤帚把它们都扫出去。

**三联生活周刊：**这种娱乐性为主的文学，是否在某些方面就等同于你最近常提到的国际性文学？

**彼得·汉德克：**国际性文学就意味着你在哪里写作都是一样的，写出来的是一样的东西，无论是纽约、曼谷还是阿拉斯加，或者其他的地方。在歌德提倡的概念里，世界文学，说的是一个遥远的国家用文学向全世界展示什么是我的国家。每种语言都有自己的方式，每个国家也都有自己的特点。你一看就知道是在写某一个国家或者城市，语言的节奏、描绘的画面都不一样，但是你同时会觉得它所描写的和你自己的某些感受是相通的。国际性文学是每个国家的文学作品都趋同，失去了本国的特点。现在的国际文学当中最不好的就是侦探小说，

**三联生活周刊：**所以你就写了那部没有主线、情节，但是有一些侦探元素的小说《推销员》？

**彼得·汉德克：**那是我的小说中，唯一一本让人读不太懂的作品，是一种对侦探小说的讽刺。

**三联生活周刊：**你觉得奥地利文学和德国文学之间的差别主要在哪儿？

**彼得·汉德克：**每一个国家的文学都有各自不同的游戏方式，德国和奥地利的文学的游戏方式不同。奥地利作家的作品中常常有一些游戏的味道，而在德国作家的作品中，更加严肃，没有那么多游戏的成分，这可能是作家的性格不同。格里尔帕策就是非常典型的奥地利作家，他的作品和出生地之间有着很强的对应关系。

**三联生活周刊：**在这个框架里，你还强调了一个“精确性”的概念，怎么理解？

**彼得·汉德克：**我推崇那种不精确性。太过于精确就没有办法区分是不是亲身经历的。在文学当中，特别精确的时候你就会怀疑其真实性，它没有给读者留想象的空间。

我读老舍的作品时，读的是法语译本，译者翻译得不好，在很多描写的部分译者用的是典型的法国人的描写方式。他因此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将语言转换成一种法国人看惯的语言而破坏了世界文学，对于文学来说这是一种灾难。在德国近来出版的很多俄国作家的经典作品中你会发现，新的译本用了大家现在特别熟悉的语言，但是对比 19 世纪，德国人去翻译这些俄语作品的时候，语言非常真实，充分地带有陌生感，你会知道俄国人的说话方式，并且那些作品本来就是 19 世纪写的，也应该用相对应的 19 世

纪的语言，保持古典的文风。现在的这种语言更具国际性，更为通行，但却等于失去了原汁原味，这种语言可能就更精确了，但就是这种精确可能会损坏原来的韵味。文学是一个大问题，但它是一个很美好的令人愉悦的问题，没有问题就没有文学。

**三联生活周刊：**语言的问题也是你在作品里讨论的，比如《卡斯帕》就寓意语言可以杀死一个人。语言不断更新，但始终都具有那种操纵性，你认为这种更新的意义在哪儿？

**彼得·汉德克：**太难描述这个感受了，语言是包容性最强的媒介，但是同时它也是最肮脏的一种媒介。语言是一把双刃剑，在和其他的媒介，图像、声音、音乐、绘画等等相比之下，是被使用最多的，也是最多被滥用的、最不纯粹的一种媒介，我们都在报纸、电视上见到了这一点。这是一个辩证的问题。语言是最能包含纯粹性的，是可以对它进行净化的一种媒介，文学的意义其实就在于将语言这种最肮脏的媒介转化为最纯粹的媒介，这就是从事文学的人所做的工作。

绘画、音乐，本身也是一种媒介，每次欣赏的时候，你都会意识到它作为媒介的存在，但语言的形式，让你意识不到，或者说忘记了它本身是一种载体。就好像你要读一首很美好的诗，并沉浸其中，并不会意识到语言其实是在作为媒介，只是体会诗的美好，所以文学就是从最肮脏的媒介中寻找最纯洁的宝贝。这是一个辩证法，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秘密。我更喜欢“秘密”这个词，超过“辩证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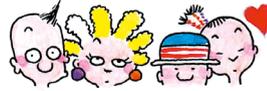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总是在习惯性猜想你在写作中打破了什么，比如传统、规律、观念，就像是一个不断制造冒险的过程。你在写作中遭遇过什么真正的危险吗？

**彼得·汉德克：**每次都是，每天都会陷入危险。

**三联生活周刊：**对你来说什么是危险的？

**彼得·汉德克：**我是一个罪犯，我就像是一个被判了刑的人，我的身份是不合法的，我不属于人类。每天都在危险之中，也许这有点夸张，我是指每天都像流水一样过去，你会产生一种很无助的感觉，你会想说，“我想要获得什么呢”“我得到了什么呢”，陷入这种想法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危险。也许因为我是基督教徒，每天都会陷入对自己的原罪的追问，也许应该改信佛教，但如果成为佛教徒可能就成了作家了。■

# 大家都有病



朱德庸



# 爸爸的长指甲

文 / 李文世（长沙） 图 / 陈曦



我一直觉得父母的感情不够好。

小学的时候，我一直很羡慕一位个头比我小的女同学，她虽然比我矮，但我总记得她给我炫耀她父母很恩爱时，我在她脸上看到的那种别人都学不来的自豪，一下子就弥补了她的身高。至于什么是相爱呢？用我那位有些矮的小学同学的话来说就是：即便已经结婚很多年，孩子都上小学了，父母还会在晚饭后在家里不足10平方米的客厅里搂腰跳舞。这不是说笑，有一次我去她家耍时，真的看到了她口中所说的那种相爱，那种区别于我那毫无浪漫可言的父母的相爱。也怪不得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对这位小学同学妒恨到只记得她比我矮了。

我也曾试图从父母的点滴生活中找出一丝所谓的相爱的故事，这个念头穷尽了我童年的幻想也不曾看到，他们会冷战、会争吵、会向我谩骂、会摔门离去留下洋洋洒洒不肯落下的灰尘，却好像从来都不会相爱。我一度认为，他们是相恨的。如果不是因为贫穷和我这两个甩不掉的累赘，他们早就恨不得和对方把关系撇得越远越好，遇见彼此对他们而言大概就是遇到此生的厄运与劫难。

后来，我也不太在意“爱与不爱”这种问题了，因为朋友的父母离婚的越来越多。我告诉自己，他们只要还生活在一起，还和我处在小小的房子里，每天早上一起起床、一起刷牙、一个接一个地用着卫生间，我就不再纠结让他们永不分离的是贫穷还是爱。

高三的有一天，我和同伴坐在教室后头你一言我一语地聊着天南和地北，同伴是天生的指挥家，话到了兴奋的时候，手便化作了她的另一张口，在空中比划着嘴里来不及道清楚的故事。我注意到她的指甲极短，肉芽抵住了指甲的出路，那是常年咬指甲后无法掩盖的铁证。我试图以一个不咬手指的模范生给她说明指甲对于一个女生的重要性：在你生命最重要的时刻——戴上婚戒的那一刻，没有指甲的光秃秃的手指

头该是一种多么影响心情的存在。我很快在脑海中想到了我妈的手，我妈的手指也是光秃秃的，她的手指甲倒并非自己咬掉的，我记得我妈的大拇指大概是因为生病了所以一直无法留长指甲，也是因为不好看，所以我妈的手上很少戴戒指。我爸则不同，当然不是说他戴戒指，只是说印象里的父亲右手，一直留着很长的指甲，长到你觉得作为一个男人的指甲长得有些碍眼的程度。我一直认为，这是我爸作为现代社会里迂腐的旧社会知识分子的明证之一。

不过，和那些知识分子不同的是，我爸从来只留着大拇指上的指甲，这突然的察觉让我觉得有些好奇，我攀着记忆曲折的支脉细细搜刮着脑海中关于指甲的记忆。至于他是什么时候留起指甲来的呢？我想大概是从我妈的指甲生病了之后。刚刚没了指甲的那段时间，她总在抱怨：“没指甲择菜真麻烦。”从那个时候开始，无论之后他们怎样争吵、冷战、摔门，父亲也不曾断过他的指甲。他总是在我妈洗好锅、热好油之后主动地将已经择好的菜递给那个正生着气或者口中谩骂不断的家中最有权威的女性，然后再若无其事地离开。

而那截长长的，又总是被菜汁染了色的指甲却被他悄悄地藏在了身后。

那个在别人看来不洁净、碍眼的存在，是父亲在温吞而平淡的生活中悄悄冒头的给我妈的爱。它又丑又脏，不起眼到连身为他们女儿的我在这十几年的岁月中也一直偏颇地质疑着它的存在。

但它究竟在那里呀。

之前在，现在在，我回过头，看着在呛人的菜香和我妈叨叨不停的背景中缄默择菜的父亲，我想，它以后也会一直存在。☑